

女性的奥秘

〔美〕贝蒂·弗里丹 著

程锡麟 朱徽 王晓路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女性的奥秘

〔美〕贝蒂·弗里丹 著
程锡麟 朱徽 王小路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The Feminine Mystique

by Betty Friedan

根据 Dell Publishing Co.,Inc,1963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李　陈
封面设计：文小牛
技术设计：凌志云

·西洋镜译丛·

女性的奥秘

贝蒂·弗里丹　著　程锡麟　朱　徽　王晓路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16.125　插页4　字数340千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0374-9/C·90 印数：1—5000

定价：3.95元

译 者 前 言

贝蒂·弗里丹1921年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皮奥里亚。1642年，她毕业于史密斯女子学院，继而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了一年心理学。弗里丹曾先后在坦普尔大学、昆斯学院和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她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学者、社会改革家和女权运动活动家。1966年，她创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并成为该组织的主要领导人；1970年她又协助组织了“全国妇女政治会议”（NWPC）。自1971年起，弗里丹任《麦考尔》杂志特约编辑，并在《哈泼斯》、《大西洋》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章。1976年，她出版了《它改变了我的生活》（*It Changed My Life*）；1981年又出版了《第二阶段》（*The Second Stage*）。弗里丹的著作（主要是《女性的奥秘》）与她的活动大大地促进了女权运动的发展，影响了整整一代美国人。而今，这位老人仍然致力于女权运动，兼任教学工作并孜孜不倦地从事着著述。

女权运动，亦称妇女解放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目的

是为妇女争取平等权利，使妇女具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对女权运动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时期。18世纪法国革命家、哲学家孔多塞曾对妇女解放表示赞同。他关于人类能够无限地完善自身的进步观念对19世纪的哲学和社会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奥林普·德·古日写了《女权宣言》。这篇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于1792年在英国发表了《女权辩》一文，谴责了女人生来就是男子玩物这一观点，提出妇女应当在教育、工作和政治方面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益，并要求大力开发妇女的智力。但直到1870年，《已婚妇女财产法》通过后，英国妇女才有权拥有自己的财产。直到1919年英国妇女才被允许参加议会竞选，到1928年她们才获得选举权。在美国，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始于1848年7月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福尔斯和罗彻斯特举行的女权大会。在会上美国改革家先驱伊丽莎白·凯蒂·斯坦顿和卢克丽霞·科芬莫特仿效《独立宣言》，发表了一篇"苦情宣言"，声明"男女生而平等"。这一宣言陈述了妇女受歧视的不公正状况，并要求根治这个社会弊病。但是女权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女权运动的进展往往更为缓慢。法国妇女直到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而且在很多地方还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法国女作家、哲学家西蒙·德·波伏瓦为现代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块丰碑。她于1949年写了一本世界畅销书《第二性》（*The Second Sex*），阐述了"解放妇女也就是解放男子"的观点，并为妇女争取平等的斗争提供了最有力而简炼的口号："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变成的！"《第二性》在美国"被广为阅读。它至今仍

然是激发理智的源泉，但没有产生像弗里丹对美国中产阶级妇女所受的挫折的报告所曾引起的那种强烈反应。”①这里所说的报告即世界新女权运动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弗里丹著的《女性的奥秘》。

《女性的奥秘》出版于1963年。是作者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一部纪实体裁的名著。作者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对美国的家庭主妇、医生、律师、学者、专家、编辑等各行各业的人士以及大学的女校友作了广泛的调查，并考证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了此书。全书的基本内容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一、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作者首先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5年间，妇女问题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美国女性不关心国际国内大事，不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女青年毫无事业心，结婚年龄越来越小，女学生纷纷辍学而结婚，“幸福的家庭主妇”成了典型的美国妇女形象和千百万女性追求和仿效的样板。而当她们成了主妇，陷于无穷无尽的家务之中时，又苦于看不到前途，生活没有意义，因而感到极度空虚和苦闷。作者用纳粹集中营来比喻她们所处的环境。有些妇女以寻求性刺激而获得一时的解脱和慰籍，其后果却更为严重。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医生、作家等不能对这种“女性的奥秘”作出正确的解释，更不能提出解决的办法，反而加

①丹尼尔·霍夫曼主编，《美国当代文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第514页。——译者。

剧了这种奥秘的危害，这就成了病态的美国社会中一个严重的问题。

作为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家，作家自己就有一段从女学生到家庭主妇的亲身经历，她结合自己的经历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分析和研究工作，透过复杂纷繁的社会现象看到问题的实质，并发出了强烈的呼吁，这对当时正陷入空虚、苦闷之中的千百万美国妇女，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

二、历史的回顾

作者回顾了殖民地时期、美国建国初期、开拓西部边疆时期妇女起的作用，以及100多年来美国女权运动发展的历史，热情歌颂了女权运动领袖人物为争取妇女权益进行的艰苦斗争，并指出美国女权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是跟解放奴隶、争取平等自由的斗争相联系的。然而，对在1920年以后出生的美国妇女来说，女权运动已成为历史，对于前辈为之终生奋斗才赢得的权利，新一代女性已经不屑一顾了。作者还根据自己的社会调查和查阅的大量资料，指出，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妇女是生气勃勃、积极进取的，她们主宰自己的命运，要干出一番事业来，那时候事业型妇女是美国妇女的典型形象。但是，在经历了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40年代的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安定、物质丰富，人们开始沉湎于舒适的家庭生活，妇女不再到社会上去干事业了。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社会舆论的影响和推动下，“幸福的家庭主妇”终于成了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妇女典型形象。

作者在横向展开美国妇女问题之后，又纵向从历史的角度回顾美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和波折，以丰富的史料令人信服地说明：美国妇女争取自己在社会上、家庭中的地位，争取自己应该享有的各种权利，是有传统的，是取得过胜利的，曾形成过与欧洲大陆的妇女完全不同的形象，从而大大鼓舞了当代陷入苦闷之中的女性继承先辈的事业，为妇女解放而斗争。

三、批驳对妇女的歧视偏见

作者批驳了对妇女的种种歧视偏见，如“女人生来低下”，“男女生来不平等”，“上帝创造女人就是作男人的仆从”，“妇女在生理上的缺陷注定她们不可能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结婚生育、当贤妻良母，是完善女性的最佳体现，也是女人的唯一天职”，“事业毕竟是男人们的事”，等等。作者作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女学者，引用大量资料和社会调查的结果，批驳了这些错误观点，并列举大量人物加以说明，论证了妇女完全可以跟男子一样，女人和男子的地位应当是完全平等的，进一步揭示了美国妇女问题的实质。

四、理化上的研究和批判

作者肯定了弗洛伊德的天才、严谨的作风和对人类作出的贡献，但同时也指出，由于受到时代、社会环境及文化发展等许多方面的限制，在今天看来，弗氏学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作者分析了弗氏学说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还指出现代科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证明弗氏学说有若干不实和错误的地方。作者认为，作家、心理学家、编辑、教育工作者等将弗

氏学说广泛运用于美国的妇女问题，用弗氏学说来强化对妇女的偏见歧视，这是完全错误的。作者还深入研究了玛格丽特·米德关于文化与性的论述，指出其学说对现代美国妇女有深刻影响。米德既赞扬了妇女的巨大潜力，但又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支持因性别的生物功能而对妇女的作用加以限制，从而对女权运动产生了“冻结”的作用。作者还对马斯洛的心理学加以阐释及引证，从而使自己的分析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作者对理论界的权威并不盲从，而是深入研究和探讨，从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的角度检验其理论，指出其不实之处和局限性，从新的高度批判了“女性奥秘”的所谓“理论基础”。

五、美国妇女的前景

作者认为：陷入苦闷彷徨中的千百万美国家庭主妇只有担负起自己的责任才能够走出陷阱，那种“适应”自己的环境的想法是没有出路的；对社会的责任感以及对生活的使命感只能来源于创造性的劳动。她号召妇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从自己的能力和实际需要出发，设计出一个蓝图。美国妇女必须断然否决女性的奥秘，看穿奥秘的虚幻，努力战胜各种歧视偏见，坚持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使自己获得新生。这可能是长期的、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妇女能够按自己内心的呼唤去努力的时代已经不是遥远的将来了。

《女性的奥秘》是女权运动的里程碑式著作。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对美国社会的这一病态提出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对安于现状、苦于困境的当代美国妇女发出了出自内心

的呼喊，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新一代美国妇女的觉醒，极大地推动了六七十年代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这本书有较大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作者带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走访了众多的有关人士，参阅了浩繁的文献资料，并加以整理分析，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生物学等各个角度，对妇女问题进行了理论上的阐释和剖析，其深度和广度都是少见的。

这本书也是弗里丹本人的求实精神和严谨学风的体现。作者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与读者直接对话，阐述自己的观点，感情真挚、语气深沉，发自内心，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弗里丹对这一社会问题的提出既不是出自主观臆断，也不是停留在现象的描述上，而是踏踏实地地从事调查研究，从多种角度把这一问题置于科学的基础上深入地加以剖析。这首先表现在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不厌其烦地加以整理，而且谨严缜密、始终如一。加上作者尊重事实，注重调查，亲自采访，从而把理论置于社会现实的广阔层面上，这种非学究式的作风也是值得称道的。弗里丹可以说是集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人物。

然而，正是由于作者对某些问题的阐释，采用的角度过多，反复加以说明，因而致使本书的结构显得松散，而且由于书中引文过多，有些地方颇有累赘之感。另外，由于作者在有些问题上采取了迂回式的阐释，叙述文字亦显得生涩。但是，作为一部唤起千百万妇女，表达她们的心声的名著，它所蕴含的情感和力量是不容置疑的。难怪《美国当代文学》(*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

ing）这样评价道："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The Feminrne Mystique*）出版于1963年，它常常被作为标志女权主义者自我意识新浪潮出现的一份文献。弗里丹的著作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宣言，而不是它的文学性内容。但是它的愤怒和热情引起读者越来越广泛的反响，已经使它成为女权运动的经典性著作。"①

本书对于我国读者了解西方的女权运动，了解美国社会，尤其是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和文化是很有帮助的；对美国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根据1963纽约版译出。原书所附的注释我们一律改为脚注，用①、②、……标出。对于不影响正文理解的原注释，我们作了一些删节。另外，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适当加了一些译注。原书所附的索引，我们考虑对读者参考价值不大，故全部删去。本书的分工如下：前言、第1至第5章由朱徽译，第6至第10章由程锡麟译，第11至第14章由王晓路译。本书涉及面很广，有些术语出于不同的上下文，其含义亦异，译名在基本统一的前提下，未强求一律。

译文的不妥、疏漏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译　者

1987年11月

---

①丹尼尔·霍夫曼主编，前引书，第514页。——译者

作者序言

尽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还不能看得很清楚，但是我已经逐渐认识到，当今的美国妇女在探索她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方面，有些东西是非常错误的。尽管我自己离家外出，有了能利用自己的能力和教育水平的工作，但作为一个妻子和三个小孩的母亲，还是第一次感到这一点也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问号，我当时的心情因为半是内疚，所以也就半是诚挚了。正是这种个人生活中的问号使得我在从史密斯学院毕业15年之后的1957年，花了大量时间对我大学时的同学进行了广泛的调查。200位妇女对我那些有关内心隐密的无所限制的问题作出的回答使我认识到，那些错误的东西不能够以当时世人所认可的那样，与她们受的教育联系起来。她们和我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得到的满足，以及我们受的教育对此所起的作用，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永无休止的论战中或褒或贬、在教室和诊所里加以分析研究、在妇女杂志中所描述的现代美国妇女的形象完全不相吻合。在我们作为女人的生活现实和我们要努力去与之相符的那种形象（我

现在把这种形象称为女性的奥秘）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差异。我很想知道其他女人是否也面临着这种精神分裂症似的分离，也想知道这种分离的意义。

于是，我对女性奥秘的起源，及它对以这种方式生活、或在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女性所起的作用，开始进行追本溯源似的探索。我采用的方式就跟一个记者采访报道某个事件一样，只是我很快就发现了这绝非是一般的普通事件。我好如置身在现代思想和生活的广阔原野上，被一个线索引向另一个线索，浮现在我眼前的轮廓令人吃惊，它既不符合传统的妇女形象，也不符合对妇女心理作的基本估计。由于在这以前已经按女性奥秘的说法对妇女进行过研究，所以，尽管不多，我还是在过去对妇女作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些使人困惑不解的问题。梅隆基金会就瓦萨女子学院的学生所作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波伏瓦① 对法国妇女内心的探索，还有科马罗夫斯基②、马斯洛③ 以及米达尔④ 等人的著作也是这样。我还发现，尽管男子的地位对妇女所具有的意义似乎还没有被人们认识到，但从心理学角度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思考已日益加深，这种情况引起了人们更加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我还对那些给妇女治病、帮助妇女解决问题的人提出咨询，从中获得更进一步的例证。我跟妇女杂志的编辑谈话，

---

①波伏瓦（1908—），法国女小说家、哲学家，萨特的妻子。因论文《第二性》（1949）而著名。——译注

②科马罗夫斯基，美国著名的女社会学家。——译注

③马斯洛（1908—1970），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译注

④米达尔（1903—），瑞典女外交家，政府大臣，198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之一。——译注

跟广告动机研究者谈话，跟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人类学、社会学、家庭教育等领域内研究妇女问题的理论专家们谈话，从他们的谈话中探索女性奥秘的发展过程。我又深入采访了80位正处于人生关键时刻的女性，每次采访时间从两小时到两天不等，她们是正在面临或正在避开“自己是什么人”这一问题的高中和大学的女学生、那些年轻的主妇和母亲（对她们来说，如果女性奥秘是正确的，那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于是她们也说不出来究竟是什么问题使她们感到困扰），还有就是那些年近40，面临人生抉择的妇女。直到进行了这些采访，那个使人困惑的难题才开始由零星的线索聚合起来。这些妇女，有的深受折磨，有的沉静安祥，她们给了我最后的线索，也向我对女性奥秘提出了最严厉的控诉。

要是没有许多专家、包括这一领域内著名的理论家和做实际工作的人员的帮助，要是没有许多既相信又要保持女性奥秘的人的协助，我是不可能写成这一本书的①。

本书对理论和事实这两者所作的深入观察和阐释，以及本书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当然均属我本人。但是无论我在本书中提出的答案是否是最终答案——社会科学家肯定还要对其作进一步探索——美国妇女的困境都是确实存在的。时至今天，许多专家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一问题，他们按照女性奥秘的观点，作出加倍努力，使妇女能适应她们面临的问题。我作出的回答或许会使这些专家大为不安，也会使妇女们不安，因为在我的回答中包含着社会变革。但是，如果我不相

①下面是作者对一些帮助她写作的人的具名致谢，译者作了删节。——译注

信妇女既受社会的影响，又能影响社会，如果我不相信一个女人最终也能同一个男子一样，具有选择的能力和创造她自己的天堂和地狱的能力，那么，我写这本书，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纽约　格兰德维尤

1957年9月—1962年7月

目　录

无名的问题

这一问题埋在美国妇女的心底，无人提及，已经有许多年了。这是美国妇女在20世纪中叶所经受的一种奇怪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渴求。每一位居住在城郊的已婚女子都在单枪匹马地与之搏斗。当她整理床铺时，当她去商店买日常用品时，当她选配沙发套子时，当她跟孩子们一块儿吃花生酱夹心面包时，当她开着汽车去接送童子军①的小家伙们时，当她夜里躺在丈夫身边时——她甚至不

① 1908年创建于英国的一个儿童组织。在美国亦有同样的组织，吸收7岁至10岁的男女儿童参加，由成人指导活动。——译注

敢在心里对自己发出无声的诘问："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

专家们告诫妇女说，她们的本分就是要努力成为贤妻良母。在这些专家描写妇女、或专为妇女写下的所有专栏作品、专著和文章的万语千言中，关于上述那种渴求，却连一个字也没有，这种状况，已经存在不止15年了。妇女们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传统的呼声和弗洛伊德复杂理论的说教，说她们只该在自身具有的女性特征内荣耀一番，舍此不能别有企求。专家们告诉她们如何去获取一位男子并与之保持关系，如何哺育小孩、训练他们大小便，如何对付兄弟姐妹之间的竞争和青年人的逆反行为，如何买一部洗碗机，烤面包，烧美味蜗牛，自己动手建造一个游泳池；还告诉她们怎样的穿着举止看起来更具有女性的特征，怎样使婚礼更加激动人心，如何使丈夫不至于过早去世，使儿子不至于干出违法的事情来。妇女们被教会去怜悯那些神经不健全的、不具有女性特征的、并不幸福愉快的某些女人，这些女人想当诗人，或是当物理学家，或是当总统。妇女们懂得，真正具有女性特征的女子就不会追求自己的事业，受高等教育，享受政治权利——即老式的女权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独立自主和成功的机会。有些四五十岁的女人至今还心怀隐痛地记得她们是如何放弃那些梦想的，而大多数比她们更年轻的女人甚至连想都不去想那些东西了。专家们的千言万语都在热情赞扬她们的女性特征，赞扬她们顺应时代，赞扬她们愈来愈成熟。她们要做的一切，就是从当小姑娘起直到找丈夫生孩子，应当毕生作出奉献。

截至本世纪50年代末，美国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下降到

20岁，而且还在继续下降，降到了十几岁。有1400万个女孩子在17岁时就订婚了。读大学的女子与男子相比，其比例从1920年的47%下降到1958年的35%。一个世纪以前，女人们要奋斗才可能进大学，而当今的姑娘念大学却是为了找丈夫。到50年代中期，有60%的大学女生中途辍学去结婚，或是她们害怕过多的教育将会成为结婚的障碍。大学专为“已婚学生”建了宿舍，但那些学生几乎全是当丈夫的，为妻子们则专门设立了一种新的学位——“Ph.T”①。

随之，出现了美国姑娘在高中时就结婚的情况。妇女杂志就这种（早婚现象）的令人不快的统计数据发出一阵哀叹，并呼吁在高中开出婚姻课程，设立婚姻顾问。念初中的女孩子在十二三岁就有了男朋友。厂商为10岁的小姑娘生产出装有用泡沫橡胶做的假胸乳罩。1960年秋季《纽约时报》所载的一则童装广告宣称：“它也可以吸引男人”。

到50年代末，美国的人口出生率超过了印度。人们要求被改称作“计划生育”的控制生育运动寻求一种方法，使那些已被告知第三胎或第四胎将是死婴或残婴的妇女仍然可以将这个婴儿生下来。统计学家们对大学里婴儿出生数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尤其感到震惊。过去只要两个小孩，现在生了四个、五个、六个。过去想要干一番事业的妇女现在是把生孩子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所以，1950年在号召美国妇女返回家庭这一运动的凯歌声中，《生活》杂志简直是兴高采烈

① “Ph.T”是Putting Husband Through（让丈夫完成学业）的缩写。这是作者仿Ph.D（哲学博士学位）讲的一句玩笑话。——译注

了。

在纽约一家医院里，当一个女人发现她不能够哺育自己的婴儿时，立即精神崩溃。在另外的医院里，因患癌症而垂死的一些女人拒绝服用经研究证明可能挽救其生命的药物，原因是据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会使人失去女性特征。在报纸杂志上，在药店广告上，一个比真人还大的美貌而空虚的女人头像向人们宣称："如果我只有一次生命，就让我当金发美人吧。"在美国全国，每10个妇女中就有3个将自己的头发染成金黄色。她们不吃普通食物而吃减肥食品，以期使身材变得如同苗条的年青模特儿一般。上百货公司购物的顾客们说，从1939年以来，美国妇女的身材已经变小了三四个号头，一位顾客说："现在是女人合不上衣服，而不是衣服合不上女人了。"

室内装饰人员设计出带有镶嵌壁画和富有新意的绘画的厨房，因为厨房再次成为妇女生活的中心。家庭缝纫成了一项百万美元的工业。除非上街买东西，开车接送孩子或随丈夫参加社交活动，许多妇女不再离家外出了。美国姑娘们直到长大成人，都没有在家庭之外干过活。在50年代后期，一种社会学的现象一下子引起人们注意：那时有1/3的美国妇女在工作，但其中大部分已经不算年轻，而在事业上有所追求的只是极少数。她们干些售货或当秘书的零活，以使丈夫或孩子完成学业，或为偿付抵押借款添上一笔。或者，她们是些要供家养口的寡妇。参加职业工作的妇女越来越少。在几乎每一个美国城市、看护、教学和社会服务等工作缺乏人手，已经引起了一场危机。考虑到在宇宙空间竞赛上，苏联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科学家们注意到，美国最丰富的，未经

开发的智力资源就是妇女。但是女孩子们不学物理学，物理学“不具有女性特征”。一位姑娘拒绝接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研究奖学金，而去一家不动产办事处找活儿干。她说，她所追求的，也正是其他所有美国姑娘所追求的——结婚，生四个孩子，生活在环境幽雅的郊区的一幢舒适的住宅里。

生活在郊区的家庭主妇——这就是年轻的美国妇女梦想的形象，而且据说也是全世界妇女嫉妒的形象。美国式的家庭主妇——科学和方便省力的家用设备使她免除了她的祖母生孩子时所冒的风险、得过的疾病和服过的药物。她健康、美丽、受过教育，只关心自己的丈夫、孩子和家庭。她寻求到了真正的女性的满足。作为主妇和母亲，她在男人的世界里，被作为男人完善而平等的伴侣而受到尊重。她可以随意选购汽车、衣服和家用设备，去她想去的超级市场，女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她应有尽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中，这种追求女性完善的奥秘成了当时美国文化中一种为人珍爱、自生自长、恒久存在的核心。千千万万个女人生活在由美国郊区主妇的美丽图画塑造的这种形象之中：在落地窗前吻别丈夫，在学校门口让孩子们下汽车，微笑着看孩子们在清洁光亮的厨房地板上拖动新买的电动打蜡机。她们自己烤面包，做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让她们的新洗衣机和脱水器一天到晚转个不停。她们每周换两次床单，而不是只换一次，去成人教育机构参加小地毯编织训练班，对她们可怜的母亲梦想干一番事业终究一无所成而心生怜悯。她们的唯一梦想就是当无可挑剔的贤妻良母；最大的奢望就是生五个孩子并拥有一幢漂亮住宅；她们唯一的奋斗就是找到中意的丈夫并保持稳定的夫妻关系。她

们从来不去想家庭之外的世界上与女性无关的各种问题；她们希望由男人去作重大的决定。她们为自己作为女人的这种地位感到光荣，在调查表上颇为骄傲地填写上："职业：家庭主妇"。

15年来，为妇女写下的文章，妇女们在她们的丈夫坐在房间的另一边大谈商店、政治、化粪池等等的时候进行的互相对话，都是与她们的孩子有关的问题，或是如何使她们的丈夫愉快，或是如何改进孩子们就读的学校，或是如何干厨房活儿、做沙发套子。没有人争辩究竟女人是比男人低下呢，还是比男人优越，她们只是跟男人不同而已。妇女的"解放"和"事业"之类的字眼听起来使人感到陌生而且不自在，人们已经多年不讲这种话了。一位名叫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法国妇女写了一本标题是《第二性》的书，有一位美国批评家评论道，很明显，她"不懂得生活是什么"，还有，她谈的是法国妇女。在美国，所谓"妇女问题"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果一个女人在本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遇到了问题，她知道准是她的婚姻或是她本人有些地方出了差错，她认为其他的妇女对自己的生活是心满意足的。如果她在给厨房地板打蜡的时候，她感受不到这是对女性满足的神秘追求，那么她是一位什么样的妇女呢？她羞于承认自己的不满足感，于是她永远也不会知道还有多少妇女也怀有同样的感受。如果她试图讲给她的丈夫听，她的丈夫会不理解她在说些什么。就连她自己也不会真正理解。15年来，美国妇女感到要谈这个问题，比谈论性的问题还要更难于启齿。就连精神分析学家都未能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名称。当一个女子像许多妇女做过的那样，去求助于精神病医生时，她会说："我简直没法

开口，”或者“我准是得了神经病，毫无办法。”一位在郊区工作的精神病医生不安地说：“我搞不清楚现在的妇女出了什么毛病，”“我只知道有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来找我的大多数病人都是妇女，而她们的问题又不是性方面的问题。”然而，大多数有这个问题的妇女又没有去求助于精神分析学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她们老是这样自言自语，“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在1959年4月的一个上午，在距纽约15英里远的一个市郊开发区，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跟另外四位母亲在一起喝咖啡，我听见她以一种平静而绝望的语气谈起了“这个问题”。而另外几位心里也都明白，她不是在谈关于她的丈夫，或是她的小孩，或她家里的问题。突然间，她们意识到她们都有这个相同的问题，这个无名的问题。她们开始吞吞吐吐地谈了起来。后来，她们开车去托儿所把小孩接回家睡午觉，随之，她们中的两位竟放声哭了起来，只是看到自己并不孤立，才感到一阵宽慰。

我逐渐意识到，在美国，有无数妇女都有这个无名的问题。作为一个杂志撰稿人，我经常要采访妇女，跟她们谈她们孩子的问题，谈关于她们的婚姻，谈她们的住房，或是她们周围所处的人们。但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看出另外一个问题的令人警觉的迹象。在郊区的平房建筑区和长岛的错层式建筑区，在新泽西州和韦斯特切斯特县，在马萨诸塞州一个小城镇的殖民地时期的住宅里，在孟菲斯的院落里，在郊区和市区的公寓里，在中西部地区的起居室里，到处我都看到了同样的迹象。有时，我不是作为一个记者，而是作为一个

生活在郊区的家庭主妇，也感受到了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正在纽约州罗克兰县抚育我自己的三个小孩。在大学的宿舍里，在半私立的产院里，在家长一教师联谊会的会议上，在妇女选举人协会的午餐聚会上，在郊区的鸡尾酒会上，在等待火车到来的车站运货小车上，从在斯克拉福偶尔听到的谈话中的只言片语中，到处我都听到了这一问题的回声。在孩子们上学时的宁静的下午，或是在丈夫干晚班活时的宁静的夜晚，我听到另外的妇女讲出一些试探性的话。这些话早在我理解其社会和心理含义之前，首先作为一个女人，我就已经理解到了。

这个无名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妇女在试图表达这个问题时使用的是什么词句呢？有时一个女人会说："我不知道怎么的，我感到空虚……不充实"。或者她会说："我觉得似乎我本来就不存在。"有时她会用镇静剂将这种感情统统抹去。有时她认为问题出在丈夫身上或出在孩子身上，不然就认为，她真正需要的是把住房再装饰一番，或者搬家，去跟好一些的邻居相处，或者再找个男人，或者再生个孩子。有时她带着一种她说不清的症状上医生那儿去："是一种疲乏的感觉……我对孩子们大发脾气，自己都觉得害怕……我觉得像在毫无根据地哭叫"（克利夫兰的一位医生称之为"家庭主妇综合症"）。有一位妇女给我讲起在她们的手掌和手臂上冒出来的水疱直淌血。"我管它叫家庭主妇病，"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家庭医生这样说，"近来我在生四个、五个、六个小孩的年青妇女身上经常看到这种状况，她们把自己浸泡在洗碗槽里。这一症状既不是由洗涤剂引起，也不能用可的松治愈。"

有时某个妇女会告诉我，这种感情变得非常强烈，她会跑出房间，朝街的尽头走去。要么她就呆在自己的房子里，哭个不停。或者她的孩子给她讲笑话，她却没有笑，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听。我也跟那些数年来经常坐在精神分析学家的沙发椅上，探求如何才能“适应女性的身份”、如何才能搬掉障碍、“作贤妻良母”的妇女们谈过话。她们说话时那种绝望的语气和眼睛里的眼神，跟那些断言自己并没有什么问题的妇女所具有的语气和眼神是完全一样的，尽管那些妇女也确有一种奇怪的绝望感。

一位19岁就离开大学去结婚，而今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对我说：

> 女人可能做的事情我都干过——消遣、园艺、腌菜、制罐装食品，跟邻居和睦相处，参加一些协会，在家长—教师联谊会上送茶水，这些事儿我都能够干，而且我也喜欢干这些，但是这并不能给你留下什么可供思考的东西——关于“你究竟是什么人”的某种感觉。我在事业上从来没有什么雄心壮志。我的全部希望就是结婚生四个孩子。我爱小家伙、爱鲍勃，也爱这个家庭。不存在什么你说得出名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绝望。我开始感到自己连个性都没有，我只不过是个专为别人摆碗碟、送食物、理床铺的人，一个当你需要点什么东西时供使唤的人。但是，究竟我是什么人呢？

一位穿蓝工装裤的23岁的母亲说：

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感到非常不满足，我身体健康，有可爱的孩子和舒适的新家，钱也满够用。我的丈夫是个电子工程师，前途远大。他就没有一点儿不满足感。他说或许我需要休假，我们就上纽约去度周末吧。但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老有一种想法，无论什么事我们都应当一起干。我不能够坐下来独个儿读一本书。孩子们在午眠，我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自己支配，可我只是在房间里走动走动，等他们醒来。要到我知道人们都上哪儿去了时，我才能动一动步。这好像你一直就是一个小姑娘，总有些人，有些东西在照看你的生活：你的父母亲或是学院，或是爱上了谁，或是生孩子，或是搬进新家。然后你在一个早上醒来，发现眼前一无所有，没有什么可企求盼望的东西。

长岛开发区的一位年轻妻子说：

看起来我好像是睡眠过多，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我这样疲倦；这套住房不像我工作时我们住的那套只供冷水的套间那样难于打扫，孩子们成天都在学校，也不是因为工作。我只是觉得好像不是活在这世上一样。

1960年，这个无名的问题像沸腾的水一样，从幸福的美国家庭主妇这种形象中迸溅而出。在电视商业广告上，漂亮的家庭主妇仍然站在泡沫四溢的洗碗槽前，容光焕发，笑容满面，而《时代》周刊所载“郊区主妇，美国的现象”的卷首报道也抗议道：“日子过得太好，谁能相信她们不幸福”。

尽管几乎每一位谈到这个问题的人都在找些肤浅的理由想不予理睬，然而，美国的家庭主妇并不幸福这一事实却一下子被披露出来了——从《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到《家政》杂志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陷入困境的家庭主妇”）都对此作了报道。这个问题被归咎于家用电器修理工没有能力（《纽约时报》），在郊区开车送孩子上学路程太远（《时代》周刊），或是家长—教师联谊会的活动太多（《红皮书》）。有人说这还是老问题——教育，越来越多的妇女接受教育，这自然会使她们在家庭主妇的位置上感到不幸福。《纽约时报》（1960年6月28日）写道：“从弗洛伊德到电冰箱，从索福克勒斯①到斯波克②，这条道路已被证明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许多年轻的妇女——当然不是全部——被她们受过的教育投入到一个想入非非的世界里，但在自己家里，她们却感到窒息。她们发现她们的日常生活跟她们受过的教育根本对不上号。像被关禁闭的人一样，她们觉得像是被抛弃了。去年，受过教育的家庭主妇的这一问题给困扰的女子学院院长的10几篇讲话提供了材料，这些院长面对着阵阵抱怨声，还坚持说，“16年的学业是对今后当妻子作母亲作实际的准备。”

对这些受过教育的家庭主妇也有许多同情的声音。（“像是长两个脑袋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她写过关于墓园

①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约公元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译注

② 斯波克（1903—）美国儿科学家，其名著《婴幼儿保健常识》（1946）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父母。——译注

诗人①的论文，现在却给送奶工人留字条。她过去曾测定过硫酸的沸点，现在却要测定自己对迟迟不来的修理工的恼怒的沸点……。家庭主妇经常要陷入尖声哭叫之中。看来，在她们从诗人到泼妇的转化过程中，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没有人能够体谅，更不用说她们自己了。”）

家庭经济学家建议应当为家庭主妇们多做些实际的准备工作，诸如在高中开设家用电器维修班之类。大学教育工作者建议应当就理家和家庭等多举办一些讨论会，以使妇女为适应今后的家庭生活做好准备。通俗杂志连篇累牍地载文，大讲“能使你的婚姻更加激动人心的58种方式”。每一个月都推出由精神病医生或性学家著的新书，为人们提供专门性的建议：如何通过性的新方式去寻求更大的满足。

一位男性幽默作家在1960年7月号的《哈波斯》杂志上开玩笑说，只要剥夺妇女的选举权，这个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在第19项修正案以前的年代里，美国妇女是温和平静的，在美国社会受到保护，对自己的地位充满自信心。她将所有的政治问题留给丈夫去作决定，反过来，丈夫又将所有的家庭问题留给她去作决定。而今天，妇女要对家庭和政治两个方面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份量对她们来说是太重了。”）

有些教育工作者郑重提议，四年制学院和大学再也不要录取成年女生了，在日益严重的大学危机中，教育更加迫切需要培养男性青年去从事原子时代的工作，而不是将女性青年培养成家庭主妇。

① 指英国18世纪以R.布莱尔和E.杨格为首的一些诗人。他们喜欢写以死亡悲痛为题材的诗。——译注

这一问题还受到一些未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激烈方式的冲击。（一位女作家在《哈泼斯》杂志上建议说，应当征召妇女去做一些类似助理护士或婴儿看护妇之类的强制性服务工作。）而这类看法又被那些具有悠久历史的灵丹妙药平息了："爱就是她们要寻求的答案"，"唯一的答案就是内心的自我帮助"，"充实的秘密是孩子"——"一种个人独具的、追求精神智力完善的手段"，"要治疗这种精神上的痛苦，简单的处方就是把一个人的自我和意志都交给上帝。"①

这一问题有时未能受到重视，是因为有人对妇女们说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福——老板就是她自己，没有计时钟，在管理方面也没有人来催促她快点干活。要是她不幸福又怎么样呢——她是不是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男人才幸福呢？她是不是在心里真正还想当男人呢？她还不明白她作一个女人是多么走运吗？

最后，这一问题有时未能受到重视，是因为有人耸耸肩头说，根本就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这正是作女人的意义所在，而美国妇女之所以不能体面地承认自己的地位，其症结又何在呢？1960年3月7日的《新闻周刊》写道：

> 她对许多东西都感到不满足，而那些东西，别的国家的妇女只能在梦里企求。她的不满足是深沉的，无处不在的，对处处都在为她提供的表面上的补偿无动于衷。

① 马格丽特·米德、杰·魏斯特："自我的才华"，见《家政》杂志创刊75周年纪念号（1960年5月）。——原注

……一只职业调查工作者的庞大队伍已经对引起麻烦的主要根源勾画出了轮廓。……从一开始，女性的生理特征就对妇女的地位既下了定义，也作出了限制。这就如同据说是出自弗洛伊德的一句话“解剖学决定一切”。尽管没有哪类妇女像美国的已婚女子那样，把这些自然的限制推开不管，但看起来她仍然不能仪态从容地接受这些限制，一位年轻的母亲美貌精明，很有才华，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她是怀有歉意地避而不谈自己的地位，你会听见她说“我能作什么呢”，为什么会是一事无成呢？我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呀！看来，她所受过的良好教育使这位妇女楷模能看到一切东西的价值，就是看不到她自身的价值……。

于是她必须承认如下的事实，“美国妇女的不幸福不过是刚刚赢得的女权”，而且援引由《新闻周刊》挑出来的幸福的家庭主妇为例，顺应着说：“我们应当向我们大家已经享有的自由致敬，应当为今天我们过的生活感到骄傲。我念过大学，也工作过，但是，当家庭主妇却是最使人有所收益、最令人满意的了……我父亲的事务工作从来不让我母亲插手，我母亲不可能扔下我们这些小孩离家出走。但是我和我的丈夫却是平等的；我可以跟他一起进行公务旅行，或参加社会上的一些活动。”

还有另一种情况，那是没有几位妇女会认真考虑的一种选择。《纽约时报》以同情的语气写道：“人人都承认，如果个人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或体力方面负担沉重，或日复一日的家庭生活枯燥乏味，或羁绊于家庭生活而不能脱身，遇

到这样情况时，就会感到极为沮丧。但是，就算妇女们可以重新选择的话，也没有人会抛弃自己的住房和家庭。”《红皮书》杂志评论道：“没有几个女人会对丈夫、孩子和周围的人们一概嗤之以鼻，遇事自行其是。这么干的女人可能颇具才干，但她们绝少获得成功。”

据《展望》周刊报道，在美国妇女的不满足感发展到最高点的那一年，有2,100多万独身、孀居或离异的美国妇女，尽管有的人已经年过半百，仍然在发疯似地、拼命地为找到一个男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而这种找寻很早就开始了，因为现在全美国的妇女中有70%的人在满24岁之前就结婚了。一位漂亮的25岁的女秘书在6个月的时间内竟干过35种不同的工作，目的就是想找到一个丈夫 其结果却是劳而无获。女人们从一家政治俱乐部换到另外一家，参加夜校的会计或航海课学习，学习怎样打高尔夫球或滑雪，一连参加若干个教堂的活动，独自一个人上酒吧间去，所有这些，都是一心要寻求一个男子。

现在，在美国有成千上万、越来越多的妇女要求助于她们的私人精神病医生。据报道，其中的已婚妇女对她们的婚姻感到不满意，而那些未婚女性则因焦虑和由此产生的沮丧感到十分痛苦，奇怪的是，有些精神病医生说，从他们处理过的病例来看，未婚妇女比已婚妇女要愉快一些。就这样，所有那些舒适雅致的郊区住房的门打开了一条缝，让人窥见还有千千万万个美国家庭主妇正痛苦思索着一个一下子人人都在谈论并认为是合乎情理的问题，她们认为，这个问题就像氢弹一样，是美国生活中不实际的、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一。到了1962年，美国家庭主妇的这种困境成了全国家家户

户谈论的话题。一期期杂志的全部文章、报上的专栏、学术著作和无聊小书，教育界的会议和电视上举办的专题讨论会都全力以赴地大谈这个问题。

尽管如此，大多数男子和一部分妇女仍然不知道这个问题是确实存在的。但是，那些坦率地正视这个问题的人都知道，一切治标不治本的补救措施、充满同情心的忠告、谴责和颂扬之词，都正将这个问题抹杀在子虚乌有之中。从美国妇女那里可以听到传来一阵阵苦笑声。人们羡慕她们、嫉妒她们、可怜她们、从她们身上创建某种理论，直到她们对此感到厌烦，人们又给她们提出一些没有人会认真考虑的极端办法和愚蠢选择。她们从由婚姻和育儿顾问、心理治疗专家、心理学家组成的，人数越来越多的一支庞大队伍那里获取关于如何顺应家庭主妇这一地位的各种忠告。在20世纪中叶，舍此便没有其他道路可供美国妇女选择。许多人已经适应了作家庭主妇，她们要么是为这个无名的问题感到苦恼，要么是对它视而不见。要是一个妇女不听取自己内心发出的不满足的奇异呼声，她可能就不那么痛苦了。

对如此众多的美国妇女的绝望感和呼声，要继续采取不闻不问、不予理睬的态度，是不可能的了。无论专家们怎么说，这都不限于作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就人类遭受的磨难来看，存在着某种原因，或许由于还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或者没有提到足够的高度，这种原因还没有被发现。说因为美国妇女过着过去时代或其他国家的妇女从来不敢梦想的奢华生活，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对这种答案，我不能接受。这一问题具有一种奇异的新颖感，其部分原因是，它不能像男人们在物质方面遇到的，诸如饥寒贫病的问题那样来理

解。受这一问题困扰的妇女有一种用食物不能奏效的饥饿感。在那些丈夫是正在为事业奋斗的见习医生和法律界职员，或丈夫是前程远大的医生和律师的妇女心中，在那些年薪为5000或50000美元的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妻子心中，这个问题始终存在。这个问题并不是由缺乏优越的物质条件而引起，那些为饥饿、贫穷和疾病等令人绝望的问题正日夜发愁的妇女甚至感觉不到有这个问题。有些妇女认为只要有更多的钱、更宽敞的住房，再买一部汽车，搬到更为优雅的郊区去住，这个问题就会解决，这些人常常发现，其结果是更为糟糕。

今天，还要将这一问题归咎于丧失女性特征，说是教育、独立以及与男子平等使美国妇女失去了女性特征，是再也不可能了。我听到许多妇女试图要拒绝这种发自她们内心的不满足的呼声，因为这种呼声与专家给她们展示的女性的完美图画并不相符。我认为，事实上，这正是对女性奥秘的最初启示：这个问题不能以科学家研究妇女、医生治疗妇女、法律顾问劝慰妇女和作家描写妇女那种世所公认的方式来加以理解。那些受这个问题困扰、内心发出呼声的妇女毕生都在追求女性的完善。她们不是事业型的女人（尽管事业型的女人或许会有另外的问题），她们是将结婚生孩子作为自己最大愿望的女人。对这类妇女中的最年长者，美国中产阶层的女儿们，不可能还有其他的梦想了。那些曾经怀有其他的梦想、现已四五十岁的妇女们，抛弃了昔日的梦想，心甘情愿地投身于家庭主妇的生活之中。而对于这类妇女中的最年轻者，新近才结婚的妻子或刚生了孩子的母亲，这是她们唯一的梦想。她们中断了在中学或大学的学业去结婚，

或是在一些自己并不真正感兴趣的工作岗位上打发日子，直至结婚。在常人看来，这些妇女具有相当多的女性特征，但是她们仍然受到这个问题的困扰。

是不是读完大学的妇女，和在当家庭主妇之外还别有梦想的妇女所受的困扰最为严重？专家们说正是如此，但是，且听一听下面四位妇女是怎么说的吧：

我每天都过得忙忙碌碌、枯燥乏味。我尽干些身边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八点钟起床——我得作早餐，我洗碗涮碟，吃午饭，洗更多的碗碟，下午就洗衣服、做清洁，然后就该洗晚餐的碗碟了，我坐下歇几分钟，又该送孩子们上床了……这就是我每天的生活，也跟其他已婚妇女每天的生活一样，单调无聊。每天最愉快的时候，是我跟小家伙们追逐玩耍的时候。

啊，天啦！我每天在干些什么呀？嗯，我六点起床，给孩子穿衣服，给他送早点，然后洗碗碟，给婴儿洗澡、喂奶。然后吃午饭。孩子们午眠时，我作些缝补活或熨衣服，把上午没有做完的事全部做完。然后给全家人准备晚餐。丈夫看电视时我就洗碗碟。把孩子们送上床后，我才束好头发，上床睡觉。

问题总是在于孩子的妈妈，或是部长夫人，而永远也不会在我自己。

如果将我家里每天上午的情形拍成电影，看上去就

会像马克思兄弟①表演的老式喜剧片，我洗涮碗碟，把大一点的孩子赶到学校去，快步跑进庭院里去给菊花浇水培土，又跑回屋里来为安排一次聚会打电话，帮最小的孩子搭积木房子，挤出一刻把钟来浏览一下报纸，这样我才能够了解外面发生的事情。然后匆匆忙忙朝洗衣机跑去，那里每周三次要洗的东西足够一个原始村落用上整整一年。到中午时分，我好像只差等人把我送到精神病医院的病房去了。我干的这些事情中，几乎没有什么是真正必须或真正重要的。外部的压力成天追逼着我，就是这样，我还是把自己算作邻里间较为轻松的家庭主妇之一。我的许多朋友甚至还更狂乱，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美国妇女再一次被关入了关松鼠的笼子。如果今天这只笼子是装有大平版玻璃和宽幅地毯的现代化住房或是方便舒适的现代化套间的话，跟她们的祖母当年身着绣花长裙，坐在金光闪闪的华丽客厅里，怒气冲冲地嘟哝着谈女权问题相比较，使人感到同样痛苦。

头两位妇女从来没有念过大学。她们住在新泽西州莱维敦和华盛顿州塔科马的开发区里，一些研究工人妻子状况的社会学家前去采访了她们。②第三位是一位部长夫人，在她念过的大学举行第15次聚会进行调查时，她写道，在事业方

① 由马克思一家兄弟四人组成的美国著名喜剧演出班子。——译注

② L.雷恩沃特，R.P.考尔曼和G.汉德尔：《工人的妻子》（纽约1959年）——原注

面，以前她从来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但是现在她倒希望当时还是有好一些。[1]第四位得过人类学博士学位，现在是内布拉斯加州一位有三个小孩的主妇。[2]

看来，她们说的这些话表明，受过各种不同程度教育的主妇都在经受着相同的、绝望情绪的困扰。

即使越来越多的妇女已经上了大学，今天也没有人怒气冲冲地嘟哝着谈"女权"问题了，这是事实。新近对巴拉德学院的历届毕业生所作的调查表明：较早期的毕业生中，有为数不多但说明问题的一些人指责她们接受的教育促使她们去争取"权利"；后来一些的毕业生指责她们接受的教育给了她们事业方面的梦想；最近的毕业生则指责上大学念书使她们感到，当一个主妇和母亲并不那么简单，如果她们没有读书、没有参加社交活动，她们并不想因此而感到惭愧内疚。但是如果教育不是引起这个问题的原因，那么，不管怎么说，教育使这些妇女越来越感到烦恼，这一事实或许会给人以某种启示。

如果说女性完善的秘密就是生孩子的话，如此众多有选择自由的妇女就决不会在这样短短几年内心甘情愿地生下这么多的孩子。如果说答案是爱情的话，妇女们就决不会以如此之大的决心和毅力去寻求爱情。尽管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应当与性联系起来，但人们越来越怀疑，这个问题或许并不是性方面的问题。我听许多医生谈起过在男子与其妻子之

---

① 贝蒂·弗里丹："如果一代人能告诉另一代人"，载《史密斯学院校友季刊》（纽约，1959）1961年冬季号。——原注

② 杰·罗宾斯，朱·罗宾逊："为什么年轻母亲有一种困惑感"，载《红皮书》杂志1960年9月号。——原注

间出现的新的性问题——妻子的性饥渴非常强烈，她们的丈夫不能使之得到满足。“我们使女人成了性的造物”，一位精神病医生在玛格丽特[1]婚姻咨询诊所这样说，“她的身份就只能是妻子和母亲。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谁。她成天等待丈夫晚上回家使她有活力，而现在是作丈夫的反倒不感兴趣了。女人夜复一夜地躺在那里，等待自己的丈夫来使她有活力，这真是可怕。”为什么会有那种给读者提供有关性问题的指导性意见的文章和书籍的市场？金西[2]从对最近几代美国妇女作的统计数据中发现的性兴奋之类的看法似乎并不能解答这个问题。

反之，在妇女们中间发现了新的神经病——以及给不出名称只好叫神经病的问题——这种病具有与由性压抑引起的病症相同的生理症状、焦虑和防御性神经症状，而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并没有预见到会出现这种病。还有人报道了一些关于成长中的一代儿童的奇怪的新问题，他们的母亲老是在那儿督促他们干这干那，帮助他们完成家庭作业，他们难以承受痛苦和纪律的约束，在追求任何一种应当持之以恒的目标方面无能为力，这是生活中一桩极其令人生厌的事情。教育工作者对现在正进入大学学习的男女青少年的依赖他人、缺乏自力更生精神的现象越来越感到不安。哥伦比亚大学一位系主任说：“我们打了一场不间断的战争，不过是使

---

①玛格丽特·桑格（1883—1966），美国计划生育运动创始人，著名的男女平等主义者。——译注

② 金西（1854—1956）美国动物学家，人类性行为研究者，著有《男人的性行为》（1948），《女人的性行为》（1953）等，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曾轰动一时。——译注

我们的学生徒具男子汉的虚名而已。”

白宫召开过一次关于美国儿童体质变坏、肌肉退化的会议：是不是在精心养育他们上做得过了头？社会学家注意到了郊区儿童生活中令人惊讶的组织：课程、聚会、娱乐活动，游戏和学习小组，这些都为他们作了组织安排。俄勒岗州波特兰市一位住在郊区的主妇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们“需要”外面那些童子军组织，“这里又不是贫民窟，这儿的小孩子成天在外面活动。我认为是人们感到非常厌烦，所以才把孩子们组织起来，还要把另外的孩子都牢牢地吸引到这上面来。可怜的小家伙们连躺在床上乱想一通的时间也没有了。”

能否把这个无名的问题跟屯妇们日复一日的家庭琐事联系起来呢？当一个女人想要描述--番这个问题时，她经常只是讲述她的日常生活。在对舒适的家庭生活的种种细节所作的详尽叙述中，有什么东西可能引起这种绝望之感呢？她仅仅是被困在对她作为现代主妇而提出的许多要求中吗？要当妻子、家庭教师、母亲、护士、商店主顾、厨子、司机，室内修饰专家、育儿专家、家用电器和家俱维护专家、营养学专家和教育专家……。她的一天被分割成许多小段，她从洗碗机赶到洗衣机，又赶到电话机、脱水机，又赶向汽车去超级市场。她开车送约翰尼去正举行少年棒球联赛的运动场，又送珍妮去舞蹈学习班，把剪草机送去修理，（这就到了下午6点45分了）。她做任何一件事都决不能超出15分钟；她没有时间读书，只是翻翻杂志；即使是有时间，她也再不能集中精力了。一天下来，她极其疲乏，有时得由丈夫来接着干，把孩子送上床。

这种极度的疲乏在本世纪50年代使得许多妇女求助于医

生，于是有一位医生决定作一番调查。他惊讶地发现他那些正在受"主妇疲乏"折磨的病人的睡眠时间比一个成年人所需的时间要长，长达每天10个小时，而且她们实际花在家务劳动上的精力并没有损伤她们的能力。他肯定说，真正的问题一定是另外某些东西——或许是烦躁吧。

有些医生告诉自己的女病人，她们应当从家庭走出去，在户外呆上一天，上城里去看一场电影，以此进行自我治疗。还有一些医生给病人开镇静剂。许多郊区主妇像服咳嗽药一样服用镇静剂。"你早上醒来，感到像这样又要过一天，似乎一点意义也没有。于是你就服镇静剂，因为这东西会使你对没有一点意义并不那么在乎。"

不难看到困扰郊区主妇的具体细节和为占用她们时间而不断提出的要求。但是把她们束缚在陷阱里的锁链正是她们自己心灵和精神上的锁链。这是由错误的思想、未被正确解释的事实、不完全的真理和不真实的选择构成的锁链。要看到这些锁链并不容易，要挣脱这些锁链也不容易。

妇女怎样才能在看到自己生活范围里的全部真理呢？她怎么才能相信，在摒弃老一套的陈腐观念时，发自她内心的呼声已经包含了她生活中的真理呢？那些与我交谈过的妇女最终还是听到了她内心的呼声，看来她们正在以一种难以置信的方式朝着与专家意见格格不入的真理摸索前行。

我认为许许多多不同领域的专家把上述真理的某些断片放在他们的显微镜下面观察了很长时候，却没有能够认识真理。在从心理学、社会学和生物学方面研究和理论的某些新成果中，发现了这一真理的组成部分，而上述这些学科对妇女具有什么样的内在涵义，似乎从来没有被认真研究过。我

跟郊区医生、妇科病专家、产科医生、儿童指导大夫、儿科医生、中学顾问、大学教授，婚姻顾问、精神病医生和部长谈过话，不是就他们的理论，而是就他们对待美国妇女的实际经历向他们提出问题。从跟他们的谈话中，我找到了探索真理的许多线索。我注意到了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只是由于这些证据与现在流行的、关于妇女的思想模式不相符合，才没有被公开报道。女性的常规、女性的调节、女性的完善、女性的成熟，多数妇女仍然在努力遵循这些准则去生活，而我所发现的那些证明，却使这些准则都成了问题。

我开始以一种奇异的新方式观察到美国人正在回到那种引起人口爆炸性增长的早婚和大家庭中去，医生们的报告中则谈到了近来提倡自然生产自然哺乳的运动、郊区生活的协调、新出现的神经病、性格变态和性方面的问题。

从长期以来被妇女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老问题中，我开始观察到了新的侧面。那些老问题有：月经带来的麻烦、性冷漠、性关系混乱、怀孕引起的畏惧、生育抑郁症、二三十岁的妇女感情破裂和自杀而产生的深刻影响、绝经期危机、所谓美国男子的消极和幼稚、妇女在童年时测得的智能与她们长大成人后的成就之间的差距、美国妇女成年期性兴奋的变化影响，以及在心理疗法和妇女教育方面长期存在的老问题。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今天在如此众多的美国妇女心中躁动的这个无名问题并不是由于她们失去了女性的特征或接受了过多的教育，或者是对她们在家务上提出的各种要求。这比任何人所承认的要重要得多。这个问题是解决数年来一直折磨着妇女和她们的丈夫孩子，令她们的医生和教育者困惑不解的各种新老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我们的民族和一种

文化的未来。这也很可能是关键所在。“除了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之外，我还有所企求”，对妇女们发自内心的这种呼声，我们再也不能漠然不顾了。

家庭主妇：幸福的女主人公

为什么这么多美国妇女多年来承受着这种不满足的无名之痛，而个个都以为自己孤立无援？当我首次将这个问题述诸文字时①，康涅狄格州一位母亲写信给我说："别的女人同样也有我内心的烦躁，我感到宽慰，禁不住热泪盈眶。"一位来自俄亥俄州某城镇的妇女写道："我无数次感到唯一的答案是找精神病医生，无数次的气愤、苦痛和沮丧，次数之多，我连提都不想再提起，我简直不知道还

① 贝蒂·弗里丹著，"女人也是人！"载《家政》杂志1960年9月号。美国各地的女性读了这篇文章之后写给我的信表达了她们强烈的感情，这使我坚信并不是只有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女性才有那个"无名的问题"。——原注

有千千万万个女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还以为自己是完全孤立的呢。”得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一位主妇写道：“正是由于我以为我在自己遇到的问题上几乎是孤立的，才使得这个问题成了难题。为着我全家人、我的家庭、也为着我有机会照看我的家人，我得感谢上帝，但是我的生活并不能就此为止。懂得了自己并不是一个怪人，不再为还有所企求而感到羞愧，这就是觉醒。”

那种使人感到痛苦和负疚的沉寂，那种当某种感情最终被公诸于世而使人感受到的莫大快慰是人所熟悉的心理学的迹象。今天这么多的妇女能够抑制什么样的需求，抑制她们自身的什么东西呢？在这个弗洛伊德之后的时代，性首先受到怀疑。但是妇女心中这种新的躁动看来并不是性。事实上，对妇女来说，这比谈论性问题更难于启齿。是否可能还有另外的需求和她们自身的某些东西，使她们像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一样（她们对性避而不谈）把这些需求和东西也深深地掩藏起来了？

如果真有的话，一个女人或许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不知道她有性需求一样。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子生活中所遵循的好女人的形象，完全排除了性的内容。那么，今天，在公众面前，那些结交异性朋友的、骄傲自得的女中学生形象，正在谈恋爱的女大学生形象，有一位奋发有为的丈夫和可以装满一辆小型客车的孩子的郊区主妇形象 等一切现代美国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所遵循的形象，是不是也排除了什么东西呢？由妇女杂志、广告、电视、电影、小说、专栏文章和专家论述婚姻、家庭、儿童心理和性调节的专著，以及社会学、心理分析学的普及者等共同创造出

的这种形象，形成了现代妇女的生活模式，也反映出她们的梦想。这种形象或许给那个无名的问题提供了一点线索，正如一场梦给做梦者叫不出名字的某种愿望提供了一点线索一样。当这种形象表明与现实之间有巨大差距时，在心灵的耳朵里，就会响起盖革计数器①的咔嗒声。当我不能将这么多妇女无声的绝望感装入我为妇女杂志撰文时帮助绘出的现代美国主妇的画面中时，在我内心的耳朵里，就响起了盖革计数器的咔嗒声。美国妇女所追求的贤妻良母的形象里，有什么东西没有包含在内呢？在反映和创造了当今美国妇女的地位的形象里，有什么东西没有包含在内呢？

本世纪60年代初，《麦考尔》杂志是妇女杂志中发行数增长最快的一种。其内容相当准确地代表了由畅销杂志描绘出、在某些方面可以说创造出的美国妇女形象。下面是1960年7月的一期《麦考尔》杂志的全部内容提要：

1. 关于过分的梳妆打扮会使“妇女越来越单调乏味”的重要文章。

2. 一首用大号字排出，题为《一个男孩就是一个男孩》的关于孩子的长诗。

3. 讲述一位不上大学的年轻姑娘如何从一个聪明努力的女大学生那里夺走一个男子的短篇小说。

4. 描述一个婴孩把他的瓶子从小床上扔出去那种

① 盖革计数器，德国物理学家盖革(1882—1945)创造，用以测定单个α粒子和其他电离辐射。——译注

瞬间欢快情绪的短篇小说。

5. 温莎公爵最近以亲切的笔调写的关于"公爵夫人和我是如何生活度日的，衣服对我的影响和我对衣服的影响"（两部分中的第一部分）。

6. 讲述一位19岁的姑娘被送到美姿学校学习如何眨眼睫毛和在网球运动中如何输球的短篇小说。（"你现在19岁了，按美国通常的标准，我现在可以在法律和经济两个方面使你不再受我管辖了，而让一些嘴上没毛的小青年把你带走，他会把你拐骗到某个地方去，那里有一间半住房的套间。而他就去学出售债券的勾当。但是只要你跟他对着干，也就没有哪个嘴上没毛的小青年敢那样干了。"）

7. 讲述一对度蜜月的夫妻，在就拉斯韦加斯①的赌博争吵一阵之后，在相互分开的卧室之间来回走动的故事。

8. 论述"如何克服自卑感"的文章。

9. 题为"婚期"的一个故事。

10. 讲述一位青年的母亲如何学跳摇摆舞的故事。

11. 六页引人注目的图画，上面是身穿孕妇服装的女模特儿。

12. 四页引人注目的图画，讲的是"按照模特儿的方式使自己变瘦。"

13. 讲飞机晚点的一篇文章。

14. 家庭缝纫的服装式样。

---

① 拉斯韦加斯，美国著名赌城，在内华达州。——译注

15. 制作折叠屏幕(一种使人着迷的魔屏)的办法。

16. 一篇题为《寻求第二丈夫的方式大全》的文章。

17. 一只"吉祥烤全猪",奉献给"伟大的美国先生,他头戴厨师帽,手执餐叉,站在平台上,后院里或其它某个地方,眼观他的烤猪正在烤肉叉上翻动。还奉献给他的妻子,要没有她,(有时)那只本来无疑是这个夏天极大成功的烤全猪就决不会成功了。……

此外还有每期必登的卷首"服务箱"专栏文章,讲医药研究的新成果、育儿知识、卢斯[1]写的专栏文章和罗斯福夫人[2]写的专栏文章、"锅盘碗碟"栏及"读者来信"栏。

由这家漂亮的大型杂志推出的妇女形象,年轻、浅薄、简直是一脸娃娃相,傻乎乎的,很温顺,颇具女性特征,对由卧室、厨房、性、婴儿和家庭组成的这个世界十分欢喜、心满意足。这家杂志当然不会排除性方面的内容;允许一个女人具有的唯一激情、唯一追求和唯一目标就是找到男人。这家杂志被饮食、穿着、化妆品、家俱和青年女子的体态塞得满满的,但是,作为心灵和精神的生命,思想的境界又在哪里呢?按这家杂志塑造的妇女形象,除了搞家务,保持自己体态优美,找到男人并与之保持关系之外,她什么也不干。

这就是当时美国妇女的形象,在那一年,卡斯特罗领导了古巴革命,人们正在接受训练,准备去太空旅行;在那一

① 克莱尔·卢斯(1903—),美国女剧作家,曾任《时尚》杂志和《名利场》杂志副主编。——译注

② 罗斯福夫人(1884—1962),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社会活动家,经常为报刊撰写专栏文章。——译注

年，非洲大陆上成立了一些新国家，一种超音速飞机弄得某次首脑会议不欢而散①；在那一年，艺术家们团团围住一家大博物馆，对抽象艺术的霸权地位提出抗议；物理学家在探索关于反物质的问题；由于有了新的射电望远镜，天文学家不得不改变他们关于宇宙扩展的概念；生物学家在生命的基本物质构成及其化学性质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成果；而美国南方学校的黑人青年自南北战争以来，第一次强烈要求美国正视陷于危机之中的民主与真理。但是，这家为500多万美国妇女（她们几乎都念完中学，将近半数念完大学）发行的杂志对家庭之外的外部世界可以说是只字不提。在20世纪后半叶的美国，女人的天地局限在她自己的体态和美貌、男人的魅力、生儿育女，照顾好丈夫孩子和为全家人服务等等之中。上述这些，并不是某一种妇女杂志的某一期的异常情况。

有一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杂志编辑和撰稿人的会议，到会的绝大多数是男人，他们为各种杂志包括妇女杂志工作。那天会上的主要发言人是一位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领袖。在他发言之前，另一位男子简要地谈了他编辑的一家大型妇女杂志的需求情况：

> 我们的读者是成天呆在家里的主妇。她们对每天外面发生的大事不感兴趣，她们对国家大事和国际事务不感兴趣，她们只对自己的家庭和家庭成员感兴趣。她们对政治不感兴趣，除非跟她的家庭眼前的需要有关系，像

① 1960年5月，美国U—2高空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苏联导弹击落，赫鲁晓夫取消了在巴黎举行的苏美首脑会议。——译注

咖啡价格之类。幽默？得温和一些，她们不要讽刺作品。旅游？我们几乎全部删去了这方面的内容。教育？那是个问题。她们自己的教育程度正在提高。她们都受过中学教育，许多人还念过大学。她们对孩子们的教育极感兴趣——算术考试成绩达四级。你们不要为妇女写些思想啦、大事件啦什么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要登90%的服务性内容，而只登10%的一般性内容的原因。

另一位编辑表示赞同，他以一种哀怨的语调补充道："除了写些'有个人死在你的药厨里了'之类的东西，你们还能为我们写出什么来？你们中哪一位能虚构出妇女新的危机来？我们当然只能对性问题感兴趣了。"

此后，撰稿人和编辑用了一小时的时间听塞古德·马歇尔[①]讲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内幕，及其对竞选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位编辑说："很遗憾我不能发表他讲的内容。你没法把他讲的跟妇女的世界联在一起。"

我在听他们发言的时候，一句德国话在我的心里回响——Kinder，Kuche，Kirche[②]，那是当年纳粹分子规定妇女必须重新被限制在其生物功能中时所使用的口号。但是，这里不是纳粹统治下的德国，这里是美国。整个世界都对美国妇女敞开了大门。那么，为什么美国妇女的形象会拒绝这个世界呢？为什么要限制妇女只能有"一种热情、一种作

---

① 塞·马歇尔（1908—）美国黑人律师，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领袖人物，1967年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黑人大法官。——译注

② 德语，"小孩、教堂、厨房。"——译注

用、一种职业”？不久前，妇女们还在为平等和争取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而幻想、而奋斗。后来她们的这种梦想又怎么样了呢？是什么时候妇女们决定脱离这个世界，还是回到自己家里好的呢？

地质学家从大洋洋底取来泥芯，从泥芯上观察到长年积沉下来、层次分明如剃刀刀刃的沉积层，那是了解发生在地球上的地质演变的线索，这种长时期的巨大变化，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不会注意到。我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坐了许多天，翻阅了20多年内出版的许多种妇女杂志的合订本，从中去探索了解这些年的情况。我在妇女世界的范围之中，美国妇女的形象中，发现了一种变化，这种变化与大洋洋底沉积层揭示出的变化一样层次分明却令人不解。

在1939年，妇女杂志所载文章的主角并不总是年轻女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她们比今天小说中塑造的同类人物还是要年轻一些。美国男主角任何时候都年轻，美国女主角同样也年轻：她们是以欢快坚定的精神、享有自己的生活来奠定自己新的地位的新型妇女。那时在她们身上有一种走向未来，与昔日告别的气质。四家主要的妇女杂志（当时是《妇女家庭杂志》、《麦考尔》、《家政》和《妇女家庭伴侣》）上的绝大多数女主角都是事业型的妇女——愉快、自豪、极富进取精神、引人注目的事业型妇女——她们爱男人，男人们也爱她们。无论是护士、教师，或是艺术家、演员、或是书记员、推销员，那种独立自主的精神、勇气和决心，就是她们在各自的工作表现出来的性格力量，也是她们的魅力的组成部分。她们具有一种无可置疑的气质，她们的这种

个性并非不能吸引男子，而是很受男子赞赏，她们的精神和性格特征，如同她们的外貌一样，对男子有很强的吸引力。

这些就是处于全盛期的大众妇女杂志的情况。所载故事都成了老一套：姑娘遇到小伙子或姑娘得到小伙子。但这并不总是故事的主题。这些女主人公通常是朝着自己的目标或前景奋进，当找到男人后，又要跟工作或外部世界的一些问题拼搏一番。这类新型妇女较少带有那种傻乎乎的女人腔，在探寻自己的新生活上独立自主、满怀信心，与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大相径庭。她在寻求男人方面，并不那么积极主动。她对待世界的热情态度、她作为个人的自我感受、她的自力更生精神，都使她在处理与男人之间的关系上具有某些迥然不同的东西。

这类故事中有一篇，其中的男女主人公同在一家广告社工作，他们相遇而相爱了。男主人公说："我不想把你关在大墙后面的花园里，我想你跟我手拉手一块儿走，一起去完成我们想干的一切事情。"（"共有的梦想"，载《红皮书》杂志1939年1月号）。

这种新型妇女几乎没有一个是家庭主妇。实际上，通常在她们生孩子之前，故事就结束了。说她们年轻是因为她们前程远大，但是在另一层意义上，与今天那些小猫咪似的，一脸娃娃相的年轻主妇相比，看上去她们要年长得多，成熟得多。例证之一是一位护士（见"岳母"，载《妇女家庭杂志》1939年6月号），"他认为她非常可爱。她丝毫没有画册上展现的那种美貌，但是她的双手强健有力，她的仪态骄傲自豪，她微抬的下颏和湛蓝的眼睛非常高贵。自她9年前开始工作以来就一直自己靠自己。她自己谋生，除了她自己的

心灵之外，她什么也无需关心。”

一个女主角的母亲执意要她跨入社交界，而不让她去参加地质考察，于是她离家出走。她决心争取自己的生活这种热情并不妨碍这位新型妇女去爱一个男子，但却使得她要背叛自己的父母，正如那些青年男主人公常常要离开家庭才能长大成人一样。那个帮助她离家出走的小伙子说：“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位姑娘都勇敢，你具有勇敢者的品质。”（“亲爱的，愿你愉快”，载《妇女家庭杂志》1939年5月号）

对一个女人来说，在工作和男人这两者之间经常会出现冲突。但1939年的时尚却是，如果她没有将男人选错的话，她一心一意要搞好工作，也不会失去男人。一个年轻寡妇坐在她的办公室里，拿不定主意，是该呆在办公室里纠正她工作上出的一个大错误呢，还是该去践约，跟一位男子约会，她回想起她的婚姻、小孩、丈夫的死……“随后一段时间她内心十分矛盾，想在两者之间作出明确的判断，倒不是担心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是担心有没有把握作出决定。”老板怎么可能指望她不去赴约呢！但是她还是留下来工作。“他们在这场竞争运动中都投入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她不能够使他失望。”她也找到了男人——就是那个老板！（“白昼与黑夜之间”载《妇女家庭杂志》1939年2月号）

这类故事或许算不上是什么文学名著。但是故事中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却道出了那些无论过去今天都在阅读妇女杂志的主妇的一些情况。这些杂志不是编给事业型妇女看的。新型妇女主人公是过去那些主妇的理想，在这些主人公身上，反映出当时妇女的梦想，反映出她们渴望争取自己的地位，也感受到确有这种可能性。而且，如果妇女不能够对自

已抱有这种梦想，她们就期望她们的女儿抱有这种梦想。她们期望自己的女儿不要仅仅当个主妇，而要跨出家门，进入她们曾经不能进入的外部世界。

早在“职业型女性”在美国成为一个令人生厌的字眼之前，职业对妇女来说，意味着什么，要重新唤起那时的记忆，如同记起一场早被忘却的梦。在经济萧条时期结束时，干活当然就意味着挣钱，但这些杂志的读者并不是那些找活干的妇女，职业不仅仅是干活挣钱。看来，职业意味着做事情，意味着自立，不依附于别人。

在1950年前的几十年间，职业似乎已经将对自我地位的热烈追求象征化了，而我在一篇题为“萨拉与水上飞机”的小说（载《妇女家庭杂志》1949年2月号）中就找到了这种热烈追求的最后的清晰特征。19年来，萨拉在家里一直扮演着一个温顺女儿的角色，现在她正偷偷地学开飞机。为了陪母亲作一些社交拜访，她耽误了飞行课程。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医生来家作客，对她说：“我亲爱的萨拉，每天每时每刻，你都在进行自杀，这是犯罪，比不能使别人愉快、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还要严重。”他对她的秘密有所察觉，便问她是不是爱上谁了。“她觉得这个问题难于回答。爱上谁了？爱上那个脾气好、又漂亮的飞行教练亨利了吗？爱上波光闪闪的水面和飞机腾空那一瞬间上升的双翼了吗？或是爱上了那绽开笑脸、无边无际的世界了？‘对，’她答道，‘我觉得是这样的。’”

次日上午，萨拉放单飞。亨利“砰”的一声把机舱门给她关上就走了，然后帮她发动了飞机。她现在是独自一个人了。刹那间，她已经掌握的技术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她得

尽力适应在这熟悉的驾驶舱里完完全全独当一面的局面，真是既令人兴奋，又有点儿摸不着头脑。她深深吸了一口气，突然间，一种自己具有某种本领的美妙感觉使她坐直了身子，露出了笑容。她不用靠别人了！她只听命于自己，再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了

“‘我会开飞机啦！’她大声自语道……气流从在波光闪闪的水浪中穿行的飞机旁冲过去，随之，水上飞机轻巧地升空了，自由自在地展翅翱翔。”就是她的母亲也不能够阻止她去取得她的飞机驾驶证。她不怕“去探寻，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想起亨利说，“你是我的”，脸上露出了困倦的笑容。

“是亨利的！她笑了。不对，她不是亨利的。她是萨拉！这就够了。由于有这种新的看法，看来她要真正认识自己还需要一段时间。她此刻已经是半入梦乡了，她不明白，当她在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她是不是会需要别的什么人，如果需要，那人会是谁。”

这之后，突然间，这种形象变得模糊起来了。正在自由地展翅翱翔的新型妇女在飞行中变得犹豫不决，在那一片蓝莹莹的阳光中哆嗦起来，于是匆忙赶回到她舒适温暖的家中去。就在萨拉放单飞的那一年，《妇女家庭杂志》刊载了赞颂“职业：家庭主妇”的最早的文章，随着这篇原型文章，无数类似的赞颂文章开始出现于妇女杂志上，并响彻整个50年代。这些文章通常是这样开头的：一个女人抱怨说，当她在统计表上有关栏目中只能写下“家庭主妇”时，她有一种自卑感。（“当我填写时，我意识到我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

的中年妇女，而我一生却没有做出任何成绩，我只不过是一个家庭主妇。”）然后，自己从来不会是主妇的赞歌作者（这里是出现于《妇女家庭杂志》1949年8月号上的报界女性，驻外记者，有名的专栏作家多萝西 汤普森）就会开怀大笑。她指责说，问题就出在你还不懂你同时是十几种事业的专门行家。“你可以这样填写：家务监督、厨师、护士、司机、裁缝、室内装饰家、会计、伙食包办者、教师、私人秘书——或者填慈善家。……为了爱情，你毕生都在付出自己的精力，自己的本领、自己的才智，毕生都在为别人服务。”但那主妇还是要抱怨，我都快50岁了，我青年时代想要搞的——音乐，我从来没有摸过，我在大学时受的教育，完全付诸东流了。

哈哈，汤普森小姐笑着说，不是因为你，你的孩子才具有音乐天赋吗？你的丈夫在完成他的事业那一段拮据岁月里，你不是一年才花3千美元就把家庭操持得满不错吗？你不是自己缝小孩和你自己的衣服、自己用纸糊起居室墙壁吗？你不是目光犀利地紧盯着市场，买了便宜货吗？在不干家务的时间，你不是还替你丈夫打字，校对他的手稿吗？不是还安排了些节目活动来弥补教堂活动的不足吗？不是还跟孩子一块儿在钢琴上弹奏二重奏以增添乐趣、读他们学习的教科书以跟上他们的课程吗？“但是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过一种精神寄托式的生活，代替别人在生活罢了，”主妇叹息道，“像拿破仑或者一位女王那样代替别人生活。”汤普森小姐以嘲弄的口吻说，“我拒不接受你这种自我怜悯，你是我所知的最为成功的女性之一。”

这番争论并未就此为止，如果说主妇连一文钱都没有挣

到，那就让她计算一下她所提供的服务的价值吧。妇女由于她们在持家方面的才干而省下的钱，比她们从事家庭之外的工作挣的钱还要多。至于说妇女的精神面貌被令人生厌的家务劳动弄得一塌糊涂，或许真有些妇女的天才被压制了，但是，"一个满是天才女性和弱智孩子的世界是会很快走向其尽头的……须知伟大的人物必定出自伟大的母亲。"

还有人让美国主妇回想起，"中世纪的天主教国家把本不受人注意、性情温和的马利亚捧到了天国女王的尊位，还建造起最好的大教堂，奉献给这位'Notre Dame[①]，我们的圣母'。……家庭缔造者，下一代的教养者，孩子们生活环境的创造者总是在重新创造出文化、文明和美德，假如她在这种伟大的家庭管理工作和创造性活动方面干得不错的话，那就让她自豪地将她的职业写成'主妇'"。

1949年，《妇女家庭杂志》还登载了玛格丽特·米德写的"男人和女人"一文。1942年出版了由法纳姆和伦德伯格写的《现代女性：迷惘的性别》，这部著作激起了各种杂志的反响，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追求事业上的成就和接受高等教育正在导致女子的男性化、这种情况会因女子的丈夫得不到性满足而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不仅如此，还会对家庭，对依附于家庭的孩子，对妇女的能力也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

于是，女性奥秘开始在全国广泛传播，它植根于陈规陋习之中，又将人们束缚在这些陈规陋习中，使他们不能面向未来。在这种新的奥秘后面是一些观念和理论，由于这些观

① Notre Dame：法文，"圣母马利亚"之意。——译注

念和理论十分深奥玄妙，似乎是人们可以接受的真理，所以常常使人莫辨真伪。由于这些理论非常复杂，所以除了少数初识此道之人而外，大家都望而却步，于是这些理论就成了无可批驳的了。有必要打破这面神秘的高墙，更仔细地观察这些复杂的观念和这些已被人接受的真理，去充分了解美国妇女的情况。

女性奥秘论告诉人们，女人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使命就是她们自身女性特征的完善；它告诉人們，纵观其历史，西方文化中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低估了这种女性特征的价值；它又告诉人们，这种女性特征非常神秘，非常接近人类生命的创造和起源，是一种直觉的东西，所以，人为的科学或许永远也无法理解它。但是无论有多么特殊，多么不一致，女性特征决不比人的本性低下，在某些方面，或许还要优于后者。女性奥秘论告诉人们，过去犯的错误和女人遇到麻烦的根源就在于女人妒忌男人，力图要跟男人一样，而不是认识到她们自己的本性，这种本性的完美，只存在于男人主宰一切、女人在性方面温顺服从和对孩子施加的母爱之中。

但是这种奥秘给美国妇女塑造出的新形象还是昔日的形象：“职业：家庭主妇。”新的奥秘论造就出别无其他职业选择的主妇加母亲这种所有妇女的典范。它预测道：就妇女而言，此时此刻，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它光辉的顶点。在这些莫测高深颇能迷惑人的话语下面，这种奥秘只不过是将女性生涯中某些具体的、有限的、家务方面的东西（如同那些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活局限在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生孩子之内的女人们过的日子一样）变成了所有女人都必须遵循或必须摒弃其女性特征的一种教义、一种生活方式。

自1949年以后，对美国妇女来说，女性的完美，就只存在唯一的一种定义，那就是主妇加母亲。在这个变化中的世界上，作为一个正在变化、正在成长的个体，美国妇女的形象梦幻般地被粉碎了。她那为寻求自我的放单飞在匆忙探求跟别人共同生活的安全感时，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她那无限广阔的天地收缩成了舒适家庭的几面墙壁。

反映在妇女杂志中的这种变化，在1949年时就已经清晰可见了，后来在整个50年代，更是有增无减："女性特征始于家庭"，"这或许是一个男人的世界"，"趁你年青时生小孩"，"怎样获取一位男性"，"我们结婚后，我还去上班吗？""你在训练你的女儿当妻子吗？""家庭中的事业"，"女人非得多说话吗？""为什么美国兵更喜欢那些德国姑娘"，"女人从母亲夏娃那里可以学些什么？""政治确实是男人的世界"，"怎样维护幸福的婚姻"，"不要怕早婚"，"医生谈母乳哺育"，"我们的小孩在家里出生"，"烹饪对我来讲富于诗意"，"持家诸事"，等等。

到1949年年底，妇女杂志上的主人公，每三位中只有一位是事业型妇女，就是这一位事业型妇女也是通过她放弃自己的事业，发现自己真正需要的还是当主妇这样的行为表现出来的。在1958年，后来在1959年，我逐期翻遍了三大妇女杂志（排在第四位的《妇女家庭伴侣》已经停刊），竟没有发现一位女主人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职业：家庭主妇"之外，还有自己的事业，在诸如艺术、宗教、专门行业等任何一种工作中有所作为。100位女主人公中只有一位有工作，就连那些未婚的青年女主人公也不再工作了，除非她打算获

取一个丈夫。①

奇怪的是，这些新型的、幸福的主妇式主人公看上去要比三四十年代那些生气勃勃的事业型姑娘还年轻。无论是从外貌，或是孩子般的依赖性上，她们看起来总是较为年轻一些。除了指望生个孩子，她们也看不到什么前景。在她们的天地里，唯一充满生气、不断成长的形象就是孩子。主妇型的女主人公永远是年轻的，因为她们自己的形象在生孩子的时候便告结束。当她们的孩子与世界一起成长的时候，她们却像彼得·潘②一样永葆青春。她们生小孩得一直生下去，因为女性的奥秘告诉人们，对一个女人来说，只有当女主人公，舍此别无他途。下面是从1959年4月号《妇女家庭杂志》所载“夹心面包制作者”中选取的一个典型例证。这个女人把大学讲授的经济学带到家里来，她不外出工作了，学习如何做饭菜。她尽管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还得在孩子们的游戏中扮作新娘。她的问题是钱。“啊，没有什么像税收啦、互惠贸易协定啦、外援项目啦那么令人生厌了。我把所有这些经济上令人头昏目眩的东西都交给了我那位根据宪法选出来的、在华盛顿的代表，愿上天保祐他。”

问题就在出在她那42.1美元的津贴。她极不愿意在每一

---

① 20世纪60年代，在妇女杂志上偶而也出现一些并非是“幸福主妇”的女主人公，《麦考尔》杂志的一位编辑解释道：“有时为了纯粹娱乐性的目的，我们也发表一篇不落俗套的小说。”有一篇这种样式的中篇小说，是诺尔·克莱德按要求专为《家政》杂志创作的（载于1960年1月号），其标题是“男人反对女人”。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一位幸福的事业型女人，她几乎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原注

② 彼得·潘，英国作家巴里（1860—1937）创作的同名剧本中人物，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男孩。——译注

次想买一双鞋子时都得开口向丈夫要钱，但是如果把赊购帐①交由她来管吧，丈夫又信不过她。"啊，我多么想有一点点我自己的钱啊！要不了多少，真的。一年不多，几百美元也就够了，偶尔跟朋友聚一聚，吃顿午饭；穿双高档彩色统袜，开开心，买几件小东西，用不着开口向查利要，这笔钱也够了。但是，唉，查利是对的，我这一辈子也没有挣到过一元钱，对怎样挣钱一无所知。所以长期以来我干的一切就是守着这个窝，没完没了地做饭、打扫卫生，做饭、洗衣服、熨衣服、做饭。"

终于有了解决的办法——她从在她丈夫工厂里工作的其他男人那里承接夹心面包订货。除非她忘了计成本，她每周可挣得52.5美金。她记不得总额是多少，只好把8640个装夹心面包的袋子藏在炉子后面。查利说她把夹心面包做得过于花样翻新了，她解释道："如果这仅仅是黑面包上放火腿的话，那我不过就是一个夹心面包制作者而已，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在此之外，还得有些别具一格的特色——嗯，那才会使这项工作变得具有创造性哩。"于是她剁肉馅、在面包上抹肉馅、包装、封口，黎明即起，忙个不停，每天赚得九美金的纯利，直至她对这些食物发出的气味感到厌恶。后来，有一天，她忙着将蒜味咸腊肠切成片，放进八个老也装不满的午餐盒子里，一夜没睡，终于支撑不住，踉跄着跌到楼下。"查利正好这时下来，迅速地瞥了我一眼，赶紧跑去倒了一杯水来。"她意识到不久她又要生小孩了。

① 一种购物信用，顾客凭此信用，可在商店记账购买商品，到时总结算。——译注

"查利就此事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把别人向你预订的午餐取消了。你是个母亲，当母亲就是你的本职工作。你没有必要也去挣钱。'就是这么动听，就是这么简单！'遵命，老板'，我服从了，我喃喃低语着，坦白说是感到了宽慰。"当夜，丈夫把支票簿给她带回家来，他还打算把一个夫妻共用帐号交给她。于是她决定再也不提那8640个夹心面包纸袋了。她可以做夹心面包，让她的四个孩子带着上学去，要到最小的一个孩子准备上大学时，才会把这么多纸袋用完。

走完从萨拉和她的水上飞机通向夹心面包制作者的道路，只需仅仅10年。在这10年当中，美国妇女的形象似乎经历了一种精神分裂症似的裂变，而这种形象上的裂变，远远不限于从妇女的梦想中粗暴地剥夺她们的职业。

以前，妇女的形象也曾经分裂成两类——一类是受人尊重的纯洁美好的女性，另一类是贪求肉欲的淫妇。新形象的分裂则显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分裂——一类是具有女性特征的妇女，她们的美好之处也包括肉欲；另一类是事业型妇女，她们的罪过包括追求自身价值的一切愿望。新的女性道德的故事就是讲的清除被禁锢的事业梦，就是女主人公对墨菲斯托菲里斯[1]取得的胜利，这个魔鬼开始是以事业型妇女的形象出现，威胁说要弄走女主人公的丈夫和孩子；最后，女主人公自己身上的魔鬼，即追求自立的梦想、精神上的不满足、甚至不想依附别人的感情、这些都必须被袪除，以赢得或保持丈夫和孩子的爱。

① 墨菲斯托菲里斯：浮士德传说中的魔鬼精灵。——译注

在1957年11月号《红皮书》杂志所载“举止像丈夫的男人”的故事中，有一位新婚的年轻女主人公，是一个脸上长雀斑、皮肤颜色偏深的小个子姑娘，绰号叫“小东西”。有一次，她念大学时同寝室住的同学来看她，其中一位叫凯的是“一个男人似的姑娘，确实很能干……她把她涂了发油的赤褐色头发挽成高高的发髻，还插上两根筷子似的东西。”凯不但离了婚，而且在电视上工作时把孩子留给祖母带。这个事业型妇女式的魔鬼以参加工作为诱饵，引诱“小东西”不要去哺育她的婴孩，甚至不许这位年轻的母亲在午夜两点小孩哭叫时去小孩那里。但是她的丈夫乔治发现了窗户洞开。北风凛冽，赤身露体的婴孩在刺骨的寒风中哭叫不止，血从脸颊上淌了下来之后，她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凯也悔过自新了，她在工作时偷偷溜走，上她孩子那儿去，重新开始生活。而“小东西”也在午夜两点时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沾沾自喜地沉思默想，“我就是一个主妇，我真高兴，真高兴，真高兴”，她开始幻想她怀中的婴孩长大后也是一位主妇了。

事业型妇女被清除了，那些对社会活动有兴趣的主妇又成了应该被祓除的魔鬼。甚至连“家长—教师联谊会”这样的组织都带上了令人生疑的涵义，就更不用说那些对一些国际问题产生兴趣的人了（见1955年11月号《麦考尔》杂志所载“算得上是谈情说爱”）。再往下，就到了那些仅仅只是考虑到自己的主妇。“我不想告诉你”一文（载《麦考尔》1958年1月号）的女主人公想要对自己支配支票簿和跟丈夫在家庭琐事上互不相让之类的问题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后来，她跟自己的丈夫分了手，后者去跟一个“可怜无助的小

寡妇”一起生活，那个寡妇的主要问题是她不能够“立即想出”一个办理保险或抵押的办法来。这位与丈夫分了手的妻子说：“她准是还有性方面的要求，当妻子的还能有什么武器与这个相抗衡呢？”但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告诉她：“你把这事看得太简单了，你忘记了塔尼娅是多么可怜无援，也忘记了她对帮助她的男子是多么感激……。”

“我不可能是那种离了男人的帮助就没法过日子的女人，”这位妻子说道，“我从大学出来后有一份比一般人从事的还好的工作，我一直是一个相当自由自在的人。我不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妇人，我也不会装成那副模样。”然而就在那天晚上，她懂得了。她听到一阵可能是盗贼发出的声音，尽管她也知道那不过是老鼠，但还是绝望地大声呼叫，向她丈夫求援，她也确实把他争取回来了。在他对她假装出来的惶恐样子作出一番安慰时，她喃喃低语说，那天早上在两人的争吵中，他无疑是正确的。“她静静地躺在软和的床上，甜甜地笑着，心中甚感满意，几乎没有什么内疚之感。”

在这条道路的尽头，作为不依附别人的自我和关于她自己的故事中的主角，女主人公差不多完全消逝了。这条道路的尽头就是同一化（togatherness），即跟别人共同生活，到这一步，女人连靠负疚来掩盖的自我都没有了，她的存在，仅仅是为着丈夫和孩子，她们也只能因为丈夫和孩子存在而存在。

1954年由《麦考尔》杂志发行者杜撰出来的“同一化”的概念，作为一种具有精神意义的运动，被广告制作商、牧师、报纸编辑等紧紧抓住了。有一段时间，“同一化”实际上被吹捧成了全体国民的目标。然而，对这个所谓“同一

化”，社会上很快就出现了尖锐的批评和辛辣的讽刺，说它取代了人类更大的目标，取代了男人的目标。妇女受到指责，说她们不该让自己的丈夫干家务，而不让他们为国家，为世界去干一番开拓性的事业。有人会问，具有政治家、人类学家、物理学家、诗人等才干的男人，在平日晚上和星期六上午这样的工作日之外的时间，本可以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但是还得洗碗碟、给婴儿换尿布，这是为什么？

有意思的是，批评者们只是对此感到忿忿不平：男人们被要求去共同承担“女人的天地”。没有几个人对女人的天地到底有多广阔提出过质疑。似乎没有一个人还记得起，女人曾经被认为也具有政治家、诗人和物理学家的才干和眼光。几乎没有人看到，所谓“同一化”，对妇女来说，实在是弥天大谎。

再看看1954年复活节号《麦考尔》杂志，它宣称同一化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妇女争取并赢得政治平等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还说妇女杂志“帮助你去开拓过去是列为女性禁区的广阔的生活领域”。在新的生活方式下，“男人女人结婚、生孩子时的年龄越来越小，这种人日益增多，他们的家庭人口越来越多，而且从自己的家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下，“男人，女人和孩子正在取得同一化……，不是互不相干的单个女人，或单个男人，而是共享生活乐趣的一家人。”

这篇详细阐述这种生活方式的配图文章的标题是“一个男人的地位在家中”。文章把住在新泽西州一幢灰顶错层房屋里，有三个小孩的一对夫妇描写成了新的形象、新的理想。埃德和卡罗尔的生活“几乎完全是以他们的孩子和家庭

为中心的”。文章中他们俩一块儿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做手工活、给孩子穿衣服，一块儿做早餐。“然后埃德去停车场，驱车去他的办公室上班。”

埃德作为丈夫，主要是他，要为家庭内的色调、装饰等作出决策。埃德喜欢做的事是：在住房四周走走，自己动手做点东西，上油漆，挑选家俱、地毯、窗帘、托盘，给孩子们读读书，照顾他们上床睡觉，在花园里松土浇花，照顾孩子们吃饭，给他们洗澡、穿衣服，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举行的会议、做饭、给妻子买衣服，买日常用品。

对下面这些家务事埃德就不喜欢做了：抹灰尘，用真空吸尘器打扫房间，做完起了个头又不想完成的事，晒窗帘，涮洗锅盘碗盏，孩子起来后整理床铺，铲雪，把草坪剪平，给婴儿换尿布，把照看婴儿的小媬姆带回家来，洗衣服，熨衣服。埃德当然是不做这些事的。

为家庭每一个成员着想，一家人需要一个头。这是指父亲，而不是母亲……。男孩子和女孩子对男人、女人的能力和作用都需要了解、需要认识和尊重。在给孩子洗澡，喂食、照料孩子、跟他们一块玩耍等方面，尽管父亲愿意并准备尽自己一份力量，但还不能把他仅仅当成是一个起母亲作用的人，他还得在外面工作；他是与外部世界的一种联系。如果在那个世界里，他对外部事物感兴趣、勇于进取、谦虚忍让、颇有建树，他必然会把这些品质传给他的孩子。

那时在《麦考尔》杂志社举行过多次编辑部会议，其气

氛可以说是使人感到痛苦。“突然间，人人都在寻求同一化的精神意义，期望着我们从过去五年里人们过的生活（悄悄溜回家里，对身后的外部世界不闻不问）之中创造出某种神奇的宗教运动来，但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一种方式，来表明这不是使人感到枯燥乏味的怪诞东西。”《麦考尔》杂志社一位前编辑这样回忆道，“这老是被归结为，好啦，好啦，好啦，爸爸正在园子里烤小猪呢。我们把男子安排在时装图片和食品图片中，甚至香水图片中。但是我们在编辑工作中是很难这样发挥的。

“我们曾收到一些由精神病医生写的文章，但是我们不能用在杂志上，因为这些文章将父母俩把全部心身放在孩子身上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摆在人们面前。但是除了照看孩子，你又能干些什么才叫同一化呢？我们半是哀怨，半是感激地另找材料，以使我们能够向读者展示父亲与母亲的合影。有时我们会产生疑问，男人把以前属于女人干的各种活，诸如室内装饰、照看小孩及做饭等，都接过来干了，那女人又去干什么呢？但是我们不能表现妇女离家出走，去干一番事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要作的是不再单为妇女编辑刊物了，而要同时为男人和女人——编刊物。我们想为全体人民，而不是仅仅为女人搞编辑工作。”

但是，既然女人已经被禁止跟男人一块儿参加外部世界的活动，她们又能否算是人民呢？女人的独立自主遭到禁止，她们最终要被吞没在这种被动的、依附于人的形象之中，即她们还是需要男人来作决定，甚至在家庭内也是如此。那种狂乱的幻觉，认为同一化会给枯燥乏味的家务琐事注入精神内涵，那种为弥补妇女社会地位的不足而对某种宗

教运动的渴求，表明了妇女蒙受的损失和妇女形象苍白空虚的程度。让男人分担家务就能补偿妇女在这世界上蒙受的损失吗？用真空吸尘器跟丈夫一块儿打扫起居室的地板就能够使主妇在生活中有一些神奇的新目标吗？

1956年，当同一化处于高峰状态时，《麦考尔》感到厌烦的编辑刊登了一篇题为“离家出走的母亲”的短文。使编辑们大为惊讶的是，在他们发表的所有文章中，读这篇文章的读者人数最多。“那一刻我们才看到了真理，”一位前任编辑说，“我们一下子意识到，所有那些在家里跟三个半孩子一块儿生活的母亲们并不幸福，甚至可以说是痛苦的。”

但是，到那个时候，“职业：家庭主妇”，这种美国妇女的新形象已经被铸入了无可置疑的女性奥秘之中，成了被这种奥秘扭曲了的现实。

在那时，我开始为妇女杂志撰稿。当时，人们认为妇女作为妻子和母亲只关心自己，感情只会在什么地方受骗上当，除此之外，她们对政治、美国之外的生活、国家大事、艺术、科学、新思想、积极进取、受教育，甚至她们自己周围的人们等，一概不感兴趣。在50年代，编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理所当然的，而作家们则普遍把这种看法看成是生活中不可更改的事实。

对于妇女来说，政治成了玛米娅①的衣着和尼克松②的家庭生活。出自良知，也出自一种责任感，《妇女家庭杂

---

① 玛米娅，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1890—1969，总统任期1953—1961）的夫人。——译注

② 尼克松（1913—），曾任美国副总统（1953—1961）是艾森豪威尔的亲选伙伴。后任总统（1969—1973），因水门事件丑闻辞职。——译注

志》会登载诸如“政治天路历程①”之类的系列文章，描写妇女们如何努力去改善她们的孩子就读的学校和玩耍的操场。然而，就是利用母爱来探讨政治，也未必能够激起妇女的兴趣，这被认为不过是一种手法。人人都知道究竟会有多少人去阅读这类文章。《红皮书》杂志一位脑瓜机灵的编辑描写当丈夫航行进核污染地区时他的妻子的感情状态，试图将政治问题也用女性的特征来阐述。

那些为普及性妇女杂志搞编辑工作的男子一致认为，“女子不能够接受一种纯思想、纯论点，应当把这些思想和论点换成能够被妇女理解的说法。”妇女杂志的撰稿人完全懂得这一点，有一位自然生育专家给一家最有影响的妇女杂志投去一篇文章，标题是“怎么在防原子弹掩体中生小孩”。一位编辑告诉我，“文章写得并不好，不然我们或许已经将那篇文章采用了。”按照女性的奥秘，那些具有神秘莫测的女性特征的妇女，或许只对在防原子弹掩体中生小孩时生理上的种种具体情况感兴趣，而决不会对原子弹具有毁灭全人类这种抽象概念发生兴趣。

当然，这样一种信念也就成了某种女性自我完善的预言。1960年，一位敏感的社会心理学家给我展示了一些令人沮丧的统计数据，看来这些数据明确无误地证实，35岁以下的美国妇女的确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告诉我，“妇女有选举权，但她们并不梦想要靠选举去谋得一官半职。如果你写一篇政论性文章，她们是不会去读的。你得把它转化成她们能

① 《天路历程》：英国17世纪作家翰约·班扬的代表作，系宗教讽喻小说。——译注

够理解的问题——爱情故事，怀孕生小孩，喂养孩子，家庭设置，衣着等。要发表关于经济，关于种族问题，关于人权等的文章，你就得想到，妇女对这些问题，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或许她们真的是闻所未闻吧。思想可不像血缘中的天性一样，可以照原样传入到人的心灵中去。思想是通过受教育，通过书刊等种种印刷品来传播的。心理学家的调查材料表明，那些从中学、大学里缀学去结婚的新型年轻主妇是不读书的。她们只读杂志，而当今的杂志又假定妇女对思想观念不感兴趣。但是当我回到卷帙浩繁的图书馆里，我发现，在三十四十年代，那些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如《妇女家庭杂志》，就登载过数百篇关于家庭之外的广阔世界的文章。例如：沃尔特·李普曼①写的“宣战前美国对外关系秘闻”，“战后美国能享有和平吗？”哈罗德·史塔生②写的“斯大林在午夜”；“史迪威将军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文森特·希恩③写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末日的几篇文章；关于德国的犹太人受迫害；关于新政④；卡尔·桑德堡⑤关于

---

① W·李普曼（1889--1974）美国新闻评论家、作家、世界著名的政论专栏作家。——译注

② H·史塔生，生于1907年，美国律师、政治活动家，曾任明尼苏达州州长，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校长。——译注

③ V·希恩，生于1899年，美国作家，出版过多部小说。——译注。

④ 新政，美国总统说F·D·罗斯福的政府在1933－1939年间所实施的内政纲领的名称。——译注

⑤ 卡尔·桑德堡（1878－1967），美国诗人，传记作家，《林肯传》（共6卷，1926－1942）的作者。——译注

林肯总统被刺的报道；福克纳①写的密西西比州的故事；桑格夫人②为提倡节制生育而进行的斗争。

到了50年代，除了专门为作为主妇的妇女而写的文章，或是将妇女描写成主妇的文章，或是纯粹是讲女性地位如温莎公爵夫人或玛格丽特公主等的文章，实际上，上述那些杂志再也不登载其他文章了。《妇女家庭杂志》的一位编辑告诉我："如果我们收到一篇文章，是讲一个女人去干冒险出格的事，哼，我们就认为她准是太不守本分，有神经病。"桑格夫人要是在现在，是绝对上不了杂志的。

1960年，我看到一些统计数据，这些数据表明，35岁以下的妇女不可能等同于某篇小说中那位精力充沛的女主人公，她在广告经营部工作，力劝男孩子就留在大城市里为自己的生活准则而奋斗，而不要为了家里的事情不出问题就跑回家去；这些新的年轻主妇也不可能等同于那位蔑视传统观念，按自己的信念我行我素的青年教士；说她们只等同于那位18岁时瘫痪了的男青年，倒一点不过头。（"我恢复了知觉，才发现我既不能动，又不能说话。我只能扭动一只手上的一根手指头。在信念和精神病医生的帮助下，我现在才认识到了为什么要尽可能充实地生活。"）

上述这些是不是揭示了有关身为新型主妇的读者的一些情况呢？如同任何一位编辑都能够证实的一样，她们完全可能等同于身受眼瞎、耳聋、体残、中风、瘫痪、癌症或垂死等等之害的人。这种关于既不能看不能动，又不能说话的人

① 威廉·福克纳（1897—1962），美国小说家，作品大都以美国南方密西西比州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为背景，曾获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② 桑格夫人（1883—1966），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倡导者。——译注

的文章在“职业：家庭主妇”的时代，成了妇女杂志上的老生常谈。这类事情被一写再写、不厌其详，完全取代了那些关于国家和世界，关于思想和论点，关于艺术和科学的文章；取代了描写积极进取、生气勃勃的妇女的故事。而且无论身受病痛折磨的人是男人、女人或小孩，也无论苟延残喘是由于不治之癌症或是日渐沉重的瘫痪，那些身为主妇的读者都能够与之等同。

在我为这些杂志撰稿的时候，编辑们不断地提醒我，“女人是需要有与自己相同的人的。”有一次我想写一篇关于一位艺术家的文章。于是我就写她做饭、去市场买东西、爱上她后来的丈夫、给婴儿小床上油漆，我不得已略去了她花在绘画和干正经事上的时间，还略去了她思考这些事的方式。如果你使你笔下的女性言谈举止像个主妇，如果你略去了她为家庭之外的世界作的工作，或者略去了她孜孜以求的、对心灵和精神的个人看法，那么，有时你还是能够侥幸对并不真是主妇的女性作一番描述。1949年2月号的《妇女家庭杂志》登载了一篇题为“诗人的厨房”的特写，展示了米莱[①]做饭的情景。“说干家务事会使人失身份丢面子，人皆如此，我现在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言论了，因为，如果连当今这个时代，以及任何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都能够从简单的家务事中发现美，那就意味着，这个多年存在的论争已告结束。”

有一类在妇女杂志上一直备受欢迎的“事业型妇女”，

---

① 米莱（1892—1950），美国女诗人，剧作家，善于体现20年代浪漫女性的叛逆夸张气质。——译注

那就是女演员。但是，女演员的形像也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从脾气暴燥，颇有心计的复杂个性，从精神和性感的奇妙混合体，变成性感对象，变成长着一张娃娃脸的新娘，或者是家庭主妇。例如，想一想嘉宝，还有黛德丽，戴维丝，拉塞尔，赫本，然后再想一想梦露，雷诺兹，巴多，[1]还有《我爱露西》[2]。

当你在为妇女杂志写一位女演员时，你得把她写成一个主妇。你从来不去写她从事或喜欢当演员的工作，除非她因此而失去了丈夫或孩子或者是承认自己作为女人失败了。

1957年6月号《红皮书》杂志所载朱迪·霍利迪的简介，描写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是怎样开始在工作中发现了她从来不曾在生活中找到的乐趣。”我们从文章中读到，“她以她的热情和信心，在银幕上扮演成熟而有智识的妻子和待产的女人，这与她以前扮演过的角色迥然不同。”由于她跟丈夫离了婚，作为女人“她有一种强烈的欠缺感，”那么，她必定是在事业上找到了满足。“……朱迪的生活有一种令人伤心的讽刺意味：作为一个演员，她几乎没有作出什么努力就取得了成功，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却失败了……。”

---

① 嘉宝(1905—)，瑞典电影女演员，长期在美国拍片，享有盛名；黛德丽（1904— ），生于德国的美国女演员；戴维丝（1908— ），美国著名电影女演员；赫本（1909— ），从事舞台剧和电影表演达50余年的美国著名女演员；梦露（1929—1962），美国著名电影明星，富于性感；雷诺兹（1932— ），美国能歌善舞的女演员；巴多（1934— ），法国著名电影女演员，以性感表演著称。——译注

② 《我爱露西》，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于1951年首次在电视上推出的喜剧连续剧，后于1961—1974年间几次重播，深受美国公众喜爱，该剧的主演是美国广播电视电影喜剧女明星露西尔·鲍尔（Lucille Ball,1911—）——译注

十分奇怪的是，当女性的奥秘不断扩展，对妇女的事业和她们在家庭之外从事的一切工作都持否定态度的同时，在家庭之外工作的美国妇女却在增多，达到了每三个中就有一个的比例。不错，三个妇女中的另外两个仍然是家庭主妇，但是，当世界的大门最终为所有的妇女敞开之时，为什么女性奥秘对一个世纪以来激励着妇女的梦想，要持否定态度？

一天上午，当我坐在一家妇女杂志的编辑办公室里时，我找到了线索。那位编辑是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她回忆起当年旧的妇女形象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她也看到这一形象是如何被取代的。她对我说，精力充沛的事业型姑娘这种旧形象基本上是由女作家、女编辑创造出来的。而主妇——母亲这一种新形象却基本上是由男作家、男编辑创造出来的。

她以一种怀旧的情绪说："那时候，大部分材料都由女作家提供。战争结束后，青年男子纷纷回家，许许多多的女作家不再从事写作了。年青妇女开始生育许多小孩，终止了写作。新作家清一色是从战场上回来的男子，在战场上他们对家庭，对温暖舒适的家庭生活，简直是朝思暮想、梦寐以求。"30年代愉快的"事业型姑娘"这类女主人公的塑造者们一个一个地销声匿迹了。到40年代末，那些在描写主妇式新形象方面还没有找到窍门的作家都离开了妇女杂志界。杂志界的新人都换成了男子，以及少数几位能够按照主妇这一公式写来得心应手的妇女。在这些杂志的影响下，形成了另外几类人：有一类新出现的女作家，他们按主妇的形象，或者装着按主妇的形象，安排自己的生活；还有一类新出现的编辑和出版商，他们为妇女工作，热衷于向妇女推销广

告商感兴趣的东西——家庭用具、洗洁剂、口红等，而对深入妇女心灵的思想观念，却不甚感兴趣。今天，在多数这类杂志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呼声都是由男子发出的。女人通常只是照章办事，她们只编辑为主妇提供“服务”的有关栏目，但是，就是对主妇的新形象具有决定意义的公式本身，也是男人思想的产物。

此外，在40年代和50年代，那些严肃的小说作家，无论男女，都从发行量很大的妇女杂志上消失了。实际上，无论哪一种小说都几乎完全被另一类文章取代了。再也没有那种关于论点或思想的旧文章了，代之而来的是关于“服务”的新言论。有些时候，这类文章不是大谈某位诗人的诗艺和某个东奔西忙的记者在烤馅饼或买洗衣机时表现出来的诚意，就是谈油漆可以对起居室产生奇效，谈为了使身材看上去具有形体美、节食啦、药物啦、衣着啦、还有化装品什么的作用。有时这类文章讲述一些深奥玄妙的思想：精神病学的新近发展，儿童心理学、性与婚姻、医药等。据悉，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妇女读者是能够接受这些切合她们需要的思想观念的，但是，只有当她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关于身体的种种细节上，而这些细节又是以关心哪些事干得、哪些事干不得的普通主妇的日常生活这样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才有可能接受。例如，如何使你的丈夫幸福，如何解决你的小孩尿床的问题，如何利用家庭药箱来延年益寿……。

有一点很奇怪，无论是对主妇直接提供服务，还是关于一位主妇的记实性报道，妇女杂志上这类范围很窄的文章，几乎总是比妇女杂志登载的小说质量好。这类文章要写得好些，诚恳些，也更深刻复杂一些。爱动脑筋的读者和感到困

惑的编辑都多次发现这种情况，连作家本人也发现了。《红皮书》杂志的一位编辑说，“那些严肃的小说作家变得太内向了，无法为我们的读者所接受，所以我们只好跟公式化的作家合作了。”以前，像南希·黑尔[1]，甚至威廉·福克纳这样的严肃作家都曾为妇女杂志撰稿，也不曾被认为是“无法为读者接受。”或许，内心的诚挚、观念的深度和人类的真谛等对优秀小说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东西，而妇女的新形象却不能容许这些。

至少，小说需要有一位主人公，或者对妇女杂志来说，一位女主人公，那是一个探索人生目标或人生梦想的“自我”。描写追求男孩子的姑娘，或探寻沙发下面一个布满灰尘的球的主妇，这类故事毕竟数目有限。这样，服务性的文章便取代了小说中必需的内心诚挚和人生真谛，这类文章中充满了客观而具体，实实在在的琐碎家务——墙壁的色彩、唇膏的颜色、炉子的确切温度，等等。

拿当今的妇女杂志来衡量，妇女生活中的具体细节，比她们的思想观念，比她们的梦想似乎还要有趣味。不然，就是那些丰富而真实的细节，以及对家庭琐事的悉心描述，掩盖了她们在梦想和思想方面的匮乏，掩盖了压在美国主妇头上的可怕的厌烦感？

有一次，我坐在另一位女编辑的办公室里，她是从旧时代过来的，是现在基本上由男人控制的妇女杂志界中很少几位女编辑之一。她对她在创造女性奥秘中所起的作用作了一

[1] N·黑尔，生于1908年，美国作家，记者、编辑。——译注

番解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接受过精神分析法治疗，"她回忆道，"我们开始为自己是事业型妇女感到窘困不安。有一种可怕的惶惑感，那就是我们正在丧失我们的女性特征。于是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要帮助妇女接受她们女性的身份。"

如果真正的女编辑不管怎样都不能够放弃她自己的事业，那么，要"帮助"其他的妇女努力去做贤妻良母，理由就更充足了。极少几位还够参加编辑部会议的女性在她们的现实生活中是拒绝向女性的奥秘屈服的。但是，这种力量来自于她们参与创造，而多数妇女都深感愧疚的女性形象。而如果当她们在爱情和小孩方面一无所获时，她们会认为或许是她们从事的事业应当受到指责。

在她那堆得乱七八糟的办公桌的后边，一位《小姐》杂志的编辑不安地说："从大学到我们这儿来当客座编辑的姑娘们对我们这些人，可以说是心怀怜悯，我想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是事业型妇女吧。不久前跟她们在一次工作午餐上，我们请她们绕着餐桌走走，给我们大家谈一谈她们对自己的事业有些什么打算。20个姑娘中竟然没有一个举手的。我还记得当年我是怎么学着干这一行，是多么热爱自己的工作的——那时我们大家都发疯了么？"

跟那些自欺欺人的女编辑不无关联的是一类新型的女作家开始把她们自己描写成"家庭主妇"，对孩子们嬉笑打闹的欢快生活，对离心式洗衣机，对家长—教师联谊会举办的家长之夜活动等沉迷其中，乐此不疲。雪莉·杰克逊①写道："日复一日地为12岁的男孩子整理床铺之后，就是攀登埃弗

① S·杰克逊(1919—1995)，美国女小说家，以短篇小说著称。——译注

勒斯峰[1]吧，看来也不过是小事一桩，令人发笑而已。”（1956年4月号《麦考尔》杂志）雪莉·杰克逊从青年时代起一直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作家，努力追求一种远比整理床铺重要得多的技艺。还有身为剧作家的琼·克尔（Jean Kerr）以及诗人菲利斯·麦金利（Phyllis McGinley），当她们都把自己描述成主妇的时候，对那些真正在理床的管家或女佣，她们可能是忽略了，也许又没有忽略，但是，对这种情况，以及对包含在她们写的小说、诗歌和剧本中，别人感到满足的艰辛劳动，实际上她们是不予承认的。她们作为个人而不是作为主妇，对自己过的生活也是不予承认的。

她们是满不错的有本事的人，是这些主妇式作家中的佼佼者。而她们干的有些工作却是可笑的。孩子们发生的事情，12岁小男孩头一次吸香烟，少年棒球联盟以及幼儿园的小乐队等，这些常常是引人发笑的。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事情不仅普通主妇要遇到，身为作家的妇女也要遇到。但是，如果汤姆叔叔[2]或阿莫斯与安迪[3]那样干，关于主妇式作家的有些事情就引不起人发笑了。“笑吧，”作家主妇对真正的主妇说道。“如果你现在感到空虚、厌烦、绝望、成天困在理床啦，开车接送孩子啦，洗碗碟啦什么的，这不是很可笑吗？我们都处于同样的困境之中。”那么，那些真正的主妇是不是在笑声中就能

① 埃弗勒斯峰，即珠穆朗玛峰。——译注

② 汤姆叔叔，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1811—1896）写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1842）中的主人公，——译注

③ 阿莫斯与安迪，描写纽约哈莱姆区黑人生活的广播剧和电视系列片中的主要人物。——译注

够把她们的梦幻和绝望感驱散了呢？她们是不是认为她们受压抑的才干和受限制的生活不过是在开玩笑呢？雪莉·杰克逊也理床，也恋爱，还笑她的儿子，同时她又写了一本书。琼·克尔编的剧在百老汇也上演了。玩笑不是对她们这样的人开的。

有一些新型主妇式作家正是按照这种形象在生活，《红皮书》杂志告诉我们，一篇论述“母乳哺育”的文章作者是一位名叫贝蒂·安·康特里伍曼的女性，“她原先打算当医生。但就在她以优异成绩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前夕，她一想到当医生这种奉献会把她从她真正希冀的结婚，组织大家庭这种期望割裂出来，她退却了。她进了耶鲁大学的保育学院，跟一位年青的精神病医生在第一次约会时订了婚。现在他们有从2岁到13岁的6个孩子，而康特里伍曼夫人成了印第安纳波利斯产科联合会的母乳哺育指导。”（1960年6月号《红皮书》杂志）她说：

> 对母亲来说，母乳哺育成了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给母亲一种高尚的完美感，使母亲处于一种每个妇女都期望实现的尽善尽美的关系之中……。而生儿育女这个简单事实本身并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和渴求……。母爱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能以温柔的感情、以保护的态度、以充满母爱的女性那种无微不至的爱去充分表现自己。

当终生视为神圣的母爱被说成是完美的生活方式时，妇女们是不是自己就应当拒绝对她们敞开大门的外部世界和未来？或者说，是不是对外部世界的拒绝迫使她们把母爱当成

了完美的生活方式？划分奥秘与现实的分界线消失了；在现实生活中的妇女身上就体现了妇女形象上的这种分裂。在专门奉献给“新型”美国妇女、洋洋大观的《生活》杂志1956年圣诞节专号上，我们看到了一位典型的事业型女性，那不是妇女杂志上的反面角色，而是记实性文章里的形象，她正“求助于”精神病医生，她成了男女平等主义宣传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反证。她受过良好教育，很有才华，很有抱负，十分引人注目；她挣的钱与其丈夫大致相等。但是，她在这本杂志上被描写成“心情沮丧”，她因她所从事的事业变得“男性化”了，以至她那精疲力竭、萎靡不振的丈夫在性方面对她也丝毫不感兴趣了。她丈夫拒不承担责任，他把他那被损害的男子气概淹没在酗酒之中。

还有生活在郊区，心怀不满的妻子，她们在家长一教师联谊会上大声喧闹；她们有一种病态的受压抑感，毁了自己的孩子，还对能外出工作的丈夫心生妒忌，加以控制。“那些作妻子的，在婚前工作过，或起码受过参加脑力劳动的教育，现在却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不过是个家庭主妇’的可悲地位……。她们极不高兴，似乎她们是事业型妇女，可能毁掉丈夫和孩子的生活（还有她们自己的生活），的确也是如此，有时还有过之。”

新型的主妇式母亲与之形成了一种鲜明对照，使人破颜为笑：她们具有她们“自己的特点”、她们“独特的女性”以及“蕴含在她们女性本性中的温顺和贤淑”。她们致力于自身的美，致力于生儿育女，“是具有真正女性态度，女性特征的妇女。由于她们那种奇迹般的，上帝赐予的，独树一帜，撩拨人心的穿戴本领，以及蕴含在内的种种意义，她们

倍受男子的赞美。”老式的，有三至五个小孩的家庭重新出现在上层和中上层人士居住的市郊令人惊讶的区域里，《生活》周刊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它写道：

在这里，在那些可能最有资格去干“事业”的妇女中间，对生育和理家的价值是越来越重视了。人们或许要猜测……由于这些妇女比一般人消息灵通，比一般人更为成熟，所以她们最先领悟到“女权主义”的惩罚，并采取了与之抗衡的行动。不仅是服装和装饰的样式，还有思维模式都开始从这些地方逐渐扩展到更多的人中间。这是一种反倾向，可能最终要消除那种占主导地位的破坏性倾向，它还使婚姻恢复其本来面目：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双方都沉静愉快地恪守本分，都为自己与一位异性结为夫妻而满心欢喜。

那段时间的《展望》周刊也显得精神振奋，1956年10月16日出版的一期上写道：

美国妇女正在赢得性别之战的胜利。她像十几岁的大姑娘一样，正在成长，把那些对她说长道短的人弄得张口结舌。在心理上，她再也不是男人世界的移民了，作为美国劳工的第三支力量，她漫不经心地干活，不是为了想“干一番事业”，而是想把嫁妆箱子装满或是买一台新的家用冰箱。她雍容大度地把头等好的工作让给了男子。这些美妙的人儿结婚年龄比前人要小，生的

孩子比前人要多，跟20年代甚至30年代那些“解放了的”姑娘相比，她们的外貌举止都带有更多的女性特征。钢铁工人的妻子和女青年会①成员并无不同，都得干各自的家务……。今天，如果美国妇女作出旧时代式的选择，去精心照料花园和一大堆孩子，她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响亮地赞美上帝。

在新时代的美国，事实比小说更为重要。《生活》周刊和《展望》周刊上那些献身于孩子和家庭的真实女性的实际形象，反过来又成了妇女的理想和榜样；这可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材料，不是妇女杂志上登载的小说中那种不值一读的女主人公。当一种奥秘具有很强说服力的时候，它会使自己虚构的东西变成事实。它从那些可能与它自身大相径庭的事实中吸取养料，而又无孔不入地渗透进文化中去，甚至把有些社会评论家都弄得茫然不知所以。

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1955年在史密斯学院学位授予典礼上致词，将受过教育的妇女想在“时代的危机中”起自己的政治作用这一愿望一笔抹杀，这篇讲话发表在1955年9月号的《妇女家庭伴侣》杂志上。民主自由主义的发言人说，现代妇女要参与政治，是通过当好妻子母亲来体现的，“女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女人，有一种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影响我们男子和男孩。”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妇女们看不到她们在政治危机中真能起的作用就是当好

① 美国妇女组织，多为有闲阶级妇女参加，在这里代表上等人。
——译注

妻子和母亲。

一旦陷入到繁忙而具体的家务问题之中时，许多妇女对重大事件和激动人心的辩论都感到没精打采，与自己毫无关联了，尽管她们以前受的教育在这些方面曾给予了她们以理解力和好奇心。她们曾经写过诗，现在却在填写洗衣单子；她们曾经彻夜讨论艺术和哲学，现在却十分疲乏，碗碟一洗完就呼呼入睡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前景已经一去不复返，她们经常有一种压抑感。她们也想在时代的危机中尽自己一份力，但是她们所做的不过是洗洗尿布而已。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无论我们谈非洲，谈伊斯兰教，还是谈亚洲，妇女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你那样了解得那么详细。然而，简言之，婚姻和母爱的天职使你对当今的重大事件不再关注，反而会使你重新具有一种无限深厚的责任感，其影响直至那些重大事件的核心，与这种责任感相比较，那些在报刊上编造新闻、出尽风头的人、那些专门在重大事件的风云中讨生活、到头来连自己都搞不清楚哪些事件实属重大的人，他们承担的责任，也就太小了。

妇女在政治方面的作为，就是“在自己的家庭里展现生活与自由的真谛……，就是要帮助自己的丈夫去发现能使他每天从事的工作取得成果的价值……就是要教育孩子们认识到每一位个人都有他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

这就是你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使命，你可以在起居室里，膝上放着婴儿，或是在厨房里，手里拿着开罐头刀，来完成这个使命。如果你很聪明，或许你还可以对那位对你的举动并不留意的男子，在他看电视的时候，实施一番你拯救的艺术。我觉得就我们面临的危机而言，你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主妇，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你最崇高的天职。

就这样，女性奥秘的这种逻辑对妇女问题的本质，重新下了定义。当妇女被认为是与男子一样，也具有人类无穷潜力时，妨碍她充分发挥潜力的全部因素都归结为一个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在接受高等教育和参与政治方面存在着障碍，在法律和道德方面存在着歧视或偏见。但是，既然只是从女人的角度来看待妇女的作用，那么，妨碍她们充分发挥潜力的种种障碍、阻止她们尽可能地投身于外部世界的种种偏见，就再也不是什么应当加以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了。现在仅存的问题就在于可能干扰和影响她们当好主妇的因素了。由此看来，事业是问题，受教育是问题，政治方面的兴趣、乃至于承认妇女的智慧和个性，都成了问题。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是一种意义不明确的模糊愿望，即在洗碗碟、熨衣服、奖惩孩子等之外，“还期望有一些东西”。在妇女杂志上，可以用将头发染成金黄色或是再生一个小孩这类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位年轻的主妇在1960年2月号的《妇女家庭杂志》上说道：“要记住，当我们大家都是小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打算今后‘长大成才’的？”她夸口说她在七年内读破了斯波克博士写的两本关于育儿方面的书，她高呼：

"我多幸运！多么幸运！作一个女人我多么高兴呀！"

1949年8月号《小姐》杂志登载的一篇题为"假日"的小说中，一位绝望的年轻妻子遵照医生的吩咐，每周有一天要到户外去活动。她去买东西，试衣服，在镜子里照照，看她的丈夫萨姆会喜欢哪一件。

> 萨姆就像古希腊的舞台监督，无时无刻不在她身后。就好像她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应当有的清醒头脑……。突然间，她弄不清百褶裙与镶花边裙之间有什么不同，该挑哪一种，自己也拿不定主意。她在穿衣镜里打量着自己，高高的个子、臂部日渐丰满、脸部的肌肉已经开始松弛。她才29岁，但她感到已到中年，似乎许多岁月已经逝去，来日不多了……，她的女儿小爱伦才三岁，这种感觉真是奇怪。得对女儿的整个前程作一番安排，而且可能还得生一个孩子。这可不能拖得太久。

1948年11月号《红皮书》杂志所载"我后面的男人"中有一位年轻的主妇。当她发现她精心安排的宴会根本不能使自己的丈夫获得提升的机会，她绝望了。（"你应当说我是能够起作用的，你应当说我在某些方面还是挺能干的……。生活就像是一个残缺的谜，那残缺的部分就是我，而我自己也看不清楚我在这中间应当占有什么样的地位。"）于是她把头发染成金黄色，当她的丈夫在床上对这位面目一新的"金色的我"作出满意的反应时，她产生了"一种新的宁静之感，好像是对我心中的那个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

妇女杂志上登载的这类故事一再声称，只有当妇女在生

小孩的那一刻，她们才可能认识到自身使命的完成。而对妇女不再想生小孩的年月，尽管她们已经多次生了小孩，那些杂志也闭口不提。按照女性的奥秘，一个女人要对创新开拓或对自己的前途产生梦想，是没有什么出路的，除非她是作为孩子的母亲，作为丈夫的妻子。既使对自己产生某种幻想，也绝无门路。而那些记实性的文章则记述了在女性奥秘的影响下成长起来，连“心中的问题”都没有的新一代年轻主妇。1959年6月号《妇女家庭杂志》所载“美国怎样生活”一文中写到一位女性，她说：“如果他不希望我穿某种颜色或某种样式的衣服，我不希望穿这种衣服。情况正是如此；凡是他所希望的也都是我也希望的……。对那种绝对平等的婚姻我是不相信的。”她放弃了大学的学业和就业机会，在18岁时结了婚，至今也不失悔，她“在男人们谈话的时候，从不加入他们的讨论，在任何问题上她都绝不跟丈夫争辩……。她用了许多时间从窗口向外观望，看雪，看雨，看那初开的小花越来越惹人注目。她有一种消磨时间的极好办法，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慰藉，那就是刺绣：用金子般的金属线或丝线绣成精巧的花样，那可需要精力高度集中。”

按女性奥秘的逻辑，对这种没有自己的意愿，仅仅把自己看作妻子、母亲的妇女来说，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如果真有问题，那只可能是她的孩子的问题，或是她丈夫的问题。倒是作丈夫的向婚姻问题顾问发出了怨言（见《红皮书》杂志1955年6月号）：“在我看来，所谓结婚就是使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但各有各自己的生活，而玛丽却似乎是认为我们两个都应当只过一种生活，即自我的生活。”玛丽老是要跟他一起去买衬衫、买袜子，把他所需的尺码和颜色

告诉售货员。当他晚上回家时，玛丽总要问他跟谁一块儿吃的午饭，在哪儿吃的，他都谈过些什么。当他表示不满时，她说："啊，亲爱的，我只是想与你共享生活，成为你的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此而已……，我希望我们两人成为一体，婚姻咨询服务处就是这么说的。"在丈夫看来，"两个人能够按玛丽的方式成为一体"，简直是不可理解。"这种状况真是荒唐 。我也不会喜欢这种状况的。我不愿意跟别的人捆绑在一起，要是那样，我就不可能再有纯粹是我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了。"

著名的婚姻问题顾问埃米利·穆德博士说，对"彼得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是，要让玛丽感到她是在过他的生活：时常邀请她上城里去，跟他办公室里的人共进午餐，为她点他喜欢吃的小牛肉，或是给她介绍一些诸如游泳之类的有益于健康的运动，以此来耗去她过剩的精力。玛丽没有能够享有她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她的问题。

1960年10月号《妇女家庭杂志》所载"美国怎样生活"中描述的德克萨斯州的那位主妇终于享受到了主妇的最大幸福，她"坐在浅银灰色缎子沙发上，从宽大的窗户朝外面的街道凝神望去。就是在上午这样的时候（还不到9点钟），她也是擦着口红，一脸浓妆，服饰整洁，一尘不染。"她洋洋自得地说："到上午八点半钟，我最小的孩子也上学去了，整个家里干净整洁，我穿戴起来，准备好好过这一天，我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说是随心所欲，玩桥牌啦，参加俱乐部聚会啦，呆在家里看看书啦，听听贝多芬的乐曲啦，或是闲逛也行。"

"有时候，她在下午1点半钟坐下来玩桥牌之前，先洗

洗头，把头发吹干。要是她上午在家里打桥牌，那就够忙的了；因为玩了牌，她得丢开牌桌、纸牌和筹码，去烧咖啡和准备午饭……。在冬天的日子里，她可以从上午 9 点一直玩到下午 3 点，每周玩四天桥牌……。珍妮丝留心保证在她的孩子们下午四点从学校回家之前，呆在家里。”

这位新型的年轻主妇并不感到沮丧。念中学时她是个优等生，18岁时结了婚，20岁时第二次结婚并怀了孕。她现在拥有的住房是她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梦寐以求、精心筹划而获得的。她能够在八点半钟时将家里的事情收拾停当，她对自己作为主妇的工作效率感到甚为得意。她在星期六作大扫除，那天丈夫要去钓鱼，孩子们要去参加童子军的活动。（“除此之外无事可做，又不玩桥牌，对我来说，这真是漫长的一天。”）

“‘我爱我的家，’她说。……她家的起居室和餐室呈L形，漆着浅灰色油漆，尽管是五年前修的，但现在还是完好如初……。那些浅桃红色、黄色和浅银色的挂毯、地毯等室内装璜，尽管已经用了八年，但仍然十分光洁。要是手表坏了在修理，她的腕部也缀着硕大的钻石，珍妮丝以一种爱怜的口吻说：‘有时候我感到生活平平稳稳、井井有条、我感到太满足了’。家里她最喜欢的家具是那张有四根雕花床柱和粉红色塔夫绸华盖的大床。她愉快地说：‘我觉得在那床上睡觉，简直就跟伊丽莎白女王一样’（因为她丈夫睡觉时要打鼾，所以在另一间屋里睡）。

“她说：“我为我的福份感激不尽，满不错的丈夫，儿子们相貌好看，气质也不俗，住房又宽敞又舒适……。我身体健康，我笃信上帝，我拥有两部汽车、两台电视机和两个壁炉，对所有这些，我内心十分感激。”

我注视着这位妇女的形象，心中颇感不安，我觉得，似乎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如那种虽带笑意，实则空虚的平平稳稳或井井有条那么美好。如果生活在女性奥秘之中的年轻妇女是幸福的，那么，难道这就是她们人生道路的终点吗？在这种形象中，是不是根深蒂固地产生着某些比沮丧还要糟糕的东西呢？在这类妇女形象和人类现实两者之间，是不是还存在着日益明显的差距呢？

请看一看，在妇女杂志上，女性的魅力越来越突出，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症状：女人在用真空吸尘器打扫房间时都装着人工睫毛，涂着眼膏（见"作一个女人的荣耀"）。为什么年复一年，这种"以主妇为职业"的宣传总是要求妇女具有不可或缺的魅力？这种努力追求的魅力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妇女们对此极力反对。

另一时代的女性形象要求妇女严肃拘谨、一本正经，对性方面的事情绝口不提。而眼下这种新型妇女形象却要求妇女不必费脑伤神，只需着眼于物质生活：两部汽车、两台电视和两个壁炉等等。妇女杂志上一页又一页充斥着硕大无比的各种蔬菜：甜菜、黄瓜、青椒、马铃薯等，对这些蔬菜还要像描写爱情故事那样描述一番。用的字体越来越大，看上去好像是头号字了。《麦考尔》杂志毫不掩饰地说，女人根本没有头脑，不过是些毛绒绒的小猫咪而已；《妇女家庭杂志》不甘人后，便满怀激情地将摇摆舞明星帕特·布恩捧成了青少年的引路人；《红皮书》和其他杂志也换用了大号字，用大号字是不是就意味着，所有的杂志在争相献媚取宠的那些新型年轻主妇，就真的具有出类拔萃的思想吗？或者说，用大号字是不是在试图掩盖杂志内容的琐细无聊？在当

今广为承认的妇女世界这个范围内，作为编辑，除了大写特写烤马铃薯，或者将厨房描写成镜殿①之外，似乎再也想不出什么可写的东西了。归根结底，女性奥秘禁止他们去表现有价值、有意义的思想。但是，对办妇女杂志的各位男士来说，他们所遇到的麻烦或许是产生于所描的形象太渺小，而他们正是用了这渺小的形象，去削弱妇女的思想。

现在这些编辑都遇到了麻烦，发行量很大的杂志相互竞争、十分激烈，电视已把越来越多、数以百万计的妇女拉去购买广告商推销的东西。这种疯狂的竞争会不会迫使创造出妇女形象的男人们把妇女看成仅仅是会买东西的人呢？这种疯狂的竞争会不会迫使男人们最终竭力使妇女的思想丧失人的思维呢？实际上，妇女形象创造者所遇到的麻烦日趋增长，而他们所创造的妇女形象的思想之空虚，也日趋严重，两者恰成正比。

妇女形象将妇女的世界局限在家庭之内，将妇女所起的作用局限在当主妇上。在产生这一过程的年月里，有五家发行量很大的妇女杂志已经宣告停刊了，另外一些杂志也濒临停刊的边缘。

妇女们对妇女杂志上那些空虚、狭隘的女性形象越来越感到厌烦，这或许是说明这些女性形象脱离社会现实的一种最有希望的信号。但是，在符合这一形象的妇女方面，还存在着更能说明问题的症状。1960年，一家专门描写幸福的年轻主妇——或者毋宁说是专门描写新型的年轻夫妻（妻子跟

---

① 镜殿，在法国凡尔赛宫中，以豪华精美著称，1919年6月协约国和德国在此殿内签署凡尔赛和约。——译注

丈夫孩子密不可分）的杂志编辑写文章提出质疑："为什么年轻的母亲陷入了困境？"（载1960年9月号《红皮书》杂志）作为宣传上的一种噱头，编辑们请遇到这一问题的年轻母亲们详细地写一写自己的经历，酬金是500美元。收到的回信竟有24000多件，这使编辑们大为震惊。难道一种妇女形象能够被贬抑到连自身都成为困难这样的地步吗？

在一家主要的妇女杂志社，一位女编辑已经意识到美国妇女可能极其需要某些东西来扩展她们的天地，于是作了数月的努力来说服她的男同事们，在杂志上介绍一些家庭之外的思想。作最终决策的一位男士说："我们决定反对这个提议。妇女们在她们的生活中已经与思想的领域完全隔绝了，她们接受不了思想的领域。"那么究竟是谁使她们与世隔绝的呢？这样问或许有点离题。或许这些弗兰肯斯坦①们要想遏制由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女性妖魔，已经无能为力了。

在创造这种形象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出过一份力。我以15年的时间观察美国妇女是如何努力去仿效这种形象并与之相符合的。但是，对它可怕的含义，对我的所见所闻，我再也不能置之不顾了。这并不是一种无害的形象。在心理学上可能还没有专门的术语来表明它正在产生的危害。但是当妇女们努力按照使得她们将自己的思想都置之不理的某种形象去生活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当妇女们在使得她们将变化中的世界这一现实都置之不顾的某种形象中成长起来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① 弗兰肯斯坦，英国女作家M.W.雪莱（即雪莱夫人）写的科幻小说中的主人公，最终被自己创造的怪物杀死。——译注

在一个世纪以前，当美国人民还是拓荒者的时候，当美国还在征服中扩展世界的时候，生活中的各种物质东西，做饭扫房间这类日常劳动，对丈夫孩子所需的东西加以考虑，等等，确实是妇女世界的全部内容。但是，就是那些随着牛车队向西部进发的妇女，也有拓荒这种目的啊。今天，美国的边界已经进入到思想的领域，进入到精神的境界。爱情、孩子和家庭，这些东西的确不错，尽管专为妇女写下的多数文章都诡称这些就是她们的整个世界，但实际上并非是整个世界。为什么妇女们非接受这一幅残缺不全、只反映一半生活的画面呢？为什么她们就不能在整个人类的命运中享有自己的一份呢？为什么妇女们得努力使家务活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而不是像昔日的美国妇女跟她们的丈夫一起沿着边界进发一样，在她们自己的时代也沿着边界进发呢？

一只烤马铃薯并不是大如整个世界，而用真空吸尘器打扫起居室的地板（无论化不化装），也不是一件需要用与妇女的全部能力相适应的思想精力才能胜任的工作。女人也是人，不是玩具娃娃，不是动物。多少世纪以来，人认识到了，人之所以能与其他动物区分开，是因为他有思想，有看法，有能力按自己的思想去开创未来。他像其他动物一样，也需要食物，需要异性。但是，当他恋爱时，他是作为一个人在恋爱，而且，当他发现、创造并完善一种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未来时，他就成了人，成了真正的人。

为什么如此众多受过教育，能够发现并创造未来的美国妇女又重新回到家里，在家务活和生儿育女之中去寻求“更重大的意义”呢？这才是真正的奥秘。在生气勃勃的“新型女性”被“幸福主妇”取代的那15年间，人类世界的疆界扩

展了，世界变化的步伐加快了，而人类现实的本质也越来越不受生物的或物质的需要束缚了，这两种状况，看起来自相矛盾，难于理解。这种奥秘是不是限制了美国妇女随着世界的发展而成长？这种奥秘是不是迫使妇女不承认现实，如同精神病院里的妇女应当不承认她自已就是女王一样？。这种奥秘是不是使妇女在这个变化中的复杂世界上，就算没有变成精神分裂病患者吧，也注定会成为没有正当归宿的人？

认为这种状况自相矛盾，奇怪难解，这还不够；由于所有的职业最终都可以由美国妇女选择，"事业型妇女"就成了一个肮脏的字眼；由于每一个有才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妇女都可以接受这种教育，对妇女的教育就成了一桩使人大生怀疑的事，以至越来越多的女性中止了在中学或大学的学业，去结婚生孩子；由于现代社会上有如此之多的工作岗位可供妇女去施展才干，妇女们才相当固执地将自已局限在一个工作岗位上。除掉了一度妨碍妇女与男子平等相处，在法律、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个方面存在的全部障碍之后，一个女人有了她自已的权利，可以无拘束地发挥她自身的潜在能力，那么，为什么她应当接受这种新的女性形象呢？这种形象表明妇女并不是人，仅仅是被剥夺了人类生存自由和人类命运的呼声的"女人"而已。

女性奥秘的影响十分深广，在妇女成长过程中，她们已经不再能够认识到她们本来具有被女性奥秘禁锢了的愿望和才干。但是，这种奥秘并不只是在短短几年内被局限在某个民族之中，而是原因不明地扭转了整整一个世纪的趋势。是什么东西赋予女性奥秘这样的力量？为什么妇女们又重新回到家里去了呢？

女性的个性转变期[1]

过去10年里，我在采访跟我同时代的妇女时发现了一桩奇怪的事情。当我们长大成人时，我们中的许多人都看不到自己21岁以后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作为女性，在那时候看不到我们在将来是什么形象。

我还记得1942年，在史密斯女子学院的校园里，一个春日下午的宁静气氛中，那时，在我对未来的憧憬中，

[1] 标题原文是The Crisis in Women's Identity。identity crisis是生于德国、长期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精神分析学家E·H·埃里克松（1902-）创造的一个术语，意为：人在青春期，常对自己的性格、前途、人生目标、社会地位等缺乏认识，没有主见，因而产生烦恼或沮丧的情绪。——译注

我走到了令人生畏的终点。几天前，我收到一个通知，告知我，我已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在别人向我道贺时，在我的兴奋激动的情绪后面，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不安之感，产生了一个我不愿去想的问题。“这就是我真正追求的东西吗？”这个问题把我与那些在校舍后面洒满阳光的小山坡上谈话学习的姑娘们分隔开了，使我感到孤独寂寞。我认为我会当一个心理学家。但如果我对此拿不定主意的话，那我又希望当什么呢？我感到前景越来越狭小，而且在这样的前景里，我根本看不到自己的位置。我看不到自己在离开学院后将是什么样子。当我从中西部一个城镇来到这里时，是一个年仅17岁，没有主见的姑娘。世界的广阔天地和心灵的勃勃生机都在向我召唤。我开始认识到我是什么人，我希望作什么了。我那时不可能走回头路。我不可能再回到家里去，回到我母亲和家乡妇女过的那种生活中去，她们被困在家里，靠玩桥牌、买东西、照料丈夫孩子、作施舍，在衣服穿着中打发日子。眼下，要我采取决定性步骤去创造自己未来的时刻已经到来，我却突然间不知道我究竟想干什么了。

我接受了这份研究生奖学金，但是来年春天，在加利福尼亚州另一所大学的校园里，这个问题又冒了出来，而我怎么也不能够不去想它。那时，我已经获得了另一份研究生奖学金，这使我能够从事我的研究工作，取得博士学位，并能将心理学研究作为我的毕业事业。“这就是我真正追求的东西吗？”当时要作出的决定真的使我心生畏惧。有若干天，我都不能够想其他任何事情，在拿不定主意的惶惑之中度过。

我对自己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在那一年，除了恋爱之外，没有什么问题算得上是重要问题。我们在伯克列的小

坡上漫步。那个小伙子说："就我们两个人的事情来说，我们不能就这样下去，我就绝不会去努力争取一份像你那样的研究生奖学金。"如果我继续走下去，岂不是又要不可避免地遇到那孤独冷清的春日下午吗？于是我放弃了这份奖学金。心中产生了一种宽慰之感。但是，那以后若干年，对以前我曾一度视为我毕生事业的科学著作，我一个字也读不进去，那一次损失所造成的后果太令人痛心了。

我永远也无法解释，甚至自己也不清楚，当时我为什么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我后来到一家报社工作，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得过且过罢了。后来我结了婚，生了小孩，按女性奥秘的模式过着郊区主妇的生活。但是，那一个问题仍然萦绕于怀，无法排遣。直到我终于正视这一问题并努力寻求自己的答案时，我才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了目标，心中才算有了宁静之感。

我在1959年跟史密斯女子学院高年级学生的谈话中发现，那一个问题对当时的姑娘来说，同样使人震惊。只是她们以某种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而我们那一代人经过半辈子的光阴，才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答案。那些姑娘大多数是高年级学生，坐在校舍里的起居室里，呷着咖啡，跟我在那里念高年级时这样的夜晚相比，没有多大的差异，只是更多的姑娘在左手手指上戴了戒指。我问我身边的姑娘她们打算当什么。那些定了婚的姑娘谈起了婚礼、套间住房，丈夫完成学业后去找个秘书的活儿干。另外的姑娘在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之后，含混不清地谈到这样那样的工作，继续读书，等等，但没有一个人有明确的计划。第二天，一位金发白皮肤，头扎马尾巴辫子的姑娘问我相信不相信那些姑娘说的话。她对我说：

“没有一句是真话。我们不喜欢别人问我们想当什么。我们中也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中甚至没有人愿意去想这个问题。那些马上就能结婚的人才是走运的。她们不必去想这个问题。”

但是那晚上我也注意到了，当我在向另外的姑娘询问她们将从事的工作时，许多已经订婚的姑娘一言不发地围着炉火坐着，表现出一种忿忿不平的神情。我那位扎马尾巴辫子的信息提供人说：“她们不愿意去想将要中止学业，她们都知道她们在学校学得的知识再也用不上了。她们将很快成为妻子，成为母亲。你可以说你还能继续坚持读书，并对你周围的人和事物感兴趣。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你没法坚持下去。意识到你现在就要止步了，不能继续念书了，所学的东西用不上了，这令人非常伤心。”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位离开大学15年现在身为医生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母亲的女性，在新英格兰她家厨房里一边喝咖啡一边对我说：

> 这场悲剧就在于没有一个人会正确看待你，你除了当丈夫的妻子和当孩子的母亲之外，没有人会对你说，你得拿定主意这辈子还该干些什么。我直到36岁时才把这些事情前前后后想了一遍。我丈夫工作很忙，没法每天晚上都使我开心。三个男孩子成天都在学校里。尽管我们Rh抗原不合，① 我还是想继续生小孩。在两次流产

① Rh抗原，又称Rh因子，如果父母亲Rh的抗原不合，新生儿可能发生新生儿原红细胞增多症。——译注

之后，别人告诉我说必须就此止步了。我认为我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已告结束。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我就知道，我会长大，上大学，然后结婚，凡是作小姑娘的都会想到这些。从那之后，就由你的丈夫来主宰和占据你的全部生活。直到我作为一个医生的妻子感到十分寂寞，由于小孩子不能使我生活充实而经常对他们大喊大叫之时，我才意识到我应当去开创我自己的生活。我仍然应当作决定当什么样的人。我自身的成长，还远远谈不上已经完成。但是，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竟花了我10年的时间。

女性奥秘允许甚至怂恿妇女将妇女的地位这一问题置之一旁。女性奥秘认为，她们可以用“汤姆的妻子”、“玛丽的母亲”之类的言辞来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只要美国妇女敢于正视那种使美国妇女在21岁之后连自己的地位也看不到的，令人震惊的空白感，那么，女性的奥秘对她们也就无能为力了。事情的真相是，再也没有一种个人的形象来告诉一个美国妇女，她是什么人，她可能是什么人，她想当什么人。这种情况存在有多久，我说不准，但在我那个时代就业已存在，对今天成长中的姑娘而言，亦是如此。

出现在杂志和电视的商业性节目中的公众形象被安排来推销洗衣机、食品原料、除臭剂、洗涤剂、回春面膏、染发剂等等。商业公司为争取电视播送的时间和广告篇幅，在这类形象上花费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而这类形象之所以有影响力，其原因就在于：美国妇女再也不知道她们是什么人了。她们极需一种新的形象来帮助她们去发现自己的地位。

研究行为动机问题的专业人员喋喋不休地对广告商说，美国妇女对她们应当作什么样的人，没有一点主见，所以她们才着眼于这种华而不实的公众形象，并照此来精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她们正在寻求那种跟她们自己的母亲迥然不同的形象。

在我那个时代，尽管我们都很爱自己的母亲，但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想作像自己母亲那样的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亲眼看到了她们的失望感。母亲们时时刻刻跟我们在一起，竭力把我们的生活也当成她们的生活，她们还要照料父亲的生活，日复一日地去买东西，对那些看来永远无法使她们满足的东西，无论价钱多高，总是朝思暮想、孜孜以求。对于造成这一切的伤感与空虚，我们理解了吗？或者仅仅是表示不平呢？奇怪的是，许许多多热爱自己女儿的母亲（我的母亲便是其中之一）也不希望她们的女儿长大以后像她们自己那样。母亲们知道，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东西。

但是，尽管他们在帮助我们受教育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甚至进行一番奋斗；尽管她们在谈起不曾向她们敞开的事业之门时，充满了热望之情，她们却不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能告诉我们可以作什么人的形象来。她们只能够告诉我们，她们被困在家里，生活太空虚了；孩子、饭菜、衣服、桥牌、施舍、光有这些东西是不够的。一位母亲可能会清楚地对她的女儿说："别像我这样一辈子当家庭主妇。"但是，这位女儿感觉到她的母亲心情沮丧，体会不到丈夫和孩子对她的爱，她或许会认为："母亲失败了，我会成功的，作为一个女性，我自己会取得圆满成功。"然而，对她母亲毕生的教训，她却从来不去认真吸取。

近来，我采访了一些中学女生，她们开始念书时，聪明机敏、前程似锦，但现在却突然中止了学业。我开始认识到，在女性的遵从这个问题中还有新的内容。初看上去，这些女孩子不过是依照典型的女性调节曲线在走她们的人生道路。先前，她们对生物学或诗歌发生兴趣，而现在她们只对如何让人家认识自己，喜欢自己有兴趣了，她们努力要使小伙子喜欢她们，她们说，还是要跟其他所有女孩子一样才好。仔细观察之下，我才发现这些姑娘非常害怕成为像她们的母亲那样的人，以致连对自己的正确看法也丧失了。她们害怕长大成人。她们只好精心仿效那些由众人都喜欢的姑娘所构成的混合型形象，于是，由于害怕自己也具有母亲身上那种女性特征，就连自身本来具有的优点也丢掉了。其中一位17岁的姑娘告诉我：

> 我非常非常想同其他姑娘一样，我想作一个涉世不深的姑娘，我从来就是这样想的。当我起床后要走到屋子那边时，好像我是一个刚学走路的人一样，或者正在经受可怕的折磨，我今后也不想学习。放学后我就跑到人们常常聚集聊天的地方，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谈服装啦、发型啦、扭摆舞啦，其实，对这些东西，我也不是那么感兴趣，只是在作作作样子罢了。我已经发现了我能够使她们也像我一样——照其他姑娘那样行事，像她们那样谈话，不要去干与众不同的事情。我想我甚至使自己的内心都变得与别人一样了。
>
> 以前我常常写诗，老师说我具有写作方面的才能，我应当成为班上的尖子学生，有远大的前程。但是你要

大家喜欢你，并不需要这些东西呀。对一个姑娘来说，重要的是要讨人喜欢。

现在我跟一个又一个小伙子到外边去，这真要费不少精力，因为我并不是以我的本来面目跟他们呆在一起的。这使你感到更加孤寂。还有，我不知道这样下去会发展到什么地步。用不了多长时间，所有我个人的特色都将被磨得一干二净，我也就成为那种将来可以当主妇的姑娘了。

我不想去考虑长大成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有小孩，我希望他們永远长不大，如果我看着他们长大成人，我就得看着自己越来越老，我真不愿意这样。我母亲说她晚上睡不着，老是担心会出什么事儿。我小时候，她不让我一个人横穿街道，直到其他的小孩子都这么做了之后好久才让我去。

我看不到我自己结婚生孩子是什么样子，也许那时我不会有自己的个性，我的母亲像是一块被海浪磨平了的礁石，像是一处真空。她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这个家庭中去了，自己什么也没有留下。由于她没有得到足够的报答，她对我们也有不满的情绪。有时候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没有意思，除了打扫房间，她作什么事都好像是漫无目的。她自己不幸福，也不能使父亲幸福。如果她根本不管我们几个小孩子。其结果会跟溺爱我们是一样的。这使得你想反其道而行之。我认为这并不是真正的爱。我小时，有一次激动万分地回到家去对母亲说。我学会怎样做手倒立了。她却连听都不听。

后来，我常常照镜子，我害怕变得像母亲一样，如果发现我自己在言行举止或其他方面像我母亲，我就会十

> 分害怕。我在许多方面都不像她，但是哪怕只在某一个方面像她，或许最终我也必然会像她。这使我非常害怕。

这位17岁的姑娘就是这样害怕成为像她母亲一样的女人，于是，她将自身的所有特色和将会使她成为另一种人的所有机会统统置诸脑后，一昧去仿效外面那些“受众人喜欢”的姑娘。最后，在失掉自我的惶惑中，她将她自己讨人喜欢的特色丢掉了，将本可以为她赢得学院奖学金的传统美德也丢掉了。由于缺少一种能帮助她按自己的特色长大成人的形象，她退步了，成了“垮掉的一代”中空虚无聊的人物。

还有一个姑娘，是南卡罗莱纳州一个大学低年级的学生，她对我说：

> 我对我即将放弃的事业不能产生什么兴趣。
>
> 我母亲从12岁起就想当个报社记者，但是20年来，我看够了她的沮丧和失望。我不想对国际事务发生兴趣。除了我的家和当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之外，我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受教育或许是一种义务。就是那些最有前途的小伙子在家里也只是想要漂亮甜美的姑娘而已。只是有些时候，我很怀疑要是能够不断地努力，努力，再努力，学会你想学的一切东西，而且用不着缩手缩脚，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况。

这位姑娘的母亲，以及几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母亲，尽管她们中的许多人曾经为事业作过努力，或者对事业孜孜以求，或者对放弃事业后悔不已，但她们毕竟都成了主妇。无论

她们给我们讲过些什么，我们有眼睛，有耳朵，有心灵，有思想，所以我们都知道她们的生活是空虚的。我们不希望成为像她们那样的人，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其他的样板呢？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还知道几位其他类型的女性，她们是：高中的几位老处女教师、一位图书馆管理员、镇上一位将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的女医生。这几位女性中没有一个能像我在家里已经体验过的那样，过上温暖舒适的生活。这些人大多从未结婚生育。尽管她们中有人教会了我要真诚地尊重自己的心灵、运用自己的心灵，教会了我要看到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还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一想到要成为像她们那样的人，只能使我感到恐惧。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女性：她既运用自己的头脑，在世界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她又在恋爱，生儿育女。

我认为，在美国，相当长时间以来，这种缺乏个人形象的状况正是不为人知的妇女问题的核心。那种缺乏事实依据，与妇女自己没有什么联系的公众形象在改造和指导妇女生活方面才具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妇女对她们要转变个性没有深切的感受，这类形象也就不会具有这样的力量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心理分析专家、教育工作者注意到美国妇女一生中那些奇怪的、令人生畏的起始点，已经有好多年了，它们是：18岁、21岁、25岁、41岁。但是，这些起始点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没有被人们理解。在文化调节方面，它被称作是“间断”，它又被称作是妇女的“角色危机”。它被归咎于美国姑娘所受过的教育，正是这种教育使她们在成长中感到无拘无束、与男孩子们地位平等——打垒球，骑自行车，攻读几何学，荣登榜首，离家上大学，跨向外部世界去找工作，在纽

约、芝加哥或者旧金山的一套住房里孤寂地生活，对她在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大能耐作一番探索，作一番检验。批评家们说，所有这些，都使姑娘们感到，有了跟男孩子一样的自由，她们就可以想当什么就当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在妇女应当起到的作用方面，这些却不能使她们有什么思想准备。当环境迫使她们要努力去适应自己应起的作用时，危机就出现了。今天，二三十岁的妇女中出现感情悲伤和感情崩溃的比例很高，人们通常把这种现象归结于“角色危机”。试图对这种状况进行调节的人士说，如果对姑娘们的教育着眼于她们作为妇女应起的作用，那么她们就不会受这种危机的困扰了。

然而，我认为这些人只看到了事实真相的一半。

当一个姑娘在21岁，应当确定她今后当什么样的人时，难道她所面临的畏惧仅仅是害怕长大成人吗？说她们害怕长大成人，就好像以前不许她们长大一样。难道一个姑娘在21岁时面临的畏惧，就是害怕得不到毋须别人规定人生道路，自己决定自己一生的自由吗？是害怕得不到要走以前的妇女不能够走的道路所需的自由和必要条件吗？那些选择了“女性调节”这条道路的姑娘在18岁时结了婚，将自己埋葬在生儿育女和极其繁琐的家务劳动中，以此来避开这种畏惧，她们这样做，难道仅仅是为了不愿意长大成人，不愿意正视自身的地位这个问题吗？

在大学里，我那一代人首当其冲，迎头碰上了追求女性完善这种新的奥秘。在那之前，当绝大多数女性的确是以当主妇作母亲走完自己人生道路时，教育的重点是探索思想的活动，是追求真理，是在这世界上谋求一席之地。那时候有一

种感觉，在我进大学时就已经隐约可知了，那就是我们将会当“新女性”。我们的天地将会比家庭宽广得多。在史密斯学院念书时的同学有40%的人对今后的事业有自己的打算。但是，我至今还记得，就是在那个时候，有些高年级的女生由于对未来的畏惧，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困扰，她们对那些以立即结婚躲避这种畏惧的很少几个人十分羡慕。

我们当时羡慕的那些人到了现在40岁时，正在受到上述那种畏惧的困扰。其中的一位15年之后在女校友调查表上写道：“从来没有确定过我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女性。当时在学校里，个人的生活太多了。我那时要是能多学一些科学、历史、管理，对哲学的研究再深入一些就好了，”“我现在还在努力寻找一块奠基的磐石，要是当时我能念完大学该多好，然而我却结了婚。”一位六个孩子的母亲写道：“但愿当时我能过上一种属于我自己的、更深刻的、更富有创造性的生活，要是那样，我就不会在19岁时定婚、结婚了。我当时对结婚，对有一位全心全意为家庭的丈夫寄托了我的全部理想，当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时，我感到十分震惊。”

那些结婚很早，属较年轻一代的妻子中的许多人就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充满寂寞感的畏惧。她们认为她们用不着去作出选择，用不着对前面作探讨，也用不着对这一辈子究竟要干什么作一番安排。她们只需要等待别人来选择她，消极被动地打发日子，等着丈夫、孩子和新居来安排她的余生。在她们看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人之前，她们很容易就发挥出作为女人的性方面的作用了。而正是这些妇女，她们受那个无名问题的困扰，最为严重。

我的看法是，当今妇女问题的核心不是在于性的方面，而是妇女的地位，这个问题严重地影响和阻碍了妇女的成长发展，由于有女性的奥秘，就使这个问题得以长久存在。我的看法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不允许妇女承认她们基本的性要求并使之得到满足，我们现在的文化却不允许妇女承认她们作为人，要成长、要发挥潜力的需求，并使之得到满足。这种需求，绝不仅仅局限于她们在性方面起的作用。

生物学家们近来发现了一种“青春液”，如果用这种“青春液”来培养处于幼虫状态的毛虫，它就永远也长不成蛾子，到死也只是毛虫。杂志、电视、电影、只揭示了一半事实真相的心理学书籍，还有父母、老师和接受了女性奥秘的顾问向妇女灌输的关于追求完美女性特征的前景，就起到了这种青春液的作用，使大多数女性仅仅停留在性幼虫的状态，不让她们成熟，而她们本来是可以发展成熟的。越来越多的例证表明，妇女未能实现完善的自我已经阻碍了，而不是加深了她在性方面的满足，这最终会使她在丈夫和孩子面前失去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特征，而且会引发神经病，或者跟神经病一样莫明其妙的各种问题，跟由性压抑引起的各种毛病是一样的。

在人类成长过程中的各个关键时刻，也存在着男子的个性转变期，但经历过这种转变期的人并没有给出这样的名称。只是在近年来，心理学、社会学和神学等领域的理论家们才将这一个问题分离出来，并给它取了这样的名。但是，这被认为是男子的问题。这样的转变对男子来说，就是长大成人的转变，是选择自己的身份地位的转变，如果引用极富才华的精神

分析学家E·H·埃里克松①的话，就是“确定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和将要作什么样的人的决策”。

> 我把青春期的主要转变称作个性转变。当每一个青年人根据童年时代的影响和对未来成年时代的期望，必须为自己确定某些核心观点和方向，进行工作上的协调时，在人生的这一阶段，上述的转变就发生了：他必须在从自己身上观察到的东西和他那警觉的意识给予他的判断与期望这两者之间，将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相似之点识别出来。……在某些阶层的某些人身上，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这样的转变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另外一些阶层，另外的人身上，在另外一些历史时期，这样的转变作为一段极其重要的过程、一种“再生”而格外引人注目，而且很容易因为涉及很广的神经病症或者许多人受其折磨的思想烦躁而变得更加严重。

按照这种解释，在人类的成长过程中，一个人一生中的自我个性转变可以反映出，或者开创出一种再生、一个新的阶段。青年马丁·路德在中世纪结束之时离开了天主教教堂，为他自己，为西方人确定了一种新的地位，埃里克松在阐释他所经历的转变时，提出了新的见解：“在人类历史的某些时期，在人生的某些阶段，人在思想上迫切需要新的方向，如

① 埃里克·埃里克松：《青年路德——心理分析与历史的研究》（纽约，1958年，第15页，另见埃里克松：《童年与社会》（纽约，1950年）及埃里克松：“转变的问题”，载《美国心理分析学会会刊》（1956年，第4卷，第56页——21页）——原注

同迫切需要空气和食物一样。”

每一代人中，任何一个描述如何探索自我的人都会发现这是一个新问题，但是，在美国思想界，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在美国，从一开始人们就认识到，男人们应当向未来挺进，挺进的步伐太快，男人的个性也就不可能一成不变。在每一代人中，许多男子由于不能够承受从他们的父亲那里获得的，自己也想当那种人的男性形象，于是深受哀愁、彷徨和痛苦的困扰。那些不能够重返家园的青年男子如何寻求自己个性的认同成了美国作家笔下的主题。对男子来说，受这种成长中的痛苦的折磨，探寻并找到他自己的个性认同是一桩好事。在美国，这从来被看作是天经地义。农场的男孩子上大城市去，裁缝的儿子成了医生，林肯靠自学掌握了文化知识，这些比那种由贫致富的故事有意义得多，也是美国梦的组成部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问题在于金钱、种族、肤色、阶层，这些东西阻碍了他们去进行选择，但如果他们有选择自由的话，他们也就不会成为他们不想当的人了。

就是在今天，一个男青年很快就知道了，他必须就他想作什么样的人作出决定。如果他在念中学、念大学时没有能作出决定，那么，他必须在25岁或30岁时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否则，这个人就完了。现在，因为越来越多的男孩子不能够从我们的文化中（从他们的父亲或其他男人那里）发现某种形象来给他们以帮助，这种对个性认同的探求就成了更加严重的问题。旧时代的边疆地区早已经被占领，而新时代的边界尚未划定。今天，越来越多的男青年渴望找到值得他们追求的男子形象，渴望找到真正能够发挥他们作用的目标，他们正深受个性转变的困扰。

但是，为什么理论家们就没有在妇女身上意识到同样的个性转变呢？按照老传统和新的女性奥秘的说法，不要期望妇女成长起来，去发现她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她们作为人的地位。研究女性问题的理论家们说，对妇女作一番解剖就能确定她们的命运，妇女的个性是由她们的生物性决定的。

但是，果真是如此吗？越来越多的妇女都在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她们问道："我是在什么地方？……我在这儿干什么？"好像是刚从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妇女们有史以来第一次意识到在她们的生活中还存在着个性转变期，这种转变开始于许多代人之前，随着每一代人而每况愈下；将来，妇女们或者她们的女儿们要度过某个现在尚不为人知的难关，将她们自身和她们的生活化作千千万万的妇女现在正急切需要的新形象，直到那个时候，妇女的个性转变期才会消亡。

在超越单个妇女生活的意义上，我认为这种转变是正在成长中的妇女的转变，这就是从被称作女性特征的不成熟，发展到完整的人的地位这一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种始于100年前的个性转变，妇女们早已深受其苦；我认为，就是在今天，妇女们只要想作一个真正的人，还得深受其苦。

充满激情的旅程

在一个世纪以前，正是对一种新的地位的需求，把妇女从家里引了出来，将她们送上那充满激情的旅程，送上那被人们误解和诽谤的旅程。

近年来，将女权主义当作是历史上一种肮脏的玩笑加以嘲笑，已经是很普遍的情况了：对那些为争取妇女受高等教育、干事业、参加选举的权利而奋斗的老式的女权主义者讥笑一番，同时又表示怜悯。现在，人们说，她们想当男人，是些对男性生殖器官有羡慕癖的神经病患者。在为争取妇女跟男子平等地参与重要工作和社会决策的自由这场斗争中，她们没

有考虑到她们自己作为女人的本性，今天，女人的本性正通过性活动中的温顺、接受男人的控制和增进母爱之类的行为得以完善。

但是，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正是这最初的旅程，可以说明从那时以来的妇女的正在发生的许多情况。

对那种使妇女不致于老呆在家里，对更富有意义的生活只能苦苦期待，而是为了寻求新的地位而离家出走的激情，当代心理学并没有能够认识到，这是它一个奇怪的盲点。这些妇女的行为是一种叛逆，是对当时规定的妇女地位的一种强有力的反叛。正是对新的地位的需求引导那些热情的女权主义者为妇女们指出若干条新的小径来。有的小径崎岖难行，为始料所不及；有的小径本身就是死路；还有些小径或许是虚假的，并不存在，但是，妇女要找到新的小径这种需求却是千真万确的。

在当时，对妇女来说，地位问题是一个新问题，确实是一个新问题。女权主义者是站在妇女成长发展的前沿的开拓者。她们要努力证实，女人也是人。她们要努力砸碎代表上一个世纪理想妇女的德累斯顿①的装饰性偶象，在需要的时候，要猛烈地砸碎它。她们还要努力证实，女人并不是一面被动的，只反映外在的镜子，并不是一件装有花边但毫无用处的装饰品，并不是一种没有思想的动物，并不是一种连自身的存在都不能表明，听凭别人摆布的东西；在妇女开始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之前，她们首先必须成为跟男子平等

---

① 德累斯顿：东德城市，曾被称为“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收藏有许多精美的美术和雕塑作品。——译注

的人。

妇女们被告知说，她们是一成不变的，是稚气未脱的，女人的天地就是家庭。但是，男子的情况却是在不断变化，男人的天地在世界上，男人的世界在不断扩展。妇女应当被扔在后面。妇女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她的命运，她要么在生头一个孩子时就死于难产，要么在活到35岁时生下12个孩子，而男子却以他的生理结构中其他动物所没有的那一部分——心灵，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妇女也有心灵，她们也有希望成长的、人的需求。使生活丰富多彩并推动生活向前发展的各种工作不再是在家庭中完成的了，而妇女却被培养成既不能理解世界，又不能参与世界上各种工作的人。妇女被禁锢在家里，成了自己的孩子们中的一员，处处被动，她的存在没有一丝一毫是出于她自己的意愿，她们只能靠讨好男人才能生存下去。在这个没有她参与创造的世界上，在这个男人的世界上，她得完全依附于男人的保护。她永远也不可能成长起来，提出这个简单的问题："我是什么人？我希望得到什么？"

就算男人像对小孩、对玩具娃娃、对一件装饰品那样宠爱她，就算男人给了她红宝石、绸缎、天鹅绒，就算她在家里感到温暖，跟孩子们在一起有一种安全感，难道她就此满足，不再有别的什么期望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她完全被男人当成了附属品，从来不抱任何希望作为主体的"我"去参与和享受性活动。人们常说："他从她那里得到了享乐……他对她自有办法。"妇女的解放和作为人的全部权利，对现在还在世的以及新近去世的几代妇女极为重要；她们中的一些人用拳头进行过斗争，有的还蹲过监狱，有的甚至为之而

献身，难道这些都难于理解吗？为了争得作为人要成长发展的权利，有些妇女将自己是女人、将自己爱别人、被男人爱和生儿育女这样的愿望都置之不顾了。

女权运动的激情和烈焰产生于那些仇视男子、心怀怨恨、受性饥渴折磨的老处女，产生于那些性变态的、或是失去女性特征的人，她们已经算不得是女人了，只是因她们缺乏作为女人去恋爱的能力，于是对男性生殖器妒火中烧，很想从所有的男子身上将男性生殖器都摘除掉，并且将男人们都毁灭掉。这种说法是歪曲历史，完全是奇谈怪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①、安吉利娜·格里姆凯②、欧内斯汀·露丝、③玛格丽特·富勒、④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⑤、朱莉娅·沃德·豪⑥和玛格丽特·桑格⑦这些人都恋爱过，都得到过别人的爱，都结了婚。在妇女内心的激情像知识一样遭到禁锢的年代里，她们中的许多人在处理跟恋人和丈夫的关系时，

---

① M·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英国女作家，以热情为妇女争取教育平等和社会平等而闻名。——译注

② A·格里姆凯（1805—1879），美国女权运动先驱，积极从事反对奴隶制度，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译注

③ E·露丝（1810—1892），出生于波兰的女权运动先驱，长期在美国居住、活动。——译注

④ M·富勒（1810—1850），美国女评论家，教师和文学家，致力于使妇女在政治上平等、在精神文化上得到满足。在美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译注

⑤ E·C·斯坦顿（1815—1982）），美国女权运动领袖。——译注

⑥ J·W·豪（1819—1910）。美国女作家，讲师，致力于争取妇女受教育和就业的平等机会。——译注

⑦ M·桑格·见第21页注①。——译注

跟在争取妇女成长发展的权利的战斗中一样，同样是满怀激情。但是，这些人以及有些像苏珊·安东妮①一样的人，如果命运和不幸的经历使她们不能结婚，她们又为了争取妇女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奋斗，这种奋斗不依附于男人，而是自己的奋斗，那么，这种奋斗就是产生于跟需要爱情同样真切同样炽烈的一种需求。（玛格丽特·富勒说："妇女所需要的，不是作为女人去行动、去主宰什么，而是作为一种本性在发展，作为一种理智在辨解，作为一种灵魂在自由自在的生活中无拘无束地发挥她天生的能力。"）

关于完善而自由的人，女权主义者们只有一种样板、一种形象、一种视野，那就是：男人。因为直到最近，只有男人（尽管不是所有的男人）才有足够的自由，受到必要的教育，去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去发现、去开拓、去创造，去为子孙后代制定新的前景。只有男人才有选择的权利，具有形成社会生活中重大决策的自由。只有男人才有恋爱和享有爱情的自由，才有按他们对上帝的看法，确定问题的是非曲直的自由。难道妇女是因为想当男子才需要这些自由？抑或是她们也想作人才需要这些自由？

这就是女权主义的全部内容，亨利·易卜生②对此的看法颇具象征意义。他在他1879年写成的剧本《玩偶之家》中说：女人也是人，从而在文学作品中发出了新声。在维多利亚时代，欧洲和美洲成千上万个中产阶级的妇女在娜拉身上看到

① 苏珊·安东妮（1820—1906），美国女权运动先驱，全美妇女选举权协会会长（1892—1900）。——译注

② 易卜生（1828—1906），挪威戏剧家、诗人。——译注

了自己的形象。到了1960年，几乎过了一个世纪，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主妇在电视上观看了这出剧，当她们欣赏娜拉下面这一段台词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形象：

> 你对我一直都很好。但是我们的家庭不过是一间游乐室。我只是你的玩偶妻子，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家里是爸爸的玩偶孩子一样；在这儿，孩子们也只是我的玩偶。我觉得你跟我一块玩时真是太好笑了。如同孩子们觉得我跟他们一块儿玩时，也是太好笑了。托瓦尔德，这就是我们的婚姻……。
>
> 我就非常适宜于培育孩子吗？……另有一个任务是我应当首先从事的，那就是我必须努力使自己受教育——在这方面，你不是那种愿意帮助我的人。我只好自己去干了，这就是我为什么现在要离开你的原因。我如果要理解我自己和我身边的事物，我必然会非常孤立。正是为着这个原因，我再也不能和你呆在一起了……。

她那位大受震惊的丈夫提醒她说："女人最神圣的职责，就是她对丈夫孩子的职责，"他又说："最首要的是，你是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其他的都是次要的。"娜拉回答道：

> 我相信，最首要的是，我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如同你也是讲道理的人一样，或者说，在处理各种事情中，我应当努力作一个讲道理的人。托瓦尔德，我很清楚，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你是正确的，你那种观点也可以在书上找到；但是我对许多人所说的和从书上发现的东西再

也不能感到满足了。我必须对这些东西作出自己的考虑，努力理解这些东西……。

妇女们花了半个世纪为“权利”而战，在下半个世纪又发出疑问，她们是否真正需要这些权利，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在她们赢得胜利之后成长起来的人看来，“权利”这个词简直是枯燥乏味。但是女权主义者跟娜拉一样，在她们作为人开始生活和恋爱之前，必须赢得这些权利。在当时，甚至在现在，并不是很多妇女都敢于离开她们唯一的安全之地，敢于抛弃家庭和丈夫，去进行娜拉式的探索。但是，无论在当时或现在，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妇女发现了，她们作为主妇的生活十分空虚无聊，以至再也享受不到丈夫和孩子的爱了。

她们中的一些人，以及为数不多的男子（这些人认识到人类的一半被剥夺了成为真正的人的权利），开始着手去改变禁锢妇女的状况。1848年在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召开的首届女权大会对这种状况进行了总结概括，认为那是对男子的强烈不满：

他强迫她屈从于没有听取她的呼声就制定了的法律……。如果结了婚，从法律的角度看，他把她的个人权利剥夺殆尽，他夺去了她所有的财产权，甚至夺去了她支配自己挣得的工资的权利……。她在婚姻这个契约的约束下，被迫服从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实质上成了她的主人——法律赋予他剥夺她的自由，对她施以惩罚的权利……。她的通向财富和荣誉的所有道路，都被他封

闭；而财富和荣誉，对他自己来说，却是无上光荣的。她作为一个教神学、医药或法律的教师，并不为人所知，他对她受过完全的教育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所有的大学都对她关上了大门……。他给世界提出了分别适用于男人和女人的道德标准，以此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公众情绪；按这样的道德标准，那种将妇女从整个社会中驱逐出去的道德过失，不仅可以被容忍，而且无须男人承担什么责任。他窃取了耶和华的特权，宣称限制她的活动范围是他的权利，而这权利本来应当属于她的良知和她的上帝。他竭尽努力去摧毁她对自己能力的信念，去削弱她的自尊，迫使她心甘情愿地过那种依附于人的悲惨生活。

正是一个世纪之前女权主义者就着手要废止的这种状况，使妇女成了“具有女性特征”的人，当时就是这么说的，现在仍然如此。

在美国，解放妇女的斗争在革命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兴起，又随着解放奴隶运动的发展而风起云涌①，这很难说是一种巧合。美国革命的发言人托马斯·潘恩于1775年率先就妇女的地位问题作了谴责：“甚至在她们可能被尊为最幸福的人的国度，她们的权益也受制于人，她们的愿望受到钳制，她们的自由被人剥夺，按照法律，她们终将成为公众舆论的奴隶……。”美国革命期间，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美国掀起女权运动之前十来年，有一位叫朱迭恩·萨金特·默里的美

① 见埃林诺·弗列克斯勒尔：《百年斗争：美国的女权运动》（马萨诸塞州，1959年）。——原注

国妇女说过，妇女需要知识，去认准新的目标，在向新的目标进发之中使自已得以成长。霍利奥克山学院在1837年对女性打开了大门，第一次给予了妇女与男子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机会。就在那一年，美国妇女在纽约举行了首届反对奴隶制的全国性集会。昔日在塞尼卡福尔斯发起女权运动的妇女们，当别人不让她们出席在伦敦举行的一次反奴隶制集会时，她们聚集在一起了。正在度蜜月的伊丽莎白·斯坦顿和一位5个孩子的母亲、娴淑端庄的卢克丽霞·莫特①被阻挡在会议厅走廊的一幅门帘外面，她们一致认为：需要解放的，决不仅仅是奴隶。

世界上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出现争取人类自由的高潮，这中间就必然有妇女为她们自已赢得的一部分自由。并不是性别问题掀起了法国革命，解放了美国奴隶，推翻了俄国沙皇，从印度赶走了英国人，但是，当争取人类自由的思想震撼着男人的心灵时，同时也震撼着妇女的心灵。《塞尼卡福尔斯宣言》②的基调就直接产生于《独立宣言》：

>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家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具有与迄今为止所占有的位置完全不同的地位，这已经成为必须的了……。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

---

① 卢克丽霞·莫特（1793—1880），美国改革家先驱，她积极反对奴隶制度，从事女权运动。——译注

② 《塞尼卡福尔斯宣言》，1848年由L·莫特和E·C·斯坦顿发起，在美国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召开了争取女权的会议，在会议上通过了列举妇女受的歧视、呼吁妇女享有选举权的宣言，发起了现代女权运动。——译注

有的男人和女人都生来平等。

女权主义并不是一种肮脏的玩笑。女权革命的斗争还要继续，因为在妇女的成长中，她们还被阻止在远远没有发挥出她们作为人的能力这一个阶段上。西奥多·帕克① 牧师1853年在波士顿布道时说："妇女在家庭中从事的各种工作并没有将她们的能力消耗殆尽。让占人类总数一半的人在管家、妻子和母亲从事的工作中耗去精力，这对上帝创造出来的、最为宝贵的资源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还有一种很有见地、但有时又是危险的思想，贯穿于女权运动的历史，那就是，为了达到性生活的真正完善，妇女的平等在使男人和女人都获得自由上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妇女的退化会扭曲婚姻、恋爱、男人女人之间的一切关系。罗伯特·戴尔·欧文② 说，在发生性革命之后，"将会出现性消亡的一边倒的情况，以及其他一些不合理的一边倒的情况，而妇女也将不再被局限在一种美德、一种激情、一种职业之中了。"

发动这场革命的男人女人们预言，由此产生出来的误解，颠倒黑白和奚落嘲讽决不会少。他们确实是一针见血。在美国，率先在公众场合为争取妇女的权利发出呼吁的人——一位苏格兰贵族的女儿芬妮·怀特和一位犹太学者的女儿欧内斯汀·露丝——被人们尊称为"异教徒中走红的淫妇"和"比妓女还低劣一千倍的女人。"《塞尼卡福尔斯宣言》从报

① 西奥多·帕克（1810—1860），美国上帝一位论派神学家、牧师、学者、反蓄奴的社会改革家。——译注

② 罗伯特·戴尔·欧文（1801—1877），美国社会改革家。——译注

纸上或牧师那里引用了这样的强烈呼吁："革命"、"女性的复活"、"女人的统治"、"亵渎神明"等等，这样的言辞使那些意志不坚定的人畏畏缩缩不敢在《宣言》上签字。关于"自由恋爱"和"合法通奸"之类耸人听闻的报道跟有些关于女律师、女牧师、女医生的虚构故事在争夺报刊篇幅和读者，在这类虚构故事中，因为这些女人急急忙忙要给丈夫生个孩子，她们所从事的法庭审讯、教堂布道和外科手术等都只得中止了。

女权主义者在前进道路上每跨出一步都必须跟那种认为她们正在破坏和抹杀上帝赐予妇女的本性这样的观念作斗争。牧师手挥《圣经》，打断了进行中的女权集会，他引用《圣经》经文说："圣保罗说过……男子是每一个女子的首脑"，……"在教堂里，你们女人要保持沉默，因为让女人讲话是不许可的。"……"如果女人要想知道什么东西，让她们回家去问丈夫，因为女人在教堂里说话是可耻的。"……"在我看来，女人要受教育，或者窃取支配男人的权利，都是不能容许的，她们只能保持沉默，因为上帝最先创造亚当，然后才创造夏娃。""圣彼得说：所以，你们作妻子的，就服从你们各自的丈夫吧。"……

来自新泽西州的一位参议员在1866年虔诚地吟诵道，给妇女以平等权利，就会毁掉她们那种"十分温顺柔和的天性，正是这种天性，使得她们对社会生活中的动乱和斗争退避三舍，绝不参与"，"她们有比别人更崇高更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在静处幽居之中造就未来男子的性格。她们的使命是在家里，当男人从生活的斗争中回到家里来后，用她们的奉迎和柔情去抚慰男人激动的心情，而不是自己投身进去，在生

话的斗争中火上浇油。”

纽约州的一位议员对争取已婚妇女的财产权、收入权的呼吁持反对态度，他说：“看来她们对自己失去女人特征还不满足，她们想让全国每一个女人都失去女性特征。”这位州议员振振有词地将争取女权的呼吁批驳一番：因为“上帝把男人创造成人类的代表，又从男人的身上取下材料去创造女人，然后又使女人回到男人身上以婚姻的形式使之成为一体，成为一个人，”“所以有一种比立法权还要崇高的权利授权规定：男人女人必不平等。”①

认为这些女人是“违反自然的妖怪”的神话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毁灭上帝赐予妇女的温顺，就必然会毁灭家庭，使男人变成奴隶。在每一场旨在将男子家庭中的一种新成分推向平等地位的革命之中，都会产生这样的神话。女权主义者那种不讲人性、野蛮的食人生番似的形象，无论是被形容成对上帝的亵渎，或是按时下的说法是性反常状况，跟那些原始动物似的黑人或者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工会成员们相比，并无二致。被性方面的专门术语掩盖了的事实是：女权运动是一场革命。当然，在这场革命中，跟在其他任何一场革命中一样，都存在过激的言行，但是，女权主义者的过激言行本身就表明了这场革命需要实现什么。这些过激言行既产生于妇女生活中被扭曲的现实和靠彬彬有礼掩盖起来的绝对服从，又是对这种扭曲和服从的强有力的批判；正是这种靠彬彬有礼掩盖起来的绝对服从，使男子对妇女的蔑视

① 尤里·赛尔：《欧内斯汀·L·露丝与人权之战》（纽约，1959年）第158页。——原注

蒙上了一层薄纱，使妇女甚至产生自卑的思想。很明显，妇女所承受的蔑视和自卑，比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更难于清除。

她们当然羡慕男人。早期的女权主义者把头发剪得短短的，下身穿灯笼裤，尽力使自己看起来像男人。那些充满激情的妇女从她们亲眼所见自己母亲所过的生活，从她们自身的经历，有了充分的依据去抛弃传统式的妇女形象。有些甚至将结婚、生儿育女的这样的事都弃之不顾了。但是，她们中有些人背弃了老一代女权主义者的形象，投身于解放自己、解放全体妇女的战斗，她们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女性，成了完美的人。

今天，一提起露西·斯通①，就会使人想起那身穿短裤、手挥雨伞、脾气暴燥的食人者形象。那位爱上她的男子用了很长时间去说服她跟自己结婚。尽管她爱他，而且终生保持了对他的爱情，但她绝不改用男方的姓氏。在她出生之时，她那温和的母亲叫出声来："啊，天哪！真遗憾又是个女孩。女人的生活太艰苦了！"1818年在马萨诸塞州西部一个农场里，在她出生前仅仅几个小时，她的母亲还给八头奶牛挤了奶，其原因是暴风雨突然来临，农场上所有的人都得下田去：抢收庄稼比看护一位临产的产妇更为重要。尽管这位温和而疲乏的母亲生了九个孩子，在农舍里无穷无尽地干活，但露西、斯通却是在这种认识中长大成人的："在我们家庭中只有存在一种意志，那就是我父亲的意志。"

她生来是个女孩，这意味着她将像《圣经》所形容的那

① 露西·斯通（1818—1893），美国女权运动先驱，曾积极参加废奴运动。——译注

么低下，像她母亲所说的那么低下，于是她反叛了。在参加教堂里的集会时，她一次又一次地抬起头来，她反叛了。但这没有起多大作用。有一次，她参加教堂组织的集体缝衣活动，她正做一件衬衫，准备通过神学讨论班去帮助一位青年男子，正在那时，她听到玛丽·莱昂[1]谈起了对妇女的教育。她把那件没有做完的衬衫扔下了，在16岁时开始去学校上课，每周一美元，就这样一直干了九年，才挣到了足够的钱，供自己上大学。她想让自己受到培养，“不仅仅为奴隶，还要为世界上无论什么地方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大声疾呼。我尤其要为我们女人地位的提高而努力。”但是，在奥伯林学院，她作为该校首批女毕业生之一，还得躲在树林里偷偷练习怎样当众讲话，因为就是在奥伯林学院，女孩子当众讲话也是被禁止的。

> 女人给男人洗衣服、打扫房间、照料他们用餐、静听男人们的高谈阔论，而女人自己在公众场合，却只能一言不发，故作高雅，奥伯林学院对女孩子的培养目标不过是有知识的、温顺的贤妻良母而已。[2]

从外表上看，露西·斯通是个小个子女人，她那清脆温和的嗓音可以使人群发出的喧嚣声平静下来。她作为废奴协会的代理人，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都要作关于废除奴隶制的

---

① 玛丽·莱昂（1797—1849），美国致力于妇女高等教育的先驱。豪尔约克山女子学院创建人及首任院长。——译注

② 见弗列克斯勒尔所著《百年斗争：美国的女权运动》，第64页。——原注

讲演，而每周中的其他日子，则要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努力：有的男子手持棍棒对她进行威胁，朝她头上扔祈祷书和鸡蛋，还有一次在严冬时节，有人将水龙软管插进她的窗户，朝她身上浇冰凉的冷水。

在一个小城镇里，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人们纷纷传说着，有个男子式的大块头女人要来作讲演，此人脚蹬皮靴、口叼雪茄、动辄对人破口大骂。但是，前来听这个怪人要说些什么的女士们却惊奇地发现，露西·斯通体态娇小，身着一件黑色缎袍，领口缀有一圈白色褶皱饰边，“清新姣好如沐晨风。具有典型的女性优雅之态……”①

她的讲演激怒了那些坚持奴隶制的人，《波士顿邮报》发表了一首粗俗的诗，希望有一位男士能“用婚礼上的长吻去堵死露西·斯通的嘴巴。命运的号角，必将为这位男士长鸣。”露西·斯通已经感觉到，“对一个女人来说，结婚就会使她成为奴隶。”亨利·布莱克威尔从辛辛那提到马萨诸塞，一直在追求她（他不无抱怨地说：“这个人生来就是一部机车”）。他发誓要“批判婚姻中的女性至上或男性至上”。他还写信给她，“我跟你在尼亚加拉瀑布旁聚在一起，我坐在你的脚旁，身边是瀑布的旋涡，我向下俯视深色的水流滚滚而去，心中涌起一阵充满激情的热望，这是一种别人无法分享、难以使之满足的热望，是你永远不能体会、永远无法理解的热望，”他还在公众场合发表为妇女权益呼吁的讲演；露西·斯通也承认自己爱他，还写信给他：“对单身生活

① 埃里若·莱斯·赫伊斯：《晨星——露西·斯通传》（纽约，1961年）第83页。——原注

的空虚，我非常清楚，用不着你来指点。”就是这样，她为了要作出跟他结婚的决定，还是承受了周期性头痛的痛苦。

托·希金森牧师①后来对人们说：“在结婚仪式上，英雄的露西·斯通竟像乡下新娘一般地哭了起来，对“夫妻本一体，一体即丈夫”这种制度的罪恶，我每次都是怀着一种更新之感去主持结婚仪式的。”他又把露西·斯通和亨利·布莱克威尔两人在结婚宣誓之前共同签署的一份婚约送到报社去，供其他的夫妻仿效：

> 我们公开接受夫妻关系……以此来承认我们相互的感情的同时，我们认为有责任宣布：关于婚姻的现行法规拒绝承认妻子是独立的、有理性的人，又给予丈夫以有害的、与情理相悖的支配权，我们的行动，对这类法规，既不默认，也不屈从。②

露西·斯通，她的朋友，漂亮的安东内特·布朗（她后来嫁给了亨利的兄弟）、玛格丽特·富勒、安吉利娜·格里姆凯、阿比·克勒·福斯特③都一致反对早婚。在现实生活中，在反对奴隶制和争取女权的斗争中，她们找到了她们的母亲从来不知道的妇女的地位，直到此时，她们才结婚。有一些人，如苏姗·安东妮和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则终生未婚。露西·斯通一直坚持使用自己的姓氏，她不仅仅是把

---

① 托·希金森（1823—1911），美国改革家，曾献身废奴运动。——译注

② 费列克斯勒尔著。前引书，第64页——原注

③ 阿比·克勒·福斯特（1810—1887）美国废奴运动和女权运动的女鼓动家。——译注

它看成是一种象征，而是害怕一旦当了妻子，就意味着作为一个人，再也不复存在了。所谓“被掩盖起来的妇女”这种概念已经被写进了法律，并使妇女在结婚之后便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不再有自己合法的地位了。“对一位已婚妇女来说，她的新的自身就是她的上司，就是她的伴侣，就是她的主人。”

如果女权主义者的敌人说她们是一些“失望的女人”这一说法属实的话，那也是因为差不多所有在这种状况下生活的女人都有理由感到失望。1855年，露西·斯通在她一生中作的最为动人的讲演之一中说：

> 从我开始记事的岁月起，我就一直是一个失望的女人。记得我曾经跟我的兄弟们一道，想去探索知识的源泉，然而，我却受到了指责：“这种事对你并不适合，知识不属于女性，”……“在受教育上、在婚姻中、在宗教的问题上，在一切问题上，失望是女人命中注定的事。使每一个女人从心底里深切地认识这种失望，直到她们再也不向它屈服，这将是我的毕生事业。①

露西·斯通在她的一生中，目睹了几乎每一个州的法律在妇女问题上作了相当大的改动，中学和全美国三分之二的学院都对女性敞开了大门。1893年，她去世之后，她的丈夫和女儿爱丽丝·斯通·布莱克威尔都献身于为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未竟斗争。在她那充满激情的历程的终点，她可以说她

① 赫伊斯，前引书，第138页。——原注

为自已生来是个女人而感到高兴。在她70岁生日的前一天，她写信给女儿说：

> 我生就是个女人，当有许多事情别人需要帮助而我又能出力的时刻，我多么高兴呀！对这些，我的母亲看见了、了解了，对此我深信不疑。我亲爱的母亲！她的生活非常艰辛，她为她又生了一个女儿来承受女人的艰辛生活而深感内疚。……但是，我为我来到这世界上而满心高兴。⑦

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就某些男子而言，他们渴望自由的激情跟他们对性爱的激情一样强烈，甚至还要超过。对许多为解放妇女而战的女性来说，情况也正是如此，无论对渴望自由的激情产生的力量作何种解释，这都是确切的事实。尽管大多数丈夫和父亲对她们加以嘲笑和讥讽，尽管因为她们“非女性”的言行举止而被人敌视（如果不是公开的诅咒的话），女权主义者们仍在继续她们的远征。在远征路上每跨出一步，她们自己都要经受那种灵魂探索式的怀疑的严峻考验。玛丽·莱昂带着一只绿色绒布口袋遍游新英格兰各地，打算集资创办一所女子学院。朋友们说她这样干，简直不像是一个女人应该做的事情。她却反问道：“我这样做有什么错？我不要导游陪同，自己乘马车或汽车上路……。对那种貌似华贵高雅、实则空虚无聊的生活，我的心灵十分痛苦。我正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我不会半途而废。”

---

⑦ 赫·伊斯：前引书，第73页。——原注

可爱的安吉利娜·格里姆凯同意出席马萨诸塞州的立法会议，并在会上发表关于反对奴隶制的讲演。她是首批出席州立法会议的妇女之一，在当时，这无异于是在开玩笑，她本人也感觉到她好象要昏过去了。有人写来一封信，谴责她这种非女性行为，其语气犹如主教对教友训话：

> 我们请求你对那种广泛地、长期地对女性品质构成威胁的危险予以关注……。女人的能力就是她对别人的依附，而这种依附，只是产生于对上帝为保护她而赐予她的脆弱的意识……。但是，当她作为一个投身于民众的改革家，占据男人的地位、操着男人的腔调……，她的品质就有悖于常理了。正如葡萄藤，其力量和魅力就在于依附棚架，将一串串果实半遮半掩，如果葡萄藤也想像榆树那样，绿荫盖地、自由自在，那么，它不仅结不出果实，还会落入尘土、丢尽脸面。①

比烦燥、比沮丧内容更为丰富的东西使得格里姆凯拒绝了“羞于开口”，使新英格兰地区的主妇在寒冬之夜步行二公里、四公里、六公里甚至八公里去听她讲话。

美国妇女要在解放奴隶的战斗中找到自己的地位，她们这一充满感情的举动或许能够证实，她们自己的反叛是出自一种无意识的激情。但是，为了解放奴隶，在组织工作中，在呼吁请愿中，在公开讲演中，美国妇女学会了怎样解放自己，这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在南方，奴隶制度将妇女束缚

① 费列克斯列尔著。前引书，第46页——原注

在家里，她们从来没有机会受教育或从事开拓性的工作，也从来没有经历过社会上要求学习文化的斗争；在那里，女性的旧形象依然故我，女权主义者的人数也少得可怜。在北方，妇女们参加“地下铁道”①的活动，要么从事解放奴隶的工作，她们再也不是昔日的模样了。女权主义还随着西进的马车队向西进发，在西部，边疆生活使妇女从一开始就跟男子有平等的地位（怀俄明州率先给予妇女选举权）。就个人而言，女权主义者跟她们同时代的所有妇女一样，有完全相同的理由去妒忌和仇视男子。但是，她们真正具有的，却是自尊、勇气和力量。无论她们热爱或是仇视男子，无论她们在自己的生活中对男人施加的侮辱是逃避或是忍受，她们始终跟广大妇女站在一起。那些接受了给自己以侮辱的生活条件的妇女对她们自己、对所有妇女都产生了屈辱感。跟这种生活条件进行斗争的女权主义者使自己免除了屈辱感，也就没有多少理由去妒忌男子了。

呼吁召开首届女权大会的起因是这样的：有一位受过教育的女性作为废奴主义者，早已参加了社会改革工作，却一下子遇到了在小城镇里一个主妇要承受的繁重劳动和孤独寂寞这样的现实。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就像现在那些大学毕业、结婚生了六个孩子、移居郊区的妇女一样，在丈夫的劝说下，移居到塞尼卡福尔斯这个小镇上，她得烤面包、做饭、缝衣服、洗衣服，照看每一个小孩，成天忙得一刻都不停。她的丈夫是个废奴主义运动领导人，经常在外面干工作。

① 地下铁道，美国南北战争以前，北方各州为帮助奴隶逃亡的秘密交通线。——译注

她写道：

> 我现在才看到了绝大多数妇女在与世隔绝的家庭生活中要与之搏斗的种种实际困难，现在才看到了，一旦妇女把她生活的主要内容跟仆人和小孩联系起来，她要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就再也不可能了。……我为妇女的地位感到十分不满，绝大多数妇女眼中那种困乏焦虑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强烈地感受到，是应当采取一些积极的措施的时候了……。我不知道该干什么，从何着手，我只有一个想法：为了引起讨论、为了提出抗议，应当召开一个公众集会。

她只是在报纸上登了一个海报，那些对生活的认识除了干家务别无所知的主妇们，以及她们的女儿们，就从半径为50英里的范围内纷纷乘马车赶来听她讲演。

那些领导争取女权斗争的人们，无论时间早迟，也无论她们的社会背景和心理因素有多大的差异，她们所具有的，绝不仅仅是一般人的智识，她们所汲取的，也绝不仅仅是当时普通教育所能给予的知识。如果不是这样，则无论她们具有什么样的感情，她们也不可能由表及里，洞悉旨在贬低妇女的种种偏见，并把她们的非议之声诉诸言辞。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靠自学成长起来的，而在当时，她又从宣扬男子权利的一伙英国哲学家那里受到教育。玛格丽特·富勒在她父亲的教导下，能读六种文字的经典作品，后来被吸引到

① 同前引书第73页——原注

爱默生①身边那些先验论者的圈子里。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的父亲是个法官，他给了女儿在当时最良好的教育，还让她旁听自己审理案子。欧内斯汀·露丝是犹太教教士的女儿，她反对妇女必须屈从于男子的犹太教教义，并且以"自由思考"方式从伟大的空想哲学家罗伯特·欧文那里受到了教育。她抛弃了自相矛盾的宗教习俗，跟自己相爱的男子结婚。她一直坚持认为，妇女的敌人不是男子，即使在为争取女权而战的最艰苦日子里也是这样看。"我们不是跟男人作战，而仅仅是跟坏的准则作战。"

这些妇女并不是食人生番。朱莉娅·沃德·豪是出身于纽约"四百豪富"的聪明而美丽的姑娘。她对每一门使她产生兴趣的学科都作过深入的钻研，因为她的丈夫认为她的一生应当奉献给他和六个孩子，于是她就以不署名的方式写了一首"共和国战歌"。直到1868年，她一遇到露西·斯通，就开始投身于争取妇女选举权的运动，她觉得露西·斯通"一直是我想象中令人厌恶的事物的反对者，当我凝视她那甜美的、充满女性特征的面庞，聆听她诚挚的声音时，我感到那些令我生厌的东西不过是一些由愚昧和误解组合起来的幻象……。我只能够说：'我跟你站在一起'"。②

那种关于食人者的具讽刺意味的神话声称，是女权主义者的过激言行产生于她们的孤立无援。当妇女被视为没有权利或者不够资格享有任何权利时，她们又能够有什么作为呢？

---

① 爱默生（1803—1882），美国思想家、散文作家、诗人。超验主义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译注

② 赫伊斯著，前引书，第221页。——原注

开始，她们似乎是除了空谈之外，一无所成。1848年以后，她们每年都举行女权集会。她们在小城镇、在大城市、在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那州、马萨诸塞州，一次又一次地举行州内的、全国性的女权集会。关于她们不曾拥有的权利，她们可以大谈特谈，直到世界末日。但是，当妇女连选举权都没有时，她们怎么能够让立法委员们使她们能够支配自己的收入，或者在离婚之后还能有自己的孩子呢？当她们没有自己的钱财，甚至连拥有资财的权利都没有时，她们怎么可能去资助或组织一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呢？

有一种看法，认为这种绝对的附庸关系是妇女固有的特征，意识到这一点，使得她们从那体面典雅的牢笼向外面每跨出的一步，都成了痛苦的一步。她们哪怕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图改变一下环境和条件，也必然会遭到嘲笑奚落。当时，“女士们”穿的奇形怪状、极不舒适的服装正是她们受的层层束缚的象征：被带子紧紧缠住，连呼吸都感到困难，身上穿了六七条裙子和衬裙，重达十一二磅，裙子长得把街上的垃圾都扫了起来。关于有的女权主义者要把男人的裤子扒掉这种荒唐的传说，部分产生于那种“女式灯笼裤”式的服装——一种紧身的，长至膝盖的裙子、长齐踝部的马裤。伊丽莎白·斯坦顿开始很喜欢穿这种服装，就像今天的年轻妇女穿短裤或便裤一样，觉得这样穿著在做家务事时要舒适一些。但是，当女权主义者把这种女式灯笼裤式的服装当作他们争取解放的象征，在公众场合公开穿出去时，从报纸编辑那里，从街头巷尾游手好闲的人那里，从小青年那里发出来的粗俗的玩笑话，使得她们那女性的敏感再也承受不住了。伊丽莎白·斯坦顿说：“我们穿这种服装，是想争得

更大的自由，但是，跟精神上受的束缚比较，身体的自由又算得了什么呢？于是，她把她的灯笼裤式服装扔了。大多数人都跟露西·斯通一样，出于女性的考虑，不再穿这种服装了：因为除了身材特别娇小的女性而外，这种服装并不十分合身。

在男子的心中，在另外的妇女心中，在女权主义者自己心中，那种于事无补的彬彬有礼还是应当被清除掉。当她们决定就已婚妇女应当拥有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发出呼吁时，在半数的场合，就连那些已婚妇女都让她们尝了闭门羹，还沾沾自喜地说什么她们有丈夫，用不着要法律保护她们。苏珊·安东尼和她的妇女工作队长们在10个星期之内，在呼吁书上征集了6000个签名，而纽约州议会对她们却报以一阵哄堂大笑。州议会的议员们还挖苦嘲笑说，因为妇女在餐桌上总是千挑万选、拣最好吃的东西吃，乘车时挑最好的座位，睡觉时也要挑在床上躺哪一边，所以，“如果说真有什么不公平、受压迫的话，那么，男士们才是受害者。”但是，除非是夫妻双方都在呼吁书上签了字，她们是不会马上作出“修正”的。“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会提出，请求通过一个法案，授权她们去更改人们的穿着，那样，作丈夫的可能会穿衬裙，而作妻子的可能会穿马裤。”

奇迹就在于女权主义者最终能够赢得一切，她们不是心怀怨恨的泼妇，而是满怀热诚的女性，她们深知自己正在创造历史。在伊丽莎白·斯坦顿身上，精力多于苦痛，她年过40了还生小孩，她写信给苏珊·安东妮说，这真正是她最后一个小孩了，笑话才开头呢——“苏珊，勇敢些，要到50岁才是我们一生中的全盛时期。”苏珊·安东妮对她自己的外

貌十分注意，十分担心，到了使她伤脑筋的地步，那倒还不是因为考虑到男人们将如何看待她（她有若干追求者），而是因为考虑到有一位后来作了母亲的美貌的老大姐把长着一双斗鸡眼，视为人生的一场悲剧。在所有19世纪女权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中，苏珊·安东妮是唯一一个能体现女性神话的人。当别的女人开始结婚生小孩时，她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的感觉。但是，尽管她有这个毛病，她可绝不是那种怀抱小猫凄凄楚楚地打发日子的老处女。她一个人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自己张贴集会海报，既作组织者、活动家，又是演说家，可以说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越来越广阔的天地里，开拓出自己的道路。

这些妇女在她们的一生中，改变了那种使贬抑妇女合法化的女性形象。在一次集会上，男人们对妇女要求选举权发出一阵嘲笑声，出席会议的几个妇女束手无策，只好让人抬着越过泥坑、被送进车厢去，她们中一位不甘屈服的女权主义者，名叫索琼纳·特鲁思①，她高举起黑黑的手臂，大声喊道：

> 看看我的手臂！我耕过地、种过庄稼、收过农作物……难道我不是一个女人吗？我能够和男人一样干活，只要有吃的，我能够跟男人吃得一样多，我也同样挨过皮鞭……我生过13个孩子，亲眼看见他们被人卖作奴隶，我怀着妇女亲身受过的痛苦大声哭叫，但是除了上帝，没

① 索琼纳·特鲁思（约1797—1883），美国黑人女传教士，改革家，她以忘我的宗教热情致力于废奴运动和女权运动。——译注

那种貌似彬彬有礼，实则空虚无聊的女性形象也被越来越多的，在红砖围墙围起来的工厂里做工的成千上万的女工们破坏了。在洛威尔面粉加工厂做工的姑娘们为改善工厂里可怕的工作条件而奋起斗争，那里的工作条件比男工的工作条件还要糟糕，这正是妇女地位低下产生的结果。但是，她们每天在工厂里干了十二三个小时的活之后，回家还得做家务活，在那充满激情的旅程中，这些妇女不能够起到领导的作用。起领导作用的女权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妇女，她们的动力产生于要使自己受到教育，要粉碎空虚无聊的女性形象的愿望。

是什么东西在驱使她们向前进？路易莎·梅·奥尔科特①决定自愿参加南北战争，去当护士，她在日记中写道："必须以一种新的方式将我的备受压抑的精力释放出来。""那是一条通向新世界的、最有趣味的历程，耳闻目睹，全是激动人心的事情，全是未曾经历过的事情，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正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当我在祖国大地上驰骋时，我诚心祈祷，帐篷映照着我，鲜血染红了我，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多么庄严神圣的时代啊，我为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而高兴。"

是什么东西在驱使她们向前进？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②

---

① 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32—1888），美国女作家，废奴主义者。《小妇人》是她最成功的作品。——译注

② 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1812—1910），美国第一个在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妇女。——译注

深感孤独寂寞、徘徊不定，便下决心要当一个女医生。在当时，这是一桩稀奇古怪、闻所未闻的事情，她不顾别人的讥讽嘲笑，去从事她的解剖研究。她为争取观看解剖人体生殖器官的权利进行了斗争，但是却拒绝出席学位授予典礼，因为那不是为女性举行的。就连她那些医生同事都对她避而远之，她写道：

> 我是医生，又是女人……我现在才明白了以前的人们为什么不愿意过我这样的生活。只有崇高的目标，得不到任何支援，还要顶住来自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反对意见，这样的生活真是太艰辛了。我愿意不时有点开心的事。总的来说，生活太严峻了。①

在进行这场斗争的一个世纪中，事实证明了，说妇女会利用她们争取到的权利对男人施行报复性的统治这种神话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由于妇女赢得了平等地受教育的权利、在公众场合讲演和拥有自己财产的权利、以及求职业于工作和支配自己的收入的权利，女权主义者也就觉得没有更多的理由对男子采取严厉的态度了。但是，还有一场战斗要进行。布林莫尔女子学院很有才干的首任院长M·卡瑞·托马斯在1908年说：

> 妇女是半个世界，但是直到一个世纪以前，她们还过着半明半暗的生活，生活的一半并不属于她们。她

① 弗列克斯勒尔：前引书，第117页。——原注

们朝外望去，看见男人们像走动着的阴影。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法律是男人的法律，政府是男人的政府，国家是男人的国家。现在，妇女已经赢得了受高等教育和经济独立的权利。她们受教育和从事家庭之外的工作，必然产生这样的结果：她们会赢得成为国家公民的权利。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们应当继续前进，我们不能够走回头路。①

麻烦就在于，争取妇女权益的运动变得非常受人尊重，但是如果没有赢得选举权，妇女便不能够使任何一个政党认真对待她们。伊丽莎白·斯坦顿的女儿哈丽特·布莱奇嫁给了一个英国人，后来丈夫死了，她于1908年回到家里，这时她发现她的母亲曾经用来培养她的女权运动已经成了在品茶用餐时的陈词滥调，不会产生什么结果了。她在英国时见过英国妇女在相似的僵局中，为使争端掀起高潮而采用的策略：对在公众集会上的发言者提出诘难，向警察进行精心安排的挑衅，在监狱里开展绝食斗争，这些就像甘地在印度采取的带戏剧色彩的非暴力抵抗行动，或者说就像今天美国的自由乘客②在合法策略对种族隔离政策无能为力时所采取的行动。美国的女权主义者们从来没有采取过受折磨时间更长的英国同伴采用过的极端手段。但是她们确实使关于选举权的

① 同上书，第235页。——原注

② 自由乘客，1961年美国南部黑人民权运动者为抗议长途汽车种族隔离而采取抗议行动，在全国范围内乘车旅行，以检查长途汽车线路上是否消除了种族歧视，这些民权运动者被称之为“自由乘客”。——译注

争端引起了世人注目，直到她们激发起比性方面的反对意见还要强烈得多的反感。

19世纪解放妇女的斗争是由解放奴隶的斗争引起的，20世纪解放妇女的斗争则是由简·亚当斯①和赫尔大厦②的社会改革斗争、工会运动的兴起和反对工厂里令人无法忍受的工作条件的大罢工引起的。制作“三角牌”女用衬衫的姑娘们工资低到每周六美元，上夜班干到晚上10点钟，如果谈笑唱歌，就要被处以罚款，对她们来说，平等是比受教育和选举权还要重要的问题。在受严寒饥饿折磨的日子里，她们坚守在罢工警戒线上，有数十人遭到手持棍棒的警察的毒打，被粗暴地拖进囚车。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就像她们的母亲当年为“地下铁道”出过力一样，为了示威者的食物和保释金而四处募捐。

一想到那些从事改革的妇女如果赢得了选举权会干些什么，政治机构就会畏缩害怕，在所谓“拯救女性”、“拯救家庭”的呼声背后，不是可以窥见政治机构的影响吗？妇女曾经作出努力，要关闭那些沙龙。酿酒商以及其他种类的厂商老板，尤其是那些靠着低报酬的童工女工而发家致富的人，为反对通过给予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在华盛顿公开进行游说活动。政治机构里的人们对他们究竟有多大本事对选民的增加进行控制，可以说是心中无数。在他们看来，选民的增加，相对来说，不会对行贿受贿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

---

① 简·亚当斯（1860年—1935），美国社会改良家及和平主义者，曾获1931年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② 赫尔大厦，北美首批在贫民区中进行福利工作的社会团体之一。1889年由简·亚当斯和A·G·塔尔创办。——译注

这种状况更富于战斗性，必然会干扰从污水管理直到禁止使用童工的各种改革活动，尤其糟糕的是，必然会干扰“净化政治”[①]。而且，南方的国会议员指出，给妇女以选举权，还应当包括黑人妇女。

为争取选举权的最后斗争是在二十世纪由越来越多的念过大学的妇女进行的，领导这场斗争的是衣阿华州大草原的女儿凯莉·查普曼·卡特[②]。她在衣阿华州立大学念过书，后来作了教师，又在报社工作，她的丈夫是个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的工程师，他全力支持妻子的斗争。有一个后来自称为妇女党的组织因为在白宫周围布置示威警戒线而连连成为报纸上突出报导的对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对那些包围在白宫围栏外面的妇女发出了许多歇斯底里的指控。她们受到警察和法庭的虐待，在监狱里进行绝食斗争，因强制进食而最终丧了命。这些妇女中，多数人是基督教贵格会教徒和和平主义者。但是，绝大多数女权主义者就是在继续进行争取妇女权利的运动时，也是支持这一场战争的。对于今天还在流行的、关于食人者的女权主义者的神话，她们很难承担什么责任。从露西·斯通的时代直到今天，只要有人提出理由反对妇女走出家门，这种神话就会冒出来。

在这最后的战斗中，美国妇女在50年间，发起过56次运动，争取男性选民实现公民投票；发起过480次运动，促使立法机关向选民们提交普选修正案；发起过277次运动，促使州政党集会研究妇女参加选举的政策要点；发起过30次运动，促

① 同上书，第299页。——原注

② 凯莉·查普曼·卡特(1859—1947)，美国女权运动领导人。——译注

使最高级的政党集会采纳妇女参加选举的政策要点，针对连续19届国会发起过19次运动①。新一代的女权主义者不再是一小批具有献身精神的妇女了，数以万计、百万计的美国妇女，她们有家庭、有丈夫和孩子，为了妇女的事业，她们献出了自己能够抽出的全部时间。今天，女权主义者的不令人愉快的形象，不太能反映出女权主义者的本来面目，倒更接近于曾经被某些势力培育起来的女性形象，那些势力在一个又一个州里强烈反对妇女拥有选举权，直到有36个州都批准了给妇女以选举权的修正案。甚至在那之后，有些人还四处游说，对立法委员以事业破产和政治倒台相威胁，不惜行贿拉票，甚至干出偷窃选票的勾当。

从事过那场斗争的人们所赢得的，不只是一纸空文上的权利。她们拨开了若干世纪来使妇女蒙受屈辱的蔑视和自卑的迷雾。英国的女权主义者爱达·阿列克莎·露丝·魏莉出色地描述了那一场斗争的胜利所带来的欢欣、兴奋和对个人的慰藉：

> 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尽管那些女人患膝内翻症，尽管若干世纪以来，没有一位可尊敬的女人的双腿值得人们一提，但是，到了紧要关头，连伦敦的警察都跑不过她们。只要稍加练习，她们能准确地击中目标，把熟透了的蔬菜准准地打在部长们的眼睛上。她们的聪明才智也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让伦敦警察厅的警官们手忙脚乱、一筹莫展。她们机敏的组织才干、严守秘密和忠诚不二

① 同上书，第173页。——原注

的品质，敢于破除迷信，等级制度和固有秩序等等，都成了对有关的人，特别是对她们自己的一种启示。……

有一次我们在一家剧院举行战斗集会，我准确地击中了一个警官的下巴，把刑事侦察部来的这块大块头警官送进了剧院的乐池，那一天，标志着我长大成人了。……我不是什么天才，那次事件也不可能使我成为天才，但那次事件却使我放开了手脚，干我想干的事，一直到达到我的意愿的顶峰。……

在那两年无拘无束、有时是危险的冒险经历中，我跟那些精力充沛、心情愉快、内心充实的妇女们一起工作、共同战斗，她们高兴时开怀大笑，而不是吃吃窃笑；走路时迈开大步，而不是瞻前顾后，她们可以连说带笑，把甘地①奚落一番。晚上，我挤在上年纪的小贩老婆、肥胖的女厨师和年轻的女售货员中间，睡在坚硬的地板上。我们经常是备受恐吓，疲惫不堪。但是我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分享到前所未有的生活乐趣。我的大多数战友都身为母亲、妻子。在她们的家庭生活中，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丈夫带着一种新的热诚在晚上回到家里来……。孩子们的态度发生了急速的变化，他们先是对亲爱而可怜的母亲采取了一种怜悯的宽容的态度，继而对母亲的举动睁大了双眼，感到大惑不解。他们的母亲太忙了，无法给他们以更多的照料关怀。他们从母性，溺爱中解脱出来了，感到他们很爱自己的母亲。她

① 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主义领袖，非暴力主义的倡导者。——译注

很有毅力，非常讨人喜欢。……那些置身于战斗之外的妇女——我遗憾地说她们是大多数——那些人不过比人们常说的小妇人要强一些，她们以恶毒的妒恨仇视妇女中的战士……。①

是不是作为对女权主义的一种反动，妇女们真的就重新回到家里去了呢？事实是，对在1920年之后出生的妇女来说，女权主义已经成了过去的历史。随着妇女赢得最后的权利——选举权，美国的这一场重大运动便宣告结束。到了30年代和40年代，那些曾经为争取妇女权益而战的妇女们仍然还在关注人类的权利和自由，如黑人的权益，受压迫工人的权益、以及在弗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的权益。但是，没有人十分关注妇女的权利；妇女的权利都已经赢得了。还有，那个食人者的神话还在广为流传。表现出独立自主和创新开拓精神的妇女被人称作“露西·斯通似的人”。“女权主义者”跟“事业型妇女”一样，成了肮脏的字眼。女权主义者摧毁了旧式的女性形象，但是，她们却无法消除仍然存在的偏见、歧视和敌对态度。对在新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女性，环境已经不再迫使她们屈从于男子，依附于男子，消极被动，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主见，这类女性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连女权主义者也描绘不出新的形象来。

女权主义者曾经致力于清除形成貌似彬彬有礼、实则空

---

① 爱达·阿列克莎·露丝·魏莉著《小妇人》，载《哈泼斯》杂志，第45卷，第11期。——原注

虚无聊的那种状况的根源，然而在那一段时期里成长起来的女孩子，她们中的绝大多数还是从当时仍然深陷在上述状况中的母亲身上获取她们的女性形象的。这些作母亲的或许正是食人神话的真实样板。蔑视和自卑的阴影能够把温柔的主妇变成专横的泼妇，同样，也能够把她们的女儿变成怒气冲冲的、男子似的人。第一批找到职业、参加工作的女人被认为是怪诞人物。她们对自己新获得的自由感到并不可靠，除非她们失去来之不易的自主，除非她们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再次被困在家务活中，她们中的一些人对女性的温柔、爱情、生儿育女等，都心存畏惧。这些妇女对食人神话，再次提供了例证。

但是，带着由女权主义者赢来的权利成长起来的下一代女性都不可能回到那种彬彬有礼、空虚无聊的旧式形象中去了，她们也不可能以她们的母亲或姑母、姨妈那样的理由不敢去爱男人，或是作一个怒气冲冲的、男子似的人。她们对妇女地位这个问题上的转折点并不知道。她们的成长，已经超出了旧式女性形象的范围；她们最终会不受约束地实现自己的愿望。但是，给她们提供了什么样的选择机会呢？在那个角落里，是凶狠的、食人的女权主义者，是事业型妇女——她们孤独寂寞，与爱情无缘。在这个角落里，是温柔的妻子、母亲——她身旁是她可爱的孩子，丈夫爱着她，保护着她。尽管许多下一代女性还在由她们的祖母开创的充满激情的旅途上继续走下去，但是，另外数以千计的人却退了下来，她们是一次错误选择的受害者。

当然，她们作出这个选择的理由要比女权主义的神话复杂得多。中国妇女在经历了许多代人被缠脚之后，最终是怎

样发现了她们也能够奔跑呢？第一批放开脚的中国妇女必然经受过这样的痛苦，她们中有些人不敢站起来，更不要说走路和奔跑了。她们走路走得越多，她们的双脚就越不会受到伤害。一代中国姑娘放开了缠过的双脚，如果在她们长大成人之前，医生本来想解除她们的痛苦和失望，却让她把放开的脚重新缠上；如果老师告诉她们，用缠上的双脚走路才具有女性特征，一个姑娘如果希望有男子喜欢她，这才是她唯一可取的走路方式；如果学者们告诉她们，要是她们不离开自己的孩子太远，她们将会成为更加称职的母亲；如果小商贩发现了不能行走的女人会从他那里买去更多的小玩意儿，他就到处散布，说奔跑会带来危险，缠脚才使人幸福；那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难道许许多多的中国小姑娘会因为他们这样说，就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让人把自己的双脚牢牢实实地缠起来，永远不去尝试着走路和跑步了吗？

历史对美国妇女开了一个真实的玩笑，这个玩笑，不是为了引人发笑，就用弗洛伊德的廉价辩术对已经故去的女权主义者开的那种玩笑，这是弗洛伊德思想对当今在世的妇女开的玩笑，是要把女权主义者的怀念织进女性奥秘的食人幻象中去，要把妇女不甘于只当妻子母亲的迫切愿望化为乌有。

妇女们在女性奥秘的怂恿下，回避她们的自我危机，在追求性生活完美的名义下，避开自己的地位问题，这样，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按照美化了的的女性特征塑造出来的旧式形象，把自己的双脚缠了起来。而正是这个旧式的女性形象，尽管有闪闪发光的新的外衣，却在若干个世纪之中，使妇女陷入困境，使女权主义者成了叛逆者。

弗洛伊德的性唯我论

认为事情是起始于弗洛伊德的说法有一半是不对的。在美国，直到40年代，事情才真正算得上是开始。然而，与其说那是一个开端，还不如说是防止结束吧。那些旧的偏见，认为妇女不过是动物，算不得是人，不能够跟男人一样思维，她们生来就是服侍男人的，等等，要消除这些偏见，无论是对征途中的女权主义者，对科学和教育，还是对民主精神而言，都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40年代，这些偏见在弗洛伊德思想的伪装下又重新冒了出来。女性的奥秘从弗洛伊德的思想中获得了力量，因为，正是

弗洛伊德思想引导妇女和研究妇女问题的人们对她们的母亲所经受的挫折和沮丧，对她们的父亲、兄弟和丈夫所表现出的不满和怨恨，对她们自己的感情和人生道路上可能的选择作出了错误的解释。弗洛伊德思想已经牢牢地溶入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现象之中，正是他的思想，在今天，使千千万万个美国妇女陷入了困境。

现代妇女对新的奥秘比对旧的偏见还更难提出质疑，其部分原因是，这种奥秘是由教育界和社会科学界的人士广为散布的，而这些人又被视为是偏见的主要敌人；另一部分原因是，弗洛伊德思想的本质使得他的思想在实际上不容人们置疑。一位受过教育的美国妇女，如果她本人不是一个精神分析专家，她怎么可能对弗洛伊德的真理提出质疑？她知道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的思想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是怎样工作的，这是人类在不断探索新知识的进程中一次重大突破。她也知道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的科学已经给受痛苦折磨的男人女人们提供了帮助。有人教导她，一个人要经过多年精神分析方面的训练，才有可能理解弗洛伊德真理的意义。她或许还知道人的思想是怎样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拒绝接受这个真理的。她怎么可能敢于涉足只有精神分析专家才有资格进入的这个神圣领域呢？

对弗洛伊德这一发现所表现出的天才，没有人能够提出质疑，对他为我们的当代文明作出的贡献，也没有人能够提出质疑。对今天拥护或者反对弗洛伊德的人实施的精神分析所取得的成效，我也不能提出质疑。但是，根据我作为一个女人的经历，以及我作为一个记者，对其他妇女的了解，我要对将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理论应用于当今的妇女这一点提

出质疑。这一理论不是用于治疗，而是通过发行很广的杂志以及所谓“专家”的意见和阐释，渗透到美国妇女的生活之中的。我认为，弗洛伊德关于妇女的理论中的许多内容已经过时，成了今天美国妇女要探求真理的障碍，成了产生那个影响深广的无名问题的主要原因。

这里面有许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弗洛伊德关于超我的概念有助于使人摆脱“应当干什么”的控制，摆脱过去的经历的控制，这种控制阻止小孩长成大人。但是，弗洛伊德思想又创造出一种新的超我来，这种新的超我使现代美国妇女麻木僵化，这就是“应当干什么”的新的专制，它把妇女捆在旧的女性形象上，不给她们以选择和成长的机会，甚至不承认她们个人的地位。

弗洛伊德心理学的要点，是强调从受压仰的道德中解放出来，去获得性活动的完美，这也是采纳妇女解放这一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被解放的妇女”这种美国长期存在的形象能唤起人们对20年代的回忆：式样繁复的发型被剪成了短发，膝盖部位裸露出来了，女人向别人炫耀自己新近获得的自由，住在格林威治村①或芝加哥的一套小公寓房里，开汽车出去，抽烟喝酒，尝尝性生活的乐趣，要不就谈谈性生活的乐趣吧。然而到了今天，距离弗洛伊德自己生活的时代已经相当遥远了，正因为如此，在美国，他的思想在思想界已已经成了性反叛的堡垒。弗洛伊德关于妇女的性的本质所下的定义，使传统的女性形象具有了新的权威性。我认为，要是没有他的这些定义，几代受过教育，精力充沛的美国妇女

---

① 格林威治村，美国纽约市下曼哈顿居民区。——译注。

是不会将她们已经萌生的“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能够作什么人”这样的意识轻而易举地抛弃的。

“阳具羡慕癖”是弗洛伊德杜撰出来的一个名称，用来描述他在妇女身上观察到的一种现象，那是些中产阶级的妇女，是维多利亚时代在维也纳请他治疗的病人。40年代在美国，这个名称被用来解释女人的一切毛病。那些宣扬女性特征受到威胁的人使美国的妇女运动逆转到争取独立自主和个人地位上，她们中的许多人从来就不知道弗洛伊德使用这个名称的本意。那些利用这个名称的人，不是少数几个精神分析专家，而是为数众多的宣传者、社会学家、教育工作者、广告经纪人、报刊撰稿人、儿童问题专家、婚姻顾问、牧师、鸡尾酒会主持人等等，这些人不可能清楚弗洛伊德用“阳具羡慕”这样的字眼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们只须弄明白弗洛伊德当时想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说明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就会看到，把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的理论照字面意义用到当今的妇女身上是多么荒谬。人们只须了解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方式来说明妇女的问题，他们便会懂得，他的理论中的许多内容都已经过时了，跟今天每一位社会科学家的思想所提供的知识都格格不入，而在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这些人的思想还不为人们所知哩。

人们都承认，在研究人类个性的许多重大问题上，弗洛伊德的观察最敏锐、最严谨。但是，在描述和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却受到他所属的文化的严重限制。他为我们的文化创造出了新的框架，同样，他也逃不出他自己的文化的框架。甚至他的天才也未能给予他关于文化发展的知识，而在今天，那些不是天才的人们都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成长起来

了。

物理学家的相对论比社会科学家的相对论更难于理解，但是，近年来，前者已经改变了我们对科学知识的全部看法，因而也就比后者更易于理解了。社会科学家不可能从他自己的文化的桎梏下完全解脱出来，他只能够按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框架去解释他所观察到的现象，这不是标语口号，而是关于真理的基本看法。就是对那些伟大的革新者而言，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只能将他们革命性的观察转化成语言和名称，而这些语言和名称则是要受当时科学发展制约的。就是那些产生出新名称的发现，也跟发现者当时所处的环境和地位密切相关。

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对文化相对论的理解，这些都是当今社会科学家的框架的组成部分，而弗洛伊德在当时却一无所知。弗洛伊德认为属于生物的、本能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其中有许多经现代科学研究证实，应当是某些特定的文化的产物。①许多被弗洛伊德看作是普遍的人性特征的东西只不过是19世纪末欧州中产阶级的某些男人和女人的特征而已。

例如，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病的性本能理论产生于这样的事实：他开始观察的首批病人中有许多人受歇斯底里症的折磨，而在这些病例中，他发现了病因是性压抑。弗洛伊德的信徒们常常不能自圆其说，他们至今还宣称，他们坚信所有的神经病例都是起源于性本能。他们在病人中寻找无意识的性

---

① 见克莱拉·汤普逊：《精神分析：进化与发展》，（纽约1950年），第131页。——原注

记忆，并把他们所听到的内容转换成跟性有关的符号，他们力图要找到他们要寻找的东西。

然而事实是，弗洛伊德观察过的歇斯底里病例在今天已经相当罕见了。很明显，在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文化上的虚伪加剧了性的压抑。（有些社会理论家甚至怀疑，在那个垂死的奥地利帝国，正是因为别无所思，才使得弗洛伊德的病人们对与性有关的东西十分专心致志）①。他所属的文化对性问题从不涉及，这种状况自然就将他的兴趣集中到性上面来了。他后来就发展了自己的理论，说人一生中成长的各个阶段都跟性相关连，并把他观察到的一切现象都纳入到性问题的范围中去。

他试图把一切心理现象都用与性有关的术语来表述，试图把关于成年人个性的一切问题都看成是儿童时代性固恋的结果，这些都来源于他本人当医生的经历，来源于当时科学思想中蕴含着的因果论。心理学术语经常使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家大伤脑筋，弗洛伊德在用这些术语研究心理现象时，同样也感到信心不足。由于他把这些现象转入到人的思想的无意识状态这个未经开拓的领域，有些跟解剖学上的某个人体器官相关连的心理现象就可以按生理学的观点来解释，这样就使得对这些现象的解释看起来更加合适、更加可靠，更加真实，更加符合科学了。如同他的传记作家欧内斯特·琼斯所说：“他竭尽努力，要在大脑解剖学中找到自己

---

① 里查德·拉·皮尔斯：《弗洛伊德的理论》（纽约，1959年），第62页。——原注

学说的依据。”①他确实具有精确地观察和生动地描述心理现象的能力，他给他的概念取的名称，无论是借自生理学、哲学，还是文学，例如阳具羡慕、自我、恋母情结等，在人体上似乎都是确实存在。琼斯说：“他心目中的心理现象，如同冶金学家心目中的各种金属一样，非常真实，非常具体。”②后来，当一些能力不那么强的思想家在阐释、传播他的概念时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其原因之一就是那些人不具备他的这种能力。

弗洛伊德理论的整个上层建筑是以严谨的决定论为基础的，而决定论又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思想的特点。现在，决定论已经被关于原因和结果的更加复杂的观点所取代，这些观点既包含有心理上的现象和发展，也包含有生理上的现象和发展。按照这种新观点，行为科学家用不着借用生理学的术语来解释心理现象，也用不着把心理现象变成似是而非的东西。性方面的现象跟莎士比亚创作《哈姆雷特》这个文学现象一样真实，而《哈姆雷特》却不能够被贬低到性问题的范畴，并按这样的范畴加以确切“解释”。就连对弗洛伊德本人也不可能用他的决定论的、生理学的模式来加以解释，尽管他的传记作家把他的天才，把他“探求知识的神圣热情”归结到他的永不满足的性方面的好奇心，说他在不满三岁时，就很想知道他的父亲母亲在卧室里究竟在干些

① 欧内斯特·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和著作》（纽约，1953年），第1卷，第384页，——原注

② 同上书，第2卷（1955年），第432页——原注

什么。①

今天，生物学家、社会科学家和越来越多的心理分析专家都看到了，人类要成长发展的需求是人类最重要的需求，如同性需求一样不可或缺。弗洛伊德按性发展的观点所说的“口唇期”和“肛门期”（即小孩获得其性快感，最初是通过嘴巴从母亲乳房上获得，然后从他的肛门区的运动获得），现在已被看作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既受性的影响，又受文化环境和父母态度的影响的不同阶段。小孩长牙齿的时候，他的嘴巴既可以咬，自然也可以吮吸。肌肉和神经同时也在生长，小孩子逐渐具有了把握、理解和控制的能力。在他5岁、25岁或者50岁时，他所属的文化能够对他要成长、要学习的需求，加以满足，或弃之不顾，或加以压抑，或使之减退，或使之激发，或使之受挫，对他的性要求亦是如此。弗洛伊德曾观察到，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母亲和孩子之间的问题在吃饭时，稍后在训练孩子大小便时，都会表现出来。今天的儿童问题专家为他的这一观察提供了更多的例证。然而，近年来在美国，在孩子的“进食问题”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衰退趋势。是孩子的本能发展发生了变化吗？不可能，因为如果按照定义，口唇期反应人的本能。要么，是不是因为在当今美国的儿童护理工作中强调不加限制，或者仅仅因为在我们这个丰裕的社会中，食物已经不再是作母亲的要焦虑的东西，我们的文化就使得进食问题不再是幼童护理工作中的重点了？由于弗洛伊德对我们的文化产生的影响，那些受过教育的父母亲在训练孩子如何大小便时

---

① 同上书，第1卷，第7—14页，第2卷，第483页。——原注

都小心翼翼，避免出现意见对立的情况，使孩子无所适从。这种意见对立的情况，在小孩学说话学走路的时候最容易出现。①

到了本世纪40年代，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和精神分析专家按照他们越来越强烈的文化意识，已经开始对弗洛伊德的思想重新作出解释。但是，奇怪的是，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把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征的理论照其字面意义运用于美国妇女。

事实上，在弗洛伊德看来，甚至在今天麦迪逊大街②上的杂志编辑看来，妇女不过是一个奇怪的、低劣的、算不上是人的物种。他把女人看作是像小孩子一样的玩偶，只有靠着男人对她的爱，她对男人的爱和服侍才能够得以生存下去。正是这种相同种类的、无意识的唯我论，在许多世纪中，使人类认为，太阳只不过是环绕地球运转的一个发光体而已。弗洛伊德正是带着由他的文化产生的这种看法成长起来的，他的文化不仅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欧洲文化，还有犹太文化；在犹太文化中，男人们每天祈祷，说："主啊，感谢你，你没有把我创造成女人"，而妇女们也心悦诚服地祈祷："主啊，感谢你，你按照你的意志创造了我。"

弗洛伊德的母亲温柔、美貌，嫁给了年龄比她大一倍的男子；他的父亲以犹太家庭中历来就有的那种独裁式权威统

---

① 布鲁诺·贝特赫尔姆著：《只有爱是不够的：论对感情受挫的孩子之治疗》。——原注

② 纽约市曼哈顿区的一条大街，系著名的报刊和广告商集中之地。——译注

治着全家，在犹太人遭受迫害的岁月中，作父亲的也几乎不可能在家庭之外的世界中去树立自己的权威。他的母亲非常喜欢她的长子小弗洛伊德，总认为他日后必成大器，似乎她的整个一生就是为着要满足这个儿子的每一个愿望。他的母亲还要满足他父亲的愿望，于是，弗洛伊德对他的父亲产生了性妒忌，后来，他对自己这种性妒忌的记忆就成了他的恋母情结理论的基础。他跟他的妻子在一起时，也如同他跟他的母亲、姊妹在一起一样，他的需要、他的要求、他的愿望就是太阳，整个家庭生活都要围绕这个太阳运转。他的几个姐妹练习钢琴的声音干扰了他的学习，“于是钢琴消失了”。安娜·弗洛伊德①若干年后回忆道，“随着钢琴的消失，我们几姊妹要想成为音乐家的一切机遇也就消失了。”

弗洛伊德并没有把这种态度看作是妇女遇到的问题，或者是产生这类问题的原因。正是由于妇女的本性，才使得她们必须受男人统治，才使得她们产生妒忌男人的病态。弗洛伊德在他们订婚四年中间（1882—1886），在写给他的未婚妻玛莎的信中，就有《玩偶之家》中托瓦尔德斥责娜拉不够做人资格的那种腔调。弗洛伊德当时正在维也纳的实验室里开始他对人的大脑之秘的研究工作；他称之为“甜美小孩”的玛莎却在自己母亲的监护之下等了整整四年，弗洛伊德才来到她身边，带她离开了她的家。从他的这些信中，人们可以发现，在他看来，玛莎的地位不过是孩子加主妇而已，哪怕在玛莎已经不再是孩子了，也不再是主妇了，他还是这样看。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妹妹。——译注

餐桌和椅子，床、镜子，一只能使这幸福的一对回忆起流逝时光的大钟，可以躺在上面做一个小时愉快的白日梦的躺椅，有助于主妇保持地板干净的地毯，放在橱柜里，用好看的缎带扎起来的衣物，最新式样的衣服，装饰有手工花的帽子，墙上挂的图画，每天都要换的玻璃杯，节日用的酒杯，各式各样的盘子碟子……，还有缝纫机，发出柔和灯光的台灯，每一样都应当放得井井有条，要不然，主妇就会烦恼，就会心碎，有多少件家俱，心就裂成了多少片。还有，这一件东西是为使合家团聚而付出的努力的见证，那一件东西凝聚着对美的憧憬，体现了对亲爱的朋友的怀念，对曾经访问过的城市的记忆，对美好时光的回顾。……我们应当在这些琐碎东西上注入我们的全部心血吗？是的，毫无疑问，完全应当……。

我完全知道，您多么甜美，您能够把这个家庭变成天堂，您一定能够理解我的兴趣，您将会成为愉快而勤奋的人。我会让您按照您的意愿来管理这个家庭，您会用您甜美的爱来报答我，您必然会超脱于妇女遭人歧视的那些弱点。只要我的研究工作允许，我们就一块儿阅读我们想学习的东西，我将引导您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如果一个姑娘对她的伴侣及其事业还不熟悉的话，这样的领域是引不起她的兴趣的……。①

---

① 欧内斯特·L·弗洛伊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书信集》（纽约，1960年），第27页，第10封信；第71页，第26封信；第145页，第71封信。

——原注

1885年7月5日，弗洛伊德写信给玛莎，斥责她跟她的朋友艾丽丝继续来往，很明显，艾丽丝对男人的看法简直不能算是严谨、正派的：

> 你以为你现在成熟了，你以为你跟她的关系对你没有什么害处，你的这些想法有哪一点好？……你太脆弱了，而这正是我力图想加以改变的，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对另一个人是要承担责任的。你是我可贵的娇小的人儿，就算你出了点什么差错，你还是那么……。我甜美的小孩，这些你都懂得……。①

包含在弗洛伊德关于妇女的科学理论中的是维多利亚式的、骑士风度和恩赐态度的混合体，在他写于1883年11月5日的一封信中就更清楚明白了，他在这封信中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②关于"女性解放及妇女问题"的观点作了一番挖苦嘲弄：

> 在他的全部论述中，从来没有提到女人是跟男人不同的人——我们也不说女人是比男人低劣的人，更不说是跟男人对立的人。他发现妇女受到的压抑跟黑人受的压制是相似的。任何一个姑娘，尽管她没有选举权或其他法定权利，如果一个男子吻她的手，并准备去赢得她

① 同上书，第60页，第74封信；第161页，第76封信。——原注

② 穆勒（第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作者。——译注

的爱情，她就可以使这个男子俯首贴耳。认为应当使妇女投身于跟男子完全一样的生存权的斗争，这种看法是一种流产的思想，在现实中不会有什么结果。举例说，如果我设想我那位温柔甜美的姑娘是一个竞争者，我就会像在17个月前说过的那样对她说，我很喜欢她，恳求她从斗争中退出来，退到宁静的、与世无争的家庭生活中来，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在哺育培养女性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变化可能会使一个女性需要保护的温柔本性全都受到压抑，可能在那之后她就可以像男子一样去挣钱谋生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为丧失了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我们关于女人的理想而痛惜，也就没有道理了。我相信，法律和教育方面的一切改革活动都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不攻自破：早在男人赢得自己的社会地位之前，造化就已经确定妇女的命运存在于美貌、魅力和甜美之中。法律和习俗给了妇女许多她们不曾得到的东西，但是，妇女的地位必将保持原状：青年时代作可爱的恋人，成人时期当可爱的妻子。①

因为弗洛伊德的全部理论都是以他对自己作的深入的、无穷尽的精神分析为基础，因为性是他全部理论的中心点，所以，关于他自己的性问题的某些有悖于常理的论点看起来还是中肯的。许多学者注意到了，他的著述中论及婴幼儿的性问题，比论及成年人的性问题要多得多。他的主要传记作家琼斯指出，就是在那样的时代，他也是纯洁的、严谨的、

① 琼斯：前引书，第1卷，第176页。——原注

重道德的，跟同代人相比，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他对性活动并不感兴趣。仅有的几个实例是，他年轻时很爱自己的母亲，16岁时跟一位名叫吉塞拉的姑娘有一段理想式的纯情浪漫史，还有就是26岁时跟玛莎订了婚。他跟玛莎在维也纳共同生活的那9个月并不太幸福，因为玛莎明显感到心神不定，还有点怕他。倒是两个人分居两地的那四年，相互间写了900多封恋爱信，才可以说是"满腔热情"。尽管他的传记作家注意到了，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道德家，从不在婚姻之外去寻求性满足．但是，在他结婚之后，他和玛莎之间的激情还是很快就消逝了。他一生中为之倾注过强烈的爱和强烈的恨的唯一一位成年女子，就是订婚初期时的玛莎。从那以后，他的强烈感情都集中在男人身上了。诚如他可敬的传记作家琼斯所说："在这个方面，弗洛伊德跟常人的不同之处，以及他公开宣称他精神上的两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都明显地影响了他的理论观点。"①

态度不那么恭敬的传记作者，甚至琼斯本人，都指出，当人们用弗洛伊德自己的生活来衡量他的理论时，他们就会想起那位清教徒似的老女人，在她眼中，到处都有性问题。②他对他那位温顺的主妇时有烦言，埋怨她还温顺得不够，有意思的是，他又以一种复杂的心情，埋怨她跟自己一起生活感到"不自在"，埋怨她不能够成为跟自己"志同道合"的人，这种情况，非常有趣。

① 同上书，第2卷，第422页。——原注

② 同上书，第1卷，第271页，——原注

然而，弗洛伊德发现她在内心并不温顺，她有坚强的性格，不易改变，于是他感到痛苦。她的个性已经完全形成，有牢实的基础，这样的个性完全够得上这位精神分析专家的最高评价："正常"。①

弗洛伊德写信给她，说她应当"变得相当年轻，变成一个出生才一周的心上人，赶快把那些人情世故丢个一干二净，"人们从这里窥见了"他的意图，他想按他心目中的完美形象来塑造这位女性，然而，他永远也不会成功。"但是，他随后又作了一番自我批评：

这可爱的人儿不应当成为一个玩偶，而应当成为一个好的伴侣，在她的严厉主子用尽心机之时还应该有她自己的情感世界。我也在尽自己的努力，将她那种直言不讳的习惯击得粉碎，好让她在同意我的意见之前先不要说出她自己的看法。②

琼斯还指出，她未能通过弗洛伊德对她的主要检验——"跟他自己，跟他的意见、他的感情，他的意图保持绝对一致，他于是感到痛苦。除非他能在她身上找到自己打上的'印记'，她就不会真正属于他。"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一个人要是在对方那里找不到一点共同语言，那是很令人生厌的。"琼斯再次强调，"只有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

① 同上书，第1卷，第102页。——原注

② 同上书，第1卷，第110页。——原注

弗洛伊德的爱情才可能得到表现和发展……。玛莎可能是害怕她这位主人似的恋人。于是，她只好在沉默之中寻找自己的安身之处了。”①

事情到了这一步，弗洛伊德写信给她："我放弃我曾经企求的东西。我不需要一个我曾经奇希望于你的那种志同道合的人。我有很强的能力，完全可以独立作战……。你还是作我的可贵的、甜美的恋人吧。”②显然，"他一生中将（爱和恨的）强烈感情集中在一个女性身上的仅有的一段时时间就这样完结了。”③

他们的婚姻是传统式的，不带有以前那种热情。琼斯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婚姻的：

> 没有多少完美的婚姻能够和他们相比。玛莎无疑成了一位极为出色的妻子和母亲。她是一位令人敬佩的管家，属于那种能够跟佣人长期相处的少见的女性，但她绝不是喜欢把一切东西都拿到人前炫耀一番的主妇。她的丈夫享受到的舒适和方便是首屈一指的……。要让她比世界上的许多人更见成效地去追随他丈夫那浮想联翩的想象力，就不大可能了。④

她像那些最周到细致的犹太母亲一样，对她丈夫生活上

---

① 同上书，第1卷，第124页。——原注
② 同上书，第2卷，第127页。——原注
③ 同上书，第3卷，第138页。——原注
④ 同上书，第1卷，第151页。——原注

的需要无微不至、尽心尽力。为着“亲爱的爸爸”的方便，她按照严格的计划安排每一餐饭。但她从来也不敢梦想在她丈夫的生活中分享到一个平等的地位。同样，弗洛伊德也没有把她看作是护卫他们的孩子的合适的人，特别是一旦他去世，她承担不起教育孩子的责任。弗洛伊德回忆他曾经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他在戏院里忘记招呼她了，他由此产生联想：“在不重要的小事情中，遗忘或许是许可的。”①

妇女的无限的附属性已经被弗洛伊德的文化视为理所当然，她们又缺乏采取独立行动和争取个人地位的机会，这两者似乎经常在妻子身上产生不安和压抑，在丈夫身上产生烦躁和恼怒，这正是弗洛伊德的婚姻的特点。琼斯对此作了总结概括，认为弗洛伊德对待妇女的态度“大概可以被称作是相当陈腐的态度，而且可以很容易地将他这种态度归结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他成长起来的那个时期，而不是归结于任何个人的因素。”

>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他表述过什么样的充满智慧的看法，在他的著作和信函中，还是有许多地方表现出他的态度和感情。要说他把男性看作是创造一切的主人，这种说法也过了头，因为在他的天性中还没有骄横傲慢和占据优势这样的色彩。但是，把他对女性的观点说成是女人的主要作用就是当乐于助人的天使，为男人的需要和舒适服务，这种说法或许是公允的。他写的信和他

---

① 海伦·沃克尔·庞勒尔著，《弗洛伊德：他的生平与思想》（纽约，1947年），第152页。——原注

在恋爱上作出的选择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他心中的恋爱对象只有一种，那就是具有女性特征的，温柔的女性……。

弗洛伊德发现女性的心理比男性的心理更加不可思议，对此已经没有多少可怀疑的了。他有一次对玛丽·波拿巴说："有个从来没有给予解答的大问题，尽管我从事对女性灵魂的深入研究已有30年，我也不能够解答的这个大问题，这就是：一个女人的需求是什么？"①

琼斯还评述道：

弗洛伊德还对另外一类女人产生过兴趣，那是些具有更多知识，或许具有更多男子气概的女人。这些女人在他的一生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尽管她们比其他的女人具有更强的能力，她们也只能作弗洛伊德的男性朋友的附庸，这些女人未能对弗洛伊德产生性方面的吸引力。②

这一类女人中有：他的表妹明娜·伯奈丝，跟玛莎相比，她更聪明，享有更多的自主权，以及稍后一些的女性心理分析专家，或者精神分析运动的女性信徒，如：玛丽·波拿巴、朱安·瑞汶丽、罗·安德烈亚斯一萨乐美。无论是他的热情崇拜者，还是对他怀有恶意的传记作者，都从来不怀疑

① 琼斯著，前引书，第2卷，第121页。——原注

② 同上书，第1卷，第301页。——原注

他没有去寻求过婚姻之外的性满足。由此看来，性已经完全脱离了他作为人的热情，而这种热情，在他漫长生涯中作出贡献的那些岁月里，曾经一再表现出来，是在较小的范围内，通过他与男性的友谊，与那些他认为跟他处于平等地位，因而具有"男子气概"的妇女的友谊一再表现出来。他曾经说过："当我不能够按照我自己的看法去理解别人时，我总觉得不可思议。"①

尽管性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人们还是从他的著作中得到了这样的印象：在他看来，性行为是卑劣的；如果说在男人眼中连女人自身都是卑劣的，性行为又怎么可能会不卑劣呢？当然，这不是他的理论。在弗洛伊德看来，那种想跟母亲和姊妹乱伦的念头才会使人"把性行为看成是卑劣的行为，被这种行为玷污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身体。"②在任何情况下，妇女受到贬斥，在弗洛伊德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这正是他关于女性的理论的核心。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女人人格的动力是出于她对男性生殖器的妒忌，这种妒忌会使她感到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如同男孩子看不起她，以及再往后男人看不起她"；就正常的女性而言，这种妒忌会引导她产生想具有她丈夫那样的男性生殖器的愿望，当然，这样的愿望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直至她生了一个儿子，以这种方式得到了男性生殖器。简言之，她仅仅是一个"homme manqué，"意即某些器官不完全

① 同上书，第1卷，第320页。——原注

② 西·弗洛伊德著，《性生活的堕落》，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论文集》第4卷。——原注

的人。著名的精神分析专家克莱拉·汤普逊(Clara Thompson)指出："弗洛伊德一直未能从他对妇女所持的那种维多利亚时代的态度中解脱出来。他把维多利亚时代的生活和看法对妇女的种种限制视为她们作为女人的命运中不可避免的成分。……他的整个思想中有两点最基本的，即阉割情结和阳具羡慕，就是来源于他的这种看法：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妇女比男子低劣。"①

弗洛伊德所谓"阳具羡慕"这一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对在这一点上他所观察到的东西作了如实的报告，对此，连那些已经意识到他无法逃避他的文化的那些人也没有提出质疑。

弗洛伊德发现，他称之为"阳具羡慕"的现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维也纳的中产阶级的妇女中，是普遍存在的。于是，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女性特征的一整套理论。他在一次题为"妇女的心理"的讲演中说道：

> 在一个男孩看到女性生殖器之后，他知道了，他看得极为重要的自己的性器官，并非对每一个女人的身体都是必不可少的……，就这样，在他身上形成了阉割情结。于是，他就处于阉割欲望的影响之中，这给他今后成长最强的动力。女孩子具有的阉割情结也是由看到男性生殖器而产生的。她很快就注意到了两种生殖器之间的差异，应当承认，她也注意到了这种差异的意义。她觉得她处于一种十分不利的地位，而且经常表明，她

① 汤普逊著，前引书，第133页。——原注

也想有像男性生殖器那样的东西，于是她受到“阳具羡慕癖”的困扰，这对她今后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留下了无法消除的影响，就是在最佳情况下，如果在精神思想方面不作出极大的努力，这种状况也无法改变。一个女孩子意识到了她没有男性生殖器，这并不意味着她就不以为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恰恰相反，她对此耿耿于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想有像男性生殖器一样的东西，在好多年内，她都相信这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心理分析证实，甚至在她对现实的理解使得她放弃了这个根本无法实现的愿望时，这样的愿望仍然存在于她的潜意识中，仍然具有相当的活力。她迫切希望有一个男性生殖器，这个愿望甚至可能激发起迫使成年妇女去求助于心理分析的动力，她们希望求之于心理分析的、合乎情理的东西，诸如想在知识领域里干一番事业的追求，通常被看作是她们这种遭到压制而不能实现的愿望的一种纯洁而温和的表现形式。①

弗洛伊德接着说，“对阉割情结的发现是一个女孩子一生中的转折点，跟那些在身体构造方面比她们完备得多的男孩子相比较，她觉得感情上受到伤害，只好自怜自爱了。”在她的眼中，她的母亲和所有的女人都是受人蔑视、地位低下的，如同在男人眼中，出于同样的理由，她们也都是受人蔑视，地位低下的。这种情况，要么导致完全的性抑制和神

① 西·弗洛伊德著，“女性心理学”，见《精神分析新论讲演集》（译者：W·J·H·斯普洛特，纽约，1933年），第170页。——原注

经病，要么导致形成“男性情结”，使她拒绝中止“男性生殖”行为(即通常体现男性特征的行为)，要么导致形成“正常的女性特征”，使女孩子的言行本能受到压制，只好转向她的父亲去实现她想有一个男性生生殖器的愿望。“女性特征的确定，只能在她想有男性生殖器的愿望被想有孩子的愿望所取代，孩子占据了男性生殖器的地位的时候才能实现。”女孩子在玩玩具娃娃时，“并不是她的女性特征的真实表现”，因为这只是一种能动性，不是被动性。“女性最强烈的愿望，就是想有男性生殖器，而只有当生下的孩子是个男孩，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男性生殖器时，这样的愿望才可得以实现……。母亲把在自己身上不得不加以压制的种种宏图大志都转移到儿子身上，对她的男性情结遗留在她身上的东西，她希望能够从儿子那里获得满意的结果。”①

但是，妇女的固有缺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阳具羡慕是难以消除的，所以妇女的“超我”即她们的良心和理想，永远也不会有男人的良心和理想那么完善，“女人没有多少正义感，这跟在她们的精神生活中妒忌占了上风不无关连”。出于同样的理由，妇女对社会生活的兴趣不及男人的兴趣那样强烈，“她们使自己的本能得以升华的能力也要差一些。”

最后，弗洛伊德不得不提到，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从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获得了这样的印象：由于在女性的特征中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就是精神分析也不能够对妇女有多少作为。

---

① 同上书，第182页。——原注

> 一位30来岁的男子看来是风华正茂，但在某种意义上讲，他还没有完全成熟，精神分析为他今后的发展提供了种种可能性，我们可以期待他在这些方面会大有作为。但是一个30来岁的女人，却常常因为她心理上的固执和呆板，把我们弄得不知所措……。在她面前，已经没有前进的道路了；她人生的旅程似乎已经走完，对未来已经没有什么期望了。实际上，就算我们成功地为她解除了神经病等的困扰，那种导致形成女性特征的艰难进程也早已使她个人成长发展的种种可能消失殆尽了。①

他这番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人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在弗洛伊德看来属于生物学的东西常常是某种文化的反应，人们就以这种新的认识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思想。当用这种认识来解释"阳具羡慕"时，我们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为妇女妒忌男子提供了许多依据，那正是女权主义者们进行斗争，要加以反对的，相同的条件和环境。一个女人没有能得到男人享有的自由、享乐和社会地位，如果她在内心涚愿，要是自己也能享有这些东西就好了，她就会在梦中希望自己是个男人，而且看见自己也有了那个使男人迥然不同的东西——男性生殖器。由于她的命运取决于如何取悦于男子，她就只能学会将自己的妒忌和愤慨隐藏起来，于是，她就扮演起小孩子、玩具娃娃和玩具之类的角色来了。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对爱情的憧憬可能还在折磨着她，使她

① 同上书，第184页。——原注

深感困烦。如果她在心里看不起自己，还为自己所没有的一切而妒忌男子，她就可能承受一番爱的动作，或者甚至对男人产生一种奴颜媚骨似的崇敬感，但是，究竟她能不能够享有那种充满欢乐的自由恋爱呢？除非你认为女人天生比男人低劣，你就不可能将妇女对男人的妒忌和她们的自卑，仅仅解释成她们不承认自己的性畸形。由此看来，她们争取平等的愿望当然也就属于是神经病了。

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弗洛伊德对人的自我（甚至男人的自我）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人的自我，即是"要主宰、要控制、要在一定的环境中实现自我完善的一种冲动。"[①]有些从弗洛伊德的偏见中解脱出来的精神分析专家跟其他的行为科学家一起对人要求成长发展的要求进行了研究，他们现在开始相信，这种需求才是人的基本需求，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正是这种需求，以及对满足这种需求的干扰，才是人在心理上遇到麻烦的根源。性只是人的潜力的一个方面。应当记住，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神经病都起源于性，他也只是在跟男人的性关系中去观察妇女。然而，在他观察到性问题的所有妇女身上，还存在着另外的严重问题：被限制的成长、缺乏人的地位的成长，那是一种不成熟的，不完全的自我。当时的社会明确拒绝给妇女以受教育的机会和自主权，也就阻止了妇女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阻止她们去实现可能推动她们成长的兴趣和理想。弗洛伊德的著述中也提到了妇女的这些缺陷，但是他只能够把这些缺陷解释成由"阳具羡慕"造成的损失。他把妇女对男人的妒忌仅

---

① 汤普逊著，前引书第12页。——原注

仅看成是一种性病态。他观察到了，那些内心里强烈希望跟男子平等的妇女对自己身为男人的附庸不会感到满意。在这一点上，看来他道出了事情的真相。但是，当他把妇女对平等的渴望贬低成“阳具羡慕”时，难道他不是在表明自己的观点，说妇女永远也不可能跟男人平等，更不要说具有男人的生殖器了吗？

弗洛伊德并不注意去改变社会，他只帮助男人、女人们去适应这个社会。他讲述过一个中年处女的病例，他成功地帮助她从15年来一直阻碍她参与生活的那种综合症状中解脱出来。她一旦得以解脱，就“投身于各式各样的活动中去，以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她的才干委实不小，她也为时未晚地从生活中得到了些许成功、欢乐与赞赏。但是，当她发现世界上并没有自己的地位时，她的一切努力也就烟消云散了。因为她不可能旧病复发，再回到以前的精神病症中去，她就开始出事了，要么把脚踝扭了，要么把脚或手扭伤。如果对这种状况也作一番分析，就会看到，“就算她没有把手脚扭伤，她在这种情况下也会生一些小病的，诸如粘膜炎、喉咙痛、流行性感冒、或是风湿病，等等，直到最后，她下定决心退却，不再参加任何活动，整个事情也就到此完结了。”①

尽管弗洛伊德和他那个时代的人认为，由上帝赐予妇女的不可更改的本性确定了她们是低劣的，当今的科学却并不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现在我们知道，妇女低下的地位，

① 西·弗洛伊德：“忧虑与本能生活”，见《精神分析新论讲演集》，第149页。——原注

是由她们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和被禁锢在家庭内造成的。今天，科学已经证实了妇女具有跟男子相同的智力，在除了肌肉力量之外的每一个方面，妇女具有跟男子相同的能力都已经显示出来。在这样的时候，以认为妇女生来低劣为基础的理论就显得既虚伪又荒谬了。尽管弗洛伊德的不受时间限制的性真理在今天已经将上述基础掩饰起来，但它仍然是弗洛伊德关于妇女的理论的基础。

因为弗洛伊德的信徒们不能够仅仅按他规定的女性形象来观察妇女（那种形象是低下的，孩子气的，孤立无援，如不甘作男人的附庸就无幸福可言），他们就想帮助妇女除掉她们受到压制的妒忌，除掉她们想争取平等的神经病似的愿望。他们想肯定妇女生来低下的地位，并以此来帮助她们去寻求作为女人的性完善。

弗洛伊德的信徒们把被他称之为“阳具羡慕”的状况的原因和诊治方法完整地转移到了20世纪的美国来。可是这时，曾经确定了妇女低下地位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按照我们对文化进展和人类发展的新的理解，人们会认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不曾享有的权利、自由、受教育等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妇女，跟弗洛伊德要给以治疗的妇女是迥然不同的。人们会认为，这些妇女没有多少理由要妒忌男子。但是，弗洛伊德的思想是按照一种奇怪的字面意义解释给美国妇女听的，按这种说法，阳具羡慕的概念本身就具有一种神秘的生命力，似乎在被观察到有阳具羡慕的妇女身上，它也是完全独立地存在着。好像弗洛伊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形象，比要对其运用这种形象的20世纪的妇女还要真实。在美国，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征的理论是按其字面意

义被人抓住不放，并加以利用的，他们认为当今的妇女跟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没有什么两样。跟男人相比，没有人会理睬一个世纪前的妇女在生活中遇到的不公正，仅仅视其为是阳具羡慕的文饰作用。跟当年的那些妇女相比，今天的妇女在生活中的种种机会，都在阳具羡慕的名义下，不让她们享有。

按字面意义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可以从下面摘自精神分析专家马瑞尼亚·法罕姆（Marynia Farnham）和社会学家费迪南德·龙伯（Ferdinand Lundberg）合著的《现代女性：迷惘的性别》一书的一些段落中看出。以这种方式运用的他的理论，在杂志上和婚姻关系中，被一再引用和阐释，已经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其中绝大部分内容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习以为常的、广为接受的真理的一部分。两位作者将女奴主义跟阳具羡慕等同起来，他们断言：

> 女权主义的政治纲领及其大部分（不是全部）社会纲领，如果从外部观察，还是合理的；然而，就其核心实质而言，不过是一种严重的病症……。今天，女权主义发展的主旨，就是要消除为获得性快感所必须的种种特征：顺从、听话、无所顾虑、毫无怨言地甘当附庸，内心深处准备着去实现性生活的最终目标——怀孕……。
>
> 要想走男人取得成功的道路，并获得成功的自我感觉，这不是女人的机体力所能及的事情。……女权主义者们试图让妇女脱离女性生儿育女的道路，把她们推上男子开拓创新的道路，她们的错误就在这里。……

社会心理学上的规律是这样的：妇女受教育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现程度不同的性生活失调。在同一组妇女中，性生活失调越严重的人，生的小孩就越少……。命运赐予她们麦克白夫人① 迫切要求的那种恩惠；她们不仅在生孩子方面，还在性快感方面，都已经失去了女性的特征。②

弗洛伊德理论的推广者们就是这样把他歧视妇女的传统偏见的核心内容更深地植入到伪科学的基础中去的。弗洛伊德试图在一个单一的事实基础上建立起他的演绎推论的宏大体制，他对自己的这一意图是十分清楚的，这看上去倒不失为是一种想象力丰富、颇有创造力的研究方法。然而，如果那个单一事实的意义被错误地加以解释的话，这种方法就只不过像一柄两边有刃的剑一样，在不同的场合派不同的用场而已。弗洛伊德在1909年写信给荣格③ 说：

你猜测在我故去之后，我的错误可能会像神圣的文物一样受到人们喜爱，你的这个想法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但是我对此并不相信。恰恰相反，我认为我的那些追随者们会把我留待确定的东西很快就全部推翻。④

---

① 麦克白夫人，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主角麦克白的妻子，她野心勃勃，竭力怂恿丈夫将国王杀死，篡夺了王位。——译注。

② 马瑞尼亚·法罕姆、费迪南德·伦德贝格著，《现代妇女：迷惘的性别》（纽约、伦敦，1947年）第142页。——原注

③ 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一译注

④ 欧·琼斯著，前引书，第2卷，第446页。一原注

但是在妇女问题上，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不仅把他的错误弄得更加复杂，还别有用心地把对现实生活中妇女的观察纳入到他的理论框架中去，把他本人留待商讨的问题也说死了。例如，在1944年出版了海伦·多伊奇（Helene Deutch）的权威性著作，两卷本的《女性心理——心理分析阐释》，作者没法将妇女的一切麻烦都一概归咎于阳具羡慕。她所从事的研究，甚至连弗洛伊德都会觉得是不明智的，她不仅在性的范围内，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把“女性特征”跟“消极顺从”等同起来，把“男性特征”跟“积极主动”等同起来。

> 我充分认识到妇女的地位要受到外部事物的影响，我冒昧地说，那种“女性消极顺从”和“男性积极主动”的基本地位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按不同的比例，已经深深地扎根于迄今已知的各种文化和种族之中了。
>
> 经常有妇女对造化赋予她的这一特征拒不接受，尽管她已经受益于这个特征，但她还是要表现出许多种行为方式来，表明她对自己的情况并不十分满意，……这种表现出来的不满意，以及试图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尝试，结果导致形成了妇女的“男性特征情结”。①

按多伊奇博士的说法，这种“男性特征情结”直接产生于“女性阉割情结”。由此看来，女性的身体结构仍然是决定她们命运的因素，女人仍然是“身体器官不完全的人。”

① 海伦·多伊奇著，《女性心理学——心理分析阐释》（纽约，1944年），第1卷，第224页。--原注

当然，多伊奇博士顺带也提到了，“但是，对女孩子来说，环境对她的进取精神和活动能力要产生遏制的影响。”所以，阳具羡慕、有缺陷的女性身体构造以及整个社会，“看来是共同起作用，产生出女性特征。”①

妇女只要最终抛弃她自己的全部人生目标，抛弃她自己的“独创精神”，通过她丈夫或儿子的活动和目标去找到自己的地位，去寻求自己的满足，那么，她就能够具有“正常”的女性特征。这个过程，也可以通过与性无关的方式得到升华，例如，有的妇女从事基础研究是为了她的男主人在事业上有创见。为了父亲而毕生作出奉献的女人也是在使女性特征“理想化”。只有在平等基础上的妇女的活动和独创性，才够得上被不光彩地称之为“男性特征情结”。弗洛伊德的这位富有才华的女性追随者曾明确指出，到1944年时，在美国的妇女，付出了未能追求到女性特征的完美这样的代价，她们正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独创性，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内，通过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声誉和地位。她不提具体的人名，但这些妇女无一例外地都受到“男性特征情结”的困扰。

40年代，那些思想深奥复杂的预言家们一下子倾注出这类共言不祥、暗伏危机的见解，本身就不是心理分析专家的女孩子或者妇女，怎么可能对这些见解持怀疑态度呢？

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被用来为两代受过教育的美国妇女洗脑筋，这是心理分析的阴谋的一部分，这种看法是荒谬的。他的理论被用来为她们洗脑筋，是由那些心怀善意的推

① 同上书，第1卷，第251页。——原注

广者和漫不经心的歪曲者进行的，是由那些自相矛盾的改革信仰者和专赶浪头的追随时尚者进行的，是由那些受困扰的人、为受困扰的人治疗的人以及将困扰转化为利益的人进行的；总而言之，是由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时期美国人民特殊的力量与需求的结合体进行的。实际上，按字面意义将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征的理论纳入美国文化，跟许多美国精神分析专家为使自己在女病人身上观察到的现象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相符合而作出的艰苦努力，形成了一种悲喜剧似的对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只要妇女能够通过精神分析，从她们的“男性奋斗”和“阳具羡慕”中解脱出来，她们就可以作贤妻良母，求得自身的完善。但是，事情并不是像他说的那么容易。韦斯特切斯特县一位精神分析专家坚持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妇女如此难于满足，看来，阳具羡慕是非常难于从她们身上清除掉了。”

纽约一位精神分析专家是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培养出来的最后一批人之一，他告诉我：

我为美国妇女作精神分析，迄今已有20年。在这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处境：我以我自己都不愿意采取的方式，在我的病人的心理生活方面强加上弗洛伊德关于女性特征的理论。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阳具羡慕根本就不存在。我亲眼见过若干妇女，她们在性感方面，在女性生殖器方面，能都充分表达她们的感情，但是她们并不成熟，并不完美。我曾遇到过一个女病人，她经常来看病差不多过了两年，我才找到了她的症结所在——她不满足于只是当个主妇和母

亲。有一天她做了一个梦，梦见她正在给学生上课。我不能够把这位主妇梦中强烈的愿望解释成阳具羡慕而加以排遣。这是她追求成熟的自我完善的表现。于是我告诉她："我没法为你分析这个梦，你应当为此作出自己的努力。"

正是这位专家在一所名牌大学里为研究生开设的诊疗课上，教导年轻一代的精神分析工作者说："如果病人的情况跟书上讲的不相符合，就把书本扔开，好好听病人讲述。"

但是，许多精神分析专家并没有把书本扔开，却把书本扔给了他们的病人，甚至在那些从来没有找过精神分析专家治疗，只对自己读过或听过的东西有所了解的妇女中间，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成了广为承认的事实。美国妇女日趋严重的沮丧和失望，或许不是出于女子性方面的问题，时至今日，这一点还没有深入到民众的意识中去。有些精神分析专家为了适应病人的情况，将弗洛伊德的理论作了重大修改，甚至将他的理论完全废弃，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然而，这样的事实却从来没有真正深入到民众的意识中去。40年代末，弗洛伊德的理论迅速而完整地被人们接受了，那以后10多年，受过教育而又重返家庭的美国妇女成了社会上人数众多的一类人，可是居然没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因为某些地方明显出了差错，而最终需要提出疑问时，这些疑问也完全是在弗洛伊德理论的框架之内提出来的，所以，其答案只可能有一个：对妇女来说，受教育、争取自由和权利是错误的。

在美国，人们不加批判地接受弗洛伊德的学说，其原因（至少是部分原因）是：就客观现实提出的一些令人不快的

问题，人们可以从他的学说中找到某种慰藉。

战后，大萧条时期之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已经不仅局限于是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了，它成了为受困扰受折磨的人提供的一种治疗方法。它成了一种美国式的无所不包的思想，一种新的宗教。在美国，对许多人来说，无论是上帝，还是旗帜，或者存款，都不再使他们感到满足了，他们一想到要为私刑处死，为集中营，为印度和美洲饿死的儿童承担责任就感到厌烦；弗洛伊德的学说正好填补了这些人思想上和人生目的上的空白。人们要想逃避原子弹，逃避麦卡锡[1]，逃避可能败坏牛排味道，损坏汽车、彩色电视和家用游泳池等的各种麻烦问题，弗洛伊德的学说提供了一条十分方便的途经。他的学说允许我们回避关于这个发展中的世界的令人烦恼的各种问题，而去追求我们个人的享乐。这种新的心理宗教把性活动变成了一种美德，消除了由个人不道德产生的一切罪恶，对人类精神思想的崇高境界大加怀疑。如果这种新的心理宗教对妇女个人产生了比男子强烈的毁灭性的后果，应该说没有一个人的本意是要这样做。

过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心理学一直因为自已科学性不强，为自卑情结所困扰，一直摆脱不掉小巧整洁的实验室设备，就是这些设备使人产生幻想，以为可以把人类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简化为迷宫中的老鼠那种可以测定的简单行为；然而，现在心理学已经变成了一种新生的运动，正横扫贫瘠的美国思想界。弗洛伊德就是其精神领袖，他的理论

---

① 麦卡锡（1908—57），美国共和党参议员，50年代初制造反共歇斯底里，迫害进步人士。——译注

就是圣经。当时，这一切是多么真实、多么重要，多么令人兴奋激动啊！他的理论自有其迷人之处，作为其中一部份，那神秘的复杂性，又使美国人感到厌烦。但是，如果他的理论中有些部分总是使人感到十分神秘、莫测高深，谁又愿意承认自己理解不了呢？弗洛伊德派、荣格[①]派和阿德勒[②]派的心理分析专家从维也纳，从柏林纷纷逃到美国，随着美国人中间成倍增多的神经病人和成倍增加的美元开销，心理分析的各种新流派应运而生、兴旺繁荣，于是美国就成了精神分析运动的中心。

但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精神分析的实践不能为女性的奥秘承担起基本的责任。应当承担这个责任的，是那些在大众媒介中摇唇鼓舌的作家编辑们，是那些从事广告心理学的研究人员，是他们后面那些在大学里工作的，弗洛伊德思想的推广者、阐释者们。弗洛伊德理论和伪弗洛伊德理论像细微的火山灰，到处洒落、覆盖。社会学、人类学、甚至历史研究和文学，都无一例外地被弗洛伊德的思想渗透，在他的思想影响下变形。女性奥秘的最富有热情的传教士就是功

---

① 荣格（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曾与弗洛伊德合作5年（1907—1912）。尔后，他反对弗洛伊德坚持以性欲为神经症病因的主张，遂中止合作关系。他主张按态度将人分成外倾型与内倾型两类，将人的心理功能区分成思维、情感、感觉与直觉4种，1916年与A·梅德合作，在苏黎世创立新学派，提倡分析心理学。——译注

② 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从1902年起跟弗洛伊德合作过几年，后观点分歧，他反对弗氏“儿童早期的性冲突引起精神病”的观点，1911年建立个体心理学体系，认为人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影响其全部心理过程。——译注

能主义者，她们饥不择食地把经过简化的弗洛伊德理论接过来，去开创她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教育”的新机构。关于婚姻的功能主义课程教导美国的女大学生们如何才能起到一个女人的“作用”——旧的作用倒成了一门新科学。大学校园外的种种有关运动，诸如父母教育、小孩研究小组、孕期母性研究小组、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等，将新的心理学的超我传遍全国各地，取代了桥牌、纸牌之类受过教育的年轻妻子的娱乐活动。而这种弗洛伊德式的超我，却对易受外界影响的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女性，起到了自己的作用，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超我的作用就在于使历史永存。

> 人类从来就不是完全生活在现实之中，超我的思想使历史永存、使民族和人民的传统永存，历史和传统会逐渐让位于现实的影响和日新月异的发展；但要，只要通过超我，历史和传统就可以完全不受经济状况的干扰，在人类的生活中起到重要的作用。①

被弗洛伊德的理论捧成了科学宗教的女性奥秘，为妇女们定下了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对生活大加限制、对未来不置一顾的基调。那些在玩垒球、替人照看婴孩、攻读几何学等中成长起来的姑娘们本来有足够的自主精神和足够的能力去应付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发生的种种问题，但我们时代最先进的思想家们却告诫她们应当回到家里去生活，像娜拉那

---

① 弗洛伊德著，“心理个性解析”，见《精神分析新论讲演集》第96页。——原注

样，被维多利亚时代的偏见禁锢在玩偶之家里。今天，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都享有科学的权威，正是这些姑娘对科学权威的尊重和敬畏，使她们始终不敢对女性奥秘提出任何质疑。

功能的冻结，女性的抗议和玛格丽特·米德[1]

在美国，社会科学没有摧毁限制妇女生活的旧偏见，而仅仅赋予了它们新的权威。一种奇怪的循环过程，使本来应该成为妇女解放强有力武器的心理学、人类学及社会学的深刻见解不知怎么地却互相抵销，使妇女陷入了死胡同。

过去20年里，在弗洛伊德思想迅速扩展的影响下，精神分析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以及其他工作者在许多大学研究中心的

[1] 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美国女人类学家，她在心理学和文化如性行为的文化制约，天性以及文化变化等方面的研究上成绩卓著。——译注

专业性讨论会上和由基金会资助的各种会议上聚首一堂。学科的交叉影响似乎使这些学科都蓬勃发展起来，然而也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混血儿”。比如，精神分析学家开始以一种从人类学借来的观点来重新解释诸如“口唇期”和“肛门期”人格这样一些弗洛伊德的观念，他们认为文化进程在弗洛伊德时代的维也纳肯定发挥过作用；人类学家则到南太平洋群岛去，根据原义的“口唇期”和“肛门期”表格用图表说明土著部落的人格特征。以“人种学野外考察工作者的心理暗示”为武器，人类学家常常发现他们所寻求的东西。玛格丽特·米德和其他在文化与人格领域充当先锋的人不是把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文化偏见转化、筛除掉，而是通过使他们自己的人类学观察资料适用于弗洛伊德的陈规从而使之错上加错。然而，如果它不曾同时脱离美国社会科学家所谓的功能主义的常轨，这一切中没有哪一点可能对妇女问题产生同样的冻结效果。

功能主义主要集中在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之中，而在家庭一生活教育的应用领域达到其极点，它从生物学那里借用了机制①分析的思想，根据机制在社会机体中的“结构”和“功能”，把社会机制看作是肌肉或骨骼，试图着手使社会科学更加“科学化”。社会科学家们打算仅仅通过研究一种机制在其自己社会内的功能来防止不科学的价值判断。在实践中，功能主义与其说是一场科学运动不如说是一场文字游戏。“功能是”常常被解释为“功能应该是”；社会科学家对他们自己在功能主义伪装下的偏见的认识并不比精神分析学家

① 机制（institution），在社会学中常称为建制。——译注

对他们自己在弗洛伊德的伪装下的偏见的认识更多一些。功能主义通过赋予那个普通术语“妇女的作用”以一种绝对的意义和一种貌似神圣的价值观念，把美国妇女置于一种深度冷冻的状况之中——如同睡美人一样，等待富于魅力的王子去唤醒她们，而世界却在那神奇的圆环之外向前发展。

以功能主义的名义在美国妇女周围画上这种欺骗性紧箍的社会科学家们（无论男女），似乎也持有一种我要称为“女性的抗议”的态度。如果存在男性的抗议那样的事情——这种精神分析观念被功能主义者接了过来用以描绘忌妒男子同时想成为男子，从而否认她们是妇女，并且变得比任何男子都更加男性化的妇女——那么，今天在由男子也罢，妇女也罢，组成的女性的抗议中能够看到与它相对应的东西，这些男子和妇女否认妇女的真实面目，而且在否认“作为一位妇女”方面比过去任何时候走得更远。最直截了当地讲，女性的抗议只不过是保护妇女免遭在接受与男子真正平等之中潜在危险的一种方式。但是，为什么带有上帝般操纵一切的优越感的社会科学家要把保护妇女免受成长起来的痛苦这一担子放在他（或她）本人身上呢？

保护性常常把向妇女关门的声音压抑了；它常常遮盖了货真价实的偏见，即使它是以科学的名义提出来的。诺拉正在学习微积分，因为她想成为物理学家，如果她的祖父皱起眉头对她咕哝：“女人的位置是在家中，”诺拉会不耐烦地笑道，“爷爷，这是1963年。”但是，当文雅的、抽着烟斗的社会学教授，或玛格丽特·米德的书，或关于女性的权威性两卷本参考书告诉她同样的内容时，她就不会笑了。功能主义的复杂而神秘的语言，弗洛伊德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使

她看不到这个事实：他们所讲的这一点并不比爷爷讲的更有根据。

同样，我们的诺拉会嘲笑维多利亚女王写于1870年的信，"女王十分急于争取每一个能说会写的人共同去阻止'女权'这样疯狂而邪恶的蠢事连同伴随它的一切恐惧，她可怜而软弱的同性们专注于此，忘记了适合于女子的感情和礼貌的每一种意识……。这个问题使女王如此愤怒以至她不能自制。上帝造出了男女不同的人，然后让他们各自保持自己的地位。"

然而她不会嘲笑她在《现代人的婚姻》中读到的内容：

> 两性是互为补充的。这就像我的手表中使指针运动并使我能够知道时间的机件。因此，机件就比表壳更重要吗？……两者并无高低之分。每一方必须根据它自己的功能来判断。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功能整体。这也是男子和妇女的情况——他们一起构成了一种功能整体。在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单独一方都是不完整的。他们是互为补充的……。当男子和妇女从事同样的职业或发挥相同的功能时，这种互补关系就崩溃了。

这本书出版于1942年。在过去20年里女孩子们是把它作为大学课本来学习的。在社会学、或"婚姻与家庭生活"、或"生活适应"的幌子下，此书向女孩子们提供了这样一类建议：

---

① 亨利·A·鲍曼：《现代人的婚姻》，纽约1942年版，第21页。——原注

然而，事实一直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之中，在一个存在着昔日巨掌的现在与最近未来的世界之中，在一个传统仍然居支配地位而且习俗比理论家有着更大影响的世界之中……在一个大多数男子和妇女都确实结婚并且大多数已婚妇女都操持家务的世界之中。谈论如果传统与习俗发生急剧变化则可能产生什么情况或者到2000年会发生什么情况，这可能成为有趣的智力游戏，但是它无助于今日的年轻人在适应生活中必然遭遇的情况或者把他们的婚姻提高到令人满意的更高水平。①

当然，这种“适应生活中必然遭遇的情况”否认了生活条件目前正在变化的速度，同时也否认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在20岁时如此适应生活的女孩子到2000年仍将活在世上。这位功能主义者警告除了“适应”那些现存的男女差异外，不可采用任何方法解决男女之间的差异。而且，如果一位妇女像诺拉一样考虑事业问题，他就会晃动手指，发出警告：

大批年轻的美国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面临着这些问题：我将自愿从事一种终生独身的事业吗？或我将从事一种临时的职业，一旦结婚就会放弃它，并且承担起操持家务和母亲的责任吗？或我应该试图去把操持家务和某种职业结合起来吗？……大多数已婚妇女都是家庭主妇。……

① 鲍曼著，前引书，第22页。——原注

如果一位妇女通过一种职业而不是通过婚姻能够找到适当的自我表现方式，那当然好。然而，许多年轻妇女忽视了这个事实：有许多职业并不为自我表现提供媒介或机会。此外，她们并未认识到只有少数妇女，正如只有少数男子，才具有特别值得表现的东西。①

于是，给诺拉留下了这种愉快的印象：如果她选择一种职业，她也就是在选择独身生活。如果她对把婚姻和职业结合起来抱有任何幻想，这位功能主义者就会告诫她：

有多少人能够同时成功地从事两种职业呢？不多。只有非同寻常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普通人则做不到。把婚姻和操持家务与另一种职业结合起来尤其困难，因为很可能这两种职业会要求不同类型的品质。要成功地作到前者，就需要自我否定；要作到后者，则需要如痴如醉的献身精神。前者需要合作；后者需要竞争……夫妻互相补足获得幸福的机会较之夫妻功能重复时要大得多……②

而且，只要诺拉对放弃她的职业抱负产生任何怀疑，她就会得到如下这种令人安慰的合理解释：

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必须懂得一些教育学、室内装

① 鲍曼著，前引书，第62页。——原注

② 鲍曼著，前引书，第74页—78页。—原注

饰、烹调、营养学、消费、心理学、生理学、社交、社区娱乐、服装、家用器具、住房建筑、卫生学以及许多其它东西。……她是一位广泛的实践者而不是一位专家。……

决定要把操持家务作为职业的年轻妇女没有必要感到低人一等。……正如一些人所做的那样，有人会说，"男人能干事业是因为妇女在理家。"有人会讲：妇女不必去挣钱并且自由地把时间专用于操持家务这项极为重要的事情，是因为男人专门挣钱养家。或者有人会讲，养家活口的人和持家的妇女一起形成了一种首屈一指的互为补充的结合。①

这本婚姻教科书不是这个学派中最深奥的一本。它过于通俗易懂，因而几乎看不到其功能主义的观点。此书也没有以一系列真正科学的事实为基础。（很难讲"这就是现状，因此这就是应该的情况"这句话是科学的。）但是，由于功能主义在这一时期渗透到了美国全部的社会学中，这说的还是功能主义的要点，而不论这位社会学家是否称他自己为"功能主义者"。在永远不会降低到开设所谓功能主义的家庭课程的"作用发挥课"的大学中，年轻妇女被指定去读塔尔科特·帕森斯②权威性的"美国社会结构中性别作用分析"，此文认为对于一位妇女来说，"除了家庭主妇"的作用外没

① 鲍曼著，前引书，第66页，——原注

② 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结构功能主义的创始人——译注

有别的选择，这种作用程度不等地强调“献身家庭生活”，“魅力”和“良好的夫妻关系”等内容。

如果一个成年男子不能以一种体面的职业“挣钱谋生”，他要做到真正自尊并且受到别人的尊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说法或许并不过分。……至于女性的作用，情况则大不一样了。……女子的主要身分是她丈夫的妻子，她的孩子的母亲……①

帕森斯，这位受到高度尊重的社会学家和主要的功能主义理论家，深刻而准确地描绘了在这种“性别作用的分离”中紧张状况的来源。他指出家庭主妇作用的“家庭”方面在重要性上“已降低到这种程度——对于一个生气勃勃的人它根本达不到专职工作那样的程度”：“魅力方式”“不可避免地与较年轻的年龄相联系”，从而“严重的紧张状况产生于对日益增长的年龄的适应问题”，“良好夫妻关系”的方式——包括对艺术和公共福利的“人文主义的”教养——缺乏一种充分建制化的地位。……只有那些最具有主动性和最聪明的人才在这个方面达到了令人满意的适应。他陈述道：“十分清楚，在成年女性的作用中有一种严重的紧张状况和不安全感，因而广泛的表现势必将以神经病行为的形式出现。”但是帕森斯警告说：

---

① 塔尔科特·帕森斯著，“美国社会结构中的年龄和性别”，《社会学理论文集》，伊利诺斯，格伦科1949年版，第223页。——原注

> 当然，对于成年妇女这样的情况是可能的：即仿效男性的模式，在职业成就的领域中寻求一种事业，同她自己阶层中的男子进行直接竞争。然而，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妇女从传统家庭模式中解放自己这方面已有了巨大进步，但仍然只有很小一部分妇女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很大进展。同样清楚的是：随着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它的普遍化才有可能出现。

男女之间的真正平等不会是“功能主义的”；只有妻子和母亲专门操持家务，或者，至多有一项“工作”，而不是会使她与她丈夫地位平等的一种“事业”，现状才可能得以维持。这样，帕森斯从保持社会结构现状出发，认为性别分离是“功能主义的”，这似乎成了功能主义者主要关心的问题。

> 机会的绝对平等显然与家庭中任何确有助益的团结相左……在已婚妇女受雇于家庭之外的情况中，绝大多数人从事的职业都不是与男子的地位直接竞争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妇女对那些职业的兴趣和判断标准更多地倾向于个人点缀。……有人提出：这种区别在功能上与在我们的阶级结构中保持家庭团结有关。①

甚至著名的女社会学家米拉·科马罗夫斯基——她对于

---

① 塔尔科特·帕森斯著，“社会分层理论的一种分析方法”，前引书，第174页。——原注

女孩子如何学会在社会中“发挥妇女的作用”这一功能主义的分析确实十分精辟——也不能完全逃脱功能主义强加的僵化模式：适应现状。一个人为了缩小对一个特定社会制度里一个建制的功能进行调查的领域，没有别的选择可以考虑，只得对那个制度的一切不平等现象提供无数合理的说明。在那种社会制度中，社会科学工作者把他们自己的功能误作为一种帮助个人“适应”他的“角色”的功能就毫不奇怪了。

> 一种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够发挥功能，只是因为绝大多数人以某种方式使他们自己适应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并发挥了期望他们发挥的功能。……在抚育男性与女性中的差异明显地与他们在成年生活中各自的作用相关；未来的家庭主妇为在家庭内的作用受到培养，而男孩子则通过得到家庭之外更多的独立性，通过“为别人送报或暑期短工为他将来的作用作准备。家庭供养者将从独立性、支配权、进取心和竞争性中获益。①

正如这位社会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对女孩子的“传统教养”的危险在于：在培养女孩子作为妻子的作用中的“独立性，内在才能，以及生活将要求她自作主张的那种程度”等问题上，这种教养可能会失败。下面就是功能主义的警告：

> 即使父母中一方正确地〔原文如此〕认为

① 米拉·科马罗夫斯基著，《现代世界中的妇女，她们的教育与困境》波士顿1953年版，第52—第61页——原注

女性作用的某些常规特征是毫无价值的，他也为女孩子带来了使她远离她那个时代公认道德观念的危险。……父母们必须采取措施以使他们的女儿们作好准备去迎接经济上的紧迫要求和现代生活中家庭的责任——正是这些措施会唤醒或发展与女性作用（这些作用是按照今天的定义）的某些特征相冲突的抱负和习性。受过大学教育的家庭主妇在文化上对她的家庭和社区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是这种教育会发展她受到家务的其它方面阻碍的兴趣。……我们冒着唤醒再次与妇女的现今定义背道而驰的兴趣和能力的风险。①

她进一步引用了曾想成为社会学家的一位姑娘的近例。这位姑娘与一个不想要他的妻子去工作的美国兵订了婚。于是，她自己也就希望她在社会学方面不会找到好工作。

她觉得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工作会使她更容易最后服从于她未来丈夫的愿望。尽管国家需要训练有素的工作者，她自己的未来、目前的兴趣尚未确定，她还是选取了一项日常工作。只有未来才能告诉她，她的决定是否精明。如果她的未婚夫从前线回来，如果他们结了婚，如果他不须她的帮助就能供养家庭，如果她受到阻碍的愿望没有重新出现，那么她就不会为她的决定而感到懊悔。……

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适应力最好的女孩子可能是

① 科马罗夫斯基著，前引书，第66页。——原注

> 这样的女子：她聪明得足以学好功课，但又不是才华横溢，各门功课全优……具有才干但并不是在对妇女相对新的领域中，完全能够自立生活，但她的生活并非好得到了同男子竞争的程度；能够干好某种工作（假设她没有结婚，否则就必须工作），但这种工作并不等同于为了她的幸福所需要的职业。①

因此，尽管美国妇女的继续幼稚化有着无意地使"女孩子从女儿的角色向配偶的角色的过渡更加困难"的后果，她还是以适应女性的文化定义的名义——对此这位卓越的社会科学家本人也明显地不相信（那个词"正确地"泄露了这一点）——最终在实质上赞同继续使美国妇女处于幼稚阶段。

> 实质上，有人认为，妇女处于更加"幼稚"的阶段，更无能力作出自己的决定，更加依靠父母的一方或双方来引导其行为和看法，更紧密地依附于他们，因此发现很难离开他们，或很难面对他们的反对意见……或者显示出其它缺乏感情解放的迹象——到了这样的程度，她就会发现她比男子更难于符合基本忠于她以后建立的家庭的这个教养标准。当然，可能产生这样的情况，较大的父母保护作用的唯一影响是要在妇女身上产生普遍的依附性，这种依附性以后会转移至丈夫，并且将能使她更

① 科马罗夫斯基著，前引书，第72，第74页。——原注

容易地在一个仍然具有许多家长制特点的家庭中充当妻子的角色。

她在一系列研究中找到了证据，这些证据表明，实际上，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幼稚，更依附于父母，并且经过学习和独立生活之后却不能像男孩子那样成熟起来。但是她在20本精神病学的教科书中也找不到证据表明，相应地，对于妻子的父母比丈夫的父母有着更多的姻亲方面的问题。很明显，只有依据那样的证据，功能主义者才能对美国姑娘的有意幼稚化颇为惬意地提出疑问。

对于美国的社会学家，功能主义是一条容易的出路。毫无疑问，他们当时是在“按事物过去的状况”描述事物，不过通过这样做，他们被免除了把理论建立在事实之上和探寻更深刻的真理的责任。他们也免除了系统地提出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争议的问题和答案的需要（有一段时间在学术界，正如在整个美国，争议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假设了一种无穷无尽的现在，并把他们的推理放在否认一种与过去不同的未来的可能性的基础之上。当然，只要未来不发生变化，他们的推理就是成立的。正如C·P·斯诺⑤指出，科学和科学家是关心未来的。社会科学家在功能主义的旗帜下却如此僵化地只关心现在以至于否认了未来；他们的理论增强了过去的偏见，从而实际上阻碍了变化的产生。

---

① 米拉·科马罗夫斯基著，“对性别作用的功能分析”《美国社会学评论》，1950年8月号。——原注

⑤ C·P·斯诺（1905—1980），英国小说家。——译注

社会科学家们自己最近得出结论：功能主义相当"令人烦恼"，因为它实际上并未说出什么东西来。正如金斯利·戴维斯[1]在1959年美国社会学学会上作的大会主席发言所指出的（发言的题目是"作为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一种特殊方法的功能主义分析的神话"）：

> 30多年来"功能主义分析法"在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之间一直有着争议。……无论它在过去有着多么大的战略意义，现在它对科学的发展成为了一种阻碍而不是促进的因素。……功能主义不能处理社会变化问题，是因为它假定了一个整体和谐静态的社会——这样的说法按定义是真实的。……

很不幸，功能主义分析的女性对象深刻地受到了它的影响。在一个对妇女来说，是伟大变革的时代，在一个教育、科学和本来应该帮助妇女度过这种变革的时代，功能主义把对于妇女的"现在是"或"过去是"改变为"应该是"了。那些从事女性抗议并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热衷于妇女角色这个问题的人，以功能主义的名义或者为了无论多么复杂的个人的或理性的理由，把未来之门对妇女关上了。功能主义者并未完全接受弗洛伊德"解剖学就是命运"的论点，但是他们全心全意地接受了对妇女的一个同样的限制性定义：妇女就是社会所说的那样的妇女。而大多数功能主义的人类学家研究了种种社会，在这些社会中妇女的命运就是按解剖学来

---

① 金斯利·戴维斯（1908— ），美国社会学家。——译注

下定义的。

从功能主义和女性抗议两方面来说，对现代妇女影响最大的是玛格丽特·米德。她关于文化和人格的著作——一本又一本的书，一份又一份的研究报告——对我这一代，我前面一代及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的妇女有着深刻的影响。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美国女思想家的象征。在1928年出版《萨摩亚人的成年》和她最近在《纽约时报杂志》或《红皮书》上发表关于美国妇女问题的文章这30多年间，她共写了上千万字的著作。在大学课堂里，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及婚姻与家庭生活等课程的姑娘们在学习她的著作；在研究生院，那些将来有一天会教姑娘们和为妇女提供指导意见的人在学习她的著作；在医学院，未来的儿科和精神病医生在学习她的著作；甚至在神学院里，进步的年轻牧师也在学习她的著作。而且各种年龄的姑娘和妇女都在妇女杂志和各种星期日增刊上阅读她的文章，她在那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如同在学术刊物上一样容易。玛格丽特·米德就是她自己最好的普及者——几乎在美国思想的每一层次都能感受到她的影响。

但是她的影响对于妇女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奥秘从当时的任何一个思想家那里取得它所需要的东西。女性的奥秘则可能从玛格丽特·米德对无数种类性别模式和人性的巨大可塑性的看法中取得了它所需要的东西，而这种看法是以她在三个原始社会中发现的性生活和气质的种种区别为基础的。在阿拉佩什人中，男子和女子在性格上都是“女性的”和“母性的”，而且在性生活上都是被动的，因为双方都被培养成具有对别人的需求采取合作，积极响应而又不过分的态度；在蒙杜古马人中，丈夫和妻子都脾气暴烈，敢作

敢为，在性生活上积极主动，“具有男子气概”；在昌布利人中，女子是主要的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管理伙伴，而男子所负的责任较小并在感情上依附于女子。

> 如果那些我们在传统上视为女性的气质性情——诸如被动性，善于配合，以及乐意抚育孩子——能如此容易地在一个部落树立为男性的模式，而在另一个部落对大多数妇女以及大多数男子宣告失败，那么我们就不再有任何基础来看待那些与性别有联系的行为。……这份材料表明我们可以说：许多（如果不是全部）我们称为男性或女性的性格特征与性别，正如同在某一特定时期里一个社会划归任一性别的服装，举止及头饰的形式一样，几乎没有什么联系。①

根据这样的人类学观察资料，米德可以把一种真正革命的观点传给大众文化，这个观点就是妇女终于自由地认识到了她们在一个社会中丰富的才能，这个社会以对个人真正才能的承认取代了随意的性别上的定义，因为这些真正才能可以出现在任何一种性别的人中。米德不止一次地谈到这样一个看法：

> 在写作被作为一种完全适于任一性别的职业的地方，具有写作能力的个人不必因他们的性别而受到阻

① 玛格丽特·米德著，《三个原始社会中的性生活和气质》，纽约1935年版，第279页。——原注

碍，如果他们确实从事写作，他们也不必怀疑自己本质上的男性或女性……在此我们能够发现建设一个社会的总体方案，这个社会会以真正的区别来取代任意的区别。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性别和种族的表面分类下存在着未能发挥的相同潜力（一代又一代出现着相同的情况），没有发挥只是因为社会没有它们的位置。

正如现在社会允许任一性别的成员去实践一门技艺，它也允许每一性别中许多在气质上形成对比的天赋得到发展。它会放弃让男子打架，让女孩子保持被动状况，或让所有孩子打架的各种尝试。……没有一个孩子会不懈地去形成一种行为模式，相反在一个世界上应该有多种模式，这个世界懂得要允许每一个人有与他的天赋最相宜的模式。①

但是，这并不是女性奥秘从玛格丽特·米德那里得到的观点；这也不是她继续提供的观点。在她自己的书中，其解释逐步模糊不清，以难以察觉的方式转变成对发挥女性作用的妇女的美化，这种女性作用是按她们的性生理功能限定的。有时米德似乎失去了她自己对人的性格的可塑性的人类学意识，而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性生理决定一切，解剖学决定命运——来看待人类学的材料。有时她似乎根据功能主义的术语辩解说：虽然妇女的潜力正如人的无限潜力一样既硕大又多样，最好还是保留由一种文化建立的性生理的种

---

① 玛格丽特·米德著，《来自南太平洋》，纽约1930年版，第321页。——原注

种限制。有时她在同一页中谈论两种情况，甚至还发出一声警告，警告在力图认识她的社会规定为男性的一种人的潜力时，注意妇女所面临的危险。

两性之间的区别是重要条件之一，依据这些条件我们建立了赋予人以尊严和地位的多种多样的人类文化。……有时一种平等能指派给一种性别，有时又给另一种性别。有时是男孩子被认为是太脆弱而需要特别照顾，有时又是女孩子。……一些人认为妇女太软弱，不适于户外工作，另一些人则把妇女视为沉重負担的合适承受者，“因为她们的头脑比男子的头脑坚强，”……一些宗教，包括我们欧洲的传说宗教，在宗教的等级制度中把下等的作用指派给妇女，其它宗教则把它们与超自然世界的整个象征关系建立在男性对妇女自然功能的模仿之上。……无论我们处理琐碎的事情或重大的事情，装饰打扮的细小事情或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样神圣的问题，我们都发现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常常一种方式与另一种方式直接矛盾，两性的作用就仿照了这些方式。

但是我们经常发现这种模仿。我们知道没有一种文化清楚明确地说过：男女除了在产生下一代的方式上有所区别以外，他们之间并无差异；另外，在一切方面他们都只不过是具有不同天赋的人，没有一种天赋能为一种性别所专有。

难道我们不正是在处理一种必须做的事情吗？我们不敢轻视这种必须做的事情，因为它在我们的哺乳动物本性中扎根得如此之深，以致于轻视它就意味着个人和

社会的不健全。或者说，虽然它的根扎得并没有那么深，但它在社会中是如此便利和如此可靠，以致于轻视它会是不经济的——例如，这种必须做的事情说道：如果我们以很大的区别仿效两性的行为，以对比的方式教育子女的行为举止，衣着打扮，并教育他们专长于不同种类的工作，那么生育和抚养孩子就会容易得多。①

我们还必须问，性差异的潜力是什么？……如果小男孩不得不了解到一个确凿无疑，不可更改的事实，即他们永远不能生产婴儿是因为那是妇女生来就有的权利，从而受到了早年的冲击，那么这一点怎么能够使他们具有更富于创造性的雄心以及更依靠于成就呢？如果小女孩有一种生长节奏，这种节奏意味着：在她们看来，她们的性别一开始就显得不及她们的兄弟那样可靠，从而给了她们一下虚假的轻击，促使她们朝报偿性的成就努力，而这种成就几乎又总是在她们确实成为母亲之前就逐渐消失了，那么这可能的确是意味着对她们的雄心壮志的一种限制吗？但是还有什么积极的潜力可言呢？②

在这些摘自《男性和女性》——一部成了女性奥秘的基石的书——的段落中，即使玛格丽特·米德用“如果”这个字眼，谨慎地为每一段明显科学事实的陈述加上序言，她还是暴露了她那弗洛伊德式的倾向。不过那是一意义深刻的“如果”。因为当性差异成了你研究文化和人格的基础，当

① 玛格丽特·米德著，《男性和女性》，纽约1955年版，第16页，第18页。——原注

② 米德著，前引书，第26页。——原注

你假定性的特性是人的人格的驱动力（你取自弗洛伊德的一种假设），而且，作为一位人类学家，当你知道除了那些涉及生育行为的性区别外，没有对于每种文化都真实的性差异，你会不可避免地给以那个词（“如果”）一种生物上的区别，在生育作用上的区别，这个区别在决定妇女人格的问题上有着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玛格丽特·米德并未掩盖这个事实，1931年之后，以身体各区域为基础的弗洛伊德的法规成了她去进行人类学野外调查时所带装备的一部分。①这样她开始把“一种文明的上层建筑所依赖的，生活中的那些肯定的、创造性的和生产性的诸方面”与阴茎等同起来，并根据子宫的“被动接受性”来解释女性的创造力。

> 在讨论男女问题时，我要关心的是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生育作用上的区别，出于为了在使种族延续永存上的互补作用而形成的身体不同之外，在功能、能力的感性和脆弱性上还出现了什么差异呢？男子所能做的事情是如何同这样的事实——他们的生育作用在单一的行动中完结了——联系起来的？妇女所能做的事情又是如何同那样的事实——她们的生育作用需要九个月的妊娠期并直到以后许多个月的哺乳期——联系起来的？每一种性别作为它本身被人看到的情况，而不是作为对另一方的单纯不完美的形式，它的贡献是什么？
>
> 生活在现代世界，穿着衣服，包着头巾，我们被迫

① 米德著，前引书，脚注，第287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用关系甚远的象征如手杖、伞和手提包等来表现对身体的感觉，这就容易失去对人体轮廓的直接看法。但是当一个人生活在原始民族中间，那儿妇女只穿一对小草围裙而且为了互相羞辱，甚至这种东西也可能扔掉，或者成群同浴，而男子仅仅系一根捶平的G形树皮带……婴幼儿则一丝不挂，在身体之间进行的基本交流……就变得非常真实。在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现在发明了一种治疗方法，这种方法根据神经病患者的回忆或精神病患者无拘无束的幻想，能够费力地推断出人体及它的各进口和出口最初是怎样使个人逐步形成了世界观。①

事实上，对于观察萨摩亚人、马努斯人、蒙杜古马人、昌布利人、雅特穆尔人、及巴厘人的文化和性格，“解剖学就是命运”这个透镜似乎特别正确；之所以正确或许是因为对于19世纪末的维也纳或20世纪的美国，它在那种系统的阐述中从来就不正确。

在南太平洋群岛的各种原始文明中，当玛格丽特·米德最初探索它们时，解剖学仍然就是命运。弗洛伊德提出的身体的原始本能决定成年人人格的理论能够在那里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明。在更先进的文明中，本能和环境日益受到人类头脑的控制和改造，这些文明的复杂目标并未形成每一个人生命的不可倒置的子宫。把男女之间的生物性区别看成是那些赤身裸体的原始民族生活中的基本力量当然要容易得多。但是只要你的眼睛戴上弗洛伊德的眼镜到那样一个岛上去，出

① 米德著，前引书，第50页及其后数页。——原注

发前就接受某些不虔诚的人类学家所称为卫生纸式的历史理论（the toilet-paper theory of history），你就会从对原始文明中赤身裸体（无论男女）的作用的观察中为现代妇女吸取教训，即：在一种复杂的现代文明中，赤裸的身体能够以同样的方式确定人的，生命的进程和人格。

今天人类学家不大倾向于把原始文明看成是观察我们自己文明的一个实验室，一个所有不相关问题已被去掉了的尺度样板；文明并非是那样地互不相关。

因为在南太平洋的原始部落和现代城市里，人体都是相同的，以心理学理论——这种理论把人类的人格和文明降低到身体的比拟——为开端的人类学家，可以以劝告现代妇女同南太平洋的妇女一样依靠她们的身体来生活而结束。困难在于玛格丽特·米德不能再创造一个南太平洋世界供我们在其中生活，在那个世界里生小孩是人类成就的顶点。（如果生育是人类生活主要和唯一的事实，岂不是今天所有的男子都会受到“子宫羡慕”的折磨吗？）

在巴厘岛，两三岁的小女孩大多数时间都有意地挺着小小的肚子走路，当她们走过时，年龄较大的妇女则开玩笑地拍她们的肚子，并逗弄说：“怀孕了。”因而那小女孩了解到，虽然她自己的性别成员资格的特征并不明显，她的乳房只像小钮扣，并不比她兄弟的胸部大，她的生殖器只是简单不显著的褶皱，但是有朝一日她会怀孕，她会生小孩。总的来讲，生小孩是呈现在那些孩子眼前最令人兴奋和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那些孩子生活在简单的世界中，其中一些地方最大的建筑只有15

英尺高，最大的船不过约20英尺长。而且，那小女孩还了解到，她将来会生小孩并不是因为她身体健壮，或精力充沛，或具有创造精神，也不是因为她不断地工作、斗争和尝试，最终获得了成功，而只是因为她是一个女孩而不是男孩，女孩会长成妇女，而且最后——如果她们保护好自己的女性特征——会生小孩。①

对于一位生活20世纪之中，在一个领域里进行竞争的美国妇女，这个领域要求创造精神、精力充沛和不懈的工作而且在这个领域里男子怨恨女子的成功；对于一位竞争的意志和能力都比玛格丽特·米德差的妇女，米德描绘的那个南太平洋世界的幻象是多么诱人呀，在那里一位妇女取得成功并受到男子的羡慕仅仅因为她是妇女。

根据西方文化对生命的观点，女人是用男子的肋骨做成的，至多只能不成功地尽力去模仿男子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级的职业。然而，创始崇拜（initiatory cult）的基本主题是：妇女凭借她们生育男子的能力掌握了生命的秘密。男子的作用是不能断定的，不明确的，而且或许是不必要的。经过巨大的努力，男子为他在根本上低女人一等找到了补偿的方法：装备上各式各样神秘的发出噪音的乐器，乐器的能力依靠其实际形状，这是那些听到声音的人闻所未闻的，即，妇女和儿童从不知道它们就是真正的竹笛，或空心圆木……男子就能从妇女

① 米德著，前引书，第72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那里把男性儿童夺走，给他们打上未成年的标记而由他们自己把孩子抚育成成年男子。诚然，妇女生育了人类，但是只有男人才能造就男子。①

确实，这种原始社会是“由无穷无尽的禁忌和防范措施”，由妇女的羞耻、发抖的恐惧及男性虚荣心的沉溺“保护的摇摇欲坠的结构”，只有每个人都遵守规则，它才能存在下去，“把笛子展示给那些妇女看的传教士才能成功地打破这种文化”。②但是玛格丽特·米德本来可以把他们自己任意而且不可靠的禁忌、预防措施、羞耻、恐惧，及男性虚荣心的沉溺的“笛子”展示给美国的男子和妇女看，她却并没有这样运用她的知识。出自于萨摩亚和巴厘的生活方式，那儿所有男子都羡慕妇女，她为美国妇女树起了一种理想，这种理想赋予摇摇欲坠的性歧视结构以新的现实——女性的奥秘。

其语言是人类学的，其陈述的理论实际上是弗洛伊德的，但是其强烈的愿望是要回到伊甸园③，在那个园里，妇女只需要忘记源于教育的“上帝的不满”，而回到一个把男性的成就看作是因为不能生育孩子而产生的一种可怜的替代物的世界中去。

文明的最近问题是要令人完全满意地为男性的作用

① 米德著，前引书，第84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② 米德著，前引书，第85页。——原注

③ 伊甸园，基督教《圣经》中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最初居住的地方。——译注

下定义——无论是修花园或养牲畜，打猎或杀敌，建桥或处理银行股金——这样，男性在他生命的进程中才有取得不可否定的成就的可靠感觉，这种成就在他童年了解到生育孩子的种种满足时，他就已经微微感受到了。就妇女来说，则只需要由一定的社会安排允许她们完成她们的生物作用，以取得这种不可否定的成就的感觉。要是妇女烦躁不安地探索追求，甚至在面临生产时也是如此，则必须通过教育使她们获得那样的感觉①。

女性的奥秘取自玛格丽特·米德的不是她对于妇女未经考验的伟大的人的潜力的幻想，而是这种对确实经过考验的女性功能的颂扬，这种性功能在每一种文化中（但很少在文明的文化中），被评价得高至人的创造力的无限潜力那样的程度。迄今为止，这种无限潜力主要是由男子表现出来的。这种奥秘从玛格丽特·米德那儿取得的幻想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妇女仅仅因为是女人，能够生儿育女，便将赢得男子因他们的创造性成就而获得的同样的尊重——好像是有子宫和乳房就赋予妇女一种男子永远也不能了解的荣耀，即使男子终生辛劳不断创造。在那样一个世界里，妇女所能做的或能成就的所有别的事情只是怀孕的无力的代替物。于是女性比社会赋于的定义具有更丰富的涵义，成了社会必须保护免遭文明的破坏性冲击的一种价值，如同正在灭绝的野牛一样。

玛格丽特·米德雄辩的文笔使许多美国妇女羡慕乳房裸

---

① 米德著，前引书，第125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露的萨摩亚人的娴静的女性特征，并试图使她们自己成为柔情的野蛮人，乳房不受文明的乳罩的束缚，头脑不受枯燥乏味，关于人类进步目标的人造知识的干扰。

> 妇女的生物性事业线（biological career-line）有一种自然的上升结构，此结构可以被遮掩、减弱、捂住并被公开否定，但是，它在两种性别对他们自己的看法中仍然是一种基本要素。……一个人问那位年轻的巴厘姑娘："你的名字叫爱特华？"她挺直身子答道："我是门巴娃（巴娃的母亲），"语气十分肯定。她是巴娃的母亲；巴娃或许明天就会死，但她仍然是巴娃的母亲；只有那孩子没有取名就死了，她的邻居才会称她"门贝拉辛"，"母亲贝雷弗特"。妇女的生命史中一个又一个阶段就是这样存在着，不可改变无可置疑，一直到完成。这就为小姑娘强调存在（being）而不强调实干（doing）提供了一种自然基础，小男孩了解到他必须像一个男孩子那样行动，做事，证明他是男孩子，并且反复地证明；而小姑娘了解到她是一个女孩，她所做的一切都要避免同男孩一样①。

这样的情况不断地继续下去，直至人们会说，那又怎么样呢？你出生，你成长，你怀孕，你生孩子，它成长；这对于一切文化，有文字记载的或无文字记载的，我们从生活中了解的或

① 米德著，前引书，第135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只有作长途旅行的人类学家才了解的深奥隐秘的种种文化，都是真实的。但是难道这就是今天妇女生活的全部内容吗？

这并非是要否定生物学的重要性，对妇女的本性的定义提出疑问，那种定义是完全彻底地以妇女与男子的生物区别作基础的。女性生物学，妇女的“生物性事业线”，可能是不可改变的——在20000年前石器时代的妇女中，在遥远海岛上的萨摩亚妇女中，以及在20世纪美国妇女中这都是相同的——但是，人同生物学的关系的性质已经改变了。我们日益增加的知识，日益增加的人类智慧的力量，使我们认识到超越饥饿、干渴和性欲这些简单的生物需求的种种目的和目标。在今天的男子或妇女身上，即使这些简单的需求也与它们在石器时代或南太平洋上的各种文化的情况不相同了，因为它们现在是人类生活更加复杂的模式的一部分。

当然，作为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懂得这一点。一方面，她大力美化女性作用，另一方面，她又描绘一个奇迹世界，在那个世界上妇女能够充分施展她们的才干。但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这幅图画几乎一成不变地蒙上了济世救人的警告、主宰一切的优越感——许多美国社会科学家具有的特征——的阴影。当这种警告同对社会科学的力量可能过高的估价（社会科学不仅要解释文化和人格，而且要安排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时，她的话便具有一种正义的讨伐——讨伐变革——的意味。她加入其他功能主义社会科学家的行列，一起强调适应社会现状，强调在对男性和女性的常规文化定义的框架内生活。这种态度在《男性和女性》的后一部分中清楚地表现出来。

给以每一种性别它应得的权益，充分认识它特殊的弱点及对保护的需求，这意味着要透过男女儿童后期表面上的相似点来看问题；在这一时期男孩和女孩都不顾许多性别适应的问题，似乎是急切地要学习，而且同样能够学习相同的东西。……但是，减少了在一个性别上的差异和弱点，以及在另一种性别上的力量差距的每一种适应都减小了互相补充的可能性，并且象征性相应地减小了女性的建设性接受能力，阻止了男性的活跃、外向的建设性活动，使它们最终沦为人类生活中较为单调沉闷的形式，在这种形式的生活中，每一种性别本来可以具有的完整的人性都被否定了。①

没有一种人的天赋强大得足以在一个人的身上得到充分发展，因为这个人受到失去该性别成员资格的威胁。……我们无论怀着什么良好的意愿开始一项真正培育男女双方在文明的一切进程——医学和法律、教育和宗教，艺术和科学——中作出充分的和特殊贡献的计划，这个任务都将是十分艰巨。……

把妇女引入那些被定义为男性的领域会使男子惊恐，使女子失去性别特征，抑制并歪曲妇女本来能够作出的贡献，因为这样干不是因她们的出现把男子从那种职业中排除开了，就是由此而改变了从事那种职业的男子的地位。如果这样干，那么把妇女的天赋罗列出来这一作法的价值是令人十分怀疑的。……对警告我们的种种迹象视而不见是愚蠢的，这些迹象警告我们：目前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妇女受到她们自己的好奇心和在与男

① 米德著，前引书，第274页及其后诸页。

女相同的教育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上进心的引诱……——对男女双方都不利。①

倘若美国妇女是以玛格丽特·米德自己的生活为榜样，而不是听从她在她的书中的说法，那么她作为女性的职业发言人的作用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玛格丽特·米德度过了一种公开挑战的生活，并且自豪地度过这种生活，虽然有时自觉地作为妇女过了这种生活。她前进到了思想领域的前沿，为我们知识的上层建筑添砖加瓦。她表明了妇女的能力远远超过了生儿育女；她在仍然属于"男子的领域"中艰难地奋进，而不否认她是一个女人。事实上，在她的工作中她显示了一种独特的妇女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没有哪一位男性人类学家能与之相比。在这样多世纪无可置疑的男性权威之后，有人宣告一种女性权威是多么自然呀。但是，伟大的人类制止战争、医治疾病、教导各民族和睦相处，为人民安居而修建崭新漂亮的各种建筑的方法要比"生育儿女的其它方式"多。

同古老的偏见作斗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为社会科学家并作为妇女，米德给予有偏见的妇女形象一定的打击，这种妇女形象可能比她自己的寿命要持续得久得多。她坚持认为妇女是人——独特的人，不是缺少某种东西的男人——这样她比弗洛伊德前进了一步。然而，因为她的观察报告是以弗洛伊德在人体上的推论为基础的，通过美化女性的神秘的奇迹，她还是减小了她自己对妇女看法的重要性。妇女所实现的这种奇迹仅仅是因为她是女性，让乳房长大，让月经流

① 米德著，前引书，第278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出，以及让婴儿吮吸胀大的乳房。她警告说：超越她们的生理作用去寻求成就的妇女有变成失去性特征的女巫的危险。在她的警告中她再次清楚地表达了一种不必要的选择。她劝年轻妇女放弃她们以高昂代价赢得的人性而不要失去她们的女性特征。最后她干了正是她警告要防止的事情——她在作品中再创造出的，她在她自己生活中打破了的恶性循环：

> 互为补充的区别过分强调性别差异的作用。通过它，我们就可能从简单的身体差异更进一步，把这种情况不恰当地扩展到生活的其它方面，扩展到诸如在艺术中、在政府里、以及在宗教上涉及到正式运用智力的那些复杂活动的既定模式上。
>
> 在所有这些文明的复杂成就中，在那些是人类的光荣的活动中——在我们建造起来的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存的希望依赖于那些活动——存在着作出人为的规定，把一种活动局限于一种性别的一种倾向，并且通过否定人的实际潜力，这种倾向不仅限制了男子和妇女，而且同样地限制了那种活动自身的发展。……
>
> 这是一种不可能确定开头和结尾的恶性循环，在这种循环中，男子对妇女作用的过高估价，或者妇女对男子作用的过高估价都导致了一种性别或另一种性别僭取、忽视、或者甚至放弃我们花费了如此高昂代价才赢得的人性的一部分。要打破这种循环的那些人本身就是这种循环的产物，他们的一举一动中都表现了这种循环的某些缺陷。他们可以强大得足以向它挑战，但却不能够真正打破它。然而，一旦识别出，一旦分析出，就有可

> 能创造一种舆论气氛，在这种气氛中，其他人——这些人受到黑暗的过去的影响少一点，因为他們受到他們手中一种光芒的照耀，这种光芒能向后也能向前照耀——可以依次采取下一个步骤。①

在由一些女权主义者作出的男性抗议之后，或许女性抗议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在妇女的权利赢得之后，玛格丽特·米德是美国生活中第一批杰出的妇女之一。她的母亲是社会科学家，她的祖母是教师；就其个人生活而言，她这位妇女是确实受过可以与任何男子匹敌的教育。而且她能够怀着深刻的信念说：作为一个妇女是愉快的，不必去模仿男子，作为一个妇女，你能够尊重自己。在她的生活和工作中，她提出了响亮的女性主张。她影响了已解放了的现代妇女用自由的智慧去选择，去生儿育女，以一种否认痛苦的自豪意识去生孩子，为孩子哺乳并把全部身心奉献于照料孩子，这一切是向前迈了一步。对于受过教育的妇女，赞同作为有意识人的目的的母性而不是作为由肉体强加的负担的母性，这是在充满激情的旅程中向前迈出的一步，由于这一步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旅程。当然，因为玛格丽特·米德帮助发起的这场自然生育—哺乳运动完全不是向原始的大地母亲式母性的复归。它强烈地吸引了独立的，受过教育的，生气勃勃的美国妇女以及西欧和俄国妇女，因为它能使妇女体验到不是作为无意识的雌性动物，由产科医生操纵的目标，而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能够以清醒的意识控制自己身体的生育。或许与控制

① 米德著，前引书，第276—285页。

生育和使妇女与男子更加平等的其它权利相比不那么重要的是：玛格丽特·米德的工作有助于性问题的人性化。它使一位科学的超级女推销员在现代美国生活中甚至再创造出了原始部落状况的外表，在这种状况下，原始部落的男子嫉妒地模仿母性并使他们自己流血。（现代丈夫当其妻子准备自然生产时，同妻子一起作呼吸练习。）但是她是否过分吹嘘了妇女呢？

她被人生吞活剥地加以理解以至于生殖成了一种崇拜、一种事业，到了排斥其它每一种创造性努力的程度，导致妇女不断地生儿育女，因为她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创造方式。或许这并不是她的过错。较次要的功能主义者和各种妇女杂志常常断章取义地引用她的话。有些人在她的著作中找到了他们自己不予承认的偏见和恐惧的证据，但他们却不仅忽视了她整个著作的复杂性，而且忽视了她复杂生活的例子。尽管作为一位妇女，在过去是男子的活动范围的抽象思想的领域中开拓（对《三个原始社会中性生活和气质》一书的一句评论表现了她常常遇到的不满："玛格丽特，你找到了一种男人生小孩的文化吗？"），她一定遇到过各种各样的困难，但她从来没有从这条通向自我实现的艰难道路上退却，而以前却极少有妇女在那条道路上跋涉。她常常告诉妇女留在那条路上。如果她们只听从了她的其它警告来与她对女性美化保持一致，或许是因为她们并不像她那样对自己和她们的人的能力充满信心。

玛格丽特·米德和次要的功能主义者知道冲破古老的社会束缚的种种痛苦和风险①。她们用妇女不要同男子竞争，而

---

① 玛格丽特·米德著，《来自南太平洋》序，纽约，1939年版，第XIII页。——原注

要为她们作为妇女的独特性去寻求尊重这种劝告来限定她们对妇女潜力的说法，上述那种意识就是为这种限定辩护。这根本不是革命性的劝告。较之弗洛伊德思想，它并没有更彻底地打破妇女的那种传统形象。或许她们的意图是要打翻那种旧形象；但是相反她们却赋予这种新奥秘以科学的色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60年代，玛格丽特·米德开始惊呼“穴居女人的复归”——美国妇女退缩到狭窄的家庭圈子中，而同时，世界却在技术大破坏的边缘上颤抖。在从《美国妇女正在变化的形象》一书中摘录，登载在《星期六晚邮报》（1962年3月3日）上的一段话里，她问道：

> 尽管我们在技术上不断进步，为什么我们又回到了石器时代呢？……妇女已经回去了，每个人回到了她单独的洞穴，焦急地等待她的伴侣和孩子归来，看守着她的丈夫，妒忌地防备其他女人，几乎完全不知道洞穴外生活的任何情况。……在这个倒退至生育的问题上，要受到指责的不是个别的妇女，而是在这个国家出现的舆论气氛……

很明显，玛格丽特·米德并不承认，或者可能并未认识到，她自己起到了那种“舆论气氛”的一位主要建筑师的作用。很明显，她忽视了她自己的大部分著作，这些著作帮助劝说几代能干的美国妇女“以拼命挣扎的穴居女人的风格，把她们的全部生命奉献给狭窄的家庭圈子——首先在女学生的梦想中和对女性角色的寻求中，这种角色富有魅力，却显得无

知，然后作为母亲，然后作为祖母……把她们的活动限制在保持她们自己隐秘并且常常是乏味的生活中。”

即使玛格丽特·米德现在似乎正试图使妇女从家庭中走出来，她仍然把性的特殊性归在妇女所干的每一件事情上。试图诱使她们作为“婴儿科学家式的教师—母亲”进入科学的现代世界，她仍然把向妇女开放的新的可能性和她仍作为人类成员所面临的种种新问题翻译成性方面的术语。但是现在，“历史上属于妇女的那些作用”被扩展到包括核裁军的政治责任——“不仅爱护她们自己的孩子，而且要爱护敌人的孩子。”她以同样的前提为基础研究同一套人类学证据，现在得出了稍许不同的妇女的性作用的结论，既然如此，人们就可以严肃地就她决定妇女应该发挥的作用的基础进行质疑，——并且会觉得把这个10年的游戏规则换到下一个10年去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其他社会科学家已经得出令人吃惊的结论：“作为一位妇女比作为一个人并不强一些、也不差一些。”①但是一种文化滞后存在于女性奥秘的内部。到一些社会科学家发现“妇女的作用”中的缺点的时候，美国的教育家们抓住了它，把它当作具有魔力的芝麻。他们开始教育妇女“发挥妇女作用”而不是教育她们要有较大的成熟性；这种成熟性是投身于现代社会——处理各种问题、冲突和艰巨的工作都需要的。

---

① 玛丽·雅霍达、琼·哈弗尔著，“担任不同社会角色的妇女的心理问题”，《教育记事》杂志，第36卷，1955年，第325页至第333页。——原注

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

在教育家们——即守旧的教育家们怀疑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 教 育 之前，这种教育就已经持续了10来年了。那些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新教育家们对有人感到惊异这种情况感到吃惊，对有人感到震动这种情况感到震惊。

对于那种对妇女的高等教育抱有极大希望的天真的人，这种震动、这种奥秘在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美国妇女上了大学，然而她们中仅少数人能够从大学继续发展成 为 物 理 学家、哲学家、诗人、医生、律师、政治动家、社会活动家、甚至大学教授。在最近的大学毕业班中能够继续在事业上或职业上取得显著成就的妇女要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主要分水

龄之前少。越来越少的女大学生准备从事比最一般的承诺要求更高的事业或职业。三个上大学的姑娘中就有两个中途辍学。在50年代，那些一直读到毕业，甚至最能干的姑娘也未显示出要成为郊区家庭主妇和母亲以外的任何一种人的迹象。事实上，对于瓦萨、史密斯和巴纳德[①]学院的教授们，他们千方百计地试图使学生对学院所教的东西感兴趣，女大学生们除了追求一只结婚戒指外似乎突然丧失了任何雄心，任何远见，任何激情。在这种早至大学一年级就开始的追求中，她们迹近不顾一切。

出于对那种越来越无效的幻想——妇女高等教育的重要性——的忠诚，纯正的教授们最初保持沉默。但是美国妇女对高等教育的遗弃和抵制最终在统计数字上显示出来了[②]：在男性院长、学者、教育家纷纷离开女子学院这个问题上显示出来了；在留下来的那些人的失望、令人困惑的沮丧、冷言冷语上显示来了；并且最后在学院和大学中对任何姑娘和妇女（无论她们多么明显地具有能力和雄心壮志）的教育投资的价值所持怀疑态度上显示出了。一些女子学院关门停办；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的一些教授说，1/3的学院不应再浪费在妇女身上了；萨拉斯学院——一所具有很高学术水平的女子学院——的院长谈到了要向男子开放；瓦萨学院的院长曾预言，曾为妇女高等教育充当先锋的所有伟大的美国女子

---

① 美国三所著名女子学院名。——译注

② 梅布尔·纽科默著，《妇女高等教育的100年》，纽约1959年版，第45页及其后诸页。美国大学生中女子的比例从1870年的21％增加到1920年的47％；1958年下降到35.2％。5所女子学院已经关闭；21所变成了男女同校学院；2所变成了初级学院。10个博士学位中仅不到一个被授予妇女，而1920年6个中就有一个授予妇女，1940年则有13％的博士学位授予妇女。——原注

学院的末日已经来临。

1956年，当我在梅隆基金会关于瓦萨女子学院学生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报告中读到有关情况正在发生的第一批谨慎暗示时，我心中想，“哎呀！瓦萨学院怎么这样堕落了！”

献身于家庭主妇的事务之外的活动或职业成为罕见的现象。许多学生，或许有1/3，对研究生学业和诸如教师一类的职业感兴趣。然而，如果它与家庭需要发生冲突，则极少有人计划继续从事这种职业。……可是，与以前各个时期，如“女权主义时期”相比，很少有学生不顾个人或社会的压力对追求高要求的职业，诸如律师或医生感兴趣，同样，人们很少发现像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①这样的例子，个人在青年时代就完全献身于自己的艺术并且抵制任何企图要损害它的尝试。②

以后的一份报告详细地说道：

瓦萨学院的学生……进一步深信，随着愈来愈少或不直接干涉女子学院学生的问题，社会的种种错误会逐步自己纠正，……总的说来，瓦萨学院的姑娘不期待名扬四海，为社会作出不朽的贡献，开拓任何新领域，或

① 米莱（1892—1950），美国女诗人，曾获1923年普利策诗歌奖。——译注。

② 默文·B·弗里德曼著，“通过大学之路”，载《大学时代的个性发展》，内维特·桑福德编，《社会问题杂志》，第12卷，1956年第4期第15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以别的方式在事物的平静秩序中引起波澜。……不仅把未婚女子身份看作一种个人悲剧，而且把生儿育女视作充实生活所不可缺少的。瓦萨学院的学生相信，她们会十分乐意地收养孩子，如果这对于创造一个家庭是必要的话。总之，她未来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包含在妻子—母亲的突出作用中。……在描述一位理想的丈夫身上应具备的特点时，瓦萨学院的大多数姑娘都十分明确地表示，她们偏爱将能承担起最重要作用的男子，这种作用是：处理他自己事业上的问题并能作出大多数影响家庭之外事情的决定。……在她们的思想中，那种女性应该试图去夺取男性的特权的想法是令人厌恶的，那种想法会严重妨碍她们自己成为贤妻良母，在家里成为男子的忠实补充的突出作用。①

1959年当我返回我曾就读的学院时，我看到了变化，一种非常真切的变化。我在史密斯学院校园公寓里同学生们一起生活了一星期，然后继续对遍及美国各地的学院和大学女生们进行采访。

一位受人爱戴的心理学教授，在他退休前夕抱怨道：

她们都十分聪明。现在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到这里来。但是她们就是不愿意使自己产生兴趣。她们似乎觉得：当她们同年轻的经理结婚并在郊区中抚养那些

---

① 约翰·布什内尔，“瓦萨的学生文化”，见《美国的学院》，内维特·桑福德编，纽约和伦敦，1962版，第590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孩子时，这会成为她们的障碍。我无法为我的高年级优秀生安排最后一次研究班讨论课，因为为新娘举行的送礼会实在是太多了，她们中没有一人认为研究班讨论课重要得足以推迟她们为新娘举行的送礼会。

我以为，他太夸张了。

我拣起一份过去我曾参与编辑的学院报纸。现任学生编辑描绘了一堂政治学课，全班20名姑娘中15名“都像德法奇夫人[①]那样面无表情、全神贯注地打着毛线、上课的讲师与其说是以严肃的口吻不如说是以挑战的口吻宣布，西方文明正临近末日。那些学生转向笔记本，记下：‘西方文……临近末日，’但没有一个人停了一针。”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她们需要这样的花样？记得我们过去在课后常常围在一块，争论教授刚讲过的问题——经济学理论、政治哲学、西方文明史、第21号课程社会学、科学与想象甚至乔叟。“现在人们对什么课程感兴趣？”我向一位穿戴着表示学位的方帽长袍的金发碧眼的高年级女生问道。或许核物理？现代艺术？非洲的各种文明？她盯着我，仿佛我是某种史前恐龙一样，说道：

姑娘们不再对那样的东西感兴趣了。我们不要事业。我们的父母期望我们上大学。每个人都上大学，如果你不上，你就成了呆在家里的被社会遗弃的人。但

---

① 德法奇夫人，狄更斯小说《双城记》中小酒店的老板娘，手中不断编织毛线，并记下贵族的姓名。——译注

是，一个对所学的东西抱严肃认真态度的姑娘——比如，想继续深造并进行研究——会成为不像女性的怪人。我想每个人都希望在毕业时在她的手指上有一颗钻石戒指。① 那才是重要的事情。

在一些学院的公寓里，我发现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禁止进行有关课程的谈话和理性的谈话。在校园里，姑娘们看起来似乎都十分匆忙，来去如风。除了少数教职员外，没有人坐在咖啡店或街角的杂货店里闲谈。过去我们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争论什么是真理、为艺术而艺术、宗教、性、战争与和平、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以及这个世界错了位的一切事情。一位冷漠的低年级女学生告诉我：

我们从来不像那样浪费时间。我们不进行关于抽象东西的乏味讨论。我们谈论得最多的是我们的约会。不管怎样，我一星期有三天在校外过。那儿有一个我感兴趣的男孩，我想同他在一起。

一位眼睛黝黑，穿着雨衣的高年级学生承认，她喜欢在图书馆中的书架周围转来转去，"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书"，这简暗地成了一种瘾。

上大学第一年你学别人对图书馆不感兴趣。然而，最近你偶然想到，明年你就要离开学院了。突然你希望

① 指订婚戒指。——译注

能多读一些，多谈一些，选修过去你放弃了的难学的课程。现在你明白了你对什么感兴趣。但是我想，当你结婚时，那些东西又无关紧要了。你感兴趣的是你的家庭，教你的孩子如何游泳和滑冰，夜里同你丈夫说话。我们将比过去的女大学生要幸福得多。

从这些姑娘的行为举止来看，仿佛大学成了必须耐心、有效、使人厌倦而事务式地通过的一种过渡阶段。经过这个阶段后，“真正的”生活才能够开始。真正的生活即是你结婚，同丈夫和孩子一起生活在郊区一幢住房里。这种厌倦，事务式的忙碌是十分自然的吗？这种一心一意只想着结婚是真相吗？我发现那些以“当我结婚时”之类的话来随便否认对她们的教育有任何严肃的兴趣的姑娘，常常并非严肃认真地对某个特定的男子感兴趣。那些匆忙赶完功课，一星期花三天在校外过的姑娘，有时并没有她们希望保持的那种真正的约会。

在我的时代，那些在耶鲁大学度过许多周末的受人喜欢的姑娘对待她们的功课常常同那些“聪明脑瓜”一样严肃认真。即使你暂时或十分严肃地谈上恋爱了，在学院一周里你仍然过着智力的生活，并且觉得这种生活要求高，吸引人，有时令人振奋，而且永远是实在的。现在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竞争这些姑娘必须更努力地学习，具有更强的能力，才能进入这样一所学院，难道她们真的对智力的生活如此厌倦了吗？

渐渐地，我在她们冷漠的外表后面感觉到了那种紧张、近乎愠怒的抗议、蓄意的努力——或者说，蓄意避免的努力。她们的厌倦并非完全像外表流露的那样。它是一种拒绝变得

复杂的保护性措施。正如一位妇女在经历与性有关的各种活动时，那种无意识地认为性是一种罪恶的妇女并不在那里，而在别的某个地方，这些姑娘也同样在别的某个地方。她们经历了那些事，但是她们保护自己免受大学可能向她们灌输的智力和精神的非人化感情——危险而与性无关的理智的感情的影响。

一位漂亮的二年级学生向我解释说：

> 这种想法是随便而非常复杂的——对你的工作或任何事情不要太热心了。对待事情太认真的人或多或少都要受人怜悯或者嘲笑。比如想唱歌，你太正经了就会使别人感到不舒服，就成了一个古怪的人。

另一位姑娘详细说明道：

> 他们可能会为你感到遗憾。我认为，只要你不时地停下来，想一想这是不是太歇斯底里了，你就能严肃认真地对待你的工作而不被人当作一个十足的书呆子而受到蔑视。因为你是假心假意这样干的，这就对了。

一位在粉红色羊毛衫上别着大学生联谊会徽章的姑娘说：

> 或许我们应该更严肃地对待大学教育。但是谁也不想毕业后到那些不能用它的地方去。如果你的丈夫准备当一名大公司职员，你就不能受太多的教育。妻子对丈

夫的事业非常重要。你不能对艺术或其它类似的东西太感兴趣。

一位放弃了历史专业优等生荣誉的姑娘告诉我：

我爱我的专业。我对我的学业如此感兴趣，有时我会早上8点钟进图书馆，一直到夜里10点才出来。我甚至想到，我可能要继续上研究生院或法学院，真正运用我的脑筋。突然，我感到害怕将会发生的情况。我要过一种富裕而充实的生活。我要结婚、生孩子，有一个幸福的家。突然我明白了，我绞尽脑汁为的是什么。因而，今年我得尽力去过一种完美的生活。我选修各种课程，但是我读了8本书之后就不再想读第9本书了。我停下来去看电影。另一种生活方式要艰苦得多，却更令人振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停了下来。或许我只是失去勇气了。

这种现象似乎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学院；人们发现这种现象存在于任何学院或学院的任何一系的姑娘中间，尽管这些学院和系仍然使学生受到智力生活的影响。一位来自南方一所大学的三年级学生说：

自从我还是一个小姑娘时，科学就对我有一种魅力。我本打算主修细菌学并进行癌症研究。现在我转到家政学了。我认识到我并不想钻到那样深奥的东西中去。如果我继续学下去，我就成为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

人中的一员。头两年我是如此专心致志，以致从来没有离开过实验室。我喜爱它，然而我失去了许多东西。下午姑娘们都去游泳了，而我还在忙着摆弄我的涂片和幻灯片。这儿的细菌学专业没有任何别的姑娘，实验室里只有60个男生和我。那段时间，我再不能同那些不懂理科的姑娘融洽相处了。我对家政学的兴趣那样强烈，不过我认识到，我最好还是改变专业，同人们一道出去。我认识到我不应该那样认真。将来我得回家去，在一家百货商店工作，直至我结婚。

在我看来，神秘不在于这些姑娘保护自己避免卷入那种智力的生活，而在于教育家们会对她们的保护行为感到迷惑不解，或者如同某些教育家那样指责“学生文化”。如果一位姑娘在1945年至1960年间上大学，那么她几乎必须学习的一课就是：如果她想成为正常、幸福、具有适应性的女性，有一位事业上成功的丈夫，学习优秀的孩子，及一种正常、富于女性特征、适宜的、成功的性生活，她就不要对结婚和生孩子以外的任何事情有兴趣、特别是发生浓厚的兴趣。她可能已在家中学到了这一课的一部分，并从学院中其他姑娘那里学到一部分，然而毋庸置疑，她从那些被委以发展她的批判性、创造性智力的重任的人——她的学院中的教授们那里也学到了这一课。

在过去15年里，针对美国妇女的一种微妙的，几乎未被察觉的变化已在高等院校的文化中发生：出现了新的、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美国妇女的教育家。在女性奥秘的影响下，负有教育妇女责任的一些院长和教授变得对他们的学生未来的

性欲高潮的能力比对她们未来对受过训练的智力的运用更为关心。实际上，一些主要的妇女教育家开始运用培养智力不具有批判性或创造性的巧妙的教育方法，有意识地关心保护学生免受运用她们的批判性、创造性智力的诱惑。这样，高等教育增加了它对那种进程的影响；通过那种进程，这一时期的美国妇女日益加剧适应她们的生物功能，而同时她们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却在不断地减弱。上了大学的姑娘几乎都逃避不了弗洛伊德和玛格丽特·米德那些零碎东西，或者避免不了一门“婚姻与家庭生活”的课程，这门课以功能主义的观点传授“如何发挥妇女的作用”。

然而，这种新的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妇女教育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课程或学院的系。它包含在所有社会科学中；但是还远不止于此，它成了教育本身的一部分，这不仅是因为英文教授、或导师、或学院院长都读弗洛伊德和米德的书，而且是因为教育成了新的女性的奥秘——美国女孩同男孩一起或像男孩一样接受教育——的主要目标。如果精神分析学说的信徒和功能主义者都是正确的，那么对于美国妇女失去女性特征，对于使她们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注定要受挫，否则便注定从事独身的事业，过没有性欲高潮的生活，教育家就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这是一种导致定罪的指控；许多学院的院长和教育理论家都毫无怨言地坦白认罪并陷入了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路线。当然，从那些仍然认为智力比婚床更重要的守旧的教育家那里发出过几声愤怒的抗议，不过他们常常临近退休，不久将被更年青、更全面地受过性教育的教师替换，不然他们则是如此沉浸于他们的专门课题，以致在一切办学方针上他们很少有发言权。

对于强调适应性的新的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路线来说，总的教育气氛已经成熟了。教育的老目标——通过生动有力地掌握主要的知识学科来发展智力——在以孩子为中心的教育家中已不再得到赞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成了教育功能主义的自然繁殖场。随着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渗透进总的学术气氛，妇女的教育也从米尔斯、斯蒂芬斯①和女子精修学校（其基础为传统的而不是理论上的）扩展到女子的常青藤联合会②的自豪的堡垒——那些开创了美国妇女高等教育并以它们不妥协的学术水平著称的学院。

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不是为有才干的妇女开辟新天地和更广阔的世界，而是转而教育她们适应家庭和孩子的世界。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不是传授反对过去广泛偏见的真理，或致偏见于死命的批判性思想方法，而是把不加批判的描述和预感的杂碎汤交给姑娘们。这类东西比一切传统的清规戒律更能约束人的心灵并且对未来更带有偏见。这种教育的大部分是由教育家出于有益的理由，有意识地进行的，当社会科学家把这类东西交给他们时，他们便真正相信了这种奥秘。如果一位男性教授或院长并未感到这种奥秘是一种确实的安慰，是对他自己偏见的一种认可，他就有理由相信它。

本来就很少的女院长和女教授，则不是赞成以性别为指导方针，就是连她作为妇女和教师的权威都受到了怀疑，不能反对。如果她们是老处女，如果她们没有生过孩子，这种奥秘

① 米尔斯、斯蒂芬斯为美国两所女子学院名。——译注

② 常青藤联合会，原指美国东北部的名牌大学，此处指美国著名的女子学院，也在美国东北部。——译注

就会禁止她们作为妇女去讲话。(《现代妇女：迷惘的性别》甚至会禁止她们教书。)没有结婚但却鼓舞了许多代女大学生去追求真理的那批才华横溢的学者，作为妇女的教育家受到了玷污。她们没有被提名当女子学院院长，尽管她们把该院的学术传统发展到了最高点；教育姑娘的大权交到了一位英俊的、丈夫般的男子手中，这更利于他向姑娘们灌输合乎时宜的女性作用。这位学者常常离开女子学院到一所名牌大学去主持一个系，那里未来的博士都是可靠的男子，对于他们，学术成就的吸引、对真理的追求，都不被认为是性作用充分发挥的障碍。

根据这种新的奥秘，女学者就只因为是女人而受到猜疑。她一方面要为养家而工作，另一方面，她又一定为一种非女性的献身——在那些艰苦难熬、报酬微薄的年月里一直在她的领域中工作，以便取得博士学位——感到内疚。为了自卫，她有时穿镶有饰边的罩衫或代表女性抗议的另一种不招人非议的样式。(在精神分析学大会上，有一位观察家注意到，女精神分析学家们纷纷戴上了漂亮、花哨、时髦的女帽，而这些帽子会使通常的郊区家庭主妇看起来更像男子汉。)无论是医学博士还是哲学博士，那些帽子和镶有饰边的罩衫无非是说：不要让人对我们的女性气质产生疑问。但是，事实是，她们的女性气质受到了怀疑。一所著名的女子学院为了防卫，采用了这样一条口号："我们不把妇女教育成学者；我们把她们教育成妻子和母亲。"(那些姑娘最终如此厌倦逐字重复这条口号，以致她们把它缩写成"WAM"①)

---

① "WAM"是英文"wive and mothers"(妻子和母亲)三个单词词头的缩写。——译注

在设置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课程时，并非每个人都像米尔斯学院前院长林恩·怀特走得那样远。但是，如果你以这样的前提——妇女不应再像男子那样，而是为了她们作为妇女的作用而受到教育——为出发点，你就几乎必须以他的课程作为结束，这种课程实际上就是用高级烹调课取代大学化学课。

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通过承担对美国妇女全面的和性方面的受挫在教育上的责任来作为自己工作的起点。

> 在我的书桌上放着一封一位几年前从大学毕业的年轻母亲来的信：
>
> "我已经认识到我过去被教育成一个成功的男子，而现在必须靠自学成为一位成功的妇女。"在美国作为妇女教育所传授的大多数知识之根本离题不可能比这句话表达得更简明扼要了。……我们的教育制度没有考虑到普通男女的生活模式之间的这些简单而基本的区别，这至少要对影响千百万妇女的深刻不满和不安承担部分责任。……
>
> 看来妇女要恢复她们的自尊，就必须把旧时的女权运动的策略颠倒过来，旧时的女权运动愤怒地否认男女的智力和感情倾向上有内在的差异。只有承认并坚持那些差异的重要性，妇女才能按她们的观点把自己从低人一等的信念中拯救出来。①

① 林恩·怀特著，《教育我们的女儿》，纽约，1950年版，第18页—48页。——原注

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把我们的“广泛受到过分赞扬的文化创造性”，以及“我们把‘进步’本身当作好事而不加批判地接受”、“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创新”、“抽象的结构”、“定量思维”都等同于男性的东西，当然，其中令人畏惧的象征不是共产主义就是原子弹。与这些东西相反，等同于女性的东西是：“人们的感觉、直接的感觉、难以确定的定性关系的感觉、对统数计字和数量的厌恶”、“直觉”、“感情”、以及一切“爱护”并“保存”“真、善、美、有用而且神圣的”东西的力量。

一种女性化的高等教育可能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这些是很少与戴上了天才桂冠的男强人有关的学科，”妇女教育的保护者赞扬道，“它们致力于探索社会和心灵的平静和不引人注目的种种力量。……它们包括了女性对保存和爱护行为的专注。”）它几乎不会包括纯科学（由于抽象理论和定量思维是非女性的）或美术，美术是男性的，浮华而抽象的。“然而，应用美术或工艺美术是女性的，这包括主要靠手而不是靠大脑制作的陶瓷制品和纺织品。“妇女同男子一样爱美，但是她们要求一种同生活的进程相关的美……手同大脑一样卓越非凡、值得尊重。”

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对蒂斯朗主教①的说法表示赞同，“妇女应当受到教育，这样她们就能同丈夫争辩。”让我们彻底停止对妇女的职业训练，他坚持认为：所有妇女都必须被教育成家庭主妇。甚至现在大学所教的家政学和持

① 蒂斯朗主教(1884—)，曾任罗马教廷枢密院院长，法兰西学院院士。——译注

家学都是男性的，因为它们是按职业训练定的基调。"①

下面是一段真正的女性教育：

> 人们可以充满信心地预言，当妇女开始以课程的术语使人们感觉到她们的明确愿望之时，不仅每个女子学院和男女同校的学校会提供一门关于家庭的坚实的核心课程，而且从此门课程出发，会衍生出系列课程，涉及食品和营养、纺织品和衣着、健康和保育、住房设计和室内装饰、花园设计和应用植物学，以及儿童教育。……难道不可能开出一门和后康德哲学同样令人兴奋并且同样困难的有关食品的启蒙课程，以利于大学毕业之后的逐步发展吗？……让我们放弃谈论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之类的东西，除了出于无心之时的谈论之外。比如，我们指出英国煮得过火的包子甘蓝不仅在味道和质地上要差一些，而且在维生素含量上也要低一些。为什么不学以下这些菜肴的理论和制作方法呢？巴斯克②式什锦蒸饭、经腌泡入味的烤羊肉串、下雪利酒的炒羊腰、道地的咖喱食品，用草做菜甚至用鲜牛奶凉拌洋蓟这样简单的拌菜。③

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几乎不受下述论点的影响，这个论点是：大学课程不应被诸如烹调或手工劳动这样的学科污染或扩大，这样的学科在中学就能成功地传授。把它们

---

① 怀特著，前引书，第76页。——原注

② 巴斯克，西班牙北部地区名。——译注

③ 怀特著，前引书，第77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传授给中学里的女孩子，在大学时又“以更大的强度和想象”再次传授给姑娘们。男孩子也应该接受一些“重视家庭的”教育，但这不应在他们宝贵的大学时间内进行；中学早期的手工劳动就足以“使他们将来在一群带着钦佩眼光的孩子环绕下在车库的工作台旁或在花园中快活地劳动……或快活地烧烤全牲。”①

这类教育以适应生活的名义，在许多校园，包括中学和大学，变成了事实。它且不是凭空想出用来阻止妇女的成长，不过它确实有助于阻止妇女的成长。当美国的教育家们最终开始调查我们民族的创造性智力资源的浪费状况时，他们发现失去了的爱因斯坦们、施威策②们、罗斯福们、爱迪生们、福特们、费米③们、弗罗斯特④们都是女性。美国中学毕业生的40%的最优秀者仅一半继续上大学；在另一半未上大学者中，**三个之中就有两个是女孩。**⑤当詹姆斯·B·科南特⑥博士走遍全国去探索美国中学存在的问题时，他发现太多的学生在学那些不能真正发挥他们智力的简易的基础知识课程。⑦而且，那些本来应该学物理、高等代数、解析几何、

---

① 怀特著，前引书，第79页，——原注

② 施威策（1875—1965），法国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人道主义者，曾获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③ 费米（1901—1954），美国物理学家，生于罗马，原子时代的主要开创者之一，曾获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注

④ 弗罗斯特（1874—1963），美国著名诗人，曾先后四次获普利策诗歌奖。——译注

⑤ 见戴尔·奥尔弗利著，《美国专业人才资源》，纽约，1954年版。——原注

⑥ 詹姆斯·B·科南特（1893—1978），美国教育家，1933年—1953年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译注

⑦ 见戴尔·沃尔弗利著，《美国的特殊才能资源》，纽约，1954年版。——原注

四年的语言课程的人却并没有学这些课程，其中大多数人都是女孩子。她们具备那种智力，那种不以性别为指导的特殊天赋，然而她们还具有那种认为这些学科是“非女性的”以性别为指导的态度。

有时一位女孩想学一门艰深的课程，但是顾问或指导教师建议说：那样做是浪费时间。例如，东部一所好中学的一位女孩想成为建筑师，她的顾问却坚定地劝告她不要申请进入任何建筑学的系科去学习，其根据是：在那种职业中，妇女十分罕见，无论怎样她也决不可能进入那种职业。她执拗地向两所授建筑学学位的大学提出申请，使她惊异的是，两所大学都接受了她。然后，她的顾问告诉她：即使她被接受了，在建筑学上妇女也是的确没有前途的；她会在制图室中度过一生。她被劝告去上一所初级学院，那里的学习比学建筑容易得多，而且她能学到结婚时她所需要的一切知识。

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对中学一级的影响或许比对大学的影响更为隐蔽有害，因为许多受到这种教育影响的姑娘永远也不会上大学。我偶然得到一份适应生活课程中一门课程的教学计划，这些课程是我居住的那个郊区县的初级中学正在传授的。其题目为“聪明的女孩”，它向11、12、13岁的女孩提出了功能主义的“约会注意事项”——一种对她们的性别功能的早期或强制性的承认。尽管许多女孩还未发育到有东西填满乳罩的程度，她们却被狡黠地告之，穿卫生衫就一定要戴乳罩，并且一定要穿上衬裙，这样男孩就看不透她们的裙子。难怪这所中学里许多聪明的女孩在二年级就充分意识到她们的性功能，她们对学校中的一切课程都感到厌倦，除了结婚生孩子外没有任何雄心壮志。人们不禁会怀疑，尤

其在这些女孩中的一些人还是中学二年级学生就怀孕而且十五六岁就结婚之时，在她们的其它能力未被认识之前，对她们进行性功能教育是否为时过早。

这种阻碍有才能的女孩无性成长的情况是全国性的。1955年，印第安纳州中学10%的优等毕业生中，仅15%的男孩没有继续他们的学业，而女孩中则有36%没有继续升学。①高等教育对于每一个想在我们爆炸性发展的社会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人已经不能缺少，恰恰是这样的年月里，**妇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却在逐年下降**。50年代，妇女也以比男子快得多的速度从大学退学；仅有37%的妇女毕业，与之对比，男子则达57%。②到60年代，同样比例的男孩中途从大学退学③。在这个为大学中的位置激烈竞争的时代，每两个男孩才有一个女孩上大学，女孩子经过了“更高要求的选择”，不大可能因为学业上的失败而中途退学。正如戴维·里斯曼④所说，妇女中途退学不是为了结婚就是因为她们担心过多的教育会成为“婚姻的障碍。”在过去15年里，第一次结婚的平约年龄降到了这个国家历史上的最低点，在西方世界各国中也是最年轻的，几乎同所谓的不发达国家过去的情况一样。在亚洲和非洲的新国家中，随着科学和教育的到来，妇女的结婚年龄现在正在上升。今天，部分地由于妇女教育上功能主义的

---

① 见“聪明的姑娘：未开发才能的一种主要源泉，”《指导通讯》，芝加哥，1959年第5期。——原注

② 奥尔弗利著，前引书。——原注

③ 约翰·萨默尔斯基著，“大学的退学学生”，《美国大学》，第631页。——原注

④ 戴维·里斯曼（1909— ），美国社会学家，《孤独的人群》（1950）作者之一。——译注

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美国人口的年增长率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几乎是西欧国家的三倍，差不多是日本的两倍，紧跟在非洲和印度之后。①

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们在这一潮流中起着双重作用：一是就姑娘的性别作用对她们积极地进行教育（没有那样的教育，她们也可能会以一种不太可能停止她们在其它方向上发展的方式完成她们的性别作用）；二是按照严格的智力观念，放弃他们对妇女进行教育的责任。无论受过教育与否，妇女都可能实现她们的生物作用，并体验到性爱和经历母亲阶段。但是如果未受过教育，妇女或男子都不大可能产生出超出生物功能的深刻兴趣。

教育应该并且能够使一个人"眼界开阔，善于吸收新鲜经验，有独立和受过训练的思维能力，献身于某种生产性活动，具有以对世界的和他对自己人格组成的理解为基础的信念。"②女孩这样成长的主要障碍是她们自己对妇女作用的僵化的先入之见，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们或者明确地增强这种先入之见，或者通过使她们不正视自己的冲破它的能力和责任来增强这种先入之见。

对1045位男孩和1925位女孩"上大学的动机因素"进行了调查之后，《美国的大学》那份长达1000页一大厚册的研究报告揭示了那种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困境。这份研究报告承认：不是主要地通过性作用而是通过工作（这使男孩子

---

① 约瑟夫·M·琼斯著，"人口过多意味着贫困吗？"国际经济发展中心，华盛顿，1962年。——原注

② 内维特·桑福德著，"作为社会问题的高等教育"，《美国的大学》第23页。——原注

在大学里不断发展）在社会里找到独立的身份，是十分必要的。女孩对大学里发展的逃避可由下述事实来解释：对于一位女孩来说，性别是唯一的身份；在这些学者看来，对于这位女孩来说，大学本身甚至不是通向更重要身份的关键，而是一种经过伪装的“性冲动的发泄口。”

对于男孩，身份的问题主要是职业事业的问题，而女孩对自我特征的理解更直接地取决于婚姻。大量的差异便从这种区别中产生出来。女孩的身份更加单纯地以她的性作用为中心——我将成为谁的妻子，我们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而男孩对自我特征的理解是围绕两个核心而形成的，他将成为丈夫和父亲（他的性作用的身份），然而他还将主要地成为劳动者。一种相关的差异便随之产生并在青春期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职业身份总的来说是一个可以早期就开始选择的个人问题，可以把一切合理的并且经过精心设计的方法和力量集中到这个选择方向。男孩能够较早地在这个方向开始思考和计划。……对于女性的发展是如此紧要的性身份则不允许那样有意识或有条不紊地做出努力。这是一个神秘而浪漫的问题，其中充满着虚似、神秘和幻想。一位女孩可以学习女性角色的某些表面技能和活动，但是，如果她对女性气质过分明显地有意识地做出努力，她就会被认为是粗野、不温柔。女性问题解决的真正核心——同一个所爱的男子亲密地生活——是一种未来的前景，对此不存在排练的问题。我们发现在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对于未来有不同的态度：男孩子们积极地为未来身份进行计划和试验，

明显地对各种选择进行筛选，努力寻找将最适合于他们特定的技能和兴趣、气质特征和需要的那种作用。女孩子们则相反，更多地沉溺于对男孩和名声、婚姻和爱情的幻想之中。

大学之梦对于更直接地专注于婚姻问题明显地起着一种代替物的作用：不打算上大学的女孩子更明确地表达了她们想要结婚的愿望，并对她们自己的性作用有一种更为扩展的意识。她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同时更坦率地关心性的问题。……把幻想当作性欲冲动的发泄口的观点是随一般精神分析的观念而产生的，那种观念认为：不能直接表达欲望会寻求某种得到满足的伪装的模式[①]。

这样，他们自然不会对一所中西部大学里70%的女新生用“寻找男人”作为答案之一来回答“你离开大学时希望干什么？”这个问题感到惊奇。他们还解释了想要“离家”，“旅行”等愿望的答案和与潜在的职业有关的答案，一半的女孩把这些职业当作“对性神秘的好奇”的象征而答出。

选择大学和旅行是因为在性问题上有更为开放的兴趣。中学毕业就结束学习的女孩子更接近于以早婚来承担一种成人的性作用，而且她们对于她们的性欲冲动和性作用有更为成熟的观念。在另一方面，要上大学的女子会推迟实现和解决性的认同问题，至少会暂时推迟。在这个过渡时期，性的能量通过一种幻想系统来得到转

① 伊丽莎白·杜万和卡曼尔·凯著，“大学入学中的动机因素”，《美国的大学》，第202—第206页。——原注

化和满足，这种幻想系统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学、大学生活的魅力，以及对一般感官享受的一种升华之上。①

为什么教育家们要完全以性的观点来看待女孩子，而且仅仅是女孩子呢？青春期的男孩子也有着可能被大学推迟实现的性欲冲动。但是对于男子，那些教育家并不关心性的“幻想”；他们关心的是“现实”，并且男孩子被期待着去取得个人的自主和身份，这一目标的实现是通过“使他们自己投身于我们文化中在道德上最有价值的领域——工作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将作为有公认的成就和潜力的人而得到承认。”即使男孩子自己的职业形象和目标在开初是不现实的——而这份研究报告则表明它们是不现实的——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们也知道，对于男孩子，动机、目标、兴趣、孩子气的先入之见等等都是可以转化的。他们还认识到，对于大多数男孩，转化的最后关键时机就在大学。但是，很明显女孩子未被指望发生转化，她们也未得到这种转化的机会。甚至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极少有女孩子受到男孩一样的教育。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们不是激发心理学家所建议的在女孩身上要自主的“潜在”欲望，而是激发她们女性的幻想，通过男子代理来实现其成就、地位和身份的愿望。他们不是对女孩子的孩子气的、僵化的、狭隘的关于妇女作用的先入之见表示异议，而是通过为她们提供只适合于家庭主妇的虚饰的文科课程的大杂烩，或者远远低于她们的能力并且只适合在大学和结婚之间的“临时”工作的狭

① 伊丽莎白·杜万和卡曼尔·凯：前引书，第208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隘的课程，如“公共营养学”，来迎合那种先入之见。

正如教育家他们自己也承认的那样，女子学院的教育常常并没有为学生提供一种有意义的知识来武装她们，使她们在毕业时或者以后进入商界或专业领域。这种训练并不适合未来的职业（是它验证教育是否合理），也不适合要求较高职业训练的工作。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赞同地说，对于妇女，大学是找男人的地方。如果大学校园如同一位教育家所说是“世界的最好婚姻交易中心”，那么可能两种性别都受到了影响。教授和学生都同意，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女孩子们是婚姻猎逐的进攻者。男孩子们，无论结婚与否，都在大学里施展他们的智慧，寻找他们的身份，填写好他们的生活计划；而女孩子在那里仅仅为了实现她们的性功能。

研究表明：数量日益增加的出于“幻想和适应生活需要”的动机而结婚的校园里的妻子中，90%或更多的人实际上在支持丈夫读完大学。①为了结婚生小孩或者为了接受一项工作以使丈夫完成学业而从中学或大学辍学的姑娘，会在高等教育假定要给以的那种智力发展和理解力上受到阻碍，这正如同过去童工阻碍了儿童身体发育一样确切无疑。在为了一种职业或一种所承担的义务而作的现实性准备和计划上，她也会受到阻碍，而那种职业或义务对于社会和她本人都有着一定的重要性。

在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努力教育妇女适应其性别和女性特征时，经济学家在美国的雇工问题上却指出了一个

① 埃斯特·劳埃德·琼斯著，《今日妇女和她们的教育》，《师范学院记录》第57卷第1期，1955年10月；第7期，1956年4月。另见奥尔佩·戴维著，《妇女的教育——未来的迹象》，美国教育协会，华盛顿，1957年。——原注

新的，革命性变革；在经济繁荣和衰退的涨落之中，他们发现对于未受过教育和没有熟练技能的人，在雇用机会上有一种绝对的、螺旋形下降的趋势。然而，当进行"妇女劳动力"研究的政府经济学家访问大学校园时，他们发现女孩子们未受到她们将在家庭之外的工作中度过成年生活中的25年或更长时间的那种统计概率的影响。甚至在大多数妇女都不再作为专门的家庭主妇度过一生这种情况是确定无疑之时，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却告诉她们，因为担心破坏她们性的适应，她们不要打算从事某种职业。

几年前，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终于渗透进了一所著名的女子学院，这所学院过去以它的大量毕业生继续在教育，法律、医学、艺术、科学、政府和社会福利各个领域发挥领导作用而自豪。这所学院有一位前女权主义者的女院长，她在想到所有那些像男子般受到教育的妇女时，或许开始感到有点内疚。送给了各种年龄的女毕业生的一份调查表明，大多数人对她们所受的不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感到满意；但是，少数人抱怨说，她们受的教育使她们过分地意识到妇女的权力和与男人平等的问题，对事业过分感兴趣，使她们具有一种令人烦恼不已的感觉，就是她们应该在社会上干些事情，她们应该至少继续读书、学习，发展她们自己的能力和兴趣。为什么她们没有被教育成幸福的家庭主妇和母亲呢？

那位感到内疚的女院长，她个人除了对有一大群孩子和事业上成功的丈夫外，对当院长感到内疚；也对在她的时代自己是一个热诚的女权主义者和在结婚之前就在事业上取得很大进展感到内疚；她受到治疗性的社会学家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她试图按她自己的不可能的、非现实的、过时的、

精力充沛的、自我要求的、幻想的非女性形象来塑造那些年轻姑娘。于是，她引进了一门关于婚姻和家庭的功能主义的课程，这门课程对所有的二年级学生都是必修课。

两年后，导致该学院作出撤消那门功能主义课程的决定的情况被秘密地掩盖起来了。与那个学院有着官方联系的人都不愿谈论这些情况。但是一位邻近院校的教育家，他本人就是一位功能主义的积极参与者，以一种轻蔑的口吻谈到了那种天真、错误的想法——他们明显地对那些学了功能主义课程的姑娘如此迅速地结婚感到十分震惊。（那个学校1959级就有75位妻子，这还只是有记录的，几乎占了仍留在那个年级的姑娘的1/4。）他平静地告诉我：

> 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姑娘们结婚早了一点就值得他们惊恐不安呢？只要有适当准备，早婚并没有什么不对。我想他们没有能抛弃那种旧观念，认为妇女应该受到教育以发展她们的智力。他们否认这一点，但是人们不禁会怀疑，他们仍然相信妇女应该有职业。不幸的是，对于某些教育家，妇女上大学去找一位丈夫的想法是令人诅咒的。

在所讨论的那个学院，“婚姻与家庭”作为一门社会学课程，经过调整使之适合于这些正在变化的社会建制的批判性分析，而不适合于功能主义的行动，或集体心理治疗，再度被列入课程表。然而，在那所邻近的学校中，为我提供资料的教授是正在迅速发展的“家庭生活教育”系的第二把手，这个系目前正在使上百名研究生作好准备到美国各学院、州立师范学院、初级学院、社区学院及中学去教功能主义的婚

姻课程。人们感觉到，这些新的、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确实把自己看作是十字军战士——讨伐知识界旧的、非治疗性的、非功能主义的价值观念，讨伐那种旧的、要求苛刻的、无性别的教育，那种教育把它本身限制在心灵的生活和对真理的追求上，并且甚至从未试图帮助姑娘去追求男子、获得情欲高潮或对性的适应。正如为我提供资料的人详细阐述：

这些女孩子关心的是约会和性，怎样和男孩相处，婚前发生关系是否合适。或许一个女孩在试图决定她的专业的同时，她也在考虑某种职业，她还在考虑结婚。这时，你建立一种角色扮演①的局面来帮助她找到出路——因而她看到了在孩子身上的影响。她认识到她不必对仅仅当一名家庭主妇而感到内疚。

当一位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被要求向未入门的人解释“功能主义的方法”时，常常有一种防御性的姿态。一位教育家告诉记者：

说大话——理性的概括、抽象的概念，联合国——固然不错，然而在某些场合我们不得不在更实在的程度上正视那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必须中止以教师为中心的状况，而变为以学生为中心。不是你认为学生需要什么，而是学生认为他们自己需要什么。这就是功能主义的方法。你走进一间教室，你的目的不再是涉及一定

① 指女性应在社会中扮演具有女性特征的女性角色。——译注

的内容，而是造成一种气氛，使你的学生感到舒适自在，并且以基本的言语而不以虚饰的概括来自由地谈论人际关系问题。

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们容易产生非常理想主义的看法。她们认为她们能获得一套不同的价值观念，与一位背景不同的男孩结婚，而这在以后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要使她们明白这事关系重大，这样她们就不会轻易地步入不同背景的婚姻中以及其它陷阱中。①

这位记者问道，如果教师不从事教学，如果没有要学的或要谈论的材料，如果唯一的目的是帮助学生理解个人问题和感情，为什么大学里还要教“配偶选择”、“对婚姻的适应感”和“家庭生活教育”这些课程呢？在为《小姐》杂志调查了一系列婚姻方面的课程后，她得出结论：“只有在美国，你才会在无意中听到一个本科生十分坦率地对另一个本科生讲，‘今天你应该来上课。我们谈论了男性的角色扮演，而且有两个人真地解开了衣服，露出了身体。’”

角色扮演的要点，是一种从小组治疗法改造而来的技巧，使学生“在感情层次上”理解问题。当那位教授邀请她们“体验”“一对青年男女在新婚之夜”的感情时，毫无疑问会激起比一般大学课堂里出现的感情要强烈得多的感情。

当那位教授耐心地倾听害羞的学生就个人感情问题所作的没完没了的发言（“唠唠叨叨”），希望激发“小组的顿悟”的时候，有一种虚假治疗性的气氛。但是，尽管功能主

① 玛丽·安·吉塔著，“大学婚姻课程——有趣还是欺骗？”，《小姐》杂志，1961年2月号。——原注

义的课程不是小组治疗，它却肯定地通过操纵学生的感情来灌输意见和价值观念；并且在这种操纵的伪装下，它不再受到其它学科要求的批判思想的影响。

那些学生把教科书中解释弗洛伊德或引用玛格丽特·米德的那些零碎东西当成了福音；她们没有来自心理学或人类学的实际研究的参照系统。事实上，通过明确地禁止大学研究中通常的批判性态度，这些伪科学的婚姻课程所提供的意见常常并不比大众的意见、科学定律更多。这种意见目前可能在精神病学界是时髦的，或者已经过时了，但是它常常只是一种偏见，用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行话及精心选择的统计数据来支撑，以产生不容置疑的科学真理的外表。

对婚前性交的讨论通常导致“那是错误的”这样一个科学的结论。一位教授选用统计资料，建立了他反对婚前性交的实例，这些资料表明婚前性交的经验容易使婚姻的适应更加困难。学生不会知道反驳这一点的其它统计资料；假如那位教授知道这些统计资料，他也能在功能主义的婚姻课程中随意地把它们当作非功能主义的东西而置之不理。（“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学生需要一些准确的权威性的知识。”）“只有例外的妇女才能献身事业，获得成功”，这是功能主义的“认识”。当然，由于在过去，大多数妇女都未有过事业；那少数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的妇女便都是“例外的”了。正如背景不同的婚姻是“例外的”，婚前性交对于一位姑娘也是例外的。全都是低于51%的现象。功能主义教育的全部要点似乎常常是：今天51%的人口所干的，明天100%的人口都会去干。

因而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劝阻姑娘们除了“正常地”献身于婚姻和家庭之外，不要从事任何职业，以此来促

进她们适应生活。有一位这样的教育家比想象中的角色扮演还走得更远，她把真正的、以前工作过的母亲带到班上来，讲述早晨她们离开她们的孩子时所感到的内疚。不知怎么地，学生很少听到有成功地冲破了常规束缚的妇女。例如，一位年轻女医生，当她生孩子时，她的姐姐照料她的诊所；一位母亲顺利地把她的婴儿的睡眠时间调整到她的工作时间；一位幸福的信奉新教的姑娘同一位天主教徒结了婚；一位性方面冷淡的妻子的婚前经历似乎并未伤害她的婚姻。这位功能主义者并未对"例外的"事例予以实际的关注，尽管他常常审慎地承认确实有例外的情况。（在教育界行话中，"例外的"孩子带有不利条件的含义：盲人、跛子、智力低下者、淘气精、蔑视常规者——以任何独特的方式与众不同的任何人，只要他具有众人视为羞耻的特征，他便是"例外的"。）不知怎么地，那些学生得出一个结论：她们不想成为那种"例外的妇女"。

顺从以许多方式成了适应生活的教育的组成部分。单就学习适应而言，很少有或干脆没有智力上的挑战或训练。几乎在每一所学校里，无论教授们如何急切地通过布置繁重的阅读和每周写读书报告来力图使婚姻课程变得难学，这门课仍然是最容易学的课程。没有人指望个案材料（当为了不严肃的用途而阅读它们时，它们并不比精神病学的连续广播剧更有意义）、角色扮演和在班上谈论性的问题、或写个人的文章会导致批判性的思维；那不是对婚姻所作的功能主义的准备的要点。

这不是说对社会科学那样的研究在妇女或男子身上会产生顺从。当以智力训练的通常目的为动力来批判地学习一门社会科学时，或者当为了职业用途的目的来掌握它时，很

难产生那样的效果。但是对于被新的女性的奥秘禁止从事职业性和智力性的工作的姑娘来说，学习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常常只是“功能主义的”。而且在功能主义课程本身之中，这些姑娘从弗洛伊德和米德那儿取得了一些零碎的东西，如性别的统计资料，角色扮演的见识。她们取得这一切不仅是照字义地、脱离上下文地、而且是亲身地——在她们自己的生活中去身体力行。归根到底，这就是适应生活教育的全部要点。在青少年中，这种情况能发生在涉及基本感情素材的几乎任何课程上。当那种素材被有意地用来不是增加批判性知识而是激起个人情感时，这种情况将肯定发生。正统的精神分析传统疗法为了让恰当的情感产生并渲泄出来，要求抑制批判性思维(理性的抵抗)。在治疗中，这可能起作用。但是，同治疗混杂在一起的教育会起作用吗？在任何一位男子或妇女的生活中，一门课程几乎不可能是关键性的，但是当明确了妇女教育的真正目的不应是智力的发展而应是性别的适应时，某些问题就可能是十分关键的了。

人们可能会问：如果适合于人智力发展的一种教育削弱了女子气质，那么适合于女子气质的一种教育将会削弱智力的发展吗？如果女子气质会被使智力发展的教育摧毁，或者通过不让智力发展而被引起，那么到底什么是女子气质呢？

人们甚至可能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提问题：当性别对于妇女不仅成了本我，而且还成了自我和超我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教育不是专注于发展自我而是专注于发展性别功能时，会发生什么情况？当教育赋予女性“应该的事情”以新的权威——这些“应该的事情”已经具有传统、常则、偏见、舆论的权威——而未赋予妇女批判性思想、独立和自治的力

量来对盲目的新老权威提出疑问之时，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罗德艾兰州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的彭布罗克女子学院，一位客座精神分析学家最近应邀主持一次关于“作为妇女意味着什么？”的吵吵嚷嚷的讨论。当那位客座精神分析学家玛格丽特·劳伦斯博士以简单的，非弗洛伊德的英语说：大多数劳动妇女过去习惯做的事情现在都在家庭之外做了，同时家庭的每个其他成员都在家庭之外度过大部分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要告诉妇女她们的主要位置是在家中，这是相当愚蠢的，学生们听了都似乎感到窘困不安。教育她们加入家庭的其余成员之中，走出家庭，到世界中去，这难道不更好吗？

不知怎么地，这并不是这些姑娘期待从一位女精神分析学家那儿听到的东西。不像通常功能主义的，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课程，它打乱了常规的女性的“理所应当的情况”。它还暗示她们应该对她们的教育和前途开始作出自己的某种决定。

功能主义的课程对于还未完全摆脱儿童期特点、不稳定的二年级学生更具有安慰作用。它不蔑视舒适、安全的常规；它给予她复杂的词语以使她接受她父母的观点，大众的观点，而不必思索她自己的观点。它还使她放心：她不必在大学里工作，她可以懒散，凭冲动行事。她不必为了未来的目标而推迟眼前的行乐；她不必为了一篇历史论文而读八本书；不必学困难的物理课，因为它可能给她一种男性情结，毕竟那本书不就是那么说的吗：

妇女的理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宝贵的女性特征

为代价。……所有观察资料都表明了这样的事实：理性的妇女是男性化的；在她身上，热烈，直觉的知识屈从于冰冷无益的思想。①

要领会这一点，一位姑娘不必那么懒惰，那么缺乏信心。思维毕竟是艰苦的工作。事实上，她只有对她自己的热烈、直觉的知识进行某种非常冷静艰苦的思考来向这种权威性陈述挑战。

几代具有优秀头脑和火热精神的美国女大学生接受了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的这种信息，在她们变得如此“理智”，以致上天不容，她们不能“以女性的方式”享受性生活之前，就逃离了大学和事业去结婚生孩子，这样的情况是不足为怪的。

即使没有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的帮助，随着美国智力和精神成长起来的姑娘也会很快就学会凡事小心谨慎，“随大流”，不要真诚直率。她学会不过分努力工作，不过分经常地思考，不提出过分多的问题。在中学，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姑娘们因为担心被划分成“智力”型的人而不愿在班上大胆讲话。许多研究报告证实了这个现象②；任何聪明的姑娘或妇女都能根据个人经验来证明这一点。布林莫尔女子学院③的姑娘们在有男孩子在周围时，有一种使用特别术语的谈话方式，这与她们不担心让自己的智力显露出来时

① H·多伊奇著，前引书，第1卷，第290页。——原注

② 米拉·科马罗夫斯基著，前引书，第70页。——原注

③ 美国著名女子学院，在宾夕法尼亚州。——译注

她们能允许自己讲的真话形成了对照。在男女同校的大学里，姑娘们主要根据自己的性功能，既被别人，也被她们自己仅仅被看作约会对象和未来的妻子。她们不是寻找她们自己而是“在他身上寻找我的安全”，同时，每一次自欺欺人的行为都使天平进一步从本体向被动的自卑倾斜。

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梅隆研究报告发现，一些瓦萨女子学院的高年级学生与新生相比，在四年中显示了一种长足的进步——向着个性和本人才能的充分发挥的成长，科学家们现在知道这种成长发生在人的20来岁，甚至30、40和50来岁，远在身体生长期结束之后。但是许多姑娘却没有表现出成长的迹象。这些人成功地抵制了专注于思想、大学的学业、需要智力的各种学科、以及更广泛的价值观念。她们抵制了智力的发展和自我发展，而赞同具有“女子气质”，不要过分有头脑，不要过分感兴趣，不要与其他姑娘过分不同。这并不是她们实际的性别兴趣进行干涉的结果；实际上，心理学家得出这样的印象：对于这些姑娘中的许多人，“对男人和婚姻的兴趣是对智力发展的一种防御。”对于这样的姑娘，甚至性别也不是真实的，而仅仅是一种顺从。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对这种适应性也找不到岔子。但是考虑到其它证据，人们可能会问，这样一种适应能够遮掩成长上的失败吗？这种失败最终成了人的一种缺陷。

几年前，一组加利福尼亚的心理学家曾对140名聪明的青少年的发展进行追踪研究，他们注意到在一些10多岁孩子的记录上，智商曲线突然出现急剧下降。当他们调查这一情况时，他们发现当大多数青少年的智商曲线保持在同样高度的同时，年复一年那些其曲线下降的人全部都是女孩。这种下

降与青春期的生理变化毫无关系；它并未出现在所有女孩身上。但是，在那些智力下降的女孩的记录中，反复发现了大意是"对于女孩子来说，要成为聪明的人这一想法并不太聪明"的说法。在某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这些女孩在十四五岁时，由于使她们与女性的形象相符而在智力发展上受到阻碍。

事实是，今天的女孩和那些负责对她们进行教育的人确实面临着一种选择。她们必须带着伴随成长的所有痛苦在适应性、一致性、避免冲突、疗法——或者个性、人的身份、在最真实意义上的教育之间作出决定。但是，她们不必正视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用防止失去女子气质和防止性的挫折这样可怕的警告来描绘出的错误选择。因为研究过瓦萨女子学院姑娘的感觉敏锐的心理学家揭示了一些变得真正专心致志于她们的教育的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令人吃惊的新证据。情况似乎是：那些显示了成长的最明显迹象的高年级学生，就具有较少被动性和常规性这一点来讲，她们具有更多的"男子气"；但是，在内在感情生活上和满足这种生活的能力上，她们具有更多的"女子气"。她们还取得了较高的分数，远比作为新生时高，高到了一般假定用来测定神经病的一定等级。那位心理学家评论道："我们到了把在那些等级上增高视作教育发生作用的证据的地步。"① 他发现有着冲突的姑娘比那些不希望变得独立的、已适应的姑娘显得更为成熟。适应得最少的人也就是取得较大发展的人——"已经为进一步的变化和更大的独立性作好了准备"。在总结瓦萨

① 哈罗德·韦伯斯特著，"一些定量分析的结果"，见《大学时代的个性发展》；内维特·桑福德编，《社会问题杂志》1956年第12卷第4期。——原注

学院的研究时，它的指导者也不能避免这个心理学的反论：对妇女的教育确实使她们的女子气较少，适应的程度较低，但是它使她们成长了。

> 具有较少的“女子气”是同受到更多的教育和更为成熟紧密相连的。……然而，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有趣的：可能主要来源于生理学和早期识别的**女性的敏感性**在大学四年中并未减少；“女性的”兴趣和女性作用的行为，即常规性和被动性，可被理解为较晚的并且更为表面性的获得物，因而随着个人变得更加成熟并受到更多的教育就更容易减少。……
>
> 人们可能会说，如果我们只对稳定性感兴趣，我们最好还是安排一种教学大纲使新生保持原样，而不要试图增加对她们的教育，增加她们在性别作用行为方面的成熟性和灵活性。高年级学生更加不稳定，因为需要被稳定的东西更多，她们的身份也更加不确定，因为更多的可能性向她们敞开着。①

然而，毕业后，那样的妇女在向自治成长的道路上仅能达到“中点”。她们的命运依靠于“是否她们进入了一个她们能继续成长的环境，或者是否她们找到了某些迅速而倒退的方式来解除压力。”逃入婚姻之中是解除那种压力最容易、最迅速的方式。在专注于妇女向自治成长的教育家来看，那样一种

---

① 内维特·桑福德著，《大学时代的个性发展》，《社会问题杂志》1956年第12卷第4期。——原注

婚姻是“倒退”。在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看来，它是女子气质的实现。

另一所学院的一位治疗学家对我谈到了那些从未投身于学业或学院的任何其它活动的姑娘，当她们的父母拒绝让她们退学去同在他们身上找到“保障”的男孩子结婚时，她们感到她们要“身心崩溃了”。当这些姑娘在外来帮助下，最终投身于学业时——或者通过参加诸如学生管理机构或校办报纸这样的活动而感到一种自我意识时——她们便失去了对“保障”不顾一切的需求。她们大学毕业了，参加了工作，同更成熟的年轻男子一道外出，现在在一个大不相同的感情基础上结婚了。

和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不同，这位职业治疗学家感到那位在高年级几乎要身心崩溃，并且面临着对自己的未来作出个人决定的姑娘——甚至面临着教育所给予她的价值观念、兴趣及能力和家庭主妇的常规作用之间的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仍然比已适应了的、镇静、稳定的姑娘“更为健康”。在后者身上，教育丝毫没有“产生作用”，并且她顺利地从作为父母的孩子的角色走向丈夫的妻子、传统的女性，而一直未觉察到痛苦的个人身份问题。

然而事实是，今天大多数姑娘不让她们的教育“产生作用”；在让教育产生作用之前，她们就停止了自己的发展。在史密斯学院的姑娘身上，在其它学院我采访过的姑娘身上，我都能看到这种情况。这在瓦萨学院的研究中十分明显。瓦萨学院的研究报告表明，正当姑娘们感到了冲突、日益增大的身份问题的痛苦之时，她们便停止了发展。她们或多或少有意识地阻止了自己向扮演女性角色方向的发展。或者，换一句

话说，她们逃避有助于成长的进一步的经历。直到现在这种对成长的阻碍或逃避被认为是正常的女性的适应。但是当瓦萨学院的研究追踪读完了高年级——那时她们处在个人成长的一种痛苦关键阶级的边缘上——离校进入生活，在生活中扮演常规女性角色的大多数妇女之时，便出现了下述事实：

1、这些妇女离开大学20或25年，经测定在包括了智力、感情和个人的成长的全部范围的"发展尺度"上，她们比高年级学生低 。她们并未失去在大学里取得的一切（她们过去的分数还是比现在的新生高），但是——尽管在21岁时就为进一步成长作好了心理上的准备——她们并未继续成长。

2、这些妇女大多已适应了作郊区家庭主妇，尽职的母亲，活跃在她们的社区里。但是除了职业妇女外，她们都未继续深入追求自己的兴趣。似乎有某种理由使人相信：成长的中止与缺乏深刻的个人兴趣、缺少一种个人的献身有关。

3、这些20年后使心理学家最烦恼的妇女都是最合乎常规的女性——这些妇女即使在大学时，也是除了对找一位丈夫之外，对别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①

在瓦萨学院的研究中，有一组学生在高年级时既未遭受冲突的痛苦到接近身心崩溃的程度，也未停止自己的成长而

① 默文·B·弗里德曼著："对大学校友的研究"，《美国的大学》第878页。——原注

逃入婚姻之中去。这些是为从事一种职业而作准备的学生，她们在大学里获取了深刻的兴趣足以使她们自己投身于一种职业。这份研究报告揭示了：所有那些有职业雄心的学生实际上都打算结婚，对于她们，婚姻是她们将自愿选择参加的一种活动，而不是对于任何个人身份的意识十分必需的某种事情。这些学生有一种清楚的方向意识，她们比大多数人都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信心。她们可能订婚或深深地坠入情网，但是她们并不认为如果她们希望结婚，她们就必须牺牲自己的个性特征或事业上的抱负。对于这些姑娘，那些心理学家并未得出如同从许多姑娘那里产生的那种印象：对男人和婚姻的兴趣是一种对智力发展的防御。她们对某个特定男人的兴趣是真实的。同时，它并不影响她们的教育。

但是，当瓦萨学院的研究报告的指导者向他同事的一个专门小组描述这样一位姑娘，“她不仅取得最高分，而且在她身上有极大可能性将来从事学术性的或职业性的工作”，这时，女性的奥秘使美国教育家们洗心革面而达到的程度显示出来了：

> 朱莉·B的母亲是一位教师、学者，也是家庭的推动力。……母亲指责父亲过于懒散了。如果他的妻子和女儿有高级趣味的爱好和思想，只要这些东西不针对他自己，父亲就毫不在乎。朱莉成了一个成天在家外的“野”姑娘，一个不守规矩的人，随意支配她的哥哥，但是，如果她没有读要求读的书或者如果平均分数下降，她就会内心不安。她决不放弃自己要读研究生并成为教师的心愿。哥哥现在是大学教师了，朱莉本人现在是研究生

了，她同一位学自然科学的研究生结了婚。

当她还是大学一年级学生时，我们把对她的调查材料未加任何解释交给了一组精神分析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按我们的看法，她是一位真正大有前途的姑娘。而一般人却问："她有什么毛病？"一般人的意见是：她需要心理治疗。实际上，她在二年级时就已同她那初露头角的科学家订婚了，她日益清楚地意识到她自己会成为一位知识分子和局外人，但是她仍然不能不顾她的学业。她说，"要是我有些课不及格就好了"。

今天只有非常大胆的教育家才敢攻击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路线，因为实质上，他必须向传统的妇女形象挑战。这个形象说妇女是被动的、依附性的循规蹈矩的人，不具有批判性思想或不能对社会作出创造性贡献；按照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最好传统，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继续使她们如此，正如在较早的年代，缺少教育也使她们如此。没有任何人曾经问过，一位被动的、女子气的、简单的、依赖性强的妇女——在一个原始村庄或在一个郊区——是否真正就比一位在大学里献身于超乎家庭的严肃兴趣的妇女享受到更大的幸福，更完美的性生活。直至最近，俄国人把人送入太空，环绕月球运行，在这样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人问，适应性是否应该是教育的目的。事实上，如此专注于妇女的适应问题的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们可以快活地列举关于美国家庭主妇的种种不祥事实——她们的空虚、懒散、厌烦、酗酒、吸毒，因发胖、疾病而身心崩溃，以及40岁后的绝望，此时她们的性功能已得到满足了——而不从他们教育全体妇女达到

这个单一目的的讨伐运动上偏离一点。

因而，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们用三条轻率的建议剥夺了妇女在40岁之后还可能生活的30年，这三条建议是：

1.学一门“家庭主妇须知的法律和规则”的课程。当她成了寡妇时，她就能够处理保险、税务、遗嘱、投资等问题。

2.男人可以早些退休以陪伴他们的妻子。

3.短暂地投入“自愿的社区服务、政治、艺术或其它活动”——然而，由于妇女将不会受到专门训练，投入这些活动的主要价值将是个人的治疗。“只选一个例子来讲，一位想要某种新鲜经验的妇女可以开展一场运动来取消她所在城市或乡村的广告牌——我们现代世界的那种令人恶心的湿疹。

虽然广告牌会继续存在并或像细菌一样成倍增长，大量出现在风景胜地，但是至少她将上一堂生动活泼的关于地方政治的成人教育课。然后，她可以松弛一下，再献身于她所毕业的那所学校的校友活动。许多到达中年的妇女在使自己投身于她的学院不断发展的生活中，在扩展她的母性本能（既然她自己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去爱生活在校园里的新一代学生时，找到了新的活力和热情。①

他说，她也可以干非全日性工作，但是她不应夺走必须

①林恩·怀特著，前引书，第117页。——原注

养家的男人的工作，并且事实上，她也不会有一种非常“令人兴奋的”工作所要求的技艺和经验。

> ……对有经验并且可靠的妇女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她们能够在固定的日子或下午解除年轻妇女的家务负担，这样，年轻妇女可以发展对社区活动的兴趣，或者从事她们自己的非全日性工作。……多年来任何时候都干了大多数家务的有文化教养的妇女没有理由要从这样的安排中退缩。①

如果女性的奥秘没有消除她的幽默感，一位妇女则可能嘲笑对她那代价高昂、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使她适应的生活的那种坦率的描述：偶尔校友重聚和帮别人干家务。可悲的是，在弗洛伊德、功能主义和女性奥秘的时代，几乎没有教育家逃脱了他们自己的性歪曲的价值观念。马克斯·勒纳②，甚至里斯曼也在《孤独的人群》中，建议妇女不必通过对社会富于成效的贡献来寻求她们自己的自主权——她们通过玩耍可能会更好地帮助丈夫坚持他们的自主地位。因而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把最近几代有才干的美国妇女与在美国生活主流中充分发挥她们才干的机会隔离开了，这正如平等而隔离的教育把能干的美国黑人与这种机会分隔开一样确实无疑。

要说在这个一致性的时代，大学并未真正地教育过任何

① 林恩·怀特著，前引书，书第119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② 马克思·勒纳（1902——），美国教授，教育家。——译注

人，这个说法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雅各布报告① 驳倒了对美国大学的这种一般性控告和由桑福德及其小组提出的更为复杂的控告，这份报告不承认下述观点：大学教育没有使妇女具有超出性别作用的个性，无疑是一种使那种一致性不朽（如果不说创造那种一致性）的关键因素，而现在教育家们却在十分时髦地攻击着那种一致性。因为下述情况是根本不可能的：教育妇女如此早而彻底地献身于她们的性角色——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妇女在取得一种被动目标时，确实能非常主动——而不把男子拖入同样的舒适圈套之中。实际上，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通过早婚轻而易举就使妇女失去了个性。而且过早地献身于任何角色——无论婚姻或职业——都封闭了各种活动领域中的经验、考验、失败与成功的大门，而这些对于一个要达到完全成熟，取得独特个性的人都是十分必要的。

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们认识到了过早的家庭生活有阻碍男孩成长的危险性。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最近指出：

> 过早的家庭生活一直是大多数未开化的人、大多数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特点。……如果有了婴儿，那就意味着父亲的学期论文同婴儿的奶瓶搅缠在一块儿了。……学生过早的婚姻使男孩子太早专注于家务，以致于他们没有充分的智力发展机会。他们没有机会把他们的全部时间用于个人发展，这不一定是呆在图书馆里的那种学

① 见菲利普·E·雅各布著，《大学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纽约，1957年版。——原注

> 习，而是指已婚学生没有时间去体验、去思考、去彻夜不眠地阅读。而这种个人发展不仅对于知识份子是重要的，而且对于打算要成为这个国家未来的政治家、律师、医生以及种种专业人员的男孩子也是重要的。①

但是那些由于婴儿的奶瓶，不能甚至永远不能写学期论文的姑娘的情况又怎样呢？由于女性的奥秘，很少有人把它看作一种悲剧，从而她们在那样一种热情、一种职业、生活的一种角色中使自己陷入圈套。60年代初期的高级教育家们有着一厢情愿的幻想，想把妇女的教育推迟到她们生了孩子之后。由此他们承认：他们几乎一致地使自己习惯于方兴未艾的早婚现象。

但是通过选择妇女特性而超越达到完整个性的痛苦成长过程，通过永远不取得自我的坚强核心（这核心不是来自于幻想而是来自于对现实的掌握），这些姑娘注定最终要受到厌倦的、扩散的感情的折磨，这是一种无目的，不存在，不卷入可称为反常状态的世界的感情，或是一种缺乏个性的感情，或是一种仅仅作为不可名状的问题而感受到的感情。

然而，要使教育成为替罪羊真是易如反掌。无论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的错误怎样，其他教育家曾进行了一场徒劳、无效的后卫战，力图使有才干的妇女“展望新的目标并通过达到这些目标而成长起来”。归根到底，在这块自由土地上成百万的有才干的妇女，她们自己选择了不使用教育

---

① 玛格丽特·米德：“对早婚的新看法”，《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专访，1960年6月6日。——原注

可能为她们打开的那道大门。这样竞相跑回家的选择和责任最终在于她们自己。

错误的选择

一种奥秘不会强迫它自己接受。女性的奥秘强迫美国妇女“洗掉”头脑中的男女平等的意识达15年之久，一定是满足了那些为了别人而利用它的人和那些为了自己而接受它的人的真正需要。所有妇女或所有这种奥秘的提供者的需要可能不尽相同。但是，在这段特定时间的美国，有着许多使我们成为容易受这种奥秘吸引的人的需要；这些需要是如此强大，以致于我们中止了批判性思维，正如人们在面临直觉的真理时所做的那样。问题在于：当需要强大到足够的程度时，直觉也能躺下睡大觉。

正好在女性的奥秘控制美国之前，发生过一场战争，它紧随在一场

经济萧条之后并以原子弹的爆炸而结束。在战争的孤寂和原子弹的不可言喻的恐怖之后，为了抵御那令人惊恐的不确定感，抵御变化着的冷漠巨大的世界，男男女女都寻求家庭和孩子的舒适现实。在散兵坑中，美国大兵们把蓓蒂·葛兰宝①的相片贴在墙上，而他们要听的歌却是摇篮曲。当他们退伍时，他们年龄都太大而不适于回家呆在母亲身边了。在男人和妇女、男孩和女孩身上，对于性和爱的需要都是真切的实在，但是为什么在此时它们对于如此多的人似乎成了仅有的需要呢？

我们都变得脆弱、思乡、孤独、惊恐不安。不同的几代人同时感到了对婚姻、家庭和孩子有一种被抑制的欲望；在战后美国的繁荣中人人都能突然满足这一欲望。因为战争使外表显得比实际年龄大的年轻士兵能够通过重建他童年时代的家而消除孤独，满足他对爱情和母亲的需要。他不用等到大学毕业找到职业才同许多姑娘约会，他能够靠美国军人津贴结婚，并给他的婴儿以温柔的母爱，这种母爱由于他不再是幼儿，不能为自己寻求。然后有稍微大一些的男子：其婚姻因战争而推迟了的25岁的男子，现在他们感到他们必须弥补失去的时光；30多岁的男子，他们的婚姻先是由于经济萧条，后是因为战争而受到影响，或者要是结了婚，也因上述原因而未能享受到天伦之乐。

对于姑娘们，那些孤独的年月增加了她们寻求爱情的紧迫感。在30年代结婚的那些人送她们的丈夫上了战场；在4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些人不无理由地担心她们可能永远得不到

① 蓓蒂·葛兰宝（1916—1973），美国电影女演员。——译注

爱情、家庭和孩子，几乎没有妇女愿意放弃这些东西。当男人们回来时，出现了一股结婚的潮流。丈夫或未来的丈夫离家参战或许可能被落下的炸弹送命的那些孤独的年月，使得妇女特别容易受到女性奥秘的影响。她们被告之，战争加在她们生活上的冷寂孤独是她们为了职业、为了家庭之外的任何兴趣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这种奥秘清楚地说明了一种选择——爱情、家庭、孩子，或者生活中的其它目标和追求。如此众多的美国妇女被赋予了这样一种选择，把爱情作为她们的全部目的，难道谁还会对此感到惊奇吗？

每个国家都出现了战后年代婴儿猛增的现象。但是这种现象在大多数其它国家都没有那种女性满足的神秘气氛。随着10多岁年龄的人结婚和怀孕的增多，以及家庭规模的增大，它在其它国家并未导致更大规模的婴儿猛增。有三个以上孩子的美国妇女人数在20年里翻了一番。而受过教育的妇女在战后多生孩子的竞赛中居于领先地位。①（在我之前的那一代，即生于1910至1919年间的妇女，变化最为剧烈。在她们20多岁时，她们的低怀孕率导致了这样的警告：教育会使人类灭绝；在她们30多岁阶段，尽管随着年龄上升，怀孕率下降，生育能力进一步降低，她们却突然显示了怀孕率的剧烈上升。）

战争之后总是有更多的孩子降生。但是，今天美国的人口爆炸主要来自于10几岁的人的婚姻。根据大都会人寿保险

① 见《联合国人口统计年鉴》，1960年，第99—118页，476页—490页，第580页。——原注

公司的数据，10几岁的人生出的孩子数在1940至1957年间增加了165%。一般应该上大学，结果却离开了或放弃上大学去结婚的姑娘（十八九岁成了今日美国姑娘司空见惯的结婚年龄；美国妇女中的一半人在20岁时都已结婚）就是这种奥秘的产物。她们真诚地相信作为妻子和母亲会"圆满地实现"人生的目的，从而毫无疑虑地放弃了教育。我想，今日的一位姑娘从统计数字或单纯从观察中就能了解到，如果她等到大学毕业或完成职业训练时才结婚，那时大多数男人会同其他女子结婚，她就有同40年代战争给予姑娘的影响一样充足的理由担心她会错过实现女性角色的机会。但是，这仍不能解释为什么她们中途辍学以支持她们的丈夫，而男孩子却继续他们的学位。

这种情况在其它国家却并未发生。即使在战争期间，那些失去了更多的男人并有更多的妇女被迫永远失去结婚机会的国家中，妇女也没有惊慌失措地再次跑回家。而且在今日的其它国家中，姑娘同男孩子一样对教育怀有如饥似渴的强烈欲望，因为那是通往未来的大道。

战争使得妇女特别容易受到这种奥秘的左右，但是引起种种挫折的战争并不是她们再次走向家庭的唯一理由。这种现象也不能用"仆人问题"来解释，那是受过教育的妇女常找的一种借口。战争期间，厨师和女仆都去军工厂工作，仆人问题显得比近年来严重得多。但是在那时，有志气的妇女常作出一反常规的家庭安排以坚持她们从事的职业。（我知道有两位年轻的战时母亲，当丈夫在海外时，同心协力坚持工作。一位是演员，在另一位干研究生的工作时，她在上午照料两人的婴儿；另一个人则在下午照料婴儿，她就去排

练或演出。我还知道一位妇女，她把她的婴儿夜晚和白天的生活时间安排加以改变，这样在她在学院学习的时间里她的孩子则在邻居家里睡觉。）同时，在当时的城市里，有工作的妇女也有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和孩子日托中心的情况。

但是在战后年代，妇女，甚至包括那些有能力请保姆或女管家的妇女都选择自己来照料家务和孩子。50年代在城市里，为有工作的母亲而设立的托儿所和日托中心几乎都消失了。只要一提出她们需要托儿所和日托中心，就会引起受过教育的家庭主妇以及女性奥秘的倡导者们的强烈抗议。①

当然，战争结束时，美国军人回来参加工作并填满学院和大学中曾一度大部分由姑娘占据的位置。有一段短暂的时间，竞争是激烈的并且旧的反女性的歧视在商业和各种职业中复活，使得女孩子难于保住工作或在工作上取得进展。这无疑使得许多妇女匆忙去寻求婚姻和家庭的保护。对妇女的不易察觉的歧视，更不用说性别上的工资差异，仍然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它的影响几乎同女权主义者面临的公开反对一样具有破坏性并且同样难于对付。例如，《时代》杂志的一位女调查员，无论她的能力如何，她决不可能指望成为作家，那条不成文的法律使男子成为作家和编辑，而使妇女成为调查员。她并不因此而恼怒；她喜欢她的工作，她喜欢她的老板。她不是一位女权主义的参与者，这不过是报业协会的一个事例。不过它却令人沮丧。如果她永远也不会取得任何成就，为什么还要继续干下去呢？

在妇女已经并且能够胜任一项较好的工作时，她们常常

---

①见"有头脑的妇女"，《纽约时报杂志》1960年1月7日。——原注

痛苦地被赶出她们选择的领域，她们被男子取代了。在某些工作中，妇女必须满足于干工作，而男人却得到名利。或者，假如她得到了一个好工作，她就得面临男人的怨恨和敌意。由于在美国的大公司中，在各种职业中，向上的竞争对于男子是如此激烈，同妇女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并且通过引用那条不成文的法律就能十分容易地取胜。战争期间妇女的能力和不可避免的竞争受到了欢迎；战后，她们面临了那种彬彬有礼但却无法穿透的敌意的帷幕。对于一位女人来说，去爱与被爱和找一个不同男人竞争的借口是容易的事情。

在经济大萧条时期，虽然供竞争的位置较少，有才干，有志气的姑娘仍然为了追求她们的事业而作出了牺牲，同偏见作斗争，并且敢于竞争。许多人并未看到在事业和爱情之间存在任何矛盾。在繁荣的战后年代，所有职业中都有相当多的工作和职位；确实没有必要为了爱情和婚姻而放弃一切。受教育较少的姑娘最终没有离开工厂而回去当女仆。自大战以来，工业部门中妇女的比例一直在稳步上升——但是在需要专门训练、能力和个人献身的事业和职业中，妇女的比例却并非如此。①"我通过我丈夫和孩子来生活，"我同时代的一位坦率的妇女告诉我，"那种方式容易一些。在现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利用这种方式，作为女人就容易一些。"

在这种意义上，这位妇女身上所发生的情况正是战后年代中发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情况的一部分。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过去曾一度有勇气正视，而现在，我们却找到借口不去正

① 见全国劳动力委员会，《妇女劳动力》，纽约，1957年。——原注

视这些问题，美国精神进入一种奇怪的休眠状态；无论男女、惊恐的自由主义者、幻想破灭的激进份子、保守份子都因这种变化而感到困惑和泄气——全国都停止了发展。我们全体都回到温暖明亮的家，回归到孩提时代的生活方式：我们在楼上平静地睡觉，而我们的父母不是读书就是在起居室打桥牌，或夏夜时在家乡坐在摇椅上，在门廊乘凉。

正当男人摆脱了战争，忘记了集中营，宽恕了腐败的行为，并不可自拔地陷入一种顺从之中，正当思想家避开战后世界的复杂大问题时，妇女再次回到家中。考虑爱情和性的问题要比考虑共产主义、麦卡锡及威力无穷的原子弹的问题容易得多，安全得多。在人的行为、思想和战争中寻找弗洛伊德学说中性的根源要比批判性地看待人的社会和以建设性的行为去修正错误要容易一些。甚至在最有远见，最有志向的一部分人中也出现了一种个人后退的现象；我们把眼光从地平线上收了回来，而一味只注意自己的事情。

现在我们能够回顾所有这一切了。那时，容易把爱情和性的需要作为生活的最终目标的一部分，在囊括一切的对“住宅”和“家庭”的献身中避免个人对真理献身。对于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和许多“家庭”顾问，就性、个性、及人际关系等个人问题对病人着重分析的疗法比过分深入地探究人的痛苦的一般原因要稳妥一些，而且更为有利。如果你不想再考虑整个人类的问题，至少你能“帮助”个别的人而不卷入麻烦之中。曾一度激起美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及种族歧视等重大问题的道德心的欧文·肖①，现在也写起性和通奸

① 欧文·肖（1913—1984）美国小说家、戏剧家。——译注

问题来了；诺曼·梅勒[1]和那些年轻的垮掉一代作家把他们的变革精神局限于性、极度的快感、毒品以及用四个字母的下流词语为他们自己作广告。对于作家来说，思考心理学问题比思考政治问题，思考个人动机比思考公共目标更容易并且更时髦。画家们退缩进一种藐视清规戒律并且美化回避意义的抽象的表现主义之中。戏剧家们把人类的目的降低为痛苦，做作的胡闹——"荒诞派戏剧"。弗洛伊德思想把无穷无尽的、逗弄的、智力之谜的性质赋予这个逃避的整个进程；进程里套进程，意义中含意义，直至意义本身消失并且这个毫无希望、单调乏昧的外在世界几乎不存在为止。正如一位戏剧批评家以田纳西·威廉斯[2]舞台世界上一种罕见的厌恶调子所说：似乎对于人，除了他的性反常行为和他既爱又恨他的母亲这个事实外，没有现实存在。

美国文化中的弗洛伊德热除了心理治疗本身的开业外，还满足了40年代和50年代的真正需要——对一种思想的需要、一个民族的目标的需要、把心理方法运用于解决人民问题的需要。精神分析学家们最近提出：缺乏思想或民族的目标可能要对把许多男男女女送去接受心理治疗的个人空虚负部分责任；他们实际上在寻求一种个性，这种个性是单独的心理治疗永远也不可能给以的。在美国，宗教的复兴与奔向精神分析的热潮是一致的，它可能出自于相同的原因——为了寻求个性，或者寻求保护、一种更大目标的真空。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许多牧师花大量时间给予教徒们以心理治疗

① 诺曼·梅勒（1923——）美国作家。——译注

② 田纳西·威廉斯（1911－1983），美国著名戏剧家。——译注

——牧师的劝告。难道他们因此就避开了较大的问题，避开了真正的寻求吗？

50年代末期我在大学校园里采访时，牧师和社会学家异口同声地证实了年轻一代的“不介入与自己无关事情的态度”。他们感到早婚倾向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年轻人在当代社会中看不到真正的价值观念。要指责年轻一代愤世嫉俗，沉溺于个人享乐和物质保障，或者垮掉一代的空虚的怀疑主义，这对于职业社会批评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的父母、教师、说教者都已经把比个人情绪适应、物质上的成功和保障等更远大的目标放弃了，那么年轻人还能学到什么更远大的目标呢？

养五个孩子，迁居至郊区，自己动手做事情，甚至用垮掉一代的生活方式满足了家庭的需要；它们还取代了这个国家里最有志气的人曾一度关心的重大需要和远大目标。“我厌倦政治……不管怎样，对于它，你都无能为力。”当为了生活而计较花一美元是太便宜或太昂贵时，你的整个社会似乎就很少关心别的东西，而只关心家庭、家庭的爱和家庭的问题——至少，这是好的真实的。生吞活剥地理解弗洛伊德产生了这样的错觉：对于这千疮百孔的整个社会，生吞活剥地理解弗洛伊德比理解弗洛伊德的真正含义更为重要，因为从字面上鹦鹉学舌般重述弗洛伊德的词句可以哄骗患病的个人相信他们得到了治疗，尽管实质上他们甚至还未面对他们的真正问题。

然而，在弗洛伊德的显微镜下，一种迥然不同的家庭概念开始出现了。恋母情结和同胞竞争成了家喻户晓的词语。挫折如同猩红热一样成了童年时期的严重危险。而挑出来特

别值得注意的词语是“母亲”这个词。人们突然发现几乎为了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怪罪母亲。在病儿、酗酒、自杀的、患精神分裂症的、精神变态的、神经病的成年人、阳萎的、同性恋的男子、缺乏性感的、放荡乱交的女性、患溃疡的、患气喘病、及其它病症的美国人的每一桩病史中，都能够找到一位母亲——一位受到挫折、压抑、烦恼、折磨，从未得到满足的、不幸的妇女；一位苛求的、爱找岔子的、泼妇似的妻子；一位抛弃孩子、或溺爱孩子，支配统治家庭的母亲；第二次世界大战揭示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男子在心理上不能正视战争的冲击，不能正视远离他们“妈妈”的生活。很明显美国妇女已“出了问题”。

不幸的巧合是：这种对母亲的攻击出现的时间正是美国妇女开始利用她们解放的权利，在不可避免地与男子的竞争中越来越多的人上大学和职业学校，在工业部门和其它行业中地位升高之时。妇女开始在不取决于她们的性别而取决于她们的个人能力的美国社会中发挥作用。对于任何一双肉眼，对于返回的美国军人，十分明显的情况是：这些美国妇女确实比，例如德国和日本姑娘更有独立性、意志更坚强、对自己的意愿和看法更自信，而较少被动性和女子气；那些美国军人吹嘘道，德国和日本姑娘“甚至为我们洗背。”然而，不太明显的情况是：这些姑娘与她们的母亲不同了。或许那就是为什么通过对逻辑的某种奇怪的歪曲，把过去和现在孩子的神经病都怪罪于这新一代美国姑娘的独立性和个性上面——这种独立性和个性是前一代家庭主妇——母亲从未有过的。

证据似乎是不可逃避的，它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精

神病发作的数据和母亲们在其病历中的数据之中，体现在金西很早就美国妇女，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妇女不能享受性欲高潮的数据之中，体现在如此多的妇女过去遭到挫折并把受挫的愤怒转到她们的丈夫和孩子身上的事实之中。美国越来越多的男子确实感到不适、实软弱无力。那些第一代职业妇女中许多人的确失去了爱情和孩子，怨恨她们与之竞争的男人同时也遭到那些男人的怨恨。越来越多的美国男子、妇女、儿童进了精神病院、诊疗所，去找精神病医生。所有这一切都堆放在美国母亲的门前，这位母亲因她的教育而被"男子化了"，因为她坚持平等与独立而无法作为妇女去完善其性别。

它如此巧妙地符合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以致于没有人停下来去调查那些战前的母亲真正像什么。她们确实遭到了挫折，但是那些顺应不良的士兵，那些不稳定的并且软弱无力的战后男子的母亲，不是独立的受过教育的妇女，而是自我牺牲的，依赖性强的，受难的家庭主妇式的"妈妈"。

1940年，在家庭之外工作的美国妇女不到妇女的1/4；那些人中大部分都没有结婚。仅有2.5%的母亲是"职业妇女"。1940年，年龄在18至30岁之间的美国兵的母亲一般出生于19世纪或20世纪初，并且成长在美国妇女赢得选举权，或享受独立、性自由、教育的或职业的机会的20年代之前。总的来说，这些"妈妈"既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是女权主义的产物，而是过着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的传统女性生活的美国妇女。难道这真的就是使得"妈妈们"受挫并把受挫的愤怒转移至她们的孩子身上的教育、事业梦想和独立性的原因吗？即使一本帮助建立那种新的女性奥秘的书——爱德华·斯特雷克的《母亲的儿子》——也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

"妈妈"既不是职业妇女，也不是女权主义者，也不运用她们受过的教育（如果她们受过教育）；她们为她们的孩子而生活，除了家庭、孩子、住宅、或她们自己的美貌之外，她们没有别的兴趣。事实上，她们正适合女性的奥秘的形象。

因精神失常而被拒绝入伍的182.5万名男子中的大多数人，因神经与精神原因而退伍的60万人，试图逃避征兵的50多万人——服役的1500万人中几乎有300万人因为不成熟，缺乏"正视生活，同别人共同生活，独立思考和独立自主的能力"而常常在入伍后仅几天就退避在精神性神经病之中。作为陆海军军医局局长顾问的斯特雷克博士在上述这些人的病历中都发现了有过错的"妈妈"。

> 一位妈妈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其母性行为来自于针对生活所给予她的自我打击去寻求感情补偿。在她同她的孩子的关系上，每一个行动和几乎每一次呼吸都旨在无意识地在感情上同化她的孩子，并牢牢地把他们同自己缚在一起。为了取得这一目标，她必须在她孩子身上盖上不成熟行为的印记。……能够成熟地正视生活的男女的母亲往往不是传统的妈妈型。妈妈很可能是亲切的、溺爱的、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她不辞辛劳并且煞费苦心地为她长大了的孩子们挑选衣服。她指导他（她）们如何卷曲头发、选择朋友和伴侣，指导他（她）们的体育运动以及他（她）们的社交态度和意见。总的来说，她为（她）们考虑了一切……〔这种主宰一切的态度〕有时是强硬而随意的，更多的时候是温柔的，劝导的并且有点迂迴曲折。……最经常的是间接的方

法，用这种方法以某种方式使孩子感到妈妈精神上的创伤并千方百计地去掩盖那种创伤。这种温和的方法在阻止年轻人的思想和行动的表现上是十分成功的。……

那位“自我牺牲的”妈妈在压力之下会含含糊糊地承认：或许她的确显得“疲惫不堪”并且实际上有些劳累，但是她快活地，喊喊喳喳地说道：“那有什么呢？”……其含意是她不在乎她看起来或感觉如何，因为在她心中有着无私奉献的快乐。从早到晚在为自己孩子们的忙碌中她找到了幸福。这个家属于他们，它必须“毫无差错”。一日三餐准时开饭，热腾腾，香喷喷，随时都可找到吃的东西。……在这个井井有条的家中不会有掉了钮扣的衣服。每件东西都放在适当的地方。妈妈知道每一件东西在哪里。孩子们把东西四处乱扔后，她会毫无怨言、高高兴兴把地东西放回原处。……孩子们需要任何东西，妈妈都会乐意为他们去取。这是一个完美的家。……由于在外部世界未能找到一个能与之相比的避风港，很可能这家孩子中的一个或更多的孩子会留在或返回这个幸福的家，永远隐藏在里面。①

这位“妈妈”可能还是一位“漂亮的糊涂虫”，她狂热地迷信美、衣着、化妆品、香水、发式、特种饮食和健身运动；她或者是“伪知识份子”，一直不断地选修课程和出席各种讲座，不是认真地学一门课程并使自己彻底掌握它，而

① 爱德华·斯特雷克著，《母亲的儿子》，费城和纽约，1946年版，第52页—59页。——原注

是这个月学大脑卫生，下一个月学经济学，再下一个月学希腊建筑，再往后学幼儿保育。这些就是其儿子不能成为前线或家庭、床上或床下的男子汉的“妈妈”，因为她们的儿子实际上只想成为依附于母亲的婴儿。所有这些妈妈有着一个共同点：

> 从使她的孩子在一种心理上的羊水中荡桨而不让他们以成熟的大胆、果断的姿势从母亲感情上的子宫里游出这种情形里，她取得感情上的满足和充实。……因为她自己就不成熟，她把不成熟性传给她的孩子，从而一般说来，他们注定要过个人的和社会的不充实、不幸福的生活……①

我详细地引用斯特雷克博士的著作，说来也奇怪，是因为他是战后谴责美国妇女失去了女性特征并要求她们再次跑回家庭，献身于她们的孩子最常引用的精神病学权威之一。实际上，斯特雷克的病例的寓意恰恰相反；那些不成熟的儿子有着过分献身于孩子的母亲，这些母亲必须一直使她们的孩子像婴儿一般，否则她们自己就根本无法生活，这些母亲自己就从未达到成熟或者从未受到鼓励去到达成熟：“具有成熟的状况或特性、成熟性、充分的发展……具有思想和行动的独立性”——这是成为完整的人的特性。而这些都并非完全等同于女性特征。

我猜想，正如被狗吃的汉堡包变成了狗、被人吃的汉堡

① 爱德华·斯特雷克著，前引书，第31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包变成了人这种奇怪的现象一样，事实则以基本相同的方式被一种奥秘吞食了，变成了奥秘。40年代，美国兵患神经病的种种事实成了“证据”，证明美国妇女受到一种适应于事业、独立性、与男子平等、“不惜任何代价的自我实现”的教育引诱而放弃了实现女性特征——纵然这些受挫妇女中的大多数人只不过是家庭妇女。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迷人论点，女性的奥秘歪曲了由那些把她们的全部时间奉献给满足孩子的需要的受挫的母亲给男孩和女孩造成的心理损害的大量证据，召唤新一代的女孩回到家庭中，把她们的时间奉献给满足孩子的需要。

没有任何东西使这种汉堡包比金西的早期数据更为可口，这些数据表明了妇女的性受挫与她们的教育有关。人们反复回味着那可怕的事实——受调查的读过大学的妇女中50%至85%的人从未体验到性的情欲高潮，而受过中学教育的妇女报告了同样问题的人不到1/5。《现代妇女：迷惘的性》解释了这些早期的金西报告：

在只受过小学或更少教育的妇女中。完全未能取得情欲高潮的人向着零点减少。金西博士和他的同事报告说，在未受过教育的黑人妇女中发现了几乎100%的完全的情欲亢进反应。……从而，开始形成的性心理规则是这样的：妇女所受的教育越多，则性失调的可能性越大，并有着程度不等的严重性……①

① 法纳姆和伦德贝格著，《现代妇女：失去的性》，第271页。——原注

差不多整整10年之后，金西关于妇女问题的全面报告出版，这个报告与那些早期的研究结果完全相反。即使现在，有多少妇女认识到金西的5940位美国妇女的个人历史表明了：在婚姻生活中达到情欲高潮的女性的数目和几乎百分之百的次数都达到情欲高潮的女性的数目，都与教育有关，但情况的确是妇女受的教育越多，性的充分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仅受过小学教育的妇女更可能从未体验过情欲高潮，而读完大学和继续读研究生或职业学校的妇女则几乎更有可能百分之百地达到情欲高潮的颠峰。金西说道：

> 我们发现在任何五年一段的时期内达到情欲高潮的女性的数目在有较高教育背景的那些妇女中十分明显地要高一些。……在婚姻的每一个阶段，从第1年直至至少第15年，在典型调查的妇女中，大量教育背景较有限的妇女在她们的婚姻性交中完全不能对情欲高潮作出反应，同时受过较好教育的妇女同样完全失败了的只是少数。……
>
> 这些数据与我们在若干年前所作的初步的，未出版的统计数据不一致。在较小的典型调查实例基础上，在不太恰当的计算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当时似乎发现了是大量教育水平较低的妇女在婚姻性交中出现了情欲高潮反应。现在这些数据需要纠正了……①

但是由早期错误数据哺育出的那种女性奥秘并不那么容

① 艾尔弗雷德·C·金西等著，《妇女的性行为》，费城和伦敦，1953年版，第378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易就得到纠正。

其次还有因为母亲工作而孩子被抛弃的令人吃惊的数字和实例。即使现在，有多少妇女认识到：在那些公布的实例中的婴儿（他们因缺乏母爱而枯萎死亡）并不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母亲的孩子——这些母亲在白天去从事某项工作或写诗或参加一场政治战役时便把孩子交付别人照管——而是那些真正被抛弃的孩子、在生下时就被未婚母亲和酒鬼父亲遗弃了的弃儿、从来就没有家或没有得到温柔爱护的孩子。任何一份含意为工作的母亲对她们的孩子的少年犯罪、学习困难或情绪纷乱负有责任的研究报告都会导致报刊的大字标题。最近，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心理学家洛伊斯·米克·斯托尔兹博士（Dr Lois Meek Stolz）分析了所有来自于那些研究报告的证据。她发现，目前人们可以就受雇工作的母亲的孩子问题讲任何一种话——无论好话或是坏话，用某些研究成果来支持那种说法，但是根本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因为孩子的母亲在工作，孩子就不幸福、不健康、不适应。

表明工作的妇女是更幸福、更好、更成熟的母亲的那些研究报告鲜为人知。有人说，既然少年犯罪在增加，而更多的妇女参加了工作或者“为了某种脑力工作而接受教育”，这就毫无问题地说明其中有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除非有证据表明不存在那种关系。几年前，舆论大肆渲染一份违法和守法少年小组的对比研究报告。其中发现，在母亲有固定工作时少年犯罪或者逃学旷课的现象并不比母亲是家庭主妇时多。但是引人注目的报刊标题却警告说，值得注意的是较多少年犯罪者的母亲有着不固定的工作。这一发现使某些受过教育的母亲感到内疚和忧郁，这些母亲放弃了正式的职业。

反而设法坚持在她们的领域里从事非全日性的工作，自由写作，或干临时工。“多年来我一直有意地干临时工或非全日性的工作，尽力为着孩子们的最大利益而安排我的工作生活，”《纽约时报》引用一位这样的母亲的话，“而现在看来似乎干了最坏的事情！”①

实际上，这位母亲，一位受过职业训练的，生活在舒适的中产阶级聚居区的妇女，把她自己等同于那份研究报告中的母亲们了；原来那些母亲不仅生活在贫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而且在许多情况里她们自己就曾是少年犯罪者，并且她们常常有感情上失调的丈夫。从事那项研究工作的研究人员提出，这些妇女的儿子们有着感情上的冲突，因为从事零星工作的母亲的动机“主要不在于补充家庭的收入而在于逃避家务和母亲的责任。”但是另一位分析了同样结果的专家却认为，母亲从事零星工作和儿子的违法行为的基本原因在于父母双方感情的不稳定。无论什么理由，这种情况决不能同对那份研究报告理解过头了的，受教育最多的妇女的情况相比。事实上，正如斯托尔兹博士指出，许多被曲解为妇女不能把职业和母爱职责结合的“证据”的研究报告，实际上表明了：只要其它条件相同，那些因为她们想工作而工作的母亲们的孩子较之家庭主妇的孩子，可能在感情上较少失调，在学校里问题较少，或者“缺乏个人的价值观念”的可能性较小。

① H·F·索瑟德著，“母亲们的困境：工作或不工作？”，《纽约时报杂志》，1960年7月17日。——原注

对工作母亲的孩子的早期研究是在极少已婚妇女参加工作的时代，在为工作母亲服务的白托托儿所进行的。那些母亲由于死亡、离婚或被抛弃而失去了丈夫。这些研究是由社会工作者和经济学家为了促进诸如母亲的抚恤金等问题的改革而进行。那些孩子中感情失调和死亡率较高的现象未在最近10年的研究中发现，在最近10年里成百万的妇女参加了工作，仅八分之一的妇女未同丈夫一起生活。

在最近一份以2000位母亲为基础进行研究的这样的报告中，仅有的显著区别在于：说“孩子使我紧张不安”这种话的人中，家庭主妇比工作母亲多；而且家庭主妇似乎生了“更多的孩子”。一项在芝加哥地区进行的著名调查开始想证明较多的少年违法者的母亲在家庭之外工作，结果只表明更多的违法少年来自于破裂的家庭。关于400个精神严重失常的孩子（该地区有学生1600人）的另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在不涉及破裂家庭的条件下，精神失常孩子的母亲是家庭主妇的比是工作母亲的多两倍。

其它研究报告表明：母亲在工作的孩子比家庭主妇的孩子出现极端放肆或畏手畏脚的行为的可能性要少些，较少可能在学校表现差，或缺乏一种个人的价值观念”，工作的母亲比家庭主妇对于怀上孕更有可能感到“欣喜”，对“母亲的角色”较少可能感到内心冲突的折磨。

对于孩子，在喜欢自己户外工作的母亲之间比在家庭主妇—母亲或不喜欢自己的工作的母亲之间也似乎存在着一种更紧密并且更积极的关系。对30来岁受过

大学教育、更能选择自己所喜欢工作的母亲的研究表明，她们的工作对她们的婚姻和感情的适应，或对孩子的问题的数量或严重性都没有不利影响。总的来说，工作的妇女仅有两种共同特征：她们很可能受过较高的教育并且生活在城市里。①

然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成群受过教育的妇女变成了郊区家庭主妇，她们并不担心她们孩子的尿床、吮指头、贪食、拒食、孤僻、缺少朋友、无独立的能力、行为放肆、胆小、阅读缓慢、阅读过多、不守纪律、呆板、拘谨、表现癖、性的早熟、或在性的方面缺乏兴趣是早期神经病的一种迹象。如果上述种种情况不是事实上的反常或者事实上的过失，它们至少也必然是父母的失败，未来神经病的预兆。有时它们确实如此。在弗洛伊德的聚光灯下，父母的身份，尤其是母亲的身份不得不变成一种专职的工作和职业，如果不变成一种宗教崇拜的话。走错一步便意味着灾难降临。除了家庭之外，母亲们没有职业，没有任何承诺，她们可以把每一刻都奉献给孩子；她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可以放在发现早期神经病的迹象上——而且可能放在产生早期神经病上。

当然，在每一份病历中，你总能找到关于母亲的重要事实，尤其在假若你要寻找有关那些想象是关键的头五年的事实或记忆之时。毕竟在美国，母亲经常在那儿；她被期望在那儿。她们经常在那儿，并且仅仅作为母亲在那儿这个事实

---

① 洛伊斯·米克·斯托尔兹著，"母亲的工作对孩子的影响：来自研究的证据"，《儿童成长》，第31卷，1960年第4期，第749—782页。——原注

由于某种原因与她们孩子的神经病有联系吗？许多文化把它们的冲突通过母亲传给孩子，但是在这个文明世界的现代文化中，并非有许多文化教育它们的最强壮、最能干的妇女把自己的孩子作为一种事业。

不久前斯波克①教授有点不安地承认，俄国儿童的母亲在她们的生活中除了母亲的身份外通常还有某种目标——她们从事医学、科学、教育、工业、政府、艺术等工作，这些儿童比美国儿童不知怎么地似乎更稳定，更适应，更成熟，而这些美国儿童的专职母亲除了成天为孩子操心外什么事情也不干。难道是因为俄国妇女在她们自己的生活中有一种严肃的目的，从而以某种方式成为较好的母亲吗？那位好心的斯波克博士说过，至少这些母亲对她们自己作为母亲更有自信心。她们不像美国母亲，后者依靠于专家们的最新言论、最时新的儿童保育风尚。② 1350 万 位 母 亲 对自己如此没有信心，以致她们逐句地依照他的书本来抚养孩子——并且当书不起作用时便虔诚地呼唤他来帮助，这对斯波克博士显然是一个可怕的负担。

没有任何报刊标题表明精神病医生对美国儿童和已长大成人的孩子身上的“独立性”问题有日益增长的关注。精神病学者戴维·利维在一份非常著名的“母亲的过分保护”的研究报告中，对20位母亲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研究，这些母亲由于“母亲的幼稚化，溺爱和过分保护”使她们的孩子受到伤

① 斯波克(1903—)，美国著名儿科学家。其著作《婴幼儿保健常识》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代美国父母。——译注

② 本杰明·斯波克著，“俄国儿童不哭闹、不争吵，不打坏东西——为什么？”《女士的家庭杂志》，1960年10月。——原注

害，到了病态的程度。①一个典型的病例是一个12岁的男孩，"在他11岁时，他的母亲拒绝为他在面包上涂黄油，他便得了幼稚脾气爆发症"。他还要求她帮助穿衣服。……他非常简洁地总结了他在生活中的要求，说道：他母亲将为他的面包涂黄油直到他结婚，结婚之后他的妻子也将这样做……"

根据诸如月经量、乳房奶量和"母亲型行为"的早期迹象等生理指数，所有这些母亲在其女性或母性本能基础上是异常强的，如果可以这样描述的话。20位母亲中除2人外，全都是负责、稳定并有进取心的，正如利维博士所描述的：

"负责行为的积极或进取的特点被视为明显的母亲型行为；它是20位自童年起就过分溺爱孩子的母亲中18位的生活的特征。"没有一人身上有无意识抛弃孩子或母亲身份的色彩。

是什么使得这20位具有强烈母性的妇女（很明显，当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把力量，甚至进取心视为母性本能的一部分时，力量，甚至进取心就不是男性的了）培育出如此病态幼稚的儿子呢？原因之一是，"孩子被用来作为一种满足对爱的一种不正常渴望的方式。"当儿子预期要从学校回家时，这些母亲就像妻子对丈夫或者姑娘要赴约会一样涂口红、梳洗打扮一番，因为除了孩子外她们没有别的生活。利维说，大多数母亲超越了事业的雄心。这种"母性的过分溺爱"实际上是由这些母亲的力量，由她们的基本的女性能量——负责、稳定、积极和进取——而引起的，当母亲的"其它表达渠道"被封闭时，这种力量和能量就在孩子身上引起了病状。

---

① 戴维·利维著，《母亲的过份保护》，纽约，1943年版。——原注

这些母亲中的大多数人自己也有支配一切的母亲和顺从的父亲，她们的丈夫也曾是支配一切的母亲的顺从的儿子；按弗洛伊德的说法，到处出现的“阉割”现象（the castrativeness）是相当极端的。这些儿子和母亲多年来被给以强化的精神分析治疗，希望这种办法能打破病理上的循环。但是，经过数年有独创性的研究之后，研究人员调查了这些妇女和在病理上受过过分溺爱的孩子，其结果并非是预期的那样。在大多数病例中，心理疗法并无效果。然而一些孩子却奇迹般地没有变成有病症的成人；这不是因为经过治疗的缘故，而是因为出于某种情况，母亲在她自己的生活中获得了一种兴趣或参与了一种活动，从而只是使那孩子停止过那种儿童的生活。在其它一些实例中，孩子健康地生活下来，这是因为通过他自己的能力，他开辟了一块他母亲不在其中的独立领域。

社会科学家还没有识破这种奥秘就又看到了美国这种母亲一孩子关系的真正问题的其它线索。一位名叫阿诺德·格林的社会学家几乎是偶然发现了养育孩子的母爱或缺乏这种爱与神经病之间的关系上的另一个方面。

情况似乎是：在格林成长的那个马萨诸塞州的工业城镇里，整个一代人是在创伤性的心理条件下抚养成人的，这些条件是：非理性的、报复性的、甚至残暴的父母权威和在父母与孩子之间完全没有“爱”。这些波兰移民的父母竭力把美国儿童并不尊重的僵化的旧世界的规则强加于孩子身上。这些孩子的嘲笑、愤怒和轻蔑使得迷惑不解的父母诉诸一种“报复性的、个人的、非理性的权威，这种权威不再能在这些孩子未来的希望和雄心中找到支持。”

> 父母们被他们的美国化了的孩子激怒了，同时又担心失去对孩子的控制，他们便完全不分青红皂白，用起拳头和鞭子来。打人、嚎哭、尖叫、着急的声音、痛苦和仇恨的哀诉声在成排的破旧磨房里此起彼伏，司空见惯，连过路人也很少予以注意。①

毫无疑问，这些就是未来神经病的种子，正如美国所有好心的后弗洛伊德的父母理解的那样。但是使格林感到诧异的是，根据书本，神经病在这里一定会普遍流行，但当他作为社会学家返回去检查神经病时，在当地波兰人聚居区，他并没有发现有由于精神性神经病而被军队退回的例子，并且在这个村庄整个一代人的公开行为中“没有发现有焦虑不安、内疚感、反应呆滞，受到压抑的敌意等各种不同的被描述为神经病特征的典型症状。”格林感到疑惑，为什么这些孩子没有患神经病，为什么他们没有被那种残暴、非理性的父母的权威所摧毁？

他们从未得到儿童心理学家竭力向中产阶级母亲所推崇的那种持续不断并且谨慎小心的哺育之爱；他们的母亲同父亲一样，整天在工厂工作；他们被交给了姐姐或哥哥照管，在田野和树林里自由地奔跑，尽可能地避开了他们的父母。在这些家庭中，重点是放在工作上，而不是在个人感情上：“尊敬而不是爱情成了把一家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并非完全缺乏爱的表示，格林说，“然而他们这种爱与在中产阶级妇女杂志中发现的那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的定义很少有

① 阿诺德·W·格林著，“中产阶级的男孩子与神经病”，《美国社会学评论》1946年第2卷第1期。——原注

共同之处。”

这位社会学家想到，或许正是缺少这种无处不在的哺育的母爱才可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孩子没有出现神经病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在中产阶级的儿子中是十分普遍的。如格林所说，这些波兰父母的权威无论多么残暴和非理性，“对于自我的核心是外在的”。这些波兰父母没有技术或机会“来消除孩子的个性”。格林提出，或许“缺乏爱”和“非理性权威”本身并不导致神经病，而是只有在“个性消除”的一定环境中才会导致神经病，这种环境是指对孩子身体上、感情上的过分照顾保护，使孩子对父母产生奴性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出现在土生土长、受过大学教育的、美国城市中产阶级的白种孩子身上。

神经病的病因是“缺乏爱”，还是那种中产阶级父母的哺育方式，即“消除”了孩子的独立的自我并在他身上造成了对爱的一种过分需求的那种哺育方式？精神分析学家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经病的病因上；格林想要“找出对于中产阶级父母来说，到底是什么使得孩子的神经病的土壤肥沃的，而不管个别的种子是如何播下的。”

照例，矛头毫无偏差地指向了母亲。但是，格林不关心帮助现代美国母亲适应她的角色；相反，他发现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位妇女，她缺乏任何真正的“角色”。

> 她结了婚，或许还怀了孕，却同从前一样，不担任固定角色，没有一套功能……。她感到比男子低人一等，因为与之相比，她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妇女实际解放的程度被普遍夸大了。……

中产阶级的姑娘通过一桩"美满的"婚姻取得的地位比通过她自己的职业可能取得的地位要高得多。但是在一种职业中幽灵般地鬼混或干一项又一项的临时工作使她对打扫屋子、换洗尿布，准备一日三餐的单调工作更感乏味。……这位母亲与家庭里里外外的事情很少有关系；她是她唯一儿子的唯一伴侣。"现代的科学育儿法"对孩子的健康、吃菠菜和自我的发展，要求一种持续不断的监督和事事处处的担心；更多的精力花在强迫孩子早学走路、解便训练、学说话上这个事实使上述情况更复杂了，因为在一个激烈竞争环境中，中产阶级父母从孩子出生之日起就不断把自己的孩子的成长情况与邻居的孩子作比较。

格林推测，可能中产阶级的母亲之所以

……把"爱"——她们对孩子的爱和孩子对她们的爱——当作她们与孩子的关系中最重要的事情，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时代的爱的情结，这种情结尤其分散在中产阶级的妇女当中，同时部分作为她们为孩子作出许多牺牲的一种补偿。孩子对爱的需要已被准确地体验到了，因为他已习惯于需要它……习惯于一种奴性的感情上的依赖。……在孩子已习惯于这种需要后，不是对父母的爱的需要，而是会失去这种爱的不断威胁成了大多数典型现代神经病的根源；如果你不吃菠菜，或停止吃奶，或从长沙发上下来，妈妈就不爱你了。这种威胁到了这种程度，孩子的个性被消除，他会因受这种对待而

陷入惊慌之中。……在这样的一个孩子身上，一道不赞成的目光较之在小斯坦罗斯·沃齐克①身上抽20分钟鞭子，会产生更多的恐惧。

格林只是根据母亲对她们儿子的影响谈到了母亲的问题。但他还是想到，仅仅是“个性的消除”毕竟还不能解释神经病。他说，因为不然前一代的中产阶级妇女也都会患那样的神经病，但没有任何人记录下了那些妇女患有那种病。毫无疑问，19世纪末期中产阶级姑娘的个性被她的父母、被“爱”的需要和绝对的服从“消除了”。然而，这位社会学家得出结论说，“在那些条件下，神经病的发病率可能并不太高，”因为即使这位妇女自己的个性被“消除了”，但它始终是“在一种角色的范围内”被消除的，“这种角色从童年进入青春期、求爱期，最后进入婚姻期变化相对较小”；她永远也不能成为她自己。

在另一方面，现代中产阶级的男孩被迫同其他人竞争，去取得成就——这要求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坚定的目标、进取心、自信心。因而，在男孩身上却未在女孩身上，由母亲培养出的被人所爱的需求、无力建立他自己的价值观念和目标便是神经病症状。

由一位社会学家于1946年提出的这种推测引起了争论，但是它从未渗透超出社会学理论界的核心圈子，也从未渗入女性奥秘的堡垒，尽管越来越多的国民意识到美国的母亲们出了问题。甚至这位社会学家也只涉及儿子们的问题，他设

① 一波兰小孩的姓名，作者意指上述波兰居民区的情况。——译注

法识破这种奥秘并根据与孩子对更多母爱的要求不同的条件来看待孩子。但是，真正的含意是：中产阶级的美国家庭主妇的角色是否迫使许多母亲抑制、消除她们的儿子和女儿的个性？许多人看到了对美国儿子们的悲剧性浪费，儿子们被培养成了不能够有所建树，没有个人的价值观念和难以独立行动的人；但是他们看不到对女儿们，对母亲们同样悲剧性的浪费，对于母亲的这种事情早在几代人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如果一种文化不期望妇女具有人的成熟性，那么它就不把缺乏人的成熟性看作一种浪费，或者产生神经病或冲突的一种可能的原因。这个结果，对于我们的文化对妇女角色的解释的真正反映，就是：当我们看到它对她们儿子的影响时，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只注意到妇女出了问题。

我们误解了真正错了的问题，难道这不令人吃惊吗？我们怎么能根据功能主义和适应的静态条件来理解它呢？当中产阶级姑娘的个性从童年直至成年"始终不断地"由她的"作为妇女角色"所消除时，教育家们和社会学家们鼓掌欢迎。只要提供了适应性，那种角色就要万岁。对人的自我的浪费没有被考虑为在妇女问题上要研究的一种现象——不过由"提供角色条件的文化的不一致"导致的挫折得到了研究，正如伟大的社会科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①描绘的美国妇女的困境一样。甚至感受到缺乏自我的痛苦和软弱无力的妇女本身也不理解那种感情；它成了那种无名的问题。而且她们在羞耻和内疚感中再次转向她们的孩子以逃避这个问题。

---

① 鲁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女人类学家，著有《文化模式》等书。——译注

因而一代复一代，从母亲到儿子和女儿周而复始地形成了完整的循环。

近年来对妇女不断的攻击成了美国人全神贯注的事情，这种攻击可能也出于逃避现实的动机，这些动机把男男女女都送回家庭的堡垒中。在美国，母爱据说是最神圣的，但是尽管母亲得到了所有那些尊敬和口头上说得好听的话，妈妈却成了一个相当安全的攻击目标，而不论人们多么正确或错误地解释她的失败。没有任何人因为攻击“这位美国妇女”而被列上黑名单或被解雇。除了来自母亲或妻子的心理压力外，在最近10年的美国还有大量非性别方面的压力——容易招致的危险，永不休止的竞争，在大机构中默默无闻并且常常漫无目的的工作——使男人不能感到像一个男人。向他的妻子和母亲出气要比认识到他自己或神圣的美国生活方式的失败要安全得多。当男人说他们的妻子能够整天呆在家里真是幸运时，他们并不总是在开玩笑。他们自以为他们是“为了妻子和孩子”去投入那种激烈竞争中的；依靠这种说法使这种竞争多少合理一些，以便他们得到慰藉。这样的男人在郊区重创了他们自己的童年，并使他们的妻子成为母亲。男人们毫无异议便爱上了这种奥秘。它向他们允诺：对于他们以后的生活，母亲既作为他们生存的一种理由也作为他们的失败的一种借口。得到过多母爱而成长起来的男孩变成了贪得无厌的男子，这有什么奇怪呢？

但是为什么妇女对这种接二连三的猛烈攻击无动于衷呢？当一种文化对妇女作为独立的自我建起了一道又一道的障碍，当一种文化对妇女自己接受成熟性建起了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教育的障碍时——甚至在大多数这

些障碍倒坍时，对于一位妇女来说，寻求家庭的庇护仍然要容易得多。通过她的丈夫和孩子来生活比在这个世界上开辟一条她自己的道路要容易些。因为她是那同一位母亲的女儿，那位妈妈使少男少女要长大成人竟成了十分艰难的事情。而且自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最后长大成人并摆脱被动的依赖是令人可怕的。如果她的文化的各种力量都告诉她不必长大成人，不长大成人会生活得更好，为什么一位妇女要自找麻烦去干妻子和母亲之外的事情呢？

因而这位美国妇女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她再次跑回家，只靠性别的活动来生活，为了安全便用她的个性来作交易。她的丈夫被她吸引到身边，并且门也向外部世界关闭了。他们开始过那种女性奥秘自欺欺人的愉快生活，但是他们中每一个人都真正地相信它吗？她毕竟是一位美国妇女，是一种文化的不可逆转的产物，这种文化不愿给她一种独立的身份。他毕竟是一位美国男子，他对个性和自由选择的尊重是他的民族的骄傲。他们一起上学；他知道她是谁。当他 6 点55分精疲力尽地回到家后，他给地板打蜡和洗碗碟的那种毫无怨言的温顺态度，难道能够掩盖得住他们夫妇俩对漂亮谎言之后的现实的内疚意识吗？什么东西使得他们相信它，而不顾在郊区到处都出现的警告的迹象呢？什么东西把妇女留在家里呢？我们文化中的什么力量大得足以把“职业：家庭妇女”这几个字写得如此之大，以致于妇女的所有的其它可能性都显得模糊不清了呢？

这个国家中强大的势力都必须用那些漂亮的家庭图画来支撑，这些图画到处盯着我们，禁止妇女在世界上运用她的才能。在这个意义上，对女性奥秘的保存可能有着根本不是

性别的含意。当人们开始考虑它时，美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着妇女的被动的依赖性、她们的女子气质。女子气质，如果人们仍然想那样称呼的话，已使美国妇女成了一个目标和针对性别销售的牺牲品。

针对性别的销售

几个月前，当我开始收集妇女退缩回家庭之谜的答案时，我感到我漏掉了某种情况。我可以追溯那些路线，通过那些路线，复杂的思想循环往复回归到它本身以使一种陈腐的女性形象不朽；我能够看到那种形象如何同偏见和曲解了的挫折配合在一起把“职业：家庭主妇”的空虚掩盖起来，不让妇女她们自己发现。

但是，是什么东西赋予它力量呢？虽然，尽管如此多的美国家庭主妇感到不可名状的绝望，尽管现在种种机会为一切妇女敞开了大门，然而除了当一名妻子和母亲之外，还有

任何别的生活目的的妇女是如此之少，那么一定是有相当强大的某个人、某种东西在起作用。女权运动背后的能量太强大有力了以致不会滴淌干涸；必须用比那种被低估了的妇女的力量更强大的某种东西来把它关闭、使它转向。

生活中某些事实是如此明显和庸俗，以致人们从不谈论它们。只有小孩才会脱口而出："为什么书中的人物从来不上厕所呢？"妇女担任家庭主妇的真正关键的功能、真正重要的角色是为家庭买更多的东西，为什么这一点从未被谈及过呢？在所有关于女性和妇女的作用的议论里，人们都忘记了美国的真正事务是商业。但是，当人们认识到妇女是美国商业的主要顾客时，家务的永存、女性奥秘的成长就有意义了（并能赚钱了）。在某个地方，某个人以某种方法一定早就领会到，如果使妇女一直处于家庭主妇的地位，处于不能充分起作用，有不可名状的渴望，没有活力的状态，妇女就会买更多的东西。

我不知道那种情况是如何发生的。工业上的决策不像那些相信历史的共谋理论的人会作的决策那样简单、那样有理性。我深信通用食品、通用电气、通用汽车、梅西和金贝尔[1]的首脑们以及生产清洁剂、电动搅拌机、倒圆角的红外线炉、人造毛皮、蜡、染发剂、家庭服装剪裁和家俱的图样、洗手液、使毛巾保持纯白的漂白剂的所有公司的各种各样的董事们，从未在麦迪逊大道或华尔街的会议室中围绕一张桃花心木的会议桌坐下并就一项提议表决："先生们，我提议，为了大家的利益，我们开始一场500亿美元的一致运动

[1] 梅西和金贝尔是纽约最大的两家百货公司。——译注

来阻止这场美国妇女离开家庭的危险倾向。我们必须使她们保持家庭主妇的地位，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一位好思考的副董事长说：“受了教育的妇女太多了，她们不想呆在家里，这种情况不正常。如果她们全都要当诸如科学家之类的人，她们就不会有时间去购买商品。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把她们留在家里呢？现在她们想要有职业了。”

“我们将解放她们，让她们有在家中从事的种种职业，”戴角质架眼镜，有心理学博士学位的那位新经理建议道，“我们将使家政具有创造性。”

当然，情况并未完全像那样发生。它不是一场针对妇女的经济上的阴谋。它是最近我们的方式与目的普遍混乱的副产品；它是当商业为了利润而进行的生产、销售和投资等事务（它只是我们的经济为了有效地为人的需要服务而组织起来的方式）开始与我们国家的目的、生活本身的目的相混淆时，仅仅发生在妇女头上的事情。毫不奇怪，在美国，妇女生活与商业目的的次序颠倒了，而且，这种颠倒胜过了人的行为科学与在妇女的真正需要的问题上欺骗妇女的颠倒。假若家庭主妇的市场开始缩小，那就需要一位聪明的经济学家来推算出什么会使我们富裕的经济保持运转，正如，假若没有战争的威胁，一位经济学家就会推算出该干什么一样。

很容易就可看出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有一个人的专业就是操纵美国妇女感情为商业的需要服务，为此，他的年收入达100万美元的。当我去看他时，我了解到它是如何发生的。1945年，这个独特的人物开始了这种潜在的劝说的生意，并使之不断发展。他的动机操纵研究所的总部是一幢在

韦斯特切斯特北部的男爵宅第。两层楼高的舞厅的四壁排满了钢架，上面放着1000多份商业和工业的研究报告，30万份个别“深入采访”记录，其中大多数是对美国家庭主妇的采访记录。①

他让我看我想看的材料，他说我可以使用对某一具体公司不属保密的任何东西。在那里没有对任何人要隐瞒的东西，使任何人感到内疚的东西——在一页又一页的那些深入研究报告中，只有对大多数美国家庭主妇所过的那种空虚、无目的、无创造性、甚至没有性的快乐的生活的精明而令人振奋的意识。按他自己毫不害臊的说法，这类最有帮助的潜在的劝说者向我表明了：通过使美国妇女保持家庭主妇的地位而提供的功能——她们缺乏个性、缺乏目的而被操纵去购买东西，创造出一个美元的大“金库”。

只要适当地操纵（“如果你并不害怕这个词，”他说），美国妇女通过购买东西就能被赋予个性、目的、创造性、自我实现的意识，甚至她们缺乏的性方面的快感。此刻我突然认识到妇女左右了美国购买力的$\frac{3}{4}$那种自夸的话的意义。我突然醒悟，美国妇女是这个可怕才能的牺牲品，是从购买东西着眼的这种力量的牺牲品。他如此慷慨地告诉我的真知灼见揭示了许多东西。……

1945年一份为一家主要妇女杂志就妇女对于家用电器的态度所作的调查清楚地说明了商业的困境。随着战争即将结束，面向消费者的销售将取代战争合同，这条信息对于所有

① 本章依据的研究报告来自由欧内斯特·迪希特博士领导的动机研究所。——原注

公司都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份“家政心理学”研究报告，它警告说，“一位妇女对家用设备的态度不能与她对管家的总的态度分割开来。”

根据对4500位妻子（中产阶级、高中或大学文化程度）进行的一次全国性典型调查，美国妇女被分为三类：“真正的家庭主妇型”、“事业型妇女”和“平衡的主妇”。当时有51%的妇女符合“真正的家庭主妇型”（“根据心理学的观点，家务管理是这位妇女最主要的兴趣。她认为使她的家庭保持舒适而井井有条就是最大的骄傲和满意。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她感到她是不可缺少的，任何其他人都不能取代她的工作。对于家庭之外的地位她很少有什么欲望，并且假若她有这种欲望，那也是外界的力量，环境或需要造成的”）。十分明显，这一类妇女的数量在减少，并且可能会继续减少，因为现在新的领域、兴趣、教育向妇女开放了。

然而，家用器具的最大市场是这位“真正的家庭主妇”——尽管对于新器具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这些新器具必须得到承认并在竞争中获胜。（“她甚至会担心它们〔各种器具〕会使她习以为常的干家务的老方式变得不需要了。”）毕竟家务是证明她整个存在的正当的理由。（“我并不认为有任何方式可以使家务对我变得容易一些，”一位真正的家庭主妇说，“因为我不相信一部机器能够取代艰苦的劳动。”）

第二类——事业型妇女或将要成为事业型的妇女——是少数，但是从销售者的观点来看，这是极端“不健康的”一类；广告商们得到警告说，不让这一类人增多将对他们有利。那些妇女，虽然不一定就是有工作的人，“不相信妇女

的位置主要在家中。”（“这一类中的许多妇女从来就没有实际工作过，但是她们的态度是：‘我认为家务管理是对时间的可怕浪费。如果我的孩子成年自立了，我就可以自由地离开家了，我将更有效地利用我的时间。如果我家的三餐饭和洗衣有人照管，我会高兴地出去参加工作。’”）这份研究报告说，关于事业型妇女要牢记的一点是，虽然她们也购买现代家用器具，她们并不是理想类型的顾客。她们是过于苛求的人。

第三类——“平衡的主妇”——“从市场观点，是理想的类型。”她有一些家庭之外的兴趣，或者在转向专门管家之前曾有过工作；她“乐意接受”机械器具所能给以的帮助，但并不指望它们干“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她需要运用她自己的经管才能“来管理一个井井有条的家庭。”

这份研究报告的寓意是清楚的：“由于平衡的主妇代表了有着最大未来潜力的市场，使越来越多的妇女意识到应当属于这一类人将有利于家用器具制造商。通过广告来教育她们：有家庭之外的兴趣和关注较广泛的知识范围（只要不变成事业型妇女）是完全可能的。良好的管家艺术应该是每一个正常妇女的目标。”

问题是，“整个新的一代妇女都被教育去干家庭之外的工作。而且，对于争取解放的一种日益强烈的欲望十分明显。”这个问题如果在那时就已被为家用器具工业服务的潜在劝说者认识到了，那么肯定也被其他生产家用器具的人认识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十分简单，就是要鼓励她们成为“现代的”家庭主妇。直言不讳地厌恶清洁、掸灰、熨衣、洗衣的事业型妇女或未来的事业型妇女对一种新的蜡、

一种新的肥皂不那么感兴趣。不像喜欢有充足的器具并且自己动手干家务的"真正的家庭主妇"和"平衡的主妇"，事业型妇女则"喜欢佣人"——家务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然而，无论她有没有佣人，她也购买各种器具设备。但是她"更可能抱怨它们所提供的服务"并"更难于向她推销"。

要把这些现代可能的或未来的事业型妇女向后转变为真正的家庭主妇既为时太晚，也不可能，但是这份研究报告在1945年为平衡的主妇指出了可发挥的潜力——家庭职业。使她们"想吃蛋糕并吃下它……是节省时间，过得更舒适，爱整洁，有机械化管理家庭的设备，然而并不想放弃在一个管理得井井有条的家中得到'自己动手干'这种个人成就的自豪感。正如一位年轻的家庭主妇说的：'现代化是美好的，这就像你经营一家有各种最新机器的工厂。'"

但是，无论对于商业界还是对于广告商来说，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几乎能够干一切家务的新玩意儿充斥着市场；美国妇女需要日益增加的独创性来得到"成就感"，而仍然以家务作为她们生活中的主要目的。教育、独立性、日益增长的个性，每一桩使她们为别的目的作准备的事情都不断地遭到反对，被引导回到家庭之中。

这位操纵者的服务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在最近的调查中，他不再采访事业型妇女，她们白天都不在家。他有意选择真正的或平衡的家庭主妇、那些新的郊区家庭主妇来作典型调查。家用产品和消费品毕竟是为妇女准备的，所有消费广告预算的75%都集中在吸引妇女，即那些家庭主妇，能够在白天采访到的妇女，有时间购买商品的妇女。自然，他的深入采

访、心理投射测验①"现场实验室"("living laboratories")都是预先计划好用来给他的顾主以深刻印象的。但是更多的时候并非如此，它们包含了老练的社会科学家的精辟见解，可以被有益地利用的见解。

他告诉他的客户们，他们必须就美国妇女要干创造性工作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现代家庭主妇的主要未得到满足的需要"作一些事情。例如，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 必须把X速熟食品作为运用妇女创造性成果的基础来竭尽全力销售。这种吸引力应该强调这样的事实：因为X速熟食品把单调乏味的工作取消了，所以它有助于妇女表现她的创造性。同时，重点应放在烹调操作法、伴随操作的乐趣上，它们使你感到X速熟食品的烹调是真正的烹调。

但是，再次遇到的困境是，如何通过告诉她"她能在她的精力真正起作用的地方利用她的精力"，使她把钱花在取消了焙烤中单调乏味的工作的速熟食品上，但又不要让她觉得太忙，没有时间去焙烤食物②，("我不用速熟食品，因为我根本就不干任何焙烤的事情，那太麻烦了。我住在郊区的公寓套间里，因为要保持房间的清洁，照料我的孩子，还要干我的兼职工作，所以我没有时间来焙烤食物。")当把意料中的

---

① 一种心理测验技术，运用模棱两可的刺激物，如墨迹和谜样画片，让被试者将内在态度、品质和行为方式投射出来。——译注

② 速熟糕点仍需焙烤。——译注

速熟糕点从烤炉中取出，它们不过是地地道道的面包而已，并且根本没有任何创造性成就的感觉，只有"失望感觉"时，如何是好呢？（"在市场上有如此多的只需热一下便可吃的食品时，为什么我要烤自己的速熟糕点呢？自己拌合面粉，然后在铁盒上涂抹油脂，再烘烤，经过这一系列麻烦的过程根本是毫无意义的。"）当那位妇女不将蛋糕从头做起，既没有她的母亲过去有过的那种感觉时，又如何是好呢？（"我母亲做蛋糕的方法是，你必须自己筛面粉，加上蛋和黄油，这样你就会明白你会做出可以引以自豪的东西。"）

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份报告保证道：

> 通过使用X速熟食品，妇女可以证明她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不仅通过焙烤食物，而且通过与她的家庭共度更多的时光。……当然，必须说明家庭焙烤的食品在每一方面都比面包店的食品更好……

最主要的是，通过贬低简便烹饪法而强调"焙烤的激励作用"来赋予X速熟食品"一种治疗价值"。从广告宣传的观点，这意味着强调，"只要家里有X速熟食品，你就会成为一位不同的妇女……一位更幸福的妇女。"

而且，他还告诉客户们，他们广告中的一句话，"你就可以用现有最容易、最懒惰的方法来做蛋糕"，在美国家庭主妇中激起了"否定的反应"——它击中了她们的"潜在的内疚感"（"由于她们从未感到她们真正充分发挥了力量，告诉她们用X速熟食品焙烤是懒惰的方式显然是错了。"）。他建议道，假设这位忠心耿耿的妻子和母亲在厨房火炉背后，

焦急地为她的丈夫和孩子准备蛋糕或馅饼，她“只是在放纵她自己对糖果的欲望。”正是焙烤是家庭主妇的工作这个事实，帮助她驱散了她对她的真正动机可能怀有的疑虑。

但是对付家庭主妇的内疚感可以有对等的方式，这份报告说：

> 可以通过广告来建议：不去充分利用X速熟食品的全部12种用途会限制你给予你的家庭欢乐的努力。这样就可以达到内疚感的转移。那位妇女不会对使用X速熟食品做甜食感到内疚，如果她不利用这个机会给她的家庭做12种不同的美味佳肴她才会感到内疚。“不要浪费你的技能；不要限制你自己。”

50年代中期，这些调查欣慰地报告说，那位事业型妇女（“吵吵嚷嚷地要求在生活的几乎每一个领域都得到平等地位的妇女，对‘家庭里奴隶般劳动’，作出愤怒而强烈反应的妇女”）已经离去了，被一位“不太世故、不太老练”的妇女所取代，这位妇女在父母一教师协会的活动使她“同她家庭之外的世界有广泛的接触”，但是她“在家务中为她的女性特征和个性找到了表现的媒介。”她不像那位自我牺牲的旧式家庭主妇；她认为她自己与男人不相上下。但是她仍然感到“懒散，被人忽视，内疚的感情老在心头萦绕”，因为她没有足够的工作可干。那位广告商一定会操纵她出于一种“创造性感觉”的需要去购买他的产品。

在最初的抵制之后，现在她倾向于接受速溶咖啡。

冷冻食物、熟食品、以及方便食品作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她需要一种正当的理由并且她在那种想法——“通过使用冷冻食物，我就有空去完成作为现代母亲和妻子的其它重要工作”——中找到了它。

创造性是这位现代妇女对她在家庭中业已改变了的地位的这个问题的辩证回答。正题：我是一位家庭主妇。反题：我很单调乏味的工作。合题：我具有创造力！

这在本质上意味着，哪怕这位家庭主妇可以买罐头食品，从而节省时间和精力，她也并未就此罢休。她很需要在罐头食品中添加别的东西，使之有所改变，从而证明她在使全家感到满意的问题上她个人的作用和关心。

创造性的感觉也为另一个目的服务：它是这位现代妇女已解放的才能、较高的情趣、较自由的想象力、较大的主动性的一个泄出口。它允许她在家中运用她可能在一种家庭之外职业中发挥的所有才能。

对创造性机会和时刻的向往是购买商品动机的一个主要方面。

这些调查警告说，唯一的麻烦是她“竭力运用她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判断。她很快就离开了集体的或大多数人的判断标准，她发展了独立的标准。”（“不必去管邻居，我不想按他们的标准去生活，或者凡事都拿自己同他们作比较。”）用“同邻居攀比竞争”这一条并非总能打动她了，广告商必须对她自己生活的需要投其所好。

> 吸引这种渴望。……对她讲，你为她的生活增添更多的热情、更多的享受，现在她有能力去尝试种种新经验并且她有权力去尝试这些经验。更有建设性的事情是，你应该表现出你正在给她上"生活的课程"。

某种清洁工具的制造商得到建议，"打扫住宅应该富有乐趣。"即使他的产品可能不及真空吸尘器有效，它却能让这位家庭主妇在工作中发挥出更多的力量。而且，它使这位家庭主妇产生这种幻觉：她变成了"一个在为具体工作确定用哪一种清洁工具问题上的内行、专家"。

> 这种专业化是这位家庭主妇的一种心理上的防卫，防止在一个一般劳动解放的时代里成为她家庭的一个普通的"吸尘器"和卑下的仆人。
>
> 专业的作用起着一种感情上的双重功能：（1）它帮助家庭主妇取得地位，并且（2）在她对新的同时更好的工作方式的寻求中，她超越她家庭的轨道，进入现代科学的世界。
>
> 结果，对于家用器具和产品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有利的心理气候。这位现代家庭主妇……实际上是放开手脚去努力获得那些家用产品。按她内行的看法，那些家用产品真正地满足了她的需要。这个趋向解释了家庭中各种用具用的不同的蜡和上光剂的流行，地板擦光器使用的日益增多和用于地板和墙壁的各种拖把和清洁工具的多样化等现象。

困难在于要给予她“提高自我价值”的“成就感”，她被劝说在家庭主妇“职业”中去寻求这种“成就感”，然而，在现实中，“她的费时的任务——家务管理不仅没完没了，而且它是社会雇用最低层，最少训练的，最受践踏的个人和集团来干的工作。……任何一个身体足够强壮（而头脑足够简单）的人都能干这些卑贱的家务杂事。”但是，即使这种困难也可被利用来向她销售更多的东西：

> 这位家庭主妇提高她自己作为她家庭的清洁工的声望的办法之一就是通过使用适于专门工作的专门产品。……
>
> 当她使用一种产品洗衣服，第二种产品洗碗碟，第三种擦墙壁，第四种擦地板，第五种擦百叶窗，等等，而不使用一种全能的清洁剂时，她就较少地感觉像一位没有技术的工人，而更多地感到像一位工程师，像一位专家。
>
> 提高她自己地位的第二种方式是“按我自己的方式做事情”——通过创造她自己“行业的窍门”来为她自己确立一种专家的作用。例如，她可以“常常放一点漂白剂在我洗的衣物——甚至有颜色的衣物中，使它们变得真正干净！”

这份报告建议说，帮助她“通过确立她作为她家庭的保护者——数以百万计细菌和病菌的消灭者的作用，证明她的卑贱工作是正当的”。“强调她在家庭里中心人物的作用……帮助她成为一名专家而不是一个奴性的工人……使家务劳

动成为一桩需要知识和技术的事情，而不是一桩仅需要力气，单调乏味、持续不断的努力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一种有效的方式是生产出新的产品。因为，在家庭主妇中似乎有一种日益增大的浪潮：“她们期待着新的产品，这些新产品不仅减少她们日常工作的负担，而且实际上使她们把感情上和智力上的兴趣放在家庭外科学发展的世界上。”

人们对科学的独创性赞叹不已。家庭主妇只要买新的东西，或者被赋以了一种崭新个性的旧东西，就能投身在科学本身之中。

> 一种新的清洁器具或产品除了增加妇女的专业化地位之外，还可增加她的经济安全感和享乐感，正如一辆新汽车对于一个男子那样。调查的回答者中28%的人这样报告，她们同意这种特殊的感情："我喜欢试用新东西。我刚开始使用一种新的液体清洁剂，并且不知怎么地，它使我感到像王后一般”。

然而，让妇女运用她的头脑并且甚至让她通过家务劳动投身于科学之中的问题并非没有弊端。科学不应该过分免除家庭主妇的单调乏味工作；相反它必须专注于创造家庭主妇似乎需要的那种成就感的错觉。

为了证明这一点，250位家庭主妇接受了一次深入的测试，她们被要求在四种想像的清洁方法中作出选择。第一种是完全自动化的除尘除污系统，它像家庭供暖系统一样连续运转。第二种，家庭庭主妇必须按按钮来启动。第三种是便携式，她必须拿着它四处走动并指向某一区域来除去污垢。

第四种是一种崭新、现代的东西，她可以自己用它把脏物扫去。这些家庭主妇清楚而响亮地表示喜欢最后这种器械。如果清洁器械“显得新而现代”，她宁愿要那种让她自己工作的器械，这份报告说。“一个使人非相信不可的理由是，她希望成为一个参加者，而不仅是一个按按钮的人。”正如一位家庭主妇所说，“至于某些神奇的按钮清洁系统，好固然好，然而这对于我的活动，我的成就感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并且我该怎样来安排我的早晨呢？”

这份极度吸引人的研究报告偶然揭示了一种电子清洁器械——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我们的美妙的省力工具之一——实际上使得“家务管理变得比它需要的程度困难得多”。根据那些家庭主妇中80%的人的反应，情况似乎是：一旦一位妇女启动了这个器械，她就“感到被迫去做那并非真正必要的清洁工作”。这种电子器械实际上口授了要做清洁的范围和类型。

那么是否应该鼓励家庭主妇回到那简单便宜的扫帚（它让她只在觉得必要时才去清扫）那儿去呢？不，这份报告说，当然不。仅仅需要给予老式扫帚一种电子器械的“地位”，让它作为现代家庭主妇的一种“节省劳力的必需品，”“然后说明，现代主妇会自然地同时拥有这两种东西”。

没有人，甚至包括那些进行深入研究的人员，否认家务劳动是没完没了的，而且它那令人生厌的重复性正好没有带来那么多的满足，不要求那样多自吹自擂的专门知识。所有家务劳动那种没完没了的性质从销售者的观点来看却是一种有利条件。问题是不使潜在的认识逼近，这种认识危险地潜伏在“我们为几十种不同的家用清洁产品进行的数千次深入

采访”中。这种认识正如一位家庭主妇所说，“家务事讨厌透了！我不得不做家务，因而我也就做了。它是一种必要的讨厌事情，如此而已。”怎么办呢？首先，生产越来越多的产品，让使用说明变得更加复杂，让家庭主妇感到“成为一名专家”是一桩真正必要的事情。（这份报告建议说，必须把洗衣变成远比把衣服仍进机器，再倒入肥皂粉更复杂的一桩事情。衣服必须进行仔细的分类，一类用A种方法洗涤，第二类用B种方法洗涤，还有一些衣服用手洗。于是家庭主妇便能“以了解某一种情况用清洁产品武库中的哪一种而感到十分自豪。”）

这份报告继续说，其次要利用家庭主妇“对隐藏脏物的内疚感”，这样她就会对住房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这样大扫除会给她几个星期的“彻底性的感觉”。（“彻底扫除的次数是衡量她最乐于试用新产品的程度的分数，同时‘大扫除’广告给以了彻底性的允诺。”）

销售者还必须强调完成每一项单独工作时的欢乐，记住“几乎所有的家庭主妇，甚至那些完全厌恶她们工作的人，通过接受它，通过‘使我自己投身于其中，’正如她所说，从她们无穷无尽的命运中自相矛盾地找到逃避现实的方式。”

她在工作中失去了自身——处于各种工具、含奶油的食品、香粉、肥皂的包围之中，她暂时忘记了她将不得不很快地重做这项工作。换句话说，一位家庭主妇让她自己暂时忘记那洗碗池将再次放满碗碟有多么快，地板多么快就会再次变脏，并且她抓住完成一项工作的时

刻作为快乐的时刻，快乐得仿佛她刚完成了将作为她永久荣誉的纪念碑而矗立的一件艺术杰作一般。

这是商品销售商能给予家庭主妇的那种创造性的经验。用一位家庭主妇自己的话来说：

我一点也不喜欢家务工作，我是一个糟糕的家务劳动者。但是偶尔我也振作起来并且我会真地进城去……当我有了一些新型的清洁材料——如像当玻璃蜡或那些硅酮家俱漆刚出来时——我从中得到极大的乐趣，并且我使房子里每一件东西都铮铮发亮，我喜欢看到东西闪闪发亮。当我看到洗澡间闪耀发光时，我心中十分舒畅。

于是那位操纵者建议道：

把你的产品与她从那几乎是宗教的、由她的家庭提供的基本安全感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联系起来。谈论她的“轻松、幸福、平静的感情”；她的“深刻的成就感”。……但是，要记住，她并非真正地为了表扬而要表扬…还要记住，她的情绪并不是简单的“快活”。她也疲惫，还有点庄重。表面上欢乐的形容词或色彩不会反映她的感情。她会对简单、热烈并且诚恳的广告词句作出有利得多的反应。

在50年代，出现了对青少年市场的革命性发现。青少年和年轻夫妇开始在这些调查中崭露头角。调查发现，那些只

上过中学并且从未工作过的年轻妻子更“不稳定”、更缺少独立性、更容易向她们推销商品。这些年轻人可能被告之：购买了合适的商品，她们无须工作或学习就能取得中产阶级的地位。那种同邻居在拥有财产上竞争的销售方法会再次奏效；美国妇女从家庭之外的教育和工作中取得的个性和独立性对于10多岁的新娘不是一个问题。这些调查说，事实上，在这些妇女正年轻时，如果“通过商品得到幸福”的模式能够建立，那么就可以放心地鼓励她们走出家庭去从事一项兼职工作以帮助她们的丈夫支付他们买的所有东西。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要使青少年深信“通过商品得到幸福”不再是富人或有才能的人的特权；所有人都能享受这种幸福了，只要他们了解“恰当的方式”、其他人享受这种幸福的方式，只要他们了解与别人不同的窘迫。

这些报告中的一份说：

> 目前的新娘中，49%都是10多岁的姑娘，而且在18岁时结婚的姑娘比任何其它年龄结婚的姑娘都多。这种较早的家庭结构产生了大量正要开始在购买商品……时自己承担责任并作出决定的年轻人。
>
> 但是最重要的事实具有一种心理上的性质：今天的婚姻不仅是浪漫的互相依恋的顶点，而且它也是创造一种伴侣关系的决定：比过去更有意识地并且更清醒地建立一个舒适的、装备有大量理想产品的家庭。
>
> 在同几十位年轻夫妇和未来的新娘谈话时，我们发现，他们的谈话和梦想通常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围绕着他们未来的家及其陈设，围绕着买东西“以获得一种观

念”，围绕着讨论各种不同产品的优缺点。……

现代新娘坚定不移地深信已婚爱情的独特价值，在婚姻中找到真正幸福的可能性以及在婚姻中并通过婚姻来实现她个人的命运。

但是，今天的订婚阶段仅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是浪漫、理想而令人兴奋的阶段。不妨说，订婚阶段是趋向于一种婚姻的物质上责任的排练。在等待婚礼的同时，未婚夫妇们努力工作，为明确的购置目标而存钱，或者甚至开始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

一方面是对于婚后生活的重要性和美妙的一种近乎宗教式的信念，另一方面是以产品为中心的观点，这两方面的这种新结合的更深意义是什么呢？……

属于一个男人，有一个家和她自己的孩子，在所有可能的事业中选择妻子—母亲—持家的妇女的事业，现代新娘把以上这些当作自觉的目标来追求。而在许多情况下，她的祖母把这些视为一种盲目的命运，她的母亲则认为是奴隶般的地位。

广告商们被告之，这样的事实——现在年轻的新娘在她的婚姻中寻求完整的“实现”，她现在期望“证明她自己的价值”并在她的家中发现生活的全部“基本意义”，同时通过她的家庭来参与“现代的时代，未来的有趣的思想”——有着巨大的“实际应用”。她在她的婚姻中寻求所有这些意义，甚至她会被“抛在后面”的这种担心也可引入购买产品的渠道。例如，纯银制品——一种非常难于销售的产品——由一位制造商被告之：

> 使她放心地相信，只有有了纯银制品，她才会在她的新角色中有充分的安全感……它象征着她作为现代妇女的成功。最主要的是要使产生于清洁银制品的工作的乐趣和自豪引人注目，激发取得成就的自豪感。"你从这项富于乐趣的工作中会感到无比自豪……"

这份报告进一步建议说，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非常年轻的10多岁姑娘的身上。这些年轻姑娘想要"其他人"要的东西，即使她们的母亲不要。（"正如我们的一位青年所说：'所有的年青人都开始有了自己的成套纯银制品。我们对这种东西真是着了迷，我们一起比较银器的图案，仔细查看有关的广告。我自己的家从来没有任何纯银制品，当我在纯银制品上花钱时，他们认为我在炫耀，他们认为镀银制品也一样好。但是这些年轻人认为镀银制品十分低劣。'"）在学校、教堂、妇女社团、社交俱乐部里争取她们；通过家政学教师、团体的领导人、青少年电视节目及针对青少年的广告来争取她们。"这是未来的最大市场，同时口头表达的广告同团体的压力一道，不仅是最有力的影响，而且在缺少传统的条件下也是一种最必要的影响。"

至于那位更有独立性而年龄较大的妻子，那种选择经久耐用，不怕摔打的物品——不锈钢制品，塑料碟子，纸餐巾——的不幸倾向能够通过使她对孩子的不良影响感到内疚而得到阻止。（"如同一位年青的妻子对我们讲的：'我整天都不在家，因而我不能按照我所希望的方式准备三餐饭，我不喜欢那样，因为我的丈夫和孩子应该换好一点的口味了。

有时我也想，如果试着依靠一个人的工资去生活并过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那就会更好一些，可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老是太多了。’”）这份报告继续说，那样的内疚感可被利用来使她把银制品看作把家庭团聚在一起的一种方式；它赋予了“增大的心理上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这种产品甚至能填补那位家庭主妇对个人身份的需要；“要暗示它真正变成了你的一部分，反映着你。不要害怕去神秘地暗示，纯银制品会使它自己适应于任何家庭和任何个人。”

另一份调查报告说，毛皮制品业处于困境之中，因为中学和大学的女学生把毛皮衣服等同于“无用”和“情妇”。在这些不幸的涵义形成之前应向这些年轻人提出建议，（“向年轻人介绍皮毛制品的正面经验，在她们10多岁的阶段使她们安心地购买衣服的可能性已增大了。”）应向她们指出：“穿毛皮衣服实际上是为一位妇女建立女性气质和性的特征”。（“这是一种女孩子期望的事情。它意味着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是女性的。”“我在正确地培养我的女儿。她总想穿‘妈妈’的衣服。她将会要这些衣服，她是一个真正的姑娘。”）但是，要记住“貂皮对于整个毛皮制品市场起了一种反面的女性象征的作用”。不幸的是，三位妇女中就有两人认为穿貂皮衣服的人是“掠夺性的、剥削性的、依附性的、在社会上非生产性的……”

这份报告说，今天的妇女不可能如此明确地具有掠夺性和剥削性；貂皮衣服也不可能有过去最时髦的“鹤立鸡群，以自我为中心的涵义”。因而毛皮制品的“自我倾向”必须用家庭主妇的那种新的女子气质来减少和取代，对于这些家庭主妇，自我倾向必须解释成共同性、家庭倾向；

> 要开始制造这样的感觉：毛皮制品是一种必需品——一种令人喜爱的必需品……从而为消费者提供道德上的许可，去购买她现在感觉是自我倾向的某些东西。……要赋予毛皮制品的女子气质以更广泛的性质，发展下列一些地位和声望的象征……一位感情上幸福的妇女……由于她是那样一种人，并且她发挥了那样一种作用，从而成为赢得她丈夫和孩子的爱和尊重的妻子和母亲。……
>
> 把毛皮制品置于家庭的环境中，让家庭成员、丈夫和孩子对一件毛皮衣服产生的欢乐和赞赏显露出来，让孩子们对他们母亲的外貌、对她拥有一件毛皮衣服而感到的骄傲显露出来。把毛皮衣服作为"家庭"礼物来发展——使整个家庭在圣诞节等场合享受毛皮衣服的乐趣，从而为毛皮衣服的拥有者降低它的自我倾向并且消除她对被说成放纵自己而感到的内疚。

这样，唯一能使这位年轻的家庭主妇表现自己而不感到内疚的方法是为她的家和家庭成员购买产品。她可能拥有的任何创造性冲动也应该以家和家庭成员为方向，正如另一份就家庭缝纫工业进行的调查所报告的：

> 像缝纫这样的活动取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和地位。缝纫不再与绝对的需要相联系。……而且，随着以家庭为方向的各种活动在道德上的提高，缝纫与烹调、园艺以及家庭装饰都被认为是表达创造性和个性的一种方式，

同时也被认为是取得一种新的情趣水平清楚表明的那种“品质”的一种方式。

这份调查发现，从事缝纫的妇女是积极主动、精力充沛、天资聪明的现代家庭主妇，是新的以家庭为方向的现代美国妇女，她们有一种未完成的巨大需要去创造、去取得并且去实现她们自己的个性——这种个性必须用某些家庭活动来加以充实。对于家庭缝纫工业，一个大问题是缝纫的“形象”太“单调乏味”了。不知怎么地，它没有取得在创造某些重要东西的感觉。在销售它们的产品时，家庭缝纫工业必须强调缝纫的“持久创造性”。

但是根据一家服装纸样制造商得到的建议，即使缝纫，也不能有太多的创造性和太多的个性。他的纸样需要一定的智力，为个性的表达留出了相当大的余地，但正是这个原因，这家制造商遇到了麻烦。他的纸样暗示：一位妇女“会明白她喜欢什么并且可能会有明确的想法”。有人向他建议扩大这种“太受限制的流行式样的个性”，使之具有“流行式样的广泛适应性”——吸引“在流行式样上动摇不定的妇女”、“遵从时尚的人”，这些人感到“穿着得过分与众不同并不精明”。当然，因为这位制造商的问题不在于满足妇女对个性、对表现或创造性的需要，而在于销售更多的式样——通过建立广泛的适应性会使销售更好一些。

一次又一次的这些调查精明地分析了美国妇女的种种需要，甚至包括她们的秘密的挫折；而每一次，只要这些需要受到了恰当地操纵，她们就可能被诱导去购买更多的“东西”。1957年，一份调查告诉各家百货公司，它们在这个新

世界上的作用不仅是向家庭主妇"销售"，而且是要满足美国妇女对"教育"的需要——去满足她们拥有的欲望，尽管她们单独一人在家，但她们仍然感到她们自己是这个变化着世界的一部分。这份报告说，如果百货公司理解她们力图通过购买商品来满足的真正需要并不在于她们能在那儿买到任何东西，那么这家百货公司就能向她销售更多的商品。

大多数妇女不仅有一种物质的需要，而且有逛百货公司的一种心理上不可抵御的冲动。她们生活在相当孤立的状态中。她们的眼界和经验都有限。她们明白在她们的地平线之外还有一种更广阔的生活，她们担心生活会把她们忽略了。

百货公司打破了那种孤立状况。突然走进一家百货公司的妇女有这种感觉；她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百货公司远胜过了杂志、电视、或任何其它大众传播媒介，成了大多数妇女了解生活各方面信息的主要来源……

这份报告继续说，存在着许多种百货公司必须满足的需要。其一，家庭主妇"要在生活中学习和前进的需要"。

我们用种种物品来围绕我们自己，以它们来象征我们的社会地位。一位妇女的丈夫在几年前一年挣6,000美元，现在一年挣1万美元，她需要学习一整套新的象征。在这个问题上，百货公司就是她的最好老师。

其二，存在着对成就的需要，对于这位新的现代家庭主妇来讲，这种需要主要由一桩“买卖”来满足。

我们发现，在我们丰裕的经济中，对大多数妇女来说，对价格的专注与其说是一种金钱上的需要，不如说是一种心理上的需要。……一桩“买卖”越来越不意味着“我现在能买过去在价格较高时我不能买的东西”；它主要意味着“作为家庭主妇，我正在干一件漂亮的事情；我正在为家庭的幸福作贡献，正如我丈夫工作并把工资带回家时所作的一样。”

这份报告说，价格本身无关紧要了：

由于买东西不过是一种复杂关系的顶点，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关系基于妇女的欲望——想知道如何成为一位更有魅力的女人、一位更好的妻子、一位优秀的母亲、等等，要在所有你的推销和广告中利用这种动机。要利用每一个机会来解释：你的商店会如何帮助她实现她在生活中最期望的那种作用……

如果说商店是妇女生活的学校，则广告就是教科书。她们对这些广告怀有一种无穷无尽的热望，这些广告给予她们这种幻觉：她们和这个无生命物体的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保持着联系，通过这些物体她们表现了她们那么多那么大的冲动……

在1957年，有一份调查再次非常正确地报告说，尽管

"以家庭为中心的新时代"有"许多积极的方面",不幸的是现在太多的需要集中在家庭上——而家庭没有能力去满足。这是引起惊恐的一个原因吗?的确不是,甚至这些需要也有利于操纵妇女。

> 家庭并不总像它有时被描绘的那样,是处在现代生活允诺的美妙梦想的极点的金罐子。实际上,正在向今天的家庭提出的心理上的需求,家庭是无法满足的。……
>
> 对于美国的制造商和广告商(同时也对于家庭和我们公民的心理健康)来讲,幸运的是,这一空白的大部分可以并正在由消费品的获得来填满。
>
> 数以百计的产品实现了一整套心理功能,这些功能是制造商和广告商应该了解并在发展更有效的销售方式时运用的。正如生产一度起着社会紧张状况的排泄口的作用,现在消费也起着同样的效用。

购买商品排除了那些不能真正由家庭满足的需要——家庭主妇对"超出她们自己用以表明身份的某种东西"的需要,对"同别人一起向着给予生活以意义和目的的目标前进的一种感觉"的需要,以及对"每一个人都能贡献他的力量的一个不容置疑的社会目标"的需要。

> 要在一群为有意义的社会目标而奋斗的人中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位置的需要深深地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无论何时缺少这一点,个人便会烦躁不安。这解释了当我

们同全国各地的人交谈时，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了这样一些问题："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向何处去？""当我们都工作得如此努力并且有如此多事情要干时，为什么事情却并不显得更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呢？"

这个问题就是：你的产品能填补这个空白吗？

在这个"同在一起"的时代，"对家庭生活隐私的需要"是一份深入调查所揭示的另一个秘密的愿望。然而，可以利用这种需要来推销一辆旧汽车。……

除了全家一起享用的汽车外，还有夫妻单独享用的汽车——"单独在车中，一个人可以得到人们非常需要的休息时间并可进一步把这汽车视作自己的城堡，或一个夺回了隐私的工具"。或者，还可以有"单独的""个人的"牙膏、肥皂、洗发剂。

另一份调查报告说，尽管十分强调婚姻、家庭和性行为，然而存在着一种令人困惑的"婚后生活性丧失的特征"。问题：什么能提供这份报告所诊断的"缺乏性的活力"的活力呢？答案：这份报告建议销售商"把里比多①放回到广告中去"。这份报告说，尽管人们感觉到了我们的广告商在竭力通过性的内容来推销每一种东西，然而出现在电视广告节目上和全国性杂志上的广告中有关性的内容却太平淡、太狭

①里比多，弗洛伊德所创的一个心理学概念，原指与性冲动有关的生理能量，在其后来的著作中又指与人类建设性活动有关的生理能量。——译注

险。"用户第一主义"正在使美国人失去性特征，因为它"未能反映远远超出了两性之间关系的每一位个人身上的强大生命力"。情况似乎是，销售商们利用性的内容过多，以致人们不再对它感兴趣了。

> 大多数现代广告反映并严重地夸大了我们目前贬低、简化和削弱人类生命欲望的充满激情、汹涌澎湃和令人兴奋的各个方面的民族倾向。……没有人建议广告能够或者应该变得黄色或淫秽。问题在于这样的事实，由于广告的谨小慎微和缺乏想象，它面临着变得缺乏里比多，从而变得不真实，无人性并且令人厌烦的危险。

怎样把里比多放回去，恢复失去了的自发性、动力、对生活的爱、个性、以及在美国似乎缺少的性的内容呢？在一个心不在焉的时刻，这份报告作出结论说："对生活的爱，诸如对另一性别的爱，应该不受到外部动机的玷污……要让妻子不仅只是一位家庭主妇、一个女人……"

一天，我正沉浸在这些报告在过去15年里给予美国广告商的各种各样见识中，我应邀同主持这项动机研究活动的那位男子共进午餐。他向我说明了在女性的奥秘背后的商业力量，这使我受益非浅，或许我也对他有所帮助。我天真地问他，既然他感到要赋予妇女在家务劳动中的创造性和成就一种真正感觉是如此困难，为什么他还力图通过使她们购买更多的"东西"来减轻她们的内疚感、幻灭感和挫折呢——为什么他不鼓励她们尽量去购买现成的东西以减轻负担，从而她们会有时间走出家庭并在外部世界中追求真正创造性的目

标呢？

“可是我们已经帮助妇女重新发现家庭以表现她的创造性的作用，”他说，“我们帮助她把现代家庭看作是艺术家的工作室，科学家的实验室。此外，”他耸了耸肩头，“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大多数制造商正在生产与家务有关的东西。”

“在一个自由企业经济中，”他继续说道，“我们必须发展对新产品的需要。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解放妇女，让她们向往这些新产品。我们帮助她们重新发现：持家比同男人竞争更富于创造性。这一点可以受到操纵。我们向她们推销她们应该要的东西，使无意识加快，推动它前进。重要的问题是要解放妇女，使她不要对正发生在她头上的情况感到害怕，即使她不必在烹调、清洁上花太多的时间也没什么。”

“那正是我的意思，”我说。“为什么速熟馅饼的广告不告诉妇女，她能利用节省的时间去成为一位天文学家呢？”

“那并不太难，”他说。“几个形象——那位天文学家得到了她的丈夫，作为女英雄的天文学家，使成为一位天文学家对妇女是有魅力的事情……可是不，”他再次耸了耸肩。“客户们会感到惊恐。他想销售速熟馅饼，那位妇女不能不呆在厨房里。制造商想用计谋使她回到厨房里去——而我们则向他表明如何正确地做那件事。如果他告诉她，她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妻子和母亲，她就会朝他脸上啐唾沫。然而我们向他说明如何去告诉她，在厨房里是富于创造性的。我们解放了她要在厨房里创造的需要。如果我们告诉她去当一位天文学家，她就会远远地离开厨房。另外，”他补充道，“如果你想开展一场解放妇女，使她们成为天文学家的

运动，你就必须找到某个大人物，如全国教育协会的大人物，来为这场运动负担费用。”

动机研究专家一定会因他们对家庭主妇的生活和需要的现实所具有的见识而受到称赞，这种现实常常被他们的社会学和治疗心理学的学术界同行们忽略，这些人通过弗洛伊德—功能主义的面纱来看待妇女。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客户们的利益，那些操纵者发现，数以百万计的假定是幸福的美国家庭主妇有着家与家庭，爱情与孩子并不能满足的复杂需要。但是根据一种超乎金钱的道德观，那些操纵者利用他们的灼见向妇女推销东西是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行为，这些东西无论多么精巧，永远也不会满足那些日益急迫的需要。他们劝说家庭主妇呆在家里，在电视机前着迷，这样，她们的人类的普遍需要就说不出来，得不到满足，被针对性别的销售引入到购买东西之中而逐渐消失，这种行为也是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

对美国商业界中的操纵者和他们的客户创造了这种女性的奥秘，几乎难以指责。但是他们是使这种奥秘不朽的人中最强大的力量；正是数百万他们这种遍及全国的人，以有说服力的形象使美国家庭主妇感到满意，转移她们的内疚感并且掩饰她们日益增长的空虚感。他们采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技术和概念并把它们变换成那些简单、精明，无耻的欺骗性广告和电视广告节目，他们于这桩事是如此成功以致今日美国状况的观察家把大多数美国妇女除了成为家庭主妇外没有任何别的抱负当作事实来接受。如果他们不单独对把妇女送回家负责，他们也无疑地要对把妇女束缚在家里负责。他们不间断的夸夸其谈很难避开今天的大众传播媒介；他们把女性的

奥秘深深地烙在每一位妇女的心灵上，以及她的丈夫、孩子和邻居的心灵上。他们使它成了她日常生活紧密结构的一部分，因为她不是一个好主妇，对她的家庭没有足够的爱，她正在变老，而遭到嘲笑辱骂。

> 一位妇女在肮脏的炉灶上煮饭，她会感觉良好吗？直至今天，没有一种炉灶能永久保持干净。现在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新式沃尔普尔炉有可以揭开的炉门，可以在洗碗池洗刷的焙烤抽屉，容易抽出的滴水盘……这是第一种任何妇女都能十分容易完全保持干净的炉灶……并且这种炉灶能使烤出的食品味道更好。
>
> 爱可以用许多方式来表示。它是给予和接受。它是保护和选择……懂得对于你所爱的那些人什么是最安全的。他们洗澡间的卫生纸总是“斯科特”牌……现在有四种颜色和白色的系列产品。

他们多么熟练地把她对成就的需要转入性的幻想，这些幻想许诺她永葆青春，使她对时间消失感觉麻木。他们甚至告诉她：她能够让时间停止不动。

> 她会……还是不会呢？她同她的孩子一样充满了乐趣——而且同样生气勃勃！她那自然的态度，她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烁发亮的方式——仿佛她已找到了使时间静止不动的秘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她已……

这些广告以日益巧妙的方式把她作为美国家庭主妇的

“角色”加以美化——广告商明白正是在那种角色中她缺少个性会使她拜倒在他们销售的任何商品之下。

> 她是谁？她同她六岁的孩子一样对开始上学感到兴奋。她计算她准备就绪需要的天数，装盒的午餐，包扎好的手指，以及许许多多的其它细节。她可能同你一样，为了忙碌而有价值的生活需要一种特殊的衣服。

> 你就是这样的妇女吗？给予你的孩子你所希望他们得到的乐趣和有利条件了吗？带他们到处走并帮助他们做事吗？参加期待你的教会和社区的活动……发展你的才能，从而你会有更广泛的兴趣吗？你可以成为你渴望成为的这种妇女，拥有你自己的一辆“普利茅斯”牌轿车。坐在你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漂亮的“普利茅斯”牌轿车里，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到你想去的地方去……

但是，一种新炉灶或一种较柔软的卫生纸不会使一位妇女成为一位较好的妻子或母亲，即使她认为那正是她需要成为的。染发不能使时间停止不前；买一辆“普利茅斯”牌轿车不会赋予她一种新的身份；抽一支“万宝路”牌香烟也不会使她得到上床的邀请，即使那正是她认为她所希望的。然而这些未实现的许诺能够使她无止境地不断想得到各种商品，防止她了解她真正需要或想要什么东西。

1962年6月10日《纽约时报》一整版的大幅广告说：“献给终生无愧于自己潜力的妇女！”画中的一位艳丽女人穿着晚礼服，佩戴珠宝首饰，身旁有两个漂亮可爱的孩子，在画下写道：“唯一完全一体化的营养化妆品和护肤品——

旨在把妇女的美貌提高到绝对的高峰。使用“阿尔特玛”① 的妇女会有深刻的满足感，一种新的自豪感。因为这种精美华贵的系列化妆品是绝妙的顶点……没有任何东西能超过它。”

当你理解了他们企图干什么时，这一切显得多么荒谬可笑。如果这位家庭主妇让操纵者们奉承或威胁她去买不会满足她家庭的需要也不会满足她自己的需要的东西，那么她只可能责备她本人而不能责备别人。但是，如果广告和电视广告节目是“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一个明显事例，那么以杂志的社论或一种电视节目伪装起来的同样针对性别的销售就不那么荒唐可笑而是更加阴险狡诈了。在这一点上，这位家庭主妇常常成了易受欺骗的牺牲品。我曾为这样的一些杂志写过文章，在这些杂志中，针对性别的销售不可避免地同社论的内容紧密联系着。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那些编辑们了解了广告商想要什么。

X杂志的核心是服务——为是美国家庭主妇的完整妇女提供彻底的服务；为也是商人的广告客户在所有最大利益的领域服务。它把一大批严肃认真、诚心诚意、有献身精神的家庭主妇交给广告客户。这些妇女对家庭和家用产品更感兴趣，更乐意并能够支付……

在编辑会议上从来就不需要写备忘录，从来就不需要讲一句话，作出编辑决策的男女常常使自己非常高的水准，与广

① “阿尔特玛”，英文“Ultima”，取自英文单词“ultimate”，有“最终的，极限的，顶点”等意。——译注

告客户的美元利益相妥协。如同《麦考尔》杂志的一位前任编辑最近揭露，广告客户的影响常常是显而易见的。在“服务”版中所描绘的那种家庭是以广告业的男人所用的明确肯定的词语口授的。

然而，一家公司必须从它的产品上获取利润；一份杂志，一个广播网需要广告收入来维持。但是，即使利润是唯一的动机，并是成功的唯一标准，我仍然怀疑当传播媒介给予顾客他们认为顾客想要的东西时，是否他们不会犯错误。我怀疑对于美国经济和商业本身的挑战和机会从长远来看是否不会在于让妇女成长起来，而在于用青春血浆把她们凝固起来，使她们没有头脑而渴求商品。

无论对于美国的经济是多么有利可图，真正的罪行是对操纵者的“使她们变年轻”的建议不动声色的接受，而且这种接受有增无减——孩子们甚至在识字之前就会唱或背诵电视广告节目，因为优美的巨幅广告几乎像“瞧，萨利，瞧，”①一样容易记住，这些杂志有意计划在10多岁的姑娘长成妇女之前就把她们变成家庭主妇式的商品购买者：

> 她把X杂志从头读到尾……她学会了如何购买东西，煮饭做菜，缝纫以及一个年轻妇女应该知道的每一件事情。她按照X杂志上的衣服来设计她的全部服装，注意X杂志对美容和情人的意见……就青少年的最新时尚请教X杂志……而且，啃！瞧她怎样根据X杂志上的广告来买东西！购买东西的习惯起源于X杂志。开始一种

① 一首美国儿童爱唱的儿歌。——译注

习惯比停止一种习惯要容易得多！（了解X杂志的独特发行方式，学校里的X杂志如何把广告带进中学家政课的课堂。）

像把小姑娘献祭给部落的神的一种原始文化，我们把我们的姑娘献给女性的奥秘，通过针对性别的销售更有效地把她们训练成商品的消费者，我们的国家就献身于这些商品的有利可图的销售上。在一家全国性新闻杂志上，最近出现了两幅广告，它们不适合于10多岁的姑娘，而适合于生产和销售商品的经理们。其中一幅是一个男孩的画像：

我就那样到月球去……而你不能去，因为你是一个姑娘！今天的孩子成长得很快，他们的兴趣能包括如此广泛的领域——从旱冰鞋到火箭。X公司也成长起来了，生产广泛多样的电子产品，适用于世界范围的行政、工业和空间领域。

另一幅广告画的是一位姑娘的面孔：

一个有天赋的孩子应该成长为家庭主妇吗？教育专家估计，在我国每50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具有高智力的天赋。当那个有天赋的孩子是姑娘时，不可避免地有人要问一个问题："假若她变成一个家庭主妇，这位罕见的天才就会被浪费了吗？"让这些有天赋的姑娘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她们中90%以上的人都结了婚，大多数人觉得家庭主妇这项工作具有强烈的魅力，大有益处，足以

充分运用她们的智力、时间和精力……。在她的日常的护士、教育家、经济学者和单纯的家庭主妇的角色中，她不断地寻求改善她家庭的生活的方式。……数以百万计的妇女——为美国一半的家庭购买商品——通过贮存商品价格标签来这样做。

如果那位有天赋的女孩成长为一位家庭主妇，在她生活的这个世纪里，在那男孩到月球去的同时，那位操纵者能够用超级市场的商品价格标签来耗尽她的才智和精力吗？

另一幅广告说，决不可低估妇女的力量。但是在美国，那种力量过去和现在都被低估了。说得更准确些，妇女的力量只是依据可被操纵去购买东西的程度来估量，并没有把妇女的才智和精力真正包括进去。可是，她们是为了比家务和购买东西更崇高的目的而生存——否则她们就会虚度年华。也许只有病态的社会才会决意忽视妇女的力量，这种社会不愿正视它自己的问题，也不能抱有与其成员的能力和知识相当的目标和目的；也许只有病态的或不成熟的社会才会选择使妇女成为"家庭主妇"，而不是成为人；也许只有不愿正视社会的伟大挑战，病态或不成熟的男子和妇女，才会没有这些难以忍受的痛苦而长期退缩进那充斥物品的家中，并使它成为生活本身的目的。

增加家务以消磨时光

带着一种幸福的现代家庭主妇的形象，正如杂志和电视、功能主义的社会学家、以性为指导方向的教育家以及在我眼前跳动的操纵者所描绘的那种家庭主妇形象，我去寻找一位那样的神秘人物。就像打着灯笼的第欧根尼①，我作为一名记者，从一个郊区到另一个郊区，寻找一位有才干、受过教育，完全成了家庭主妇的妇女。我先去了郊区的精神病康复中心和心理指导诊所，找到享有盛名的当地的

① 第欧根尼（Diogens ？一约公元前320年），犬儒学派（希腊一哲学派别）的原型人物，传说他白天打着点起的灯笼寻找诚实的人。——译注

精神分析专家和见闻广博的当地居民，向他们陈述我的目的，请他们向我引见已完全变为专职家庭主妇和母亲的那些聪明、能干、受过教育的妇女，而不要向我引见那些神经病的，沮丧的家庭主妇。

“我认识许多已达到女性完善这个目的的家庭主妇，”一位精神分析学家说。我请他列举四个人的名字，便去看她们。

第一位经过五年的心理治疗之后，不再是一位受驱使的妇女，但她也不是一位专职的家庭主妇；她成了一位计算机程序编制者。第二位是一个光荣非凡的妇女，她有一位杰出而成功的丈夫和三个能干、非凡的孩子，在她的整个婚后生活中，她一直是一位职业精神分析学家。第三位在没有怀孕生孩子的期间，认真地继续她作为舞蹈家的生涯。而第四位在经过心理治疗后，以一种日益严肃的态度投身于政治之中。

我向我的向导报告了，并说在所有这四个人似乎都成了“完善女性”的妇女的同时，却没有一个人是专职家庭主妇，而且还有一人竟是他的同行。他说，“这四个人的情况只是一种巧合。”但是我怀疑是否它是一种巧合。

在另一个社区里，我被引去见一位妇女。向我提供情况的人说，她是一位真正作为家庭主妇而达到完善的妇女（“她甚至烤自己的面包”）。结果我发现，在她的四个孩子都在六岁以下并且她在人口调查表中填写“职业：家庭主妇”期间，她学会了一种新的语言（有教学资格的证书），并利用她以前受过的音乐训练，先在一家教堂任志愿的风琴手，然后作有收入的职业风琴手。在我采访她之后不久，

她接受了一项教学工作。

然而，在许多场合下，我采访的妇女真正符合实现了女性目标的新形象——有四个，五个或六个孩子，烤自己的面包，用自己的双手来帮助修建房屋，缝制所有孩子的衣服。这些妇女没有事业的梦想，没有对比家庭更大的世界的想象；全部精力都集中在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的生活上；她们唯一的雄心，唯一的梦想已经实现了。但是她们是达到了完善的妇女吗？

在我采访过的一个高收入的经济开发区，有28位妻子。其中一些人是大学毕业生，年龄为30多岁或40出头；年轻一些的妻子一般是从大学退学而结婚的。她们的丈夫在相当高的程度上专心致力于富于挑战性的职业。这些妻子中仅一人从事职业性工作，大多数人把母亲资格作为一种职业，偶尔也参加社区里的活动。28人中有19人是自然分娩（几年前在聚餐会上，妻子和丈夫常常下到底楼一起进行适当的娱乐活动）。28人中有20人给婴儿喂奶。40岁或接近40岁时，这些妇女中的许多人怀了孕。女性奥秘的实现在这个社区得到如此依照字义的信奉，以致于如果一个小女孩说："我长大了时，我要当一名医生，"她的母亲就会纠正她："不，乖乖，你是一个女孩。你要成为一位妻子和母亲，就像妈妈一样。"

但是，妈妈到底像什么样子呢？28人中有16人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18人在服用镇静剂；好几人试图自杀；并且一些人因精神压抑或被诊断怀疑有神经病而时间不等的住过医院。（"这些幸福的郊区妻子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变得狂暴，一丝不挂地尖叫着从大街上跑过，你会对这种情况的人的数

目之多感到吃惊，”当地的一位医生，他不是神经病医生，但在那种紧急情况下曾被请去看病。）在给自己的婴儿哺乳的妇女中，有一位曾不顾一切地坚持哺乳，直至那孩子营养不良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她的医生强制她断奶。12位妇女参与了事实上的或幻想中的私通行为。

这些就是因为她们的家庭、丈夫、孩子，并且因为她们头脑和精神的个人天赋而被人羡慕的，美好而聪明的美国妇女。为什么她们中如此多的人成了受驱使的妇女呢？后来，当我在类似的郊区再三看到这一相同的模式时，我明白了它决不可能是巧合。这些妇女主要在一个方面相似：她们有着至少由初期高等教育所培养的智力和才干的非凡天赋，而她们作为郊区家庭主妇所过的生活拒绝给予她们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

正是在这些妇女身上，我首先开始注意到这个无名的问题所说明问题的迹象；她们的声音单调平淡，或者神经质并且极度紧张不安；她们倦怠厌烦，或者发狂般地围绕着家庭或社区“忙碌”。她们以妻子与母亲的神秘的词语来谈论“女性完善”，但是她们也极其热切地谈论另外一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她们似乎的确非常熟悉。

一位妇女曾首先倡议在她那个社区的落后的学校系统中寻找好教师；她曾任学校董事会成员。当她的孩子都开始上学时，39岁的她曾认真考虑她自己的未来：她应该返回大学去得到硕士学位呢，还是她本人成为一位专职教师呢？然而那时，突然她决定不继续了——她有了一个晚来的孩子，她的第五个孩子。当她告诉我，她现在从社区领导中退下了，而“再次主修家政”时，我听到了她声音中那平淡的语气。

当一位年龄较大的妇女对我讲以下的话时，我听到了同样悲伤、平淡的语气：

> 我正在寻找使我满足的某种东西。我认为它将是在这个世界上起作用、有用处的最美妙的东西。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去做事情。我丈夫不相信妻子的工作。如果我能使我的孩子变小，再次呆在家里，我情愿把我的双臂砍断。我丈夫说，找一些你喜欢的事情消磨时间，为什么你要工作呢？因此，现在我几乎每天打高尔夫球，只我自己一个人打。当你一天散步三四个钟头后，至少你晚上就能睡觉了。

我采访了另一位妇女，采访是在她自己帮助建起的住宅的巨大厨房里进行的。她正为她那出名的家制面包忙着揉面；她为一个女儿作的衣服已作了一半，放在缝纫机上；一台手织机立在一个角落。从前门到炉灶，房子里的地板上遍布着孩子们的工艺材料和玩具，在这幢现代住宅里，如同这个时代里许多开敞布置的住宅一样，在厨房和起居室之间根本就没有门。这位母亲也没有任何她自己的梦想、愿望、想法或挫折来使她与她的孩子分开。她现在怀上了第七个孩子；她说，她同她的孩子一起过日子，她的幸福是完满的。或许这儿有了一位幸福的家庭主妇。

但是正当我要离开之前，作为一种事后的想法，我说，我猜想当她提到她羡慕她的邻居，一位专职设计师兼三个孩子的母亲时，她在开玩笑。“不，我不是开玩笑，”她说；而这位正在为经常自己动手作的面包揉面的安祥的家庭主

妇竟然开始哭了起来。“我非常羡慕她，”她说。“她知道她想干什么，而我不知道，我永远也不知道。当我怀孕并且孩子还小时，我是一个重要人物，说到底，我还是一个母亲。但是以后，他们长大一些了。我不能只是一直养孩子。”

在我从未发现一位真正符合那种“幸福的家庭主妇”的形象的妇女的同时，我注意到了关于这些生活在女性奥秘的保护性阴影下的能干的妇女的一些别的情况。她们十分忙碌——忙于买东西，开汽车，使用她们的洗碟机、甩干机和电动搅拌器，忙于料理花园，打蜡上光，帮助孩子做家庭作业，为心理健康而募捐，还要干数以千计的琐碎杂务。在我采访这些妇女的过程中，我开始看到今天家务所花的时间有着某种特殊情况。

在一条郊区大道旁，有两幢殖民时期的住宅，每幢都有一间宽大舒适的起居室，一个小图书室，一间正规的餐厅，一间大而欢乐的厨房，四间寝室，一英亩的花园和草坪，并且在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位用长期车票上下班的丈夫和三个学龄儿童。两幢住宅都干净整洁，有一位女清洁工每星期来两天打扫卫生；但是，煮饭做菜和其它家务都由妻子来做，每一家的妻子都已接近40岁，聪明、健康、富有魅力并且受过良好教育。

在第一家中，W太太是一位专职家庭主妇，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忙于煮饭烧菜、清洁、买东西、开车、照料孩子。邻居D太太是一位微生物学家，每天九点钟她离家去实验室之前就把大部分家务杂事干完或者五点半回她家之后再干完这些杂务。两家的孩子都未受到忽视，然而D太太的孩子依靠自己的能力稍强一些。两位妇女都参加相当数量的娱乐活

动。那位家庭主妇W太太干了大量的日常社区工作，但是她却没“有时间”就任一项决策的公职——作为一位聪明能干的妇女，常常有人向她提供这样的职位。至多，她领导一个委员会经办一场舞会或家长一教师联谊会的一桩事情。那位科学家D太太根本不干日常的社区工作，但是除了她的工作和家之外，她还是一位热心的弦乐五重奏小组的成员（音乐是她主要的业余爱好），并且她在一个世界事务机构中拥有一个职位，自大学毕业以来她一直对世界事务感兴趣。

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收入、外界帮助、生活方式的条件下，同样大小的住宅和同样大小的家庭怎么能够使W太太花费的时间要比D太太花费的时间要多出许多呢？而且W太太确实从来就没有闲过。晚上她从来没有时间“只读书”，如同D太太常常作的那样。

在东部一大城市的一幢现代化大公寓楼里，有两套六居室的套间，除了清洁女工刚离开时，或者在聚会之前以外，两套房子都不太整洁。G家和R家都有三个10岁以下的孩子，其中一个还是婴儿。两家的丈夫都30刚出头，并且两人都从事专业性强的工作。当其妻子是专职家庭主妇的G先生晚上回到家里或星期六呆在家里时，常常被指望并且确实干了比R先生多得多的家务，而R先生的妻子是自由的插图作者，显然，除了她在画桌上度过的时间之外，她必须抽时间完成相同数量的家务。G太太不知怎么地不能在她丈夫晚上回家之前把家务干完，而她丈夫回家后尽管十分疲惫却还不得不干家务。为什么R太太没有把家务看作她的主要工作，却能在少得多的时间内把家务干完呢？

当我采访把她们自己定义为“家庭主妇”的妇女并把她

们同少数专职或兼职从事职业的妇女作比较时，我一次又一次地注意到这种状况。甚至在家庭主妇和职业妇女两家都有专职家务帮工的条件下仍然出现了这种相同的状况，尽管更经常的情况是：即使这些“家庭主妇”完全有能力雇两个佣人，她们也宁可专职于自己的家务。但是我也发现：许多发疯般忙碌的家庭主妇吃惊地发现，只要她们开始学习或工作或有其它一些家庭之外的严肃兴趣，她们就能在一小时内迅速干完过去要花六小时——或者晚饭时还未干完的家务。

玩味着这个问题：一个小时的家务怎么能膨胀填满六个小时（同样的住宅、同样的工作、同样的妻子）呢，我再次回到女性奥秘的那种基本的自相矛盾的情况：在这对妇女投身社会的障碍减少的时刻，在这科学、教育和她自己的聪明才智使得妇女可能是妻子和母亲的同时，能够积极投身于家庭之外世界上的活动的时刻，女性奥秘出现了以美化妇女作为家庭主妇的作用。而且，对“妇女角色”的美化似乎与社会不愿把妇女作为完整的人来对待成正比；因为那种角色具有的真正功能越少，则用来点缀女性奥秘以掩盖它的空虚的毫无意义的细节就越多。一般地说，这一现象在社会科学的年刊中和在历史中——比如，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和维多利亚时代妇女的虚假地受尊重的地位——已经被人注意到了，但是，已解放的美国妇女发现女性之奥秘以一种具体而极端的程度适用于今日美国家庭主妇的情况，这对于她们多少是一种冲击。

是否因为美国妇女的发展已经不能再被女性自卑的陈腐奥秘所抑制，那种分离且又平等的新的女性奥秘又有所抬头？使妇女在家里所起的作用与男人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之

间划一等号的方式就能阻止她们真正认识到自己全部的能力吗？“妇女的位置在家里”的说法再也不能以一种轻蔑的口吻说出来了。家务劳动、洗碗涮碟、换洗尿布不得不以新的神秘乔装打扮一番，使其成为与分裂原子，探索太空，创造照亮人类命运的艺术以及开拓社会新领域有相等的地位。它不得不成为生活本身的终点以掩盖这一明显的事实：它只是生活的起点。

当你以这样的方式来审视它时，女性奥秘的双重骗局就昭然若揭了：

1.妇女以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中发挥的功能被剥夺得越多，她的家务劳动、做母亲的操劳、妻子的本分就会增加得越多——她就越会抵制完成家务，不去尽到母亲的责任乃至毫无功能可言。（很明显，人的本性甚至也会在妇女身上嫌弃一种空虚。）

2.对任何特定的妇女来说，需要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是和她承担的其它工作的压力成反比。一个妇女如果没有任何家庭之外的兴趣，那么实际上就只有把自己的每时每刻都用在家务琐事上。

英国人C·诺思科特·帕金森[①] 根据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行政官僚的体验，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因时设事”的简单法则。帕金森定律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重新制定，为美国家庭主妇制定：**因时设家务**；或者**因时设母亲职责**；或甚至于**因时设性活动**；毫无疑问 这就是对这一事实的真正解

① 帕金森（1907～？）英国历史学家，讽刺作家，《帕金森定律》一书作者，在讽刺官僚主义，企业管理方面，甚为有名。——译注

释，现代美国家庭主妇即使拥有一切新式的省力用具，她们也比自己祖母那一代人花了更多的时间于家务。对于我们全国性的热衷于性和爱情，对新生婴儿持续激增的现象，这也是部分的解释。

让我们暂且不讨论那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性的底蕴，而考虑一下作为一种对支配美国女性能量解释的这种定律本身的某些动力吧。回头看前几代人，我觉得，争取女权运动与妇女失意感的真正原因均是家庭主妇角色的空虚所致。社会主要的工作及决断正在家庭之外的世界中发生，妇女们已感到了加入其中的需求，或为了这一权利而抗争。要是妇女们过去在此基础上使用了自己新近赢得的教育，并在家庭之外的这种工作中发现新的自我，那么，家政的技巧就会在她们的生活中占有犹如男人生活中的汽车、花园和工作台一样的附属地位。母亲的责任、妻子的责任、性爱、家庭的责任都就会获得一种新的，情感性的重要性，正如男人们对这些责任的态度。（许多观察家都注意到了，因为美国男人一周总的工时缩短了，所以他们就在自己孩子们身上寻找新的欢乐，而不顾女人们似乎要感到的强烈愤慨：孩子就是她们的工作。）

但是，当追求女性完善的奥秘把妇女们再次打发回家的时候，家政就不得不变成一种全日制的职业了。性爱和母爱不得不成为生活的全部，不得不耗尽妇女创造性的能量。对家庭的责任取代了对社会的责任。由于发生了这种情况，每一种省力的用具给家务劳动带来的竟是一种需要更多劳动的苦心经营。可能使妇女从烹调、清洗的辛劳中脱身出来，并因此使她有更多的时间用于其它目的每一步科学进展，反过

来都会把一种新的辛劳强压在她们身上。这种情形不到家务劳动不断增多，从而夺去全部时间，甚至在全部时间之内也难以完成的时候，就不会完结。

假如说一个妇女每天都要开动洗衣机和脱水机的话，那么，自动脱水机是不会为她一周节省下四五小时的（这时间是她原先花在晾衣绳上的）。要知道，她还要自己把要洗的东西放进和取出机器，整理收捡衣服。就像一位年青的母亲所说，“现在可以一周洗两次床单了。上周机器突然坏了，床单有八天都没换。每个人都在抱怨，我们都觉得脏极了。我感到很内疚。这不是很傻吗？”①

现代美国家庭主妇比她们母亲那一代人在清洗，晾干和熨平衣服上花了更多的时间。如果她有一个电冰箱或电动搅拌器的话，她就会比没有这些家用器具的妇女在烹调方面花更多的时间。家用电冰箱只是由于它的存在就会占去时间：蚕豆在菜园里栽培，却必须收拾好拿去冻一下才行。如果你有一个电动搅拌器，你就得把它派上用场；有栗子酱，水田芹和杏仁的精美食谱会比烧羊肉排骨花更多的时间。

根据战后进行的布林·莫尔调查来看，一个典型的美国乡村家庭中，家务劳动的时间一周要占60.55小时。在1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家庭中，家务劳动的时间占78.35小时，而在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家庭中，花在这上面的时间要占80.57小时。虽有各种各样的家用器具，郊区和城镇的家庭主妇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还是比繁忙的农妇花得多。农妇当然

① 罗宾斯等著，“为何年轻母亲们感到陷入了困境”，《红皮书》，1960年9月号。——原注

还有许多其它的事要干。

社会学家和家庭经济学家在50年代就美国妇女当时仍然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总量感到迷惑，难以理解，并就此提出了问题。一项项调查研究都表明了，美国的家庭主妇比起30年以前的妇女来说，尽管其家庭更小，更容易管理，尽管她们的主要家用设备已有七倍之多，她们还是跟当时的妇女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一样多，甚至更多。当然也有一些是例外。参加家庭以外的工作，不管是有报酬的还是社会工作，一周要干很多小时的妇女只用30小时来干家务，而全日制的主妇一周要花60小时来干同样多的家务，参加了工作的妇女似乎在干所有的操持家务的主妇的本分工作：做饭、买东西、打扫卫生、管孩子，但是参加了一周总工时为35小时工作的妇女，她们一周只比主妇每天多干1.5小时。这一奇特的现象竟没有引起重视，其原因是由于这类妇女相对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对于更为奇特的现象，女性奥秘已隐匿了其真正的重要性，事实是，尽管美国在20世纪头50年里，人口增长了，但是随着美国工业和职业平行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入城市的迁移，美国妇女外出工作的比例却没有这么增长，而工作的妇女比例实际上还下降了。1930年全国差不多有一半的职业都是妇女在干，但到了1960年，尽管女大学生的数目差不多增长了三倍，而仅仅只有36%的职业是妇女在干。这一现象是由于选择当主妇的，受到教育的妇女人数大大增加了，她们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然而，对郊区和城镇的家庭主妇来说，下列事实依然存在，原先通常在家里进行的工作越来越多地被剥夺了，诸如罐头制造、烤面包、织布做衣、教育下一代、照料病人、照

顾老人这些都成了社会化的工作。对妇女来说，采取自己烤面包的方式来使历史逆转是可能的，或者说自欺欺人地认为能够颠倒历史，但是法律并不允许她们自己在家里教育下一代，极少有几个家庭主妇能把自己所谓的多面手技巧与医生、医院的专业技术相匹敌，能在家里照料患扁桃腺炎或肺炎的孩子。

“不知怎么搞的我觉得太空虚了，太没有用了，好像自己都不存在似的。”“有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个世界就在我的门口经过，而自己只是坐在那里张望”。对于众多主妇们发出的抱怨，有一个真实的基础。这种空虚感，这种对家庭以外的世界难言的否定，常常使主妇们去耗费自己更多的精力，狂乱地干更多的家务，好让自己对未来，前途无暇顾及。主妇们为填补那种空虚感所做的选择——尽管她们好像出自逻辑和必要的理由——使她们更加陷入了家务琐事的困境之中。

例如，有两个孩子的妇女在城里的公寓里感到既厌倦又烦燥不安，她就会受到自己无用的感觉以及空虚感的驱使，搬到郊区宽裕的住房去，美其名曰“为了孩子”。这房子要花更长的时间打扫；购买家庭用品，整理花园，开车送孩子上学以及自己动手的家务事真是太花时间了，似乎那种空虚感不久就消失了。但当这房子整理停当，孩子们都上了学，家里的位置也在周围人的心目中定了形的时候，正如我走访过的一个妇女所说，“再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空虚感回来了。因而她只得重新装饰起居室，或者给厨房地板打蜡，次数多得根本就没有必要——或再生个孩子。给孩子换洗尿布，再加上其它家务劳动，或许会使她手忙脚乱，到了半夜

她就会确实需要丈夫在厨房帮帮忙。然而，这一切并不那么实在，那么必要。

二次大战以来美国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人们蜂拥迁移到郊区居住，这种杂乱无章，没完没了的蔓延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社会学家指出，这些郊区住户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住在那里的妇女比城市里的妇女受到的教育更好，并且她们绝大多数都是全日制的家庭主妇。①

乍看起来，人们或许会以为，就是郊区的扩展和存在才使得受了教育的现代美国妇女变成了全日制的家庭主妇，并至今保持着这种身份。或者说，战后郊区的大扩展至少部分地是由于无数的"在家寻求满足"的美国妇女偶然选择的结果。在我走访的妇女中，"为了孩子"而迁往郊区的想法是在放弃工作或专业，成为全日制的主妇之后才决定的，通常是根据女性的奥秘所要求的妇女年龄生第一个或第二个孩子之后，当然，对于最年轻的妻子们，女性奥秘过早地影响了她们，结果她们一结婚就会把婚姻和母爱作为一种全日制的工作去干。从而摒弃学习任何专业的教育，并决定搬到郊区去，或者，只要不再为了支持丈夫上大学或法律学校而工作就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那些要追求一定生活目标的妇女就不那么愿意把家迁到郊区去。对受到教育的妇女来说，城市中当然有更多更好的职业；还有更多的大学有夜校，有时候是免费，这种课程适合白天要上班的男人，对一个想完成学业或获得文凭的年轻母亲来说，这也比传统的上、下午教学方便多了，且不说还有

① 伍德著：《郊区，其居民及政治》，波士顿，1959年。——原注

更好的全日制或兼职的保育员或清洁工可供选用，更好的幼儿园，日托托儿站，课外活动安排等。但是这些周到的考虑只对那些委身于家庭之外的事业中的妇女才显得重要。

在城市中，要靠多干家务来使时间过得充实的可能性更小。那种烦燥不安的“无所事事”感对受了教育的、能干的城市主妇来得更早，即便孩子还小，时间忙得不够用也是如此——因为孩子还不自己去玩，在公园里把婴儿车推来推去，坐在游乐场的凳子上。况且，在城市公寓里也容不下一个家用冰箱，也没有可种蚕豆的庭园。城市中所有的机构都是如此庞大；图书馆业已建成；专业人员在管理幼儿园和娱乐中心。

于是，众多的年轻妻子们都选择迁往郊区，而且越快越好，这并不奇怪。犹如诱惑了源源而来的移民的空旷的堪萨斯[①]平原一样，簇新的，服务设施还未跟上的郊区对于美国知识妇女施展她们的精力提供了一个没有限制的用武之地（至少开始是这样）。在这些新的社区之中，那些足够坚强自立的妇女抓住了这一机会，成为了领导者和革新家。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是追求女性完善这个时代以前受到教育的妇女。要发挥在郊区生活的能力，或能干的，受到教育的美国妇女的潜在能力要得到真正的发挥，似乎要靠她自己以前的自发性或自我实现才能办到，即要靠她自己的力量去抵制顺应习惯的压力，抵制花在郊区家务和社区活动的那些费时无功的份外工作，并且还要找到或干出自己在城里可能做到的，家庭之外的正经事。郊区的这种事业至少在开始

① 堪萨斯，美国中部州名。——译注

的时候，是基于一种自愿的基础上，然而它催人奋进，非常必要。

但是当女性奥秘占了上风的时候，一类新型的妇女来到了郊区。她们寻求着庇护所；在她们发现郊区社会时，她们对其欣然接受（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适应这一社会）；对每天忙于家务琐事也乐此不疲。这一类妇女，以及大多数我走访过的这类妇女都是1950年以后的大学生，她们拒不在社区组织中担任决策的领导职务，而只为红十字会，募捐游行或童子军募捐，不然就看管幼年童子军，或为家长教师联谊会干些次要的工作。对于需要认真履行社区责任的工作，她们拒不接受的理由通常都是："我不能从家里再分出时间。"然而她们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毫无意义的繁忙之中了。她们选择的社区工作并不需要动用她们的才能和智慧——甚至有的时候起不到一点儿真正的作用。她们也不能从中摄取到什么个人的满足，但这种工作确实能混时间。

因而在新的近郊居住区，那些真正使人感兴趣的义务工作——合作托儿所的领导工作、免费图书馆的工作、地方管理公立学校教育委员会的职务、市政委员以及在一些郊区，甚至连家长教师联谊会的主席这样一些工作，都越来越多地由男人掌管了。那些"没有时间"在郊区社会认真负起责来的家庭主妇就像"没有时间"在专业上干一番事业的妇女一样，她逃避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职责，通过它，她或许能最终实现自己；她采取一步步踏入家务琐事的方式来逃避这一职责，直到在这一困境中难以自拔。

这一困境的状况就自然的法则而言似乎很难更改，因为使家庭主妇从早忙到晚的家务琐事好像是非有不可的东西。

但是这种家庭的困境，且不管它确有其事的实际性，是一种幻影吗？是一种女性奥秘所勾画的幻影吗？就拿目前“大平房”或错层式住房宽敞的规模来说吧，这类房屋造价从14990美元到54990美元不等，从罗斯林·海茨[1]到太平洋帕利塞德市[2]，人们建造了无数座这类房子。它们显示出了一种幻影；花较少的钱可得到更多的空间。但是，买这类住房的妇女总是不得不在生活中表现出女性的奥秘。那里并不存在真正的墙或门；呆在华丽的电气化厨房里的妇女从来不会从孩子们身边分开。她一刻也不必感到孤独，从来不需要依靠自己。她在这些宽敞，喧闹的大房子里可以忘却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而这些房子也可以使家务事增多，这样时间就好打发了。在基本上是一畅通的大房里，而不是由墙和楼梯隔开的许多单间的房子，老是有乱七八糟的东西要经常收拾。男人当然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在这个房子里，而女性的奥秘却禁止妇女离开。

我的一个朋友，她是一个挺能干的作家，在她把自己视为一个家庭主妇并不再写作时，就变成了一个成天呆在家里的主妇。她让一个建筑师按照她的想法设计出了自己郊区的豪华住宅。这所花了大约50000美元的房子实际上是一间大厨房。里面有一间单独的工作室，这是给她当摄影师的丈夫准备的，一个狭窄的小间用来睡觉，但是在工作时间里却没有她自己可以离开厨房的地方，可以离开孩子们的地方。那豪华的餐桌，定做的不锈钢厨房柜橱以及电气用具确实是令

---

① 纽约长岛上一村庄名。——译注

② 美国夏威夷州一城市。——译注

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但是我看到这所房子时，心里就在想，要是她重操写作旧业的话，她在哪里安放打字机呢？

在这些宽敞的房间里，在这些散乱的郊区里，简直就没有你可以独自呆的地方，这实在奇怪。高收入的郊区早婚主妇在15年的幼稚生活、家长教师联谊会、自己动手的业余涉猎、庭园和野外宴会之后意识到，自己要干点儿真正的工作。一位社会学家对这类妇女做出的研究发现，那些着手进行了的妇女常常回到了城里。①但是在与我交谈过的妇女中，这种个人真实性的契机最可能是用在房子里加一个有门的房间，或只是在一个房间里加一道门的方式标志出来，“这样，我就有自己的地方了，我想思考的时候，”或想工作、学习，想一个人呆一会儿的时候，“一道门就可以把我和孩子们隔开”。

然而，大部分的美国家庭主妇并不关上那道门。或许，她们害怕会一个人呆在那个房间里。正如另一位社会科学家所说的那样，美国家庭主妇所面临的困境是她并没有追随自己真正兴趣的个人天地，就算她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可以由自己来支配，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②假如她就像女性奥秘所告诫她的那样，把婚姻和母爱作为一种事业，假如她成为这所房子的总经理——有足够的孩子业务要处理——假如她竭尽女性奥秘禁止她在别处施展的人类力量去管理一所完美无

① 斯科菲尔德著：“郊区妇女作用的变化：一项社会人类学专题研究”，载纽约《科学院学报》，第22卷，第6号，1960年4月。——原注

① 弗里德曼著：“大学男校友研究”，载《美国大学》 第872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缺的房子，去管理孩子，以及以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方式去分享她丈夫的事业，以至于自己只有一会儿的功夫去干社区工作，以至于没有时间用于认真的，大于家庭生活的兴趣的话，谁又能说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方式没有精通原子或星球的秘密，谱写交响曲，在政府或社会中提出一种新思想那么重要，那么好呢？

对于相当能干的，在文化以及生物两个方面均有创造能力的妇女来说，唯一可行的合理方案就在于说服她自己——就像新的奥秘竭力想说服她的那样——使自己相信，照料孩子的细微琐事的确具有神秘的创造性；她要使自己相信，她如果不每时每刻呆在孩子身边，孩子就会发生意外；她还要相信，自己招待老板妻子的晚餐对于她丈夫的事业来说，与她丈夫在法庭上据理抗争或在实验室里解决难题一样关键。而且由于她丈夫和孩子在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里会很快出去，所以她必须接着生孩子，或者设法让家务琐事本身变得相当重要、相当必需、相当艰苦、并具有相当的创造性，以此来证实自己的存在。

如果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证实一个妇女的全部存在，如果这个家庭主妇的工作是如此重要，如此必要的话，那么，要是因为现代型的爱因斯坦的妻子想让丈夫把没有生命的相对论搁在一边而帮她干所谓生活本身的精髓的工作，给孩子换尿布，并且把尿布扔在桶里之前记着把脏尿布漂洗干净，然后就给厨房地板打蜡，要是这样，为什么任何人都会感到震惊呢？

无论“职业：家庭主妇”这一用心有多么良苦，它并不能恰如其分地代替真正的催人奋进的工作，对社会来说，至

少不会重要得足以得到相当的回报，其最引人注目的证明已从“同一性”（Togetherness）这一出喜剧中产生出来了。在这种小小的道德剧中扮演角色的妇女被告知，她们担任的是明星角色，这一角色与丈夫在家庭之外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重要，或许更加重要。既然她们从事着如此紧要的工作，那么，她们坚持要丈夫们分担家务又怎么说得过去呢？很显然，就是一种难言的内疚，一种对妻子深陷在困境中的难言的意识才使如此众多的男人，以不同程度的恩惠，依从妻子们的要求。但是，让丈夫分担家务并没有对妇女被拒之于广阔的世界之外真正地做出补偿。如果有什么东西使她们更加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的话，她们个人的空虚感就会由此而增加。她们需要以精神寄托的方式，越来越多地去分享她们、丈夫和孩子们的生活。同一性，这种与人共生的方式只是与人平等的可怜巴巴的替代；她为角色的美化也是作为个人自由地加入到世界中去的可怜巴巴的替代。

隐匿在美国家庭主妇琐事下面的真正空虚已经以多种方式揭示出来了。最近，在明尼阿波利斯，①有一个名叫莫里斯·克·恩格霍申的教师，他读到当地报纸上一篇有关今天的主妇一周超长工作时的报道，他在给编辑的信中断言说，“任何一个花了这么多时间的妇女肯定笨得要命，是一个可怜的时间预算者，或者说毫无能力。”这位36岁的单身汉愿意接管任何家务，并且还要给大家看看，应当如何来干家务。

好几十位气急败坏的家庭主妇都要让他证实一下。他接

① 美国中北部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译注

管了三天罗伯特·多尔顿夫妇一家的家务，这家人有四个从两岁到七岁的孩子。在一天的时间内，他打扫了一楼的清洁卫生；洗了三大堆衣服并晾出去晒干，然后熨了所有洗的东西，其中包括内衣和床单；准备了三明治加汤的午饭以及丰盛的后院晚餐；为第二天烤了两块点心，准备了两份色拉凉菜；给孩子们穿衣、脱衣、洗澡；擦洗木制用品和厨房的地板。多尔顿夫人说恩格霍申比她还会做菜。她说，“打扫卫生嘛，我倒比他彻底一些，但好像没有这个必要。”

恩格霍申指出，他七年来都是自己理家，并且在大学靠干家务挣了钱，他说，“我仍然希望，教115个学生能和在房里照料四个孩子同样轻松就好了。我仍然坚持这一点；家务劳动并不像妇女们所诉说得那么冗长乏味。”①

这种男人们常常私下或公开表露出来的断言，已经被最近一项时间操作研究所证实。通过记录和分析一组家庭主妇每一个动作之后，这项研究得出结论：她们耗费在家务劳动上的大部分精力都是多余的。由韦恩大学密歇根心脏学会发起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已经发现，“妇女们正在付出自己应当付出的双倍努力，”她们以消耗式的动作和毫无必要的步骤把精力挥霍在习惯与传统之中。

“家庭主妇的疲惫”这一使人困惑的问题带来了一些新的启发。那些采用了多种当前的医学惯用手法的医生对此都毫无办法或无法找到病因。在一次美国产科及妇科医生大学会议上，一位来自克利夫兰的医生指出，那些难以克服“这

---

① 普林格尔著，“妇女是可怜的女管家”，载《科学文摘》1960年6月。——译注

种疲惫感”并抱怨医生们没用的母亲们既不是病态，也不是精神失调，而实际上就是疲倦。“并不需要什么精神分析或深层探索，”克利夫兰诊所的伦纳德·洛夫思说，“她一天要干16个小时，一周要干7天。……她还得真心实意地卷入到其它活动中去：幼年童子军，幼年女童子军，家长教师联谊会，心脏募捐，教堂礼拜，拉曳着孩子去学习音乐和舞蹈。”但是他说，令人奇怪的是，家庭主妇的家务重担以及她的疲惫感好像都不是由于她有几个孩子才产生的，这类病人大多数只有一个或两个孩子。洛夫思大夫说：“有一个孩子的妇女与有四个孩子的妇女一样，她操了四份心，其结果是一样的。”

一些医生在这些长期感到疲倦的母亲们身上并没有发现什么器官性病变，于是就告诉她们，“这病全在你的心里。”其他的医生就让她们服药，服维生素，打针以治疗贫血，低血压，新陈代谢减缓，或规定她们的饮食（主妇们平均超重12至15磅），不让她们饮酒（在美国约有100万家庭主妇饮酒），或让她们服镇静剂。洛夫思大夫说，所有这些治疗方式都没有用，因为这些母亲们确实是太疲倦了。①

另外一些医生发现这类母亲睡眠时间是足够的或超出所需要的时间，因而断言道，其根本的原因不是疲惫而是厌倦。这一问题变得太严重了，以至妇女杂志竞相以女性奥秘的乐观女郎①的特有字眼通篇刊载文章，简直到了令人生厌的地

---

① 参见《时代》周刊，1959年4月20日刊。——原注

② 乐观女郎，美国女作家E·H·波特（1898—1920）所著小说中一个一贯乐观的女郎的绰号。——译注

步。在50年代后期出现的大量文章中（即使在这些文章中），那些受到采访的医生已经很清楚地指出，这种病是“主妇式的母亲”角色所引起的，然而文章中所推荐的“良方”仍然都是些丈夫应对妻子更富于赞扬和欣赏之类的东西。但是这类杂志都得出这样一种结论：“这是，而且总是妇女的命运，她只有尽力而为。”于是，《红皮书》（在1959年9月号的“为什么年轻妈妈们总是感到疲倦”的文章中）刊载了对长期疲倦病人的巴鲁克研究结果：

> ……任何一类疲倦都是身体出了问题的预兆。体质疲倦是保护有机体在身体任何部位的剧烈活动中不受伤害。而神经疲倦则对性格来说是一种危险的警告。这一点在那些妇女病人身上显现得最清楚，巴鲁克研究项目负责人之一哈利·C·桑兹博士解释道，那些妇女牢骚满腹，抱怨自己“只是一个家庭主妇，自己的天资和所受到的教育都荒废在家务琐事之中，自己的魅力和才能正在消退，自己作为一种人的地位也正在失去。在产业劳动中，最令人疲倦的工作就是那些仅仅需要工人部分注意力的工作，但与此同时，这种工作也使他难以对其他事情集中精力。许多年轻的妻子都说，这种心理上的暂时性模糊就是她们在理家看孩子当中最感烦恼的东西。“不久你的心里就会是一片空白，”她们说，“你对任何事情都不能集中注意力，就像梦游一样。”

《红皮书》还援引了一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精神病医生的话，大意是说在患者身上滋生出的这种长期疲倦的

主要原因在于“单调，一种没有被任何大的成功或不幸中断的千篇一律的生活，”还特别指出这可以“概括许多年青母亲的状况。”该杂志甚至还引用了密执安大学研究的结果，在那项研究中，有524名妇女在回答“使你感到‘有用和重要’的是哪些事情”时，几乎没有一个人说是“家务劳动”；在有工作的妇女中，“绝大多数已婚和单身妇女都感到，她们参加的工作比家务劳动更使人满意”。这时，该杂志突然以主笔的身分插入说，“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年轻母亲参加一种工作就可取代疲倦感。很可能参加了工作的母亲比操持家务的主妇有更多的麻烦。”这家杂志巧妙地下了结论，“既然家务劳动和哺育孩子的需求并不那么灵活，那么对长期疲倦的问题就不会有彻底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许多妇女不再向她们自己提出过多的要求的话，她们就会好受一些。一个妇女要是从实际出发，尽力搞清楚自己能干什么——更为重要的是，搞清楚自己不能干什么，她或许最终能成为一个更为出色的妻子和母亲，尽管有些倦意也无妨。”

另一篇这类文章（“厌倦对你不利吗？”《麦考尔》1957年4月刊）问道，“家庭主妇的长期疲倦真的是厌倦吗？”继而回答道，“是的。许多家庭主妇的长期疲倦是她们工作的重复，环境的单调，与世隔绝以及缺乏新意所引起的。已经发现，繁重的家务劳动并不足以解释这种疲倦。……你的才智越是超出你的工作需求，你就越会感到厌倦。事情就是这样，而且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那些有经验的老板从不雇佣比一般人聪明的人来干事务性的工作。……就是这种厌倦，当然还要加上日复一日的失意感才使得一般家庭主妇的工作比她丈夫的工作在情感上还要使人感到疲惫不堪。”其治疗

办法就是："从某些工作中享受到真正的愉悦，例如烹调或在即将举办的聚会上得到的激励，尤其是男人的赞扬，这些是治疗家务厌倦感的良方。"

这一问题对我走访过的妇女来说，好像并不是向她们问过了头，而是问得太少。一个妇女告诉我："每当我从外面办事回来，总会产生一种麻木的感觉。尽管家里有许多事要干，但好像没有什么事是自己真正要干的。所以我在冰箱里常放一瓶马丁尼酒，给自己倒上一杯，这样我就觉得自己像是在干什么了。或者，就在家里消磨时间，等到多恩回来再说。"

其他一些妇女在尽量拖长家务劳动的时候就吃东西，以此来消磨时间。肥胖症和酒精中毒与精神神经病一样，常常与源自幼年时期的性格类型有关。但是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这么多40岁左右的美国妇女有着同样的无精打采，死气沉沉的神色吗？对于她们缺乏活力，生活上一潭死水似的雷同，在不到吃饭时间偷偷摸摸地抓吃点心，喝酒，服镇静剂、安眠药，对于这一切，这能解释吗？即使就算这些妇女的性格各异，她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性质中也肯定存在着某种驱使她们作出这种逃避的东西。

美国家庭主妇的工作的真实性并不亚于大多数美国男人的工作的真实性，他们的能力在流水线上或在公司办公室里得不到充分施展的话，这种工作就会使他们产生一种茫然、空虚的感觉，迫使他们逃避到电视、镇静剂、酒精以及性行为之中。然而我所走访的妇女的丈夫们却常常忙于那种需要能力、责任和决策的工作中。我注意到，当这些男人不得不干家务的时候，他们用少得多的时间很快就干完了，而妻子

干同样的家务，所用时间似乎要多得多。当然，对他们来说，这决不是用来证实他们生活的工作。不管他们在干家务时是否出于这一理由花更多的精力，只是为了干完了事，还是家务劳动并不需要他们太多的精力，他们干起来都要快得多，而且有时候好像是更乐于干。

社会评论家们在主妇与人共生的同一化时期经常抱怨说，男人们的工作由于这些家务劳动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走访的那些妇女的丈夫们好像并没有让家务劳动影响他们的工作。由于他们的妻子有工作，或由于他们的妻子把她们自己难以完成的家务作为一种工作，或是由于她们的妻子太消极，太依赖他人，太无能耐，以致不能干完家务，或甚至是由于妻子们出于报复把家务留给丈夫们来干，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必须在傍晚或周末干家务，但这种家务劳动并没有故意加以扩展。

但是我注意到了，有好些丈夫好像是把家务劳动作为不敢在自己的工作中积极进取的借口，故意增加家务劳动以延长时间。一位大学教授的夫人告诉我说，“我希望他在星期二晚上不再坚持用吸尘器打扫整个房子就好了。这没必要，他可以去写他的书。”这位夫人本人是一个很能干的社会福利工作者，她在自己整个专业生活中想方设法，既不请佣人，也照料好家和孩子。在她女儿的帮助下，她在星期六大扫除；而不需要在星期二动用吸尘器。

去做你能够胜任的工作是成熟的标志。并不是家务劳动以及孩子们的需要，或没有佣人才使得大多数美国妇女无法成熟起来，去做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在更早的时期，当时佣人很多，而大部分雇了佣人的中产阶级妇女并没有利用她

们的自由时间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她们被“妇女的角色”限制在悠然自得之中。在诸如以色列和苏联这样的国家中，对妇女的要求就不仅仅是让她们当家庭主妇，而佣人几乎不存在，然而家庭、孩子和爱情并没有因此明显地被抛在一边。

就是这种追求女性完善的奥秘以及它所繁殖的幼稚才使得妇女们难以去干自己能够胜任的工作。那些在女性奥秘的笼罩下生活了10年或20年的妇女，那些在年纪轻轻的时候过早地就顺应了这种奥秘，以至于自己从未体验过要靠自己去生活是什么滋味的妇女，她们害怕去正视社会上真正工作的考验而墨守家庭主妇的地位，因此，即使她们自己注定会产生“空虚、无用，好像我并不存在”的感觉也无妨。这一切并不奇怪，当生活中没有另外的，似乎是非常明确的追求目标时，这种家务劳动就会，而且必须得到扩展，增多以消磨时光。要知道，要是一个主妇在一小时之内就干完了家务，孩子们也都上了学，自己的生活中又没有其它的追求，那么，这位聪明的，精力充沛的主妇就会发现这种空虚的日子真是难以忍受。

就这样，一位斯卡斯代尔[1]的妇女辞退了佣人，因为她自己干家务，参加社会工作都不能耗尽她所有的精力。她在谈及自己和一个曾想自杀的朋友时，说道：“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一周去玩三个上午的地滚球。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发疯。至少，我们现在晚上可以睡觉了。”“总有办法摆脱这个问题的，”我听到一个妇女在斯克拉福餐厅吃午饭

① 美国纽约州东南部城市。——译注

时对另一个妇女这样说，她们就医生要她们“下午空闲”，不干家务这个时间内做点儿什么，懒洋洋地在那里争论。在这场不足道的减肥斗争中（美国家庭主妇难以把多余的脂肪转化为人类能量），生产减肥食品和经营健身沙龙也成为大有赚头的行道。那些有才智，受过教育的美国妇女被迫采取吃白垩粉，与机器扭斗的方式来“摆脱”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人类能量，想起来真有点儿使人震惊。但是意识到摆脱妇女创造性能量，而不是使用这种能量为在社会上达到某种更重要的目的是家庭主妇的本质这一点，却没有人感到震惊。

要遵照女性奥秘的法则去生活有赖于一种对历史的颠倒，对人类进步的贬值。让妇女们再次回到家中，不是像纳粹分子那样采取强令的方式，而是采取“一种恢复妇女们作为女人，实际和潜在的母亲……像女人那样生活的女人的荣誉感和自重感的观点来宣传的方式使她们再次回到家中”，这意味着妇女必须抵制她们自身的“技术性失业”。罐头制造工厂和面包糕点厂并没有关闭，但是甚至连女性奥秘的创造者们都感到，有必要维护自己免遭这一问题的非难——“我们劝说妇女自愿地重新获得某些管理家庭的功能，诸如烹调，保管和布置装饰这一类的事，不正是在企图逆转历史进步的车轮呢？”①

他们争辩道，进步并非是进步，从理论上讲，女人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得以解脱可以使她们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目标，然而“就这种目标所得到的理解而言，在男人中间与在

① 法纳姆与伦德伯格著：《现代妇女，迷惘的性别》，第369页。

——原注

女人中间没什么两样，都是要追求的目标多，而选定的目标几乎微乎其微。”因此，让所有的妇女在家里重新获得所有女人都能轻松从事的那种工作——让社会做出戏剧性的安排，这样妇女的荣誉“就能明确地转移到那些妇女身上，她们被认为是作为女人能最充分地为社会服务的人。”

15年以及更长的时间以来，国内一直有一个号召给予妇女家庭主妇的“荣誉”的宣传运动，这在这个民主国家里犹如在最有力的独裁政府中一样，竟获得一致的支持。但是，当家务劳动在一个国家之中以及在妇女最终能自由地去干更有意义的工作的时候不再真正有必要了，不再真正会耗去过多的能力时，妇女身上的这种曾一度有赖于在家中的必要工作和成就的自我意识，会由家务劳动再度唤起吗？周围的世界正在向前发展，不管出于什么理由，一个妇女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一种不是向前发展的工作中是错误的，把时间花在一种并没有真正地使用她富于创造性的精力的工作中也是错误的。妇女们自己正在发现，尽管总有“办法摆脱这个问题”，但是，直到她们开始施展自己的能力之前是绝不会有安宁的。

在美国肯定有许多妇女，她们为此刻作为家庭主妇而感到幸福，还有一些妇女，她们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能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但是，幸福与活力得到充分发挥并不是一回事。人类的智力、人类的能力也不是一种静止的东西。而家务劳动，不论其如何得到扩展、增加以使时间过得充实，是难以使用其智力是平均或正常水平的妇女的能力的，更不用说妇女人口中50%的人，在孩提时期，其智力就超出了平均水平。

几十年前，某些研究心理发展迟缓的机构就发现，家务劳动特别适合那些意志薄弱的姑娘去干。在许多城镇中，那些为心理发展迟缓的人所开设的护理机构中的住院病人纷纷被雇用去干家务，当时家务劳动的强度比现在要大得多。

至于孩子培养、室内装饰、菜肴安排、开支预算、教育以及娱乐这些基本的决策当然会涉及才智，然而，就像极个别看到女性奥秘真正的荒谬性的家庭问题专家中的一个人所说，大部分家务劳动，至今仍然最花时间的那一部分家务，“让一个八岁的孩子干就能对付下来”。

因而，家庭主妇角色与一个公司的董事长角色是相似的，董事长不仅要决定政策，全面规划，而且还要把自己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诸如打扫厂房，给机器上油这些活动当中。当然，企业对于自己人員十分节省，不能以那样的方式浪费人力。

“创立一个家庭”的真正满足，与丈夫、孩子的个人关系，一个妇女所给予这个家的环境、宁静、文化、温暖或保障的气氛，是通过她的人格而来的，不是通过她的扫帚、炉子或洗碗碟的浅桶而来的。对一个妇女来说，要通过自己每天命中注定要干的沉重单调的家务琐事去获得一种有价值的，整体创造的意识是不近情理的。这与一个流水线上的工人因为自己上紧了一颗螺钉就庆賀自己创造了一辆小汽车的情况一样，是荒谬可笑的。一日三餐后收拾碗碟，开购物清单（三个柠檬，二袋肥皂粉，一盒罐装汤），用吸尘器的硬橡胶用具清扫暖气片里的脏物，清倒字纸篓，擦洗洗澡间的地板，要看到这

种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的劳动是如何达到一种总和，而不看到一件接一件无尽的琐事，是非常困难的。①

现在可以这样看，成千上万的妇女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八岁孩子就能干的工作之中，这种滑稽可笑的贬低必然导致了这一时期若干种更难对付的性现象。因为，不管这种“家庭事业”如何合理地证实这种惊人地浪费精明强干的妇女力量的浪费是有道理的，不管这些市场操纵者们如何巧妙地杜撰出新的，言过其实的科学词语，像“润滑者”（“lub-rilator”）一类的词，以此来造成一种幻觉：把衣服倒进洗衣机里是一种与译解遗传密码相类似的行为，也不管家务劳动扩展到何种地步来消磨时光，这种家庭事业对于成人的心理依然谈不上有什么催人奋进的东西。无数有关精美烹调，科学育儿的书籍，尤其是那些“婚后爱恋”方式，性交技巧的建议源源不断地涌进了这个心理的空间。这些东西对于成年人心理也没有什么催人奋进可言，其结果差不多是可想而知的。使男子们万分沮丧的是，他们的妻子突然间变成了“行家”，无所不知的万事通，她们那种在家中（两人共有的领地）无可动摇的优势使男人们难以与之竞争，也极难与之共存下去了。正如拉塞尔·莱因所说的那样：妻子们开始把丈夫视为兼职的佣人——或是最新式的用具。②美国年轻

① 斯特恩著：“妇女是家务的奴隶”，载《美国信使》，1949年1月号。——原注

② 莱因著：“新的佣人阶层”，《过量的蜜》，纽约1957年版，第49页—64页。——原注

的主妇，她们心里装着家庭经济，或婚姻与家庭的简易课程，斯波克博士和费尔德博士①的书在她们的书架上并排而立；她们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和才智都用在了丈夫、孩子和房子上，她们轻松地、必然地、灾难性地开始控制自己的家庭，其程度甚至比她们的“妈妈”更为彻底。

① 费尔德（1863—1957），比利时建筑师，室内装饰专家。——译注

性的寻求

我并没有进行金西式的调查研究。不过当自己探寻这个无名的问题时，我所走访的郊区家庭主妇们总是把与性毫不相干的问题直言不讳地扯到性的方面来。我一般询问她们的个人爱好、抱负、做些什么或愿意做些什么，并不是作为母亲或妻子时做些什么，而是从丈夫、儿女或家务中得到清闲的时候做些什么。问题甚至是有关她们如何对待教育。然而其中一些主妇们总是认为我在询问有关性的问题。那么，这个无名的问题就是一个性的问题吗？这些女人谈到性时，言语中有一种虚假的口气，有一种奇怪

的、不真实的意味。要不是这样，我兴许会认为那个问题就是性的问题。她们的言谈中夹杂着诡秘的提示或明显的暗示，巴不得回答有关性的问题；即使我没有问，她们也总是津津乐道地叙述自己外遇的详情细节。她们并没有编造，这些外遇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听起来为什么如此索然寡味，虚拟有余呢？

一个38岁，有着四个孩子的母亲告诉我，性是唯一使她"感到存在"的东西。然而事情并不顺心，她丈夫再也不让她有那种感觉了。她（他）们俩时而装装样，但他实在是不感兴趣。她开始对床上的他感到蔑视，她说，"我需要的是使我感到存在的性，但我决没有真正感到他的存在。"

一位30岁，有五个孩子的母亲，一面平静地织着毛衣，一面谈着，不切实际的意味中夹杂着一种平淡的，基于事实的口气。她说自己正考虑出走，或许去墨西哥，去和一个与自己私通的男人过日子。她并不爱他，但是她想，如果把自己"全都"给他，她也许会找到自己现在所认为的那种"生活中唯一重要的"情感。孩子们怎么办呢？她想自己大概可以带着他们同去，对此，他并不介意。她所寻求的情感是什么呢？她想就是自己曾与丈夫当初有过的那种感受。至少，她还能记起自己18岁时嫁给他时，"快活得想死"。但是她丈夫并没有"把自己的全部"都给她，而是尽力于着自己的工作。继而她觉得自己与孩子们有过那种情感，可惜转瞬即逝。她给第五个孩子断奶不久，在孩子三岁时有了第一次外遇。她发现"这使我再次获得了那种美妙的感觉，使我把整个身心都献给了另一个人。"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那个人有很多孩子，她也一样。分手时，他说："你使我感到了自

己的存在"。"那么我自己的存在呢？"她感到茫然。那年夏天，她就把孩子丢给了丈夫，自己出走了一个月。"我寻求着一种东西，我并不清楚那是什么，但使我获得那种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爱上什么人。"她又一次外遇，然而那种情感并没有出现。所以这次，她要与这个新的情人远走高飞。"既然我知道如何得到这种情感"，她平静地织着毛衣，口里说道，"我就是要想办法再次找到它。"

她真的带着五个孩子和那个匿名的、阴影似的男人到墨西哥去了。可是半年后她又带着孩子回来了。显然她没有找到自己幻想中的"情感"。不管怎么样，这对她的婚姻并无真正的影响，生活依旧。只是她所期望从性欲中获得的那种情感是什么呢？为什么总是得不到呢？当一个人需要以此来"感到有活力"，感到"自己的存在"时，性就变得虚无缥缈，离奇怪诞了吗？

在另一个郊区，我走访了一位年近40，富有魅力的女士。她有着"文化"方面的志趣，尽管她的那种志趣是模糊的，游移不定的。她着手绘画，又不完成作品；筹款举办音乐会，又不去欣赏。她说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媒介"。我发现，她在寻求一种性的位置，这如同她的文化志趣一样，同样是一种模糊、游移的意图。事实上，这是她志趣中的一个部分。她夸耀男人，她暗示这是指想与自己睡觉的男人，夸耀他们的才智与职业的显要。她告诉我，"这使你感到骄傲，像是取得一项成就似的。你并不愿隐瞒这点，对这类男人你愿意让世人皆知。"究竟想与这种有身份的男人睡觉的愿望到了何种程度，就是另一问题了。后来我从她邻居那里得知，她是一个大家都了解的爱开玩笑的人。每人确实"知

道”，她那种性开放根本未带个人情感，其结果完全是可想而知的，只有那些新来乍到的男人才会信以为真，跃跃欲试。

但是同一郊区的另一位女士对性的贪欲就不是玩笑了。她有四个孩子，比上一位女士稍稍年轻一点儿。尽管外遇不断，但似乎从未得到满足。她那种对性的寻求，如同金西也会指出的那样，是混杂着紊乱的“私通情爱”，而且已经对至少两起他人的婚姻产生了实际的，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女人和她们同类的女人，郊区的性的寻求者，实际上是居住在女性奥秘狭窄的边缘之中。她们不是傻瓜，但奇怪的是“不完善”。她们不去操持家务或干好工作，以使时间过得充实，而去寻求性欲。但她们依然得不到满足。她们说，她们的丈夫没有满足她们，私通也没有什么两样。用女性奥秘来说，如果一个女人有一种个人“空虚”感，如果她没有得到满足，其原因必定是性。但是为什么性又满足不了她呢？

正如大学女学生采取了婚后生活的性幻觉来摆脱个人献身于科学、艺术或社会所引起的冲突、痛楚和操劳一样，难道这些已婚妇女是以贪欲来摄取女性奥秘所禁用的放肆能量，以此来达到更重大的人生目的？她们是在采用性或性幻觉来满足非性欲的需求？这就是为什么她们的性生活，即使是确有其事，也似乎像是一种幻觉的原因吗？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她们体验到了高潮快感，她们还是感到“没有满足”的原因？她们是因为婚后没有找到女性奥秘承诺的性满足而沉湎于这种从未满足的性寻求？或许那是一种证实个人存在或满足的情感，她们是在寻求性本身所难以赋予的东西？

对于禁锢在女性奥秘襁褓中的妇女，性是唯一对其开放的边界。在过去的15年中，性边界不得不扩展开来，也许已超越了可能的限度，美国妇女以摒弃那些堂皇目标的方式来混天度日，填补空虚。美国妇女性饥渴的上升已被证实到了令人厌恶的地步。金西、社会学家、都市郊区风俗小说家、以及广告、电影、电视、妇女杂志这些勾起女性性欲的有广泛影响的大众传播工具都证实了这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好几代美国女能人都沦为了性工具，性的寻求者。不过，事情确实不妙。

美国女性奥秘中的性非但没有满足无尽的快感，说得好听一点儿，反而变成一种奇特、寡味、全国性的充斥物。色情小说日益露骨也更加低俗；妇女杂志中的快感刺激已成病态；泛滥成灾的性生活新指南没有任何意思。好莱坞小明星的胸部越露越开，作为广告“小把戏”的男性生殖器的突然裸露都导致了性厌恶。在这些夸张的象征中，性中的人性正在蜕变。然而出现于女性奥秘时代的所有这些奇特的性现象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妇女性饥渴中灰气丧气的人增加了，对女性性别的冲突，抵触加剧了，因为她们已经不再通过各自在家中的性角色来寻求满足。并且正当美国妇女把注意力转向对性满足的一意孤行、露骨、放肆的追求，或将性幻觉付诸行动的同时，美国男性的性冷淡及其对妇女的敌意也增加了。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今天不论在通俗小说中那赤裸裸的淫秽描写的章节里，还是时装模特照片中的那些稀奇古怪的，几乎是无性别差异的女性身上，都有一种对性过份渲染的虚假气氛。我到处都看到了这种现象。按照金西的观点，

最近几十年中，性“发泄”没有增长。但在过去的10年间，美国对性或性幻觉的注重程度大大地增加了。

一位心理学家在1950年1月，后又于1960年1月研究了美国报纸、杂志、电视广播节目、戏剧、流行歌曲、畅销书以及非虚构书籍中所有关于性的材料。他发现对性欲以及对性的描述的露骨材料极大地增长了（包括“赤裸、性器官、诲淫、猥亵、淫荡以及性交”）。这些占所观察的人类性生活材料的50％以上；“乱搞”占第二位（包括“同居、通奸、男女乱交、卖淫以及性病”）。美国传播媒介中，1960年有关性的内容为1950年的两倍半以上，在所研究的200种传播物中，“许可范围内”的性内容从509项增加到1341项。所谓的“男人杂志”在具体涉及女性性器官方面不仅前所未有，而且出现了大量刊物赤裸裸地迎合同性恋。然而最新奇的性现象、越来越露的“贪得无厌”的淫欲在畅销小说以及期刊虚构小说中越来越多，而其读者群主要是妇女。

与原先对性的虚假否认比起来，尽管这位心理学家对这一问题持职业上的“认可”态度，但他还是受到了触动。他陷入沉思：

> 现代小说中对于性器官的描写太多了，人们不仅对此感到惊异：这些东西是否已成为进入畅销书单的敲门砖。既然那种过时的，轻描淡写地描述性行为的方式似乎已失去能量，甚至在现代小说中变态性行为也极其一般，那么，当前理所当然的方式似乎就是对性器官本身的详尽描述。很难想象下一步色情描述的方式是什

么。①

从1950年到1960年，在传播媒介中的妇女不管是作为描述的对象还是作为读者、观众，她们对性的渴望与主动性使男人对于性交细节的兴趣显得相形见绌。至1950年，男人刊物中性行为的淫秽描写已不及以妇女为主要读者的畅销书的内容了。

同一时期的妇女刊物在一种令人生厌的伪装中对性特别注重。②其“健康”特色诸如“让婚姻卓有成效”，“这种婚姻可以节制”，“医生，请告诉我”等等，都以最道德的装饰作为“问题”来进行最不正当的性关系细节的描述。妇女们读起来，其心情就像研读心理学课本中的病史一样。电影和戏剧对病态或反常的性关系的暴露有增无减，每部新片、每部新剧都企图比上一部更带劲，更有刺激。

与此同时，人们可以看到，在郊区无数的社会学调查和金西式调查中，人的性行为几乎以平行的方式降到了最狭窄的心理学的限制之中。1648年与1953年，两份金西报告都把人类性行为作为寻求位置的猎奇，通过手淫、梦遗、与动物交配，以及与异性婚前婚后各种性交而达到的最大量的“发泄”和快感，这就是其目的。金西调查者的调查内容和调查方式都不亚于色情小说、杂志和戏剧，无非都是对性过度注重的症状予以描述——越来越没有人性，原始、寡味、不合逻

① 埃利斯著《性的民俗》，纽约1961年版，第 123 页。——原注

② 参见拉塞尔迈乐的滑稽作品，“道貌岸然的色情描写”，载《不变的花花公子》，纽约，1959年版，——原注

种的麻木。

性欲的“贪婪，耸人听闻，无节制”的加剧，并不是真正的人类性行为的健康迹象。随着男性勾引女性已让位于女性勾引男性，这种迹象日益明显了。夸张和反常到极点的性情节似乎对演员和观众都是必需的兴奋剂。这类邪恶的反常的最好例证或许就是意大利电影《甜蜜的生活》。这部影片虽说有艺术和象征意图，但由于广告对影片中的性刺激做了大肆渲染，使其在美国风靡一时。尽管对意大利的性方式和社会有所评论，但这部影片对性特别注重的主要特点对于美国是再合适不过了。

美国小说、戏剧以及电影中这一现象越来越多，性的寻求者主要是妇女，她们以漫不经心，衣着随便或雍容华贵的性工具的面孔出现（如好莱坞影星），或是以歇斯底里的寄生虫面孔出现（新闻记者的女朋友）。另外还有乱伦、富有的女子，她们需要妓女式的变态刺激；还有性饥渴的放肆女人，在烛光微明中沉溺于“捉迷藏”式的城堡狂欢；最后还有离异的女人，她们扭动着跳脱衣舞，挑逗着那些寂寞、厌倦、毫无表情的观众。

事实上，所有的男人实在是厌倦、繁忙，难以对此顾及。冷漠、消极的男主人公从一个寻求性的女人那里浪到另一个女人那里——像是同性恋人物唐璜[1]对隔水一方的无性女子所持有的幻觉思情。性情节的极度夸张对主人和观众都引起了难以消除的厌烦，最终以毫无人性而告终。（这种

[1] 唐璜，西方文学中的一个虚构人物，系风流浪子的象征。——译者

对无人性的性厌恶或许同样能解释百老汇剧院、好莱坞影片的观众以及美国小说的读者日益下降的原因。）在影片《甜蜜的生活》最后一幕结束以前——所有的人都瞪着那条巨大而肿胀的死鱼——影片传递的信息是再清楚不过了：“甜蜜的生活”是如此沉闷。

放肆的女性性寻求者的形象也偶尔在《佩顿巷》①和《小贩传说》一类的小说中出现，这类小说有意地迎合女人们对性的幻觉。不管这类淫荡过度的女人在小说中的形象是否是指美国妇女在实际生活中已变得如此放荡，但至少她们对描述性行为的小说饭有胃口。而男人们不管是在小说中或在实际生活中似乎并不总是有这种胃口。小说中，或现实中的美国男性和女性在性侧重方面的这种差异也许有一种简单的解释，尤其是郊区的家庭主妇们，她们更多地是对性的寻求，而不是占有。这不仅是因为孩子放学回家会发现；车道上会停满了车迟迟不开走让人生疑；佣人会散播流言等等，而且因为再简单不过的原因，即男人并不那么容易得到。一般说来，男人们把主要的时间都花在非性欲的追求上，而不那么需要依靠性刺激来混天度日。因此，美国妇女从青年到中年注定要在性幻觉中度过许多时光。即使外遇，或像金西所发现的日益增多的“私通情爱”，是确确实实的，这也绝不是女性奥秘要她们完全相信的那么回事。

正如《远郊的人们》的男作者所说：

---

① 美国女作家米塔留斯（1924—1964）所著，揭露新英格兰中上阶层生活的小说，出版后轰动一时，并被拍成电影、电视。——译注

当她的男友正干着一些对他来说是随便玩玩的把戏的时候(当然伴随其间的是旨在让她相信的花言巧语),她总是深陷其中,认为这就是自己生活中真正的爱情。对自己不幸婚姻感到沮丧,对自己丈夫的所为感到困惑、愁苦、愤懑以及经常感到的耻辱,使她在心理上巴望着另一个男人,一个善于传情、富于魅力的男人。……因此在海滩聚会、周末晚会、小车长途兜风等一切夫妇们自然分离的场合中,言语挑逗,约定幽会,新奇幻想,互递眼神,匆促中令人窒息的吻,就会随之即来。但不久,而且是常有的事,当她意识到对自己是如此重要的事对他竟是那样的轻浮随意之时,她悲痛欲绝。但随即就能揩干泪水,又四处观望起来。①

然而当一个妇女把证实自己的一切都放在自身的性功能上,当性对她来说是使自己感到"存在"的必然之物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这无非是她对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女性"以及对她丈夫,他的"男性"提出了无法达到的要求。一位婚姻顾问告诉我,有许多与他打过交道的郊区家庭主妇们对"爱情和婚姻寄予了很高的希望,但结果根本无兴奋,神秘感可言,有时几乎什么也不会出现。"

训练并教育女性有关性理方面的明晰模式是使其成为贤妻良母。两个不相干的男女生人凑到一块是没什么

① 斯帕克托斯克著:《远郊的人们》,纽约,1955年,第223页。——原注

可奇怪的，这都是事先安排的，按步就班的契约，它不需要抗争，不需要美感，也不需要生活中神秘的敬畏。因而她对他说，让我得到一种感觉吧，但她自己又没有召唤起这种感觉的力量。

一位精神病学者指出，他常常见到，当女人或男人把家庭作为"一种补偿，一种未能在公共事业中达到目标，得到满足的补偿时"，性已经"缓慢地、无可挽救地死去"。①有时他告诉我，"真实的生活太少了，最后甚至性也退化了，逐渐死去了，尽管他们是年轻人，但几个月过去都没有任何欲望。"性行为"已变得机械单调，毫无人性，变成了一种生理上的排泄，这使双方在事后更感到孤独，温柔的情感表达也枯萎了。性已变成了争夺优势的竞技场，或者它已变成为一种单调乏味、空洞无物的日常琐事。"

既使这些女人没有得到性满足，她们仍然无休止地寻求着。因为遵照女性奥秘生活的女人，在她们前面是没有通向取得成就，地位或身份的道路可言的，而只有导致性的通道：性征服的成就，有吸引力的性对象的地位，以及在性生活方面成功的妻子和母亲的身份。而且因为性并没有真正满足这些需求，她就寻求着用什么实物、直至性本身来支撑自己的虚无，这些性赖以证实的孩子、丈夫都成为用以支撑的财产、物品。一个本身仅是一个性对象的妇女是不可更改地生活在充满客体的世界之中的，她难以与其他个体特性接

① 阿克曼著，《家庭生活心理动力学》，纽约，1958年版，第112—127页。——原注

触，她自己也正是缺乏这种特性。

对于某种证实自己，取得成就的行为是不是一种需要？这些使郊区家庭主妇们对陌生人和街邻如此热切奉献自己的行为，这些使丈夫在自己家中成为一种“摆设”的行为是不是一种需要？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郊区奸情的小说中，男作者通过一个在街坊中大占那些孤单的家庭妇女便宜的鳏夫的口说：

你知道美国是什么吗？它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滑腻腻的菜盘子。……没有一个丈夫能明白这盘子的腻味。也没有一个女人能对另一个女人做出解释，因为她们对这种腻味都有同感。所以男人就是要理解这种厌烦感，孩子？是的，我知道，知道。你的日子真不好过。这儿有鲜花、香水，“我爱你。”脱了吧……你，我都是家里的摆设。但如果我们到隔壁去，啊哈！到了隔壁，我们就是英雄：她们都在寻找罗曼蒂克，因为她们在小说里和电影里学到了。又有什么能比一个甘愿冒着你丈夫枪口的风险来占有你的男人更具有浪漫色彩呢？……从这家伙身上唯一能使人兴奋的就是，他是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她并不拥有他。她对自己说自己爱上了，她甘愿冒着自己家庭、幸福、自尊，冒着付出自己所有一切的风险跟这陌生汉一周鬼混一次，……不管什么地方你得到了一个家庭主妇的同时，也为一个陌生人弄到了一个潜在的情妇。”①

① 亨特著，《路遇生人》，纽约，1958年版，第231—235页。——原注

金西在他走访的5940名妇女中发现，美国已婚妇女，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妻子，在结婚10至15年之后，较之她们的丈夫似乎有更强烈的性要求。40岁左右的已婚妇女中有1/4的人都有过私通——通常是偶尔发生的。其中一些人性欲极强，贪图“多倍快感”。从事具有青春期特点的“私通情爱”的人正在增加。金西还发现，美国已婚男子，尤其是中产阶级，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的性欲似乎随着妻子要求的上涨正在消退。①

但是在女性奥秘时代的美国家庭主妇中，比日益增长的性饥渴、未满足的迹象更为不安的是，她们对自己女性的抗争日益明显。有情况表明，常常用“女性问题”这一委婉语提出的女性性欲抗争的迹象，在她们寻求以性方式来热切、无节制地满足自己时，发生得越早，出现的形式也就越激烈。

一家著名医院的妇科保健主任医师告诉我，他越来越多地在年青母亲身上看到了排卵周期损害症状——阴道排泄，月经期推迟、紊乱，持续失眠，疲劳综合症，周身无力，这些都是原先只在经绝期妇女身上才能看到的现象。他说：

> 问题是这些年青的母亲在失去生殖能力的时候，是否会由于这些疾病而导致全身崩溃。我看见有许多的被这些经绝期病状缠身的妇女，我相信，这些病症是由于她们生活空虚才染上的。并且是由于她们28年中都在精神上依恋自己的孩子，直到孩子长大成人离开自己，

① 金西等著：《女性的性行为》，第353页及其后诸页，426页。——原注

直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恋为止。与之相比，有过孩子和性关系然而有着完整得多的人格，又不必时常对自己求全责备，要自己有了不止一个孩子后，还要坚持生下去，这样的女性所具有的经绝期阵发性发热、失眠、神经质以及极度紧张感等病状就少得多。

这些有妇科病的女人是这样一些人，她们否定了自己的女性气质，或者说她们是病态的女性。但现在我们在越来越年轻的已婚妇女身上，看到了这些病状；在那些20多岁的，把心血都投注到孩子身上，除了孩子别无它好的年轻妇女身上看到了这些病状：排卵周期损害、月经紊乱，这些经绝期才有的症状。一位22岁，有3个孩子的女士就有这些病症……我对她说："你唯一的过错就是你怀了太多的孩子，而且太快"，但我却在心里对自己说，"你的人格还未发展到应有的地步。"

在同一所医院里，人们还研究了从子宫切除术恢复过来的妇女，有月经疾病的妇女以及患有不孕症的妇女。这些深受痛苦、恶心、呕吐、体力及情感的酸楚、压抑、麻木、焦虑折磨的妇女，她们的生活几乎全在母性的喜悦和生育作用中度过。一位女士表达的一种态度十分典型，她说，"为了成为一个女人，我只有生孩子才行"。①而患病最轻的那些妇女"有着相当完整的自我"意识，有对付的办法，并且把

---

① 多瑞斯，门泽尔—贝纳容等著："子宫切除术情感恢复类型"，载《身心医学》第14卷，第5期，1957年9月第378—388页。——原注

注意力转入自己的兴趣所在，甚至在医院也是如此，而不是与自己和自己的病痛过不去。

产科的医生们也注意到了这点。一位医生告诉我：

> 说来有趣，这些背痛、出血、不孕和难产的女人都是些认为自己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生儿育女的人。而另一些认为自己不仅仅是生殖机器，还有着其它兴趣的女人，她们生孩子就要容易一些，别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又不是精神病医生。但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另一个妇科保健医生谈到了许多病人，她们在“女性完善”时代里，生儿育女和性交都没有达到“完善”。用他的话来说，她们是：

> 这些女人，她们对自己的性别觉得很不实在，需要一次又一次地生孩子来证实自己是女性；她们因为想不到其它可做的事就生了第4个或第5个孩子；对要强的女人来说，生儿育女也是一种要强。于是我就有了成百的病人，她们都是女大学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一回事，她们的母亲把她们带来是为了安放子宫帽。因为她们不成熟，不把上床睡觉当一回事——就像吃药一样，没有兴奋感，什么也没有。对她们来说，结婚不过是一种逃避。

月经痉挛的急性发作、怀孕期的恶心和呕吐、生育抑郁

症以及经绝期严重的生理和心理上的痛苦，这些都已被认为是女性生理的一个“正常”部分。标志着女性性周期的特征——月经、怀孕、经绝，这些就是她们普遍被认为的那种固定、永恒的女人本性的一部分吗？或者这与那些在“女性”与人的发育之间、性与自我之间毫无必要的抉择有关？当一个女人是一个“性工具”时，她是否无意识地在她的性周期的每一步看到了一种完结、一种死亡、一种自己生存的理由呢？这些拥挤在医疗诊所的女人们就是女性奥秘的化身。兴奋感的缺乏、日益增多的“女性问题”、乌七八糟、贪得无厌的性寻求、成为母亲时瞬间的抑郁、出于非医疗原因用子宫切除术移植女性性器官的奇特急切心情——所有这一切都使女性奥秘所布下的弥天大谎暴露无遗。犹如在萨迈拉[1]自我履行一死的预言一样，女性的奥秘，随着对失去女性的抗争，已使女人们更难证实自己的女性，也使男人们极难成为真正的男性，而对于两者都难以领略性爱的欢悦。

在我走访的郊区家庭主妇型的寻求者中，萦绕着一种不真实的气氛。这种不真实，不切实际弥漫在色情小说、戏剧和电影之中——如同在郊区聚会上弥漫在性欲的老生常谈之中一样。我突然领悟到了这是为什么。在这表面上远离郊区小岛上，性的寻求四处可见，却处于纯粹幻觉之中。在一周之中，这个小岛是郊区的夸张，因为它完全与外界隔离，与工作和政治的世界隔离，男人们在这一周甚至晚上不回家。在那里度过夏季的妇女是些光彩照人的年轻主妇。她们早婚，靠丈

① 萨迈拉，伊拉克中部城市，为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地。——译注

夫和孩子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她们对家庭以外的世界毫无兴趣。而在这个岛上，情况和郊区大不相同，这些女人无法从事社会活动，忙于家务以使时间过得充实。然而她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消遣方式，这种方式一箭双雕，既赋于她们对性的地位以欺骗性的意识，又免于她们为证实这种地位所忍受的惊恐。在这个岛上，有着一群刚从田纳西·威廉斯①的世界中出来的“少年”。当主妇们的丈夫在城里工作的一周当中，她们这些年轻的女人就与这些缺乏性感的少男们举办“疯狂的”狂欢，通宵聚会。她们的丈夫划着小船，出乎意外地中途回来安慰自己烦闷、孤单的妻子时，就会出于一种富于幽默的困惑而感到纳闷：“她们为什么这样做？可能这与这地方母系氏族制有点关系吧。”

或许这也与厌倦有关——无事可做。但这看上去像是性的问题，只有这个才会使其如此兴奋，当然尽管并没有性接触。家庭主妇们也许与她们的男友相互认识到了自己。因为就像杜鲁门·卡波特②的《在蒂法尼的早餐》中的电话应召女郎一样，她与情灰意懒的同性恋爱者度过了毫无性感的夜晚，在逃避生活中，她们俩都像个孩子。她们相互寻求着同样的非性欲的自信感。

然而在郊区，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男人，甚至连异性的面目也见不到，这些除了性工具就无法证实自己的女

---

① 参见第249页译注。——译注

② 杜鲁门·卡波特（1924—），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名著《凶杀》用小说笔法描写实事，创“非虚构小说”之称。——译注

人必须通过对"实物"的占有来拼命寻求自己的自信感。人们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市场操纵者起劲叫卖那些甚至与性没有间接关系的产品去迎合性饥渴者的原因。只要女人对于成就、身份的需求能够归入性地位的寻求之中，她就会轻而易举地成为一种牺牲品，成为任何可能许诺她拥有这种地位的产品的牺牲品。这种地位用她自己的力量或成就是难以取得的。既然对大部分美国家庭妇女来说，对这种作为有吸引力的性对象的地位毫无休止的追求在实际生活中是极难得到满足的（至多仅仅看起来像是伊丽莎白·泰勒[①]），那么，这就可以极其容易地解释为是通过对对象的占有来追求地位。

因此，女人们在郊区追求地位时是放肆的进取者，她们对地位的追求如同她们对性的寻求一样，同样是不明智的，不切实际的。地位，毕竟是男人们通过在社会中的工作所追求和获取的东西。一个女人的工作——家务劳动——是不可能给她地位的。几乎在所有的社会工作中，这一地位可以说是最低下的。一个女人的地位只能通过她丈夫的工作来间接获得。丈夫本人，甚至连孩子都变成了地位的象征，因为当一个女人把自己看作是一名家庭主妇时，这房子以及房子里物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她证实自己身份的东西，她需要用这些表面的外部标志来填补她的内心空虚，需要用它们来使自己感到像个人。她变成了一个寄生虫，不仅是因为她所需求作为地位的东西完全来自她丈夫的工作，而且因为她本

① 伊丽莎白·泰勒（1912—1975），英国女小说家，她根据当教师，图书管理员、家庭主妇的亲身体验写小说。——译注

人缺乏证实这种地位的份量，她必须控制他，占有他。假如她丈夫不能为她提供这些为了证实地位的东西，他就会受到蔑视，就像假如他难以满足她的情欲就会受到的蔑视一样。她对自己的不满如同对她丈夫以及她（他）们性关系不满一样。正如一名精神病学者所说："她从自己的婚姻关系中索取性满足的要求实在是太过分了，她丈夫对此不无怨恨，到头来根本无法对她发挥性功能。"

可能这就是新一代的年青丈夫对那些唯一的抱负就是做妻子的女孩子怨气上升的理由？对于盛气凌人的"母亲大人"以及追求事业的女孩子的陈旧敌意，终究在新一代的男性对女性的敌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了，这一代女性对于"家庭职业"生气勃勃的追求产生了一种新的控制力及咄咄逼人的架势。作为工具，作为性工具，作为"家里能干的男人"，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些显然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1962年3月，一名记者在《红皮书》杂志中注意到了郊区情况的新现象："年轻的父亲感到陷入了困境"：

> 许多丈夫感到，他们的妻子对于家庭管理、孩子哺养以及婚后恩爱等问题引经据典、态度蛮横。对于家庭生活，她们计划从严，规划短浅。这种生活几乎没有丈夫的权威可言或发表意见的余地。（一位丈夫说："自从我结婚以后，我觉得自己失去了所有的勇气和毅力。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个男人了。我还年轻，但是从生活中我并没有得到什么。我不想要忠告，但有时我觉得有什么东西突然从内部垮掉了。"）丈夫们把他们的妻子称作失意受挫、生儿育女的根源；是雇主，是财神；是亲戚、朋友

社区邻居……一句话，是社交的枢纽。年轻的父亲不再无拘无束。对家庭出现的问题也没有自己的影响力了。而他的妻子刚刚读了权威书刊，完全知道应该做什么。

这篇文章继续引录一位社会福利工作者的话：

现代型的妻子坚持为自己获取性满足，这对其丈夫来说可能是一个主要的难题。妻子为了要她的丈夫扮演出一个情场老手，又是哄又是骗。但是如果妻子对他动了肝火，奚落中斥，好像他没能耐干重体力活似的，那么，麻烦就来了。……令人不安的是，有相当数量的美国已婚男子，在婚后5年就与人通奸，还有更多的人在跃跃欲试。夫妇间的不忠实与其说是寻欢作乐还不如说是维护自我的方式。

4年前我在一个上流郊区采访，我沿着乡间小径似的道路走访了许多家庭主妇。那时，她们有了一切想要的东西：舒适的住房，儿女成群，体贴入微的丈夫。今天在同一条路上，已有了越来越多的梦境般的高标准住房。但由于各种原因，有时是数不清的原因，这些房子里只住着家庭主妇们和她们的孩子，而她们的丈夫——医生、律师、会计师已搬到了城里。据社会学家的调查，美国的几乎每一起离婚诉讼中，即使女方执意和解，男方都希望分手。①当然离婚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恐怕是男人对于悬吊在他们

① 参见古德著，《离婚之后》，格伦科，1956年版。——原注

脖颈上的女性重担日益反感和敌视，这种敌视态度并不完全是针对自己的妻子的，而是针对自己的母亲，针对与自己同事的女性——事实上，针对整个女性。

据金西的调查，美国中产阶级男性在婚后15年就与妻子没有性关系了，55岁的美国男性，两人中就有一个与人私通。①这种男性的性寻求——办公室里的罗曼蒂克，随意的或热切的外遇，甚至最近的影片《公寓》嘲讽的那种低俗的纯性欲，其动力往往不只是需要逃避自己贪欲的妻子。有时，当男人成为他妻子追求“家庭职业”的附属品时，他就寻求着失去的人际关系。有时，他对妻子的厌恶最终迫使他去寻求一种性对象，一种与任何人的关系完全破裂的对象。有时，常是在幻觉之中，他寻求着一个女孩，一个洛丽塔②来作为性对象，以此来逃避成熟的女性，这种女性会把自己全部的进取能量乃至性能量都用在他身上。毫无疑问，男性对于女人的仇恨——对于性的必然仇恨，在女性奥秘时代大大加深了。正如一个男人在1962年2月给纽约格林威治村刊物《村声》③的信中所写：“白人是否好得不能娶黑人，已不成其为问题，反之同理；而问题是女人是否好得能够嫁人了，因为她们已经不能与昔日同日而语了。”

这种男性敌意的公开象征就是美国剧作家、小说家从问题成山的世界中逃避出来而沉溺于这样一些意象之中：贪婪

① 金西等著，《男性性行为》，费城，伦敦，1948年，第259、585、588页。——原注

② 洛丽塔为俄国出生的美国作家纳博科夫（1899—1977）所著的一本同名小说的女主人公，少女花痴症患者，此小说于1962年拍成电影。——译注

③ 《村声》，美国一家先锋派杂志，在曼哈顿的格林威治村出版。——译注

的女性、倍受折磨，意志消沉的男主角（以同性或异性恋的装饰）、形形色色，孩子气的女主角、以及引人注目的性描写。这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但是并不至于特殊到无数的男人和女人，男孩和女孩都不能与之一致的地步。田纳西·威廉斯的《去夏突至》①就是这一世界名声极坏的例征。

这个来自旧式南方家庭，年纪不小的同性恋男主角，被吞食小海龟的巨鸟弄得提心吊胆，他把光阴都荒废在追忆自己失去的黄金般的青年时代之中了。他本人被自己诱人堕落的母亲“吃掉了”，就像在结局中，他确实被一帮小青年吃掉了一样。该剧的男主角从未露面，这一点极有意义：他既无面孔也无身子，唯一确切的“真实”人物就是吃人的母亲。她反复出现在威廉斯的剧作中以及他的同辈人的剧作和小说中，并与其同性恋的儿子们，淫邪的女儿们以及报复心切的唐璜②们一起出现。所有这些剧作都是对妇女爱恨交织的极度痛苦的呼喊。意味深长的是，这一类剧的许多作品都是出自南方作者之手，而在南方，女性奥秘奉为神灵的“女性”是最为完善的。

可以肯定，这种男性的义愤是来自对寄生女性难以平息的仇视，她们阻碍丈夫和儿子的发展并使他们陷入性幻觉的病态之中。因为事实上，现在的男人们也正从真实的大千世界中离去，踏入性幻觉的病态世界之中。在那里，他们的女

① 《去夏突至》是田纳西·威廉斯1959年与人合写的电影剧本。参见第249页。——译注

② 参见本章第348页注。——译注

儿、妻子、母亲被迫寻求着“完善”。再者，对于男人们也一样，性本身正呈现出虚假的幻觉特征——没有个性、难以满足乃至没有人性。

那么，是否美国的妇女问题与日益公开化的男性同性恋之间有什么联系吗？根据女性的奥秘，由女性解放、教育、平等、职业引起的美国妇女的“男性化”正滋生出一种日益“女人气”的男性。但这就是确实的解释吗？事实上，金西调查数据表明，经历过妇女解放运动的几代人中，同性恋者并没有增加。金西调查报告于1948年还披露，37%的美国男性至少有过一些同性恋经历，13%属于典型的同性恋（在16岁至55岁之间至少有过3年经历），4%完全是同性恋患者——大约200万人。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今天卷入同性恋的人比前儿辈卷入的人多了还是少了。”①

且不论美国同性恋是否增加了，但在最近几年中，肯定有增加的明显迹象。②我认为，这与女性奥秘的民族偏执不无关系，因为女性奥秘已经以女性的名义对一种顺从的，孩子气的天真无邪倍加赞颂，这种受到赞美，成为永存的品行从母亲那里传给了儿子以及女儿。男性同性恋者——男性的唐璜，他们检验自己潜力的强制心理常常是由于无意识的同

① 金西等著，《男性性行为》第631页。——原注

② 参见科里著，《美国的同性恋》，纽约1960年版，第2版前言第22页及其后诸页。

埃利斯著，前引书，第186—190页。

希尔纳著，“美国性类型的稳定与变化”，载《美国社会的性行为》，纽约，1955年版，第321页。——原注

性恋引起的，这些人并不亚于女性的性寻求者以及总是一脸稚气的彼得·潘①，他们害怕年龄的增长，因而以性魔力的方式不断地追求心理平衡，以此来抱住青春不放。

同性恋中母亲的作用已被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专家确定过。但是，其儿子成为同性恋的母亲通常不是"解放的"妇女，她在这个世上与男人竞争，却又是女性奥秘的典范，在精神上依恋自已的儿子，通过儿子实现自已的生活目标。她的女性对自已的儿子起着实际的诱惑，她的相依性使儿子难以成熟而爱上一个女人，也不能常常像一个成人那样自已去应付生活。他对于男性的爱掩饰了他对母亲过分的受到阻止的爱，他对所有的女人的仇视和反感都出自对这个女人的反应，她阻制了他成为一名男人。这种极度的母子恋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弗洛伊德写道：

> 在研究的所有病历时，我们查明：后期同性恋者在幼年时代经历了一个非常强烈而又短暂的对女性的同恋阶段（通常是对母亲），越过这一阶段后，他们就把自已视为女人并且作为性对象；就是说，他们开始在一种自恋的基础上，找寻在外貌上类似自己的年青人，希望能像母亲爱自己那样爱上他们。②

根据弗洛伊德的见解来推断，当她唯一的角色是充当妻子兼母亲，当她被限制在家里而这两者又迫使她在精神上依靠自已的儿子时，可以说，这种超乎寻常的爱和恨在母子

① 参见第43页译注。——译注

② 弗洛伊德，《性理论的三个贡献》，纽约，1948年版，第10页。——原注

关系中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男性同性恋在过去和现在都比女性同性恋普遍得多。父亲就不是那样经常受到社会的引诱或强迫以至非要依靠女儿或让其堕落不可。只有很少的男性变成了明显的同性恋，而许多男人却受到这种爱——恨的极大压抑，他们不仅对同性恋深为反感而且对妇女有一种普遍的、强烈的厌恶。

今天，真正的“女性”家庭主妇——母亲已经不仅从职业，而且从任何家庭以外的重要事务中解脱出来了，这时，能够滋生出潜在的或明显的同性恋的母子眷恋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加以发展。这种依附的母爱窒息了少年的成长，他不仅在性的方面受到阻碍，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同性恋者常常缺乏完成学业、干好工作的成熟性。（金西发现同性恋在高中后就中断学业的人中最为普遍，而在大学毕业生中最为少见①）贯穿在同性恋性生活中的特征——浅薄的虚假，幼稚，乱伦，缺乏持续的人类满足感——通常也是他全部生活和志趣的特征。对工作、教育、性以外的生活缺乏个人责任感就是意识上的“女性”。如同女性奥秘中的女儿一样，儿子也是在性幻觉中打发掉大部分时光；悲哀“花哨的”的同性恋很可能与年青的家庭主妇性寻求者们有着同感。

但是，同性恋犹如一团笼罩着美国的阴沉的烟雾一样蔓延开来，这一点与年青妇女那种不安定的、不成熟的性寻求同样是不祥的预兆，这些年青妇女在结婚初期是放肆的，

---

① 金西等著，《男性性行为》，第610页及其后诸页，并参见科里著，前引书，第97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这已成为通例而不是偶外。年青男子的消极顺从也同样令人感到惊恐。他们对早婚默然承受而不是去独立地面对这个世界。这些女性奥秘的牺牲品越来越早地开始寻求性的慰藉。最近几年中，我走访了一些来自舒适郊区家庭的女孩子，这些乱搞的女孩子中有许多在10几岁就结了婚，原因是她们怀孕了，这种情况的女孩子的数目还在增加。①与这些女孩子以及与那些竭力想帮助她们的专职人员谈话，你会很快明白，性对她们来说根本就不成其为性。她们甚至还没开始经历性反应，更不用说“满足”了。她们以性(虚假的性)来抹去难于证实自我而产生的空虚；男方是谁无关紧要，当她没有自我感的时候，这女孩几乎根本“看”不见他。假如 她用女性奥秘的简易合理性在性的寻求中来逃避导致证实自我的努力，她也同样没有自我感觉。

早期性生活、早婚，通常是不发达文明的特征，而在美国，则是郊区及城市贫民区的特有现象。然而，金西最惊人的发现之一就是，性行为的推迟与其说是社会经济原因的特征，还不如说是终极目标的特征，比如，用教育来衡量的目标。一个有贫民区背景的男孩，上了大学，当上了科学家或法官，他就会与其他后来成为科学家和法官的孩子一样，在青春期推迟性行为，而不会像其他有同样贫民区背景的孩子那样对待性行为。但是，出身并不低贱的男孩，要是未完成大学学业或者没有成为科学家或法官的话，却更多地有贫民区

---

① 《时代》周刊1962年3月16日载：“私生子从1956年到1962年间增加了194%，年青人中的花柳病增加了132%。”——原注

特点的早期性行为。①不管性与智力的关系这一点表明了什么，性行为的推迟似乎与所需要的智力活动的增长同步，是高等教育以及对社会有最高价值的专业成就的结果。

在金西调查的女孩子中，用教育来衡量的智力发展的终极水平与性满足之间似乎更是存在着某种关系。在金西调查的10几岁就结了婚的少女，一般在高中就中断学业了，她们的性生活比继续上大学或接受专业训练的姑娘们要早五六年。但是，这种过早的性行为并没有导致快感；就这一点而言，较之继续受教育的姑娘，她们往往在婚后5年，10年和15年中仍未充分体验到性满足。②对这些郊区乱交的女孩子们来说，过早对性生活的注重似乎是表明了一种虚弱的自我本质，这种本质就连结婚也无法使之增强。

这是不是无可奈何之下的性寻求的真实原因？是不是今日所能见到的，在各种年龄，异性或同性之中乱交的性寻求的真实原因呢？这些繁多的、失掉个性的性现象，即没有自我的性，追求自我的性现象，在美国妇女表明性是她们唯一的生活支柱的时期，正变得无拘无束，难道这是一种巧合吗？她们的儿女有着如此虚弱的本质，以致要求助于日益早发的无个性、无人性的性寻求，难道这是一种巧合？精神病学者已经做出了解释，乱交的关键问题通常是“自尊的降低”，这似乎常常是由一种过分的母子依附所造成的，而性寻求的类型如何，相对而言，则是无关紧要的。正如克拉拉

---

① 金西等著，《男性性行为》，第348页及其后诸页，第427页—433页。——原注

① 金西等著，《女性性行为》，第293、378、382页。——原注

·汤姆森在谈到同性恋时所说：

> 明显的同性恋可能会表示出对异性、对成人责任感的恐惧……它也许会表现出一种逃避现实，醉心于肉体刺激的行为。这同精神分裂病患者的自我性爱很相似，或者它是一种自我危害或危害他人的病症。自卑的人有眷恋自己性别的倾向，因为这不那么可怕。……然而，上述原因并不都会产生出同性恋，因为，与传统分裂的恐惧和想要与之保持一致的需要常常使这些人去结婚。事实上，结了婚的人也并不能证实他就是一个成熟的人。……有时发现，母子依附就是这一种情形的重要部分。……同性恋中的乱交现象可能比异性之间更为频繁，但是两者之中人格结构的意义很相似。两者的主要兴趣都在生殖器官与肉体刺激方面。而分享这一感受所选择的人并不重要。这种性行行为是无可奈何的，并且是他们唯一的兴趣。①

无可奈何之下的性行为，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一般都掩盖了缺乏其它方面生活的潜力。与女性奥秘论所宣扬的相反，女性或男性的性完善并不是他们达到满足的必要标志。埃里克·弗罗姆说：

---

① 克拉拉·汤姆森著“心理分析同性恋的变化观，”载《人类关系研究，对精神病学的新贡献》，帕特里克·马拉尼编，纽约，1949年版，第218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 精神分析学家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病人，他们爱恋因而与他人关系密切的能力已遭到损害。但是，他们性功能正常并且确实用性满足来代替爱恋，因为他们性欲的潜在能力是使他们唯一感到自信的动力。他们在生活的其它方面的无能为力以及毫无幸福可言的后果都被他们的性行为所平衡，所遮掩了。①

大学校园内也有一种与对性寻求相同的隐讳情感，尽管“让生活所有的其它方面都充满活力”的潜力是非常高的。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有一位学生精神病顾问最近指出，大学时期很可能是大学女生平生头一次不得不努力工作，面对激烈的竞争、主动而不是被动地想问题——这一切“不仅是一种陌生的经历，而且几乎与肉体的痛苦一样。”这时，她们对此不适应，因而常常到热烈的性关系中去寻求“保障”。

> 自尊的降低以及热情、精力的减退，采用创造性的方式发挥作用的能量的减低，这些都是重要的事实。这种压抑似乎不仅表明了依赖性和无能为力，也是一种无声的呼救。它时有发生，只不过在大学就读的女学生中，其剧烈程度不同而已。②

这位精神病学者说，所有这些也许不过是代表“一个敏

①埃里克·弗罗姆（1900—1980），德国出生的美国心理学家、社会哲学家。——译注

弗罗姆著，“性与性格，从精神分析的观点看金西报告，”载《美国社会的性行为》，第307页。——原注

②卡尔·宾格著，“今日美国女大学生的压力，”载《大西洋月刊》1961年2月号。——原注

感，天真的少年对一种崭新的、令人恐惧的复杂和世故的环境所做出的首次反应。”但是，如果这个少年是个女孩，那么显然就不应当像对男孩那样，期望她去面对这种挑战，精通煞费苦心的工作以及对付竞争。这位精神病学者认为，该女孩在“情爱”中寻求自己的“安全保障”是“正常”的，即使这男孩本人可能“相当幼稚，乳臭未干，难以自立”——“至少从这女孩的需要来看，他还是一根纤细的芦苇杆”也无妨。女性奥秘掩盖了这一事实，即这种早期性寻求，虽然对青年男女来说完全无妨，因为他（她）们寻求的只不过是性所提供的，但是它并不能使这些年青妇女看到“自己清晰的形象”——即她们所需要的自尊以及“导致女性完善和创造性生活的活力。”但另一方面女性奥秘并不总是让男孩子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即女孩子所依靠他的并不真是性方面的，如果那样，就会抑制他的发展。男孩子的敌意也由此而来，即使他对性邀请毫无办法而屈从时，也是如此。

最近，一名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学生写了一篇颇为敏感的东西，记述了一个男生对一个离开他就无法学习的女生日益增长的苦恼——甚至夜晚一起逃学，用性方式都未使其平静的苦恼，

> 她埋头盯着书页的一端，他想叫她停下来；这种有点儿机械的动作使他感到极不协调。他想，自己这么烦躁不安是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四天都没有发生关系的原因。……他想，我敢肯定她现在需要。要不，她怎么颤抖得那么厉害，还眼泪汪汪的。怪不得我考试考得这样糟，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吧。但是他知道这并不是理由，当他在

想为什么自己没有好好复习时，他感到一股怨恨油然而生……时钟决不会让他忘记自己所荒废的时间。……他猛地把书一合，然后开始用力收拾起来。埃莉诺抬起头来，他看到她眼里掠过一丝惊恐。……

“喂，我现在就送你回去，”他说，“我今晚还有事。”……他记得走了好长一段时间，但当他弯下腰匆匆吻她的时候，她一下就搂住了他，他使劲想挣脱走开，最后，她松开了，但脸上没有一点儿笑容。她悄声说：“哈尔，别走了。”他犹豫了。“求求你，别走了……”她尽力伸直了身体来吻他，当她张开嘴时，他觉得上当了。因为如果他把舌头放在她的嘴唇中间，他就无法离开了。他吻着她，开始模模糊糊地忘记自己应该走了……他把她搂向自己，听着她那夹杂着痛苦和兴奋的呜咽声。过了一会儿，他退开问道，声音已经很吃力“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吗？”……她急切地，满怀希望地四下环视起来。他心里又纳闷起来：她的欲望中有多少是激情，又有多少是贪婪呢？女孩子用性来占有你。对她们来说，假装兴奋真是太容易了。①

当然，这就有了在女性奥秘引导之下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孩子，这些年青人面对人生第一个难关时，就把性当作容易得令人生疑的慰藉。为什么对这些年青人来说，要克服困难，努力上进，为了将来长远的目标而暂缓眼下的欢乐是如此艰难呢？性行为与早婚是最为简便易行的出路，19岁就假装老

① 宾格著，“冬季学期”，载《小姐》，1958年7月刊。——原注

练地操持家务可以逃避成人本身的责任。虽然一个父亲想让他的儿子成为“男子汉”，具有自立，主动，坚强的特点，但父母都促使其女儿具有顺从、柔弱、牢靠这些“女性”的特点，因此期望她在一个男性那里找到“保障”，而不期望她走出自己的生活道路。

由此，这一周期圈收紧了。没有自我的性别被女性奥秘奉为神圣的性别，在男人对女人的形象上，在女人对她自己的形象上投下了一层难以消除的阴影。对于儿女来说，已经越发难于逃避，难于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难于在人类交往中爱上他人。19岁前就结婚的无数人们，越来越早地在滑稽地模仿着性寻求，作为女性奥秘最新的牺牲品，他（她）们表露出了一种日益严重的幼稚，情感依赖以及消极顺从。缺乏自我感的性阴影或许能在郊区阳光灿烂的上流住房中暂消一时，然而，这些孩子气的母亲和稚嫩的父亲在这个幻觉天堂里能够为孩子们做什么呢？在这个天堂之中，生活上的享乐与对物质的追求掩盖了与复杂而新异的现实之间的日益松驰的联系。这些在面对这种现实之前就成为了母亲，或成为母亲后就割断了与这种现实的联系的年青女子，她们会抚养出哪一类的儿女呢？

这种寄生式的软弱对于我们民族的未来有一种可怕的含意。顽固地死死抱住女性奥秘，结果，这种软弱正传到新一代的孩子们身上。孩子们把他们家庭主妇式的母亲的性幻觉付诸于行动的悲剧，只是正在发生的一种渐进的、失去人性的迹象。在孩子们的“行动”之中，最终能看见女性奥秘病入膏肓，岌岌可危，逐渐过时了。

人性逐渐消失：惬意的集中营

哀叹美国妇女退避家中的喧嚣声使我们确信：事情的钟摆已经开始从一个极端摆向了另一个极端。难道真是这样吗？已经有迹象表明，那些精明强干，精力充沛的母亲退避在家，以家庭主妇的形象出现，而她们的女儿们却发现自己比母亲更难在这个世界上向前迈进。在过去的15年间，美国儿童的性格已经起了一种微妙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变化。许多临床大夫、精神分析家以及社会科学家都看到，与那种家庭主妇无名的问题相类似的东西，已经在她们的儿女们身上以更荒谬的形式表现出来。专家们对此日

益关注，并特别注意到了美国儿童中有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消极、柔弱和厌倦。危险的迹象并不是少年棒球联赛所引起的角逐或上大学的竞争所导致的拚抢，而是一种稚气，它使得家庭主妇式的母亲的孩子们没有那种在棒球场上，在进入高校时所需要的奋发劲头、不畏痛苦和挫折的忍耐力以及严明的风纪。小青年中也有一种新的特性、一种虚无的梦游、是单一角色的扮演者，他们只干那些认为是该做的事情，只干别的孩子在做的事情，然而在干的过程中好像并没有感到自己的存在，并没有感到它的实在性。

1960年，我在一个东部郊区听到，有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拦住一位刚在集会上讲完话的精神病学者，向他请教有无“一种药丸，这种药丸能使你昏然入睡，然后在醒来的时候就知道了应付考试的所有东西而不需要学习。”同一年冬天，在学年考试周的中间，两个大学女生在去纽约的列车上告诉我，她们去参加一些聚会，去“清醒一下，”不去用功应付考试。“心理学已经证明，当你确实有了动力，你就会学得快，学得有效，”其中一个解释道，“如果一个教授不能把所教内容上得生动有趣，使学生不用功就能懂的话，那是他的过错，而不是你的错。”一个从大学退学的机灵小伙子告诉我说，上学简直是浪费他的时间；“直觉”才是有用的，但大学不教这个。他在这个加油站干上几周，在那个书店干上一月，后来干脆什么也不干——起床、吃饭、睡觉、甚至书报都不看。

在调查10几岁青少年性乱交情况时，我在韦斯特切斯特郊区采访了一个13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同样的虚无缥缈的梦游特征。尽管她很聪明，但她的功课几乎难以及

格，正如指导顾问所说的那样，她“不能专心致志”。她似乎总是感到厌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成天都是一副恍惚不定的样子。另外，她好像没睡醒似的，好如一个有人在拉着线绳的木偶。每天下午，她就与好几个比她大些的男孩子钻进一辆汽车，这些小青年都是从学校“退学”出来寻找“新鲜玩意儿”的。

这些新一代的小青年由于某种原因还没有“真正”长大成熟这一点已经被许多观察家感觉到了。得克萨斯的一名教育工作者遇到了麻烦，因为大学生们对他们可以获得对口工作保障的课程并不感兴趣。他发现这些大学生对校门之外的其它东西也不感兴趣。他们通常就是“鬼混”。一份调查表揭示，这些小青年还没有感到有什么可以足以为之而献身的东西，就像他们在实际的所做所为中还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们感到有活力一样。思想，这种理性思维可以说是人类所独具的，然而却从他们的心灵或生活中完全消失了。①

一位社会评论家，一两位有洞察力的精神分析学家试将这种年青一代的变化确定为美国人性格的一种基本变化。不管是好是坏，也不管它是一种病态还是一种健康迹象，他们看到，可以用一种强大、坚固的自我内核来确认的性格正在被一种模糊的、难以名状的“受外力支配的性格”所代替②。50年代，戴维·里斯曼发现，没有一个男孩或女孩拥

① 麦科克代尔著，“他们在休斯敦将为了什么而死”，《哈泼斯》杂志，1961年10月刊。——原注。

② 参见里斯曼著，《孤独的人群》；弗罗姆著，《逃避自由》，纽约，多伦多，1941年版第185—206页；埃里克森著，《幼年与社会》第230页。——原注

有明显的、可标明青春时代的自我意识，“尽管我在好几所公立和私立学校中调查了有独立能力的小青年。”①

萨拉·劳伦斯学院曾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有很大自主权的学府，但人们发现，新一代的学生在这种自主方面难以自助，漠不关心，而且无能为力。如果让他们自己组织自己的活动，就组织不起来；一门适合学生自己兴趣的课程从不起作用，因为这些学生并没有什么是自己很感兴趣的。萨拉·劳伦斯学院那时的院长哈罗德·泰勒描述了这一变化：

> 早些年间，完全可以依靠学生的强大动力和首创精神来处理自己的事务，建立新的组织，在社会福利方面或在学术领域提出新的规划；而现在却很清楚，自我管理的责任对许多学生来说，常常是一种要忍受的负担，而不是应当维护的权力……拥有完全自主权来管理自己的生活以及做出自己的决定的学生常常并不希望这样做。……大学里的学生似乎觉得自己娱乐是越来越难了。他们只是习惯于依赖别人安排妥当的娱乐活动，他们在这些活动中所起的作用只是参加而已。……学生们已经不能为自己计划出任何有兴致参加的活动了。②

起初，教育工作者把这种情况怪罪于麦卡锡时代的谨慎和保守主义，以及由核弹引起的无能为力感，后来，面临苏联在太空竞争的领先地位，政客们和公众舆论都怪罪于教育

① 里斯曼为埃德加·弗里德伯格的《消失的青少年》所写的前言。——原注

② 泰勒著，“校园内的自由与权力”，载《美国大学》第780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工作者存在的那种普遍的“软弱无力”。但是，不管他们本身的软弱无力究竟如何，最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对此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是在对付一种消极，一种孩子们带到校园里来的、令人恐惧的“根本消极……它对那些必须每天在校内外都要对付他们的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要求。”① 年青一代体质上的消极在肌肉蜕化中表现出来，最终引起了白宫的警觉。他们情感上的消极显而易见：对什么都无所谓，漫不经心，就像垮掉的一代——一种异常冷漠，无目的的青年反叛形式。在舒适的近郊居住区的孩子们中，在那些成功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受尊重的以及自重的社会成员的孩子们中，在拥有一切“优势”一切“机会”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中已经开始显露：他们的犯罪率与城市贫民区的犯罪率一样高。一部叫做《我是少年弗兰肯斯坦》② 的电影大概对韦斯特切斯特和康狄涅格的家长们来说并不奇怪，他们在1960年就遭到过警察缉捕队的光顾，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各自的松木壁板游戏室里聚众吸毒；这部电影对伯根县的家长们也不足为奇，他们的孩子于1962年因在郊区墓地聚众骚乱，捣毁墓地而遭逮捕；长岛郊区的家长对此也不陌生，他们的女儿们在13岁就从事货真价实的“应召女郎”的勾当。在这些胡作非为的背后，佛罗里达春假期间的骚乱、乱交、10几岁青少年性病的上升和非法怀孕、令人惊恐的从中学和大学退学出来的青年人，就是这种新的消极现象。对这些厌倦、懒惰、“就我所喜”的小青年来说，“疯

① 里斯曼著，前引书前言。——原注

② 弗兰肯斯坦，英国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写的一部科幻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制造了一个怪人，结果反被其害。——译注

狂和刺激”是唯一可以消磨单调乏味、无聊空虚的光阴的方式。

这种消极现象还不止是一个厌倦的问题，它预示了人类性格的退化，研究过50年代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军士兵行为的人已经感到了这一点。一位军医，克拉伦斯·安德森少校，当时他被允许自由出入俘虏营去治疗战俘，他观察到：

> 行军途中，在临时营房以及常设驻地，强者总是从弱者手中抢夺食物，没有什么纪律来制止这种行为。许多人是弱者，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其他人的帮助和照料，反而不被理会，或是陷入更坏的处境。痢疾流行，而且使得一些人虚弱得难以迈步。冬季的夜晚，毫无希望的痢疾患者被同伴卷出营房之外，任其在寒冷之中悄然死去。①

大约38%的战俘死去，其比率高于美国以往任何一次战争的俘虏死亡率，其中包括独立战争。大多数的战俘变得迟钝、懒散、龟缩到自己躲避现实的沉默之中。他们不想弄吃的，找柴禾，把身上弄干净，也不愿相互交谈，什么也不干。这位少校被事实深深震动了：这些新一代的美国士兵几乎普遍“缺乏老扬基佬的机智”，缺乏一种对付新的、野蛮状况的应变能力。由此他得出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我相信，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被俘的精神创伤所导致的结果。我想，这也是我们培养青少年的一种新的失败的后果——一种

① 金基德著，《仅此战争之中》，纽约，1959年版。——原注

新的软弱。”一位教育心理学家对于军队的宣传目的不以为然，他评论到：“这些年青人中肯定存在着某种可怕的东西，它不是软弱，而是冷酷、狡诈和脆弱。我把它称为自我失败——一种个性消沉。……青少年的成长能够并且应当导致完全的成年类型，其定义为稳定的自我意识的发展……”①

在这种意义上，朝鲜战俘们是一种新型美国人的样板。很明显，他们是在“对理智和发展有害”的方式下培育起来的，在他们各自的行为中就“难以”发展“一种理智，清醒得可以允许自身反叛的性格和心智。”

这种消极的非个性是“历史的新事物”。这一令人震惊的认识形成了，可刚一形成就开始在孩子们身上表露出来。但是这种麻木不仁的、依赖别人的、稚气的、无目的的人被当作为新型美国人显露出自己的性格而受到注意时，好像简直就不是人，他使人奇怪地联想到被女性奥秘所确定的那种熟悉的“女性”性格。难道女性的主要特性，这种被弗洛伊德错误地把它与性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特性，是消极性？是一种虚弱的自我或自我感，一种虚弱的超我或人类意识，是对自己的志向和通过他人而获得的志趣的放弃，是对抽象思维的无能为力，旨在从面对外部世界的活动中退避出来，而沉迷于内向或幻觉的世界之中，难道是这样吗？

这意味着什么呢？现在在美国少男少女中表露出来的那种引人注目的幼稚的幻觉与消极的个性，意味着什么呢？我在他们身上看出，他们的母亲就是生活在女性奥秘的限制之中的。她们以一般的、常规的方式履行妇女的职责。她们当

---

① 弗里德伯格著，《消失的青少年》，第212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中，有的能力并不一般，并且有的所受到的教育也不一般，然而她们都强烈地关注自己的孩子，在这一点上，她们十分类似，好像孩子才是她们主要的和唯一的兴趣所在。

有一位母亲由于她儿子不能学会阅读而被搅得心烦意乱，她告诉我说，当儿子第一次拿着幼儿园的成绩报告单回家来时，她简直“兴奋得跟孩子似的，就像等什么人星期六晚上约我去幽会一样。”当她儿子的老师说，这孩子在教室里四下走动，像在梦游一样，在做快速阅读测验时也不能集中注意力来完成时，这位母亲确信，这是老师的过错。另一位母亲告诉我，当她的几个儿子遇到麻烦和烦恼时，她都难以忍受，就好像他们是她自己似的。她告诉我说：

> 我常常让孩子把家具胡乱翻腾，在起居室里搭房子，而且还保留好几天，对此我从不干涉，所以有时甚至连我坐下读书看报的地方也没有。我不能忍受让他们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甚至他们生病不愿吃药，我也依着他们。他们要是不高兴、打架、跟我生气，我就受不了，不知怎么搞的，我就是和他们分不开。我总是对他们既体谅又耐心。要是丢下他们不管，哪怕只有一个下午，我也觉得是罪过。他们每一页家庭作业都使我发愁。我总是全力以赴去做一位好母亲。史蒂夫不和邻里的孩子打架，我觉得很光彩。我甚至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妙，直到他开始在学校里表现得糟糕透了，开始做死的恶梦，并且不想上学，因为他怕其他的男孩子的时候，我才察觉到。

另一位母亲说：

> 我觉得自己每天下午在她们放学回来的时候，都必须呆在那里。我把她们在学校指定的书统统读完，这样就可以帮助她们做功课。我花了几周时间帮玛丽赶制上大学的衣服，这些年来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更令人兴奋的了。但是，她不学艺术我觉得很不是滋味儿。当然，这在我结婚前就一直是自己的梦想。或许在生活中最好是做自己的梦。

今天孩子们中那种日益严重的消极感以及梦境虚幻感在同一年代中已比比皆是，以至于女性奥秘促使了相当多的美国妇女，其中包括最精明强干的妇女，以及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妇女，放弃了自己的梦想，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教育，在精神上依恋自己的孩子，通过他们实现自己的梦想来了此一生。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巧合。中产阶级的母亲“汲取”孩子的个性，一位敏锐的社会学家在40年代就感到这一现象是明显的，而在这些年中已无可避免地增加了。妇女们除了小家庭，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加之各类用具已使家务劳动程序化，她们几乎只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对孩子的哺养之中，从摇篮直到幼儿园。甚至当孩子离开自己上了学，他们的母亲们仍能分享他们的生活，想象他们的苦乐而产生出同感，并且有时亲身体验这种生活。对她们大多数人来说，与孩子的关系已经成为了一种强烈的爱恋，或是一种共生现象。

“共生现象”是一个生物学的术语；简言之，它是指两个生物体浑然一体，共同生存的一种过程。对于人类来说，

当胎儿蠕动于子宫中，母亲的血液注入了他的生命；母亲吃下的食物使他发育成长，他需要的氧气来自母亲呼吸的空气，他的废物由母亲排出。在母亲与孩子的开始之初，存在着一种生物的一体性，一种奇妙而复杂的过程。但是随着脐带的脱离以及孩子降生到世上成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时侯，这种关系便完结了。

在这一点上，儿童心理学家解释了母亲和孩子之间心理或情感上的"共生现象。"在这一现象中，母亲的爱代替了羊水，在子宫中源源不断地沐浴，调养着胎儿。这种情感上的共生养育着孩子的心灵，直到他似乎在心理上确实成熟了为止。由此，心理作家——如心理学时代之前的颂扬母爱的文学和宗教诗人——刻画了一种情形，即母亲和孩子仍然保持着某种神秘的一体性，她们并没有真正分开。在大众心理学作者的笔下，"共生现象"非常强烈地暗示了母亲持续的爱护对孩子长期的成长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在最近几年中，"共生"概念已愈加频繁地溜进心理变态的儿童的病历中。越来越多的新的儿童变态似乎就是从那种与母亲共生的关系中滋生而来的，这种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儿童成为独立的人。这些心理变态的孩子好像正在把母亲无意识的愿望和内心冲突不知不觉地表露出来，那些愿望与冲突就是母亲至今没有忘怀或放弃的，不切实际但仍在孩子身上寻求实现的梦想。

"不知不觉地表露"是精神疗法描述患者行为的术语，这种行为在一定的情景中与实际大相径庭，它是幼稚的希望或幻想的表露。心理变态的儿童"不知不觉表露"出来的那种无意识的、幼稚的希望并不是孩子自己的，而是孩子母亲

的，这听起来不禁令人觉得神秘莫测。但是，治疗学家却能够根据孩子母亲的实际行为找到病因。通过孩子来满足自己幼稚梦想的母亲，无意识地促使孩子做出了有害于他人格发展的行为。韦斯特切斯特的行政长官的妻子就使自己的女儿在13岁就陷入了乱交行为，这位母亲不仅在女儿性魅力的发展方面有意识地培养了她——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忽视了孩子自己的个性——而且甚至在女儿胸部开始发育之前就以警告和热切的询问的方式给女儿灌输了自己的期望；孩子会在实际生活中把母亲淫欲的幻觉付诸于现实。

对于父母来说，通过孩子来实现自己的梦想的行为，从不认为是病态，除非这种梦想根本没有考虑并曲解了孩子的实际情况。小说和病历都描写或记录过这种现象：当一个男孩有可能成为一名杰出的提琴家时，他却成了一个很糟的实业家，因为那是他父亲寄予他的梦想；或者，他母亲梦想他成为一名伟大的提琴家，而他却在精神病院了此一生，使母亲的愿望化为泡影。如果在最近几年中，这一过程已开始呈现出病态的话，那是因为孩子们不知不觉表露出他们母亲的梦想已变得更加幼稚可笑。这些母亲自已也变得越来越幼稚，并且，由于她们硬要通过孩子来寻求更多的满足，所以到了最后，要从孩子那里分开已难乎其难了。由此可见，在那种“共生”关系中，似乎是孩子维持了母亲的生命。而这个孩子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被毁灭了。

这种毁灭性的共生现象实际上是建筑在女性奥秘之中的。这一过程是逐渐发生的。它始于一代人，持续到第二代。大致过程如下：

1、在学校和社会中，女性奥秘使少女们从现实的考验

中，从真实的理想和责任中逃避出去。并使她们确信，通过婚姻就能取得魔力般的满足。这样，就使她们的发展停留在一种幼稚的，不切实际的水平上，缺乏个性，而且她们自己的内心十分虚弱。

2、她自己的幼稚病越严重，她自己的内心就越虚弱，她作为妻子和母亲来寻求“满足”的现象就会发生得越早，她也就会进一步在精神上完全依赖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由此，她对现实的世界与对本人的自我感的联系就会逐步剥弱。

3、既然人类有机体存在着一种发展的内在动力，那么，靠家庭主妇这一幼稚保障来逃避自身发展的妇女就会在生理上和情感上都受到日益严重的病态折磨，因为家庭主妇角色不会允许她自身的发展。对她本人和孩子们来说，她那种母亲的作用就越来越不正常。母亲的幼稚病越严重，她的孩子在现实的世界中就越难达到人类自我。拥有幼稚个性的母亲就会有更加幼稚可笑的孩子，这些孩子也就会更早地从现实的考验中退缩到幻觉之中。

4、在男孩子身上，这种病态的退缩迹象更加明显，因为还在幼年时期，男孩子就被期望去经历现实的考验，而女性奥秘则允许女孩子采用性幻觉的方式从这种考验中退缩出去。但是，就是这些期望最终使男孩子向着一个坚强的自我发展，而使女孩子成为最可悲的牺牲品，成为“传染病患者，”使她们自己孩子的人性也逐渐消失。

我从精神病医生以及郊区临床大夫那里了解到了这一过程的作用。一位精神病医生，安德拉斯·安杰尔把它描述成“发展的神经退缩”，这一现象并不专门指妇女。有两种逃避发展的主要方式，一种是“不负责任”，一个人按步就班

过着自己的生活——上学、工作、结婚——“对什么事都敷衍了事，做做样子而已。”他本人也模模糊糊地觉得自己在“扮演一种角色”。表面上，他好像生活正常，而实际上他是在“做样子”。

安杰尔把另一种逃避发展的方式称之为“代替他人生活，”它表现为一种对自身性格的一贯否定和抑制，而且总是想用别人的个性来代替，一种“理想化的概念，一种完美的标准，他在生活中企图依照这一标准而压抑了自己所有的真实动力，而这些内在动力与那种夸张的，不切实际的标准是相矛盾的。”或许，他简单地采取一种“大家当时公认的”个性模式来代替。

> 代替他人生活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一种结构特别的、依赖他人的生活方式，这种依赖性的方式常被误解为是爱恋的形式。然而，这种非常强烈而执拗的依附缺乏真正爱的精华——忠诚，靠直觉相互理解，以自己的权利和方式与对方合为一体而高兴。相反，这种依赖式的方式完全从占有的角度出发，并且执意要使对方失去“他自己的生活”。……需要依赖的人并不是要与之相处的人，而是需要他来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填补自身的空白。这种空虚原本只是一种幻觉，但长期的自我压抑使得这种幻觉濒临确有其事的境地。

所有以代替他人生活的方式旨在获得一种代替的性格，并没有使这个人从模糊不定的空虚感中解脱出来。由于真实的，本能的内在动力受到压抑，结果，只是留给他了一种痛苦的情感真空，差不多是不复存在的感

觉……①

安杰尔由此得出结论，“不负责任”与“代替他人生活”“可以理解为试图解决冲突的方式，即内在动力的发展和面对新环境所产生的恐惧之间的冲突，”——然而，尽管这些解决冲突的方式或许能暂缓减轻一些压抑，但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其结果，即便不是他们的目的，也总是一种对个人发展的逃避。”

然而，不负责任和代替他人生活正是女性奥秘传统定义的核心。这就是女性奥秘教诲少女们“作为女人，追求完善”的方式；这就是今天大多数美国妇女生活的方式。但是如果人类有机体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动力去发展，扩充以及成为它能够成为的一切，那么，健康妇女的身心开始反叛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她们没法尽力使自己去适应于那种不允许自身发展的作用。她们那些使丈夫们和精神病医生们大伤脑筋的症状是一种令人警觉的迹象：她们不经过抗争就会丧失自己的生存，逃避自己的发展。

我在自己走访的妇女中以及在自己的生活圈子中的妇女身上看到了这种正在进行的抗争。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抗争往往是失败的。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先是在高中，后来在大学仅仅为了“随大流”就放弃了自己内心所有的志趣和抱负。她早早地结了婚，以流行的、大家公认的标准女大学

① 安杰尔著“逃避发展”，载《美国精神病学期刊》，第110卷第5期。1953年11月，第358—361页，同时参见弗罗姆《逃离自由》第138—206页。——原注

生大致相同的方式扮演起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角色。我不知道她是在哪一点辨别不出真假，但当她成为母亲时，有时就会躺在地板上双脚乱蹬，大发脾气，因为她管不了自己3岁的女儿。38岁时，她就割了手腕动脉，企图自杀。

另一个相当有才气的妇女放弃了癌症研究这样有意义的工作而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就在她孩子出生之前，她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恢复之后，她跟孩子简直是"寸步不离"。连续4个月她每天上午都在幼儿园里和孩子呆在一起，不然的话，他就会又哭又闹，狂躁不已。孩子在一年级时，每当母亲不在身边，他就常常会在上午呕吐。他在操场上玩耍的狂乱劲儿简直到了危害自己和别的孩子的地步。一次，他拿着棒球球棒刚要打一个孩子的头，一个邻居就从他手中把球棒夺了下来，这位母亲竟然对孩子的"难堪"暴跳如雷。她觉得让自己来管教孩子实在是太难了。

10年间，她在郊区扮演着一个十足的母亲，只是不能严格地要求孩子。她看上去明显地消沉下去，对自身的价值也越来越茫然。就在她在自己异常整洁的错层住房式的地下室里上吊的前一天，她还带了三个孩子到儿科大夫那里做了体检，并为自己女儿的生日聚会做好了安排。

郊区家庭主妇采取自杀手段的极少。但是存在着另一迹象，她们对逃避自身的发展付出了情感和体力上的高昂代价。就像我们现在所了解的，妇女并不是人类生理上的弱者。就每一个年龄段来看，女人比男人死亡人数少。然而在美国，自从妇女把自己的女性作用表现为家庭主妇的时候起，她们的生活就不再有激情，不再有享受，不再具有真正人类健康特色的使命感了。

50年代，精神病专家、精神分析家以及医生们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注意到了，家庭主妇综合症似乎日益严重了。年青家庭主妇所患的血疱、周身不适、神经质以及疲倦感这些轻微的无法诊断的症状已变成了心力衰竭、溃疡出血、高血压、支气管肺炎；难以名状的情感压抑已变成了神经衰弱。在新一代的家庭主妇式的母亲中，在那些阳光明媚的郊区，“母性变态”、慢性自杀一样的压抑感或生育幻觉等症状仅仅在10年间就大大增加了。根据理查德·戈登博士和他的妻子凯瑟琳（两人分别是精神病学者和社会心理学家）50年代中在新泽西州的伯根县积累的医学记录来看，大约1/3的年青母亲患有生育抑郁症或生育精神错乱症。与此相对照，以前，医学预测只有1/4000的怀孕妇女患有生育抑郁症，并且1/80的症状要轻得多。

1953年至1957年，伯根县746名精神病患者中有1/10是年青的已婚妇女，她们由于生育而患精神错乱症。事实上，年青的家庭主妇(18岁至44岁)不仅深受生育抑郁症的痛苦，而且深受日益严重的各种精神紊乱和心身疾病的痛苦。她们在50年代已成为成人精神病的主要患者。遭受病痛的年青妻子的数目比患有病状的年青丈夫们要多一倍半以上，而比其他类型的患者多两倍。(在其它郊区的私人和公共诊所的调查都发现类似的情况。)从5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年青的家庭主妇作为主要的冠状动脉病变、溃疡、高血压以及支气管肺炎患者已逐步取代了男性患者。为这一郊区县服务的医院中，溃疡病患者中妇女现在占40%。

我前去拜访了戈登夫妇，他们认为，新一代年青的家庭主妇所遭受的严重病状是新郊区人口“流动”的结果，而在乡下或年代已久的郊区及城镇中的妇女中并没有发现这类情况。然而“流动”的丈夫们并没有像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那样垮掉。以前对生育抑郁症的研究已经表明，那些在事业上和职业上成功的妇女成为家庭主妇式的母亲时，有时会受到“内心冲突”的折磨。但是这些新的牺牲品，其生育抑郁症或衰弱症的比率远远高于以前任何预测，她们的奢望却从不高于做一个家庭主妇式的母亲，这就是她们所期望的一切。戈登夫妇指出，这一发现并不表明这些年青的家庭主妇必然比她们的丈夫受到了更多的压力，从某种理由来说，这些妇女只是显示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她们更容易在压力前屈服。这到底意味着家庭主妇式的母亲角色对她们来说是远非她们所及呢，还是远远不够呢？

这些妇女并没有同样的幼年期神经病源。事实上，其中一些人根本没有显示出任何病态。但是，出现在她们病历中令人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就是，她们所放弃的教育远未达到自己能力的限度。受到折磨的通常是这些人，她们在高中或大学时就退学了；比起她们同龄的妇女来说，这类事发生得更加频繁：开始上大学，然后通常在一年后就离开了。①她们中很多人是来自“更带有清规戒律的种族集团”（意大利人或犹太人），或是来自南方的小镇，在那里“妇女们受到保

① 戈登著，“社会动力学与心理疗法”，载《美国医学协会神经学与精神病学档案》，1959年4期，第81卷，第486—503页。——原注

护并保持着依赖性”。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没有追求过教育或职业，也没有靠自己的能耐进入社会。少数衰弱的妇女曾经干过非技术工作，或开始有过兴趣，但成为郊区家庭主妇式的母亲后就放弃了。大部分人除了想嫁给一个前途无量的男人外没有什么抱负；其中很多人嫁给了那些精明强干，抱负不凡的男人时不仅在应验着自己的梦想，而且还应验着自己失意的母亲的梦想。就像戈登博士所描述的那样：“她们不是能干的女人。她们从来就没有干过什么事情。她们甚至不能够组织起当地需要的社会活动，干任何社会工作。她们从来没有主动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学会一门工作并干上这种工作。她们中许多人都退过学，生个孩子总比得到好分数要容易一些。她们从来没有学到顶住压力、忍受痛苦、经受艰巨工作的折磨。一旦不顺心，她们就不行了。”

或许，这些年青的妇女是因为比其他妇女更加消极，更有依赖性，她们才把自己封闭在郊区的生活圈子之中。有时她们似乎变得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幼稚，她们的孩子也显露出一种近乎病态的消极和幼稚——这在儿子身们上反映得特别早。今天可以发现，在郊区的精神康复诊所里，绝大多数的儿科病人都是男孩。而事实的另一方面，则极富有戏剧性而且不同的是令人困惑不解，那就是今天在所有的医疗诊所和大夫的办公室里，大多数成年病人都是妇女，也就是家庭主妇们。一位波士顿的精神病大夫就有许多女病人，他对我讲了一些情况，剔除了他谈话中的那些职业上的理论术语，他说：

的确，女病人要比男病人多得多。她们自述的病痛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如果你透过表面深入其中，就会发

现她们身上那种潜在的空虚感。它并不是自卑感，而像是极度的空虚感。其生成的环境就是她们没有自己追求的任何目标。

在一新郊区精神康复诊所里，另一位医生告诉我说，一位有16岁女儿的年青母亲，自从7年前迁到这个郊区以来，除了偶尔做些公共福利的“好事”之外，一直迷在孩子们身上。尽管这位母亲对她女儿牵肠挂肚（“我整天都想着她——她一个朋友也没有，她能上大学吗？”），但她居然忘记了女儿要参加大学入学考试的日子。

她对女儿的牵挂以及对自己的所做所为而感到的苦闷，实际上就是她对自己以及对自己的无所事事所感到的焦虑。当这些妇女对自己的碌碌无为而深感苦闷时，她们的孩子实际上与她们极少有真正的接触。我想到了另一个两岁的孩子，这孩子病状很严重，因为他几乎跟他妈妈没有什么实际的接触。她就呆在家里，整天呆在那里，每天呆在那里。我甚至还得教她如何和孩子保持肉体上的接触。但是，这只能到这位母亲有了自我满足的需要时，问题才会得到解决。与孩子呆在一起同时间的耗费并没有关系——在孩子需要的时候在他们的身边是举手之劳的事。一个母亲能整天呆在一个地方而不到孩子身边去，是由于对自己过于专注的缘故。因此，这孩子发起脾气来连气都屏息了；他又踢又打；他不让母亲离开幼儿园；甚至9岁了的一个男孩子还要母亲和他一起去浴室，睡觉时要母亲和他一起躺下，否则他

就睡不着；要不然，这孩子就孤僻得到了精神分裂的程度。于是这位母亲就会发疯似地满足孩子的要求。但是，如果她确实能够满足自己，那么她也能为孩子着想。她应当是完全的自我，与孩子接触，帮助孩子成长，学会对付现实问题，甚至还应知道孩子自己真实的感情是什么。

在另一个诊所，一位治疗学家谈到了一位惊慌失措的母亲，因为她儿子在学校里不能学会阅读，尽管经过测试，她儿子的智力并不低。于是这位母亲就离开了大学，完全把自己置于家庭主妇的位置上，在儿子上学的这段时间里就在家过着日子，从自己儿子的进步中摄取自我满足。她在接受治疗，从孩子身边“分离”之前，这孩子根本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自我感。他什么事也不能做，也不去做，甚至在玩耍时也是这样，除非什么人告诉他应当怎样。他甚至连阅读也学不会，因为这需要自己来做。

这位治疗学家说，这类稀奇古怪的事就像许多其他的“女性角色”时代的妇女一样，在她致力于成为一名“真正的妇女”，一位贤妻良母时，“她实际上扮演着一个有相当男子气的角色。……她在家里发号施令——管理孩子的生活，严格治理着这个家，安排修建，唠唠叨叨地让丈夫干着从未完成的散零活儿，掌管财务，监管消遣娱乐以及教育——而她丈夫只是一个付帐单的人。”

在韦斯特切斯特的一个社区，那里的学校制度是世界闻名的。但是最近发现高中成绩优秀的毕业生进大学后却非常差，对自己评价也不高。一份调查表明这是一种简单的心理原因所导致的：在这些学生读高中时，他们的家庭作业和学

期试卷事实上都是由他们的母亲做的。这些母亲在子女的心理发展方面欺骗了自己的儿女。

另一位精神病医师说明了青少年犯罪的一种起因，即是因为孩子的母亲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而孩子却把母亲的需求不知不觉地表现在自己的行动之中。

> 久而久之，更为重要的家长——通常是母亲，尽管父亲总是在某种方式上有影响——影响了孩子，无意识地促使了自己的孩子做出违反道德标准或有害于社会的行为。这位家长的精神需求……是通过孩子的行为而间接地获得满足的。这种家长的精神需求之所以存在，或是由于在成人的世界中她们难以使自己得到满足，或是由于家长自己幼年时期受到抑制的经历，或者更为通常的情况是由于上述两种因素的结合。①

对青少年犯罪现象有所观察、并想帮助少年犯的人已经看到了这种正在发生的人性消失的渐进过程。他们还发现，仅仅用爱是不足以消除它的。这种共生的恋爱或者说是溺爱，在女性的奥秘的年代里则被解释为母爱，这种爱是不足以在孩子们身上产生出社会责任心和坚强的性格来的。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一位内心坚强的，成熟的母亲，她自己的性及本能的需求是与社会责任心联系在一起的。“坚定性表明一位家长应当懂得……如何以创造性的方式来尽可能地达到自己主要的目标。”②

① 约翰逊和索瑞尔著，“儿童与成人反社会行为的起因”，载《精神分析季刊》1952年21号，第323—343页。——原注

② 同前。——原注

一位治疗学家介绍了一个9岁女孩的情况。这个女孩有偷盗行为，庇护她的母亲说，她孩子会改掉这个坏习惯。这位母亲对女儿有一种“纵容式的溺爱，这产生于她本人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只有通过女儿的行为才能间接地得到满足。”一次，这个9岁的女孩居然问这位治疗学家，“我妈妈准备什么时候才自己偷东西？”

情况发展到了极端，这种渐进的失去人性的类型就能在精神分裂的儿童身上见到；这类儿童有时被称为“孤僻的”或“变态的”。我参观了一所颇有名气的诊所，这个诊所研究这类儿童几乎已有20年了。在这一期间，这类孩子的症状在初期和幼儿前期的阶段就引人注目，这类儿童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是有增无减。因为这种病例越来越多，对于这种奇怪状况的起因，对于这种状况是否真正有所增加，或者只是看起来在增加，权威人士的意见很不一致。直至最近，这一类儿童都一直被认为是智力迟钝。但是现在，医生和精神病大夫在医院或诊所里越来越常见到这种情况的患者。再者，这种病状与那种不可改变的，固有的智力迟钝的类型有所不同，它能够得到治疗，有时还能治愈。

这些儿童常常与无生命的东西如汽车、收音机等等呆在一起，或者与动物如猪、狗、猫呆在一起。问题的症结似乎是，这些儿童还没有形成或发展成较强的自我，因此，甚至对儿童天地的实际情况都难以应付。他们不能把自己与外界区分开来，他们生活在没有生命的物品的水平上，或者说，生活在人体组织还没有形成的内在动力的水平上。至于起因，权威人士感到必须“检查并研究这些儿童母亲的性情，儿童是通过母亲这一媒介才把自己转变成了社会化的

人。”①

在我走访的这个诊所里（波士顿詹姆斯·杰克逊·普特南儿童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这些深受其害，心理极不正常的儿童下结论时总是小心翼翼的。但其中一位大夫言语中尽管有些不耐烦，还是谈了情况。他谈到了自己所遇到的接二连三的“若有所失的孩子、虚弱的孩子、低能儿。如果家长是个虚弱的人，这孩子肯定也是。我们对这种事情是再清楚不过了。”

大多数从未形成人类自我意识的儿童，他们的母亲本人就“相当不成熟”，尽管表面上她们“给人以适应能力很强的印象”。她们对自己的母亲有很大的依赖性，又从这种依赖性中逃避到早婚之中，并且“经过勇敢的奋斗，建立并保持了她们创立的标准的妇女形象：妻子和母亲。”

> 成为母亲的愿望，通过这一经历或许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富于真实情感的人，这种希望和期待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这种愿望、希望和期待本身就会使人焦虑不安，矛盾重重，恐惧失败。因为她本人就十分缺乏母亲情感的自然表露，所以她时刻留意所有的育儿新方法，阅读有关体质，心理卫生的文章。②

她对孩子无微不至的爱护并不是自发的行为，而是根据“一个好母亲的应有形象”而进行的，她希望“通过与孩子的融合，通过自己的血肉，她或许能与孩子产生同感，领略到

① 兰克著，“精神分析技巧的适应性：变态儿童的治疗，”《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期刊》，第14期，1949年1月1日。——原注

② 同前注。——原注

真实生活的欢乐，领略到真实情感的欢乐。”

于是，这孩子就会从“消极的迟钝”退化到“深夜的惊叫，”退化到失去人性。“这个消极的孩子还不致于构成威胁，因为他并不向母亲提出过分的要求，而母亲却常常担惊受怕，害怕孩子知道自己在情感方面什么也没有，怕孩子知道自己是个骗子。”当她发现从孩子身上难以真正找到自己的满足时。

> ……她就拼死拼活地控制着，或许不再是控制自己，而是控制孩子。拼命训练孩子大小便以及进行断奶隔离通常成了冲突，从中，她竭力使自己得到补偿。于是，孩子成了真正的牺牲品——无能为力的母亲的牺牲品，这种无能为力反过来就在她身上产生出一种借故生端的挑衅，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毁灭。对孩子来说唯一的生存方式就是退让，退避，不仅从危险的母亲那里退避出去，而且从整个世界中退避出来。①

因此，他变成了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或是一个动物，或是“一个烦燥不安的漫游者，漫无边际地寻找着，在房间里躲躲闪闪，前后晃荡，绕墙转圈，好像这些就是他要打穿的障碍似的。”

在这个诊所里，医生们常常能够追溯到患者的前几辈都有类似的病状。人性的确在逐步地丧失了。

基于这些临床观察，我们可以设想，迄今发现的

① 同前注。

冲突在前几代人中就已存在，而且还将继续下去，除非这种类型的病状被治疗所中断，或者，被一个男性父亲角色挽救出来，这只是我们难以期待的一个希望而已。①

但是，如果母亲继续在精神上依靠孩子，通过孩子间接地达到自己的生活目的，那么不管是治疗还是爱，对这类儿童都不会起作用。我在自己走访的许多妇女身上注意到了相同的类型，这些妇女控制着自己的女儿，或使她们消极地依赖，顺从他人，或无意识地把她们推进了性行为之中。在我走访的妇女当中，最具有悲剧色彩的就是一个 13 岁 的“梦游”女孩的母亲。她是一位富有董事的妻子，她的生活全被各种各样的排场填得满满的，她就生活在郊区“家庭聚会”的特有景象之中，不过这只是生活表面的形式，她丈夫真正的生活完全在自己的商业中，这种生活他不能够，也不愿意与自己的妻子分享。她寻求着重新获取自己生活的意义，不知不觉她就使自己13岁的女儿陷入了乱交之中。她在女儿的行为中过着虚假的性生活，这对于她女儿来说，根本没有实际的感受，她在其中只是变成了一件“没有生命的东西。”

有许多治疗学家和顾问们都在尽力“帮助”这些母亲和父亲，在这种前提下，我认为，如果母亲的性欲情感的需要在婚姻中从丈夫那里获得了满足，那么，她就不会通过自己的女儿来解决这种需要——并且，她女儿也会从“毫无生气

---

① 兰克、普特南与罗克林著，“早期喂养困难中‘情感倾向’的意义”，载《身心医学》第5期，1948年10月5日。——原注

的东西”之中脱离出来，成长为成熟的女性。这是因为丈夫自己要解决的难题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母亲要从父亲那里得到足够的爱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因此，顾问们尽力让这些母亲在自己的生活中培养出一些真正的兴趣。

但是，我所遇到的另一些妇女就不同了，她们在精神依赖的生活中，在缺乏个人生活目的的生活中逃避自己的发展，甚至丈夫最热切的爱都无法阻止她们让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孩子的生活逐步毁灭。当这些妇女无意识地使自己的女儿过早地陷入了性行为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因为，这种性冒险是她们自己生活中唯一真正的冒险——或是取得地位，证实自己的方式。今天，她们的女儿以“正常”的女性方式把母亲的梦想或未能实现的抱负付诸于行动，这些追求雄心勃勃、精明强干的男人，好高骛远的女儿们，就和自己的母亲一样，受到了同样的挫折，同样难以得到满足，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她们不会因为怕自己把丈夫和孩子杀掉就都光着脚冲向警察局，她们觉得，就是丈夫和孩子才使她们陷入了家庭的困境。她们的儿子并没有在街邻和学校中打架行凶；她们的女儿也并没有都把母亲的性幻觉变为现实，并且在14岁就怀了孕。也不是所有的这类家庭主妇都在上午11时开始喝上几杯，以掩盖洗碗机、洗衣机、甩干机沉闷的旋转声，在孩子一个接一个地上学之后，这声音最后就成了空荡荡的房子里生活的唯一伴奏声。

但是像伯根县那样的郊区，“分居”率在50年代暴涨了100%，因为那些精明强干，雄心勃勃的男人在城市里持续发展，而他们的妻子在精神寄托的生活中，或在不承担社会

义务的生活中逃避自己的发展，在家中履行着女性的作用。只要孩子呆在家里，只要丈夫呆在外边，妻子们就会感到日益严重的折磨，恢复不了。在伯根县，这10年间，自杀人数猛烈地上升了，自杀者都是45岁以上的妇女，以及那些孩子已长大成人，离开了家，而自己却住进医院的精神病女患者。①这些不得不住进医院而且恢复得很慢的家庭主妇主要是那些从来没有在家庭之外的工作中发展过自己能力的人②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一代的年青家庭主妇式的母亲（女性的奥秘的产物）年近40，可能会出现众多的精神崩溃患者。不过，这还是一种推测。但是，她们的儿女变得越来越幼稚，正如热切追求早婚的现象所反映的，已经成为令人警觉的事实。1962年3月，在儿童研究协会全国会议上，早婚以及小父母的问题，这个原先一直被认为是年青一代中“情感成熟性已经改变”的现象，终于被公认为是一种日益严重的“幼稚化”迹象。在60年代，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在20岁之前就结了婚，这表明了其不成熟性和情感的依赖性。他们把婚姻视为一种具有魔力的取得成人地位的捷径，一种可以神奇地解决自己不能正视的难题的方式，一种公认的家庭职业本行。这些稚气的新郎和新娘被诊断为是这一代人“与自己的孩子一起的病态、悲切的爱情”的牺牲品。

许多姑娘都承认自己想结婚，因为她们不再想工作了。她们心中埋藏着梦想：自己的一生就此可以无忧

① 理查德·戈登与凯瑟琳·戈登著，“一个流动性郊区的社会精神病学”，前引书第87—100页。——原注

② 同前注。——原注

无虑，有人体贴照料，房子里的摆设恰到好处，家务轻松，饶有兴致地逛逛商业中心再加上可爱的孩子、和睦的街坊四邻。对于丈夫的梦想倒不那么重要，但在一个要结婚的少女心目中，通常是一个刚建有力的，忠诚可靠，精力充沛的父亲形象；他温文而雅，落落大方，对好母亲充满自我牺牲的爱恋。年青的男人想结婚的理由通常是希望家里有一个贤慧的女人以及有规律的性生活，只不过是双方需要的、没有烦忧的性生活……事实上，要想获得成熟性以及自立性在实际的生活中只不过是一种暗藏的希望，想要保存依赖性，以孩子的特权，尽可能地减少限制性，延长一种孩子与家长的关系。①

全国还有其它不祥的征兆。在深陷在消极依赖之中的年青父母中以及他们与孩子中间，存在着难以抑制的暴力剧增的迹象。一位精神病专家报道说，这一类妻子变得更加依赖他人，消极顺从，她们以此来对付丈夫的敌意行为，直到有时候她们被打得简直自己一步也动不了才算完。但是，这并没有使丈夫们对她们好一点儿，相反他们更加气急败坏，更加狂暴。然而这种妻子不敢对丈夫们采用的暴力会发生什么后果呢？看一下最近公布的有关“儿童受摧残综合症”的新闻（《时代周刊》1962年7月20日号），认真想一下吧：

对许多医生来说，这类的病例真是太熟悉了，简直

① 斯坦巴克著，“没有爱的性与没有责任的婚姻”。在美国儿童研究协会第38届年会上的发言，纽约1963年3月21日。——原注

令人发指。一个孩子，通常是3岁以下的孩子，头破血流地被带到医院里来，常常连头盖骨都打破了。而父母的表情合情合理，说是孩子从床上摔下来了，或是从楼梯上滚下来了，或是被其他小伙伴打的。然而X光和经验使医生们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孩子的家长打的。

科罗拉多大学一个调查组从17家医院收集的文献资料中发现，1年之内就有302起儿童被摧残病例；33人死亡，85名留有脑损伤后遗症。这些孩子的家长发疯似地“踢孩子，殴打他们，拧他们的胳膊，用锄头或皮带扣打他们，用烟头烧或用电熨斗烫他们；”这些家长，尽管住在郊区上等的错层式建筑中，但就像住在贫民区公寓里的人一样。美国医学协会声称，每当儿童被摧残综合症统计资料一搞完，“似乎就会发现，这种综合症所导致的死亡将比那些得到了仔细的观察和研究的疾病，如白血病，囊状纤维病变以及肌肉萎缩症还要频繁得多。”

有更多机会毒打孩子的这位“家长”当然是母亲。正如一个有4个孩子的年青母亲在承认自己想自杀时告诉大夫：

> 对我来说，似乎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我已经没有什么盼头了。吉姆和我除了账单以及家里要添置的东西要谈之外，连话也不说了。我知道，他气的是自己还这么年青就老气横秋了，被这个家捆住了手脚，他觉得这是我的过错，因为当时就是我提出结婚的。但更糟的是我对自己的孩子也很嫉妒，差不多是恨他们，因为他们的生活还没开始，而我的生活却已经完了。

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巧合，但是在同一周，这种幼稚家庭的表白使人们认识到了早婚的真正含义。《纽约时报书评》（1962年3月18日，星期日版）记录了在美国成年人中流行的一种新的，前所未有的书籍，即关于人与动物之间“爱情”的书籍。半个也纪以来，美国畅销书目中有关动物的书籍总共还没有最近3年（1959年至1962年)多，虽则动物总是儿童文学主要的内容，而成熟的人总是对其他的人更感兴趣。（这只是一种象征，但在罗尔沙赫氏测验[1]中，认为动物比人类优越则是幼稚型的表现）。在最近的15年中，渐进的人性消失把美国人的心灵从一方带到了另一方，从对青春的顶礼膜拜到对自己孩子的“病态爱恋”，从对肉体的性细节的专注（这种性已从人体组织中脱离出来）到人与动物之间的眷恋。这到哪里才算有个完呢？

我认为，只要女性奥秘使家庭主妇角色成为一种空虚，促使少女们采取精神寄托的生活方式，采取无所事事、不负责任的方式来逃避自身的发展，这就永远也不会完。我们曾一味怪罪或怜悯这些母亲们，她们对孩子可谓是一心一意，正是她们自己播下了人性消失的种子，因为她们自己就从来没有真正成长起来。这样的怪罪，怜悯实在是太久了。如果这些母亲应当受到责备，那为什么不促使这些睡美人都起来过自己的生活，以此来打破原有的生活的模式呢？现在，绝不会有如此众多的风流王子来唤醒睡美人，或者有许多治疗学家来打破这种模式，这是全社会的工作，最终是每一个妇女自己的工作。因为，并不是母亲的精力应当受到

[1] 以瑞士精神病学者赫曼·罗尔沙赫命名的用以测定性格的心理学测验。——译注

责备，而是她们的虚弱，她们消极、幼稚的依赖性以及不成熟性，而这些却被误认为是“女性”，只有这些才应当受到非难。我们的社会在尽可能的范围内驱使男孩子成长起来，忍受磨砺的痛苦，培养自己去干工作，继续往前。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迫使女孩子长大成人——设法取得自我意识，就此来结束那种毫无必要的困境，那种隐匿在女性奥秘中的，在女性与人性之间所进行的错误选择呢？

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制止劝导母亲们去“热爱”自己的孩子，去承受左右为难的压力，即女性奥秘的要求与事实相矛盾的压力。女性奥秘要求妇女应当全心全意地去操持家务，抚养孩子；而事实是，现在在儿童指导诊所里要处理的大部分这类难题，都只有在帮助母亲们发展了自身的志趣，不再需要通过自己的孩子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的时候才能解决。现在是到了制止劝导妇女们要更加“女性化”的时候了，这种女性养育了一种消极性和依赖性，使性失去人性，使丈夫背上了难以承受的包袱，并使儿子们显示出了日益严重的消极性。

把成千上万的美国家庭主妇的这种停滞状态称之为是一种病态并不过分；这种病态以人类自身日益虚弱的意识形式出现，当现代大众文化中人性消失的势头迫使男男女女有必要拥有一个坚定的内心，以致于可以在令人恐怖的，无法预言的，日益改变的生存环境的压力中保持人的个性时，这种病态正传到了她们儿女们的身上。妇女的精力不是起因，而是这种病态的良方。只有当妇女能够使用自己全部的精力，使自己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的时候，女性的奥秘才有可能被打破，她们孩子中人性的消失才能被制止。然而，大多数作

为家庭主妇的妇女已经不能够使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了。

需要了解一个家庭主妇的状况是如何在妇女中产生了空虚感、不存在感从及虚无感，这是很迫切的。家庭主妇的作用有许多方面使具有成人智力的妇女几乎难以保持人类个性，保持坚定的自我或“我”的意识，而没有这种意识，一个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是不会真正有生命的。在今天的美国，对于有能力的妇女来说，我敢肯定，家庭主妇状况的本身就存在着危险性。使自己“适应”家庭主妇的妇女，长大想做的事就是“一个家庭主妇”的妇女，她们与成千上万在集中营走向自己死亡的人同样危险，在某种意义上，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牵强附会，然而更多的人却拒不相信有这样的集中营。

事实上，用了解纳粹集中营犯人行为的心理观察来深入了解一名妇女，研究她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女时，为什么能轻易就失去自我感，这确实令人感到不可思议，极不自在。在那种蓄意为使人的人性消失所设置的环境中，犯人们实际上已成了“行尸走肉”。而那些使自己“适应”集中营环境的人放弃了自己的人类本性，则几乎毫无例外地走向自己的死亡。令人奇怪的是，使众多犯人的人类本性遭到毁灭的环境并不是那种惨无人道的折磨，而是与毁灭美国家庭妇女的人性相类似的环境。

犯人们在这种集中营被迫做出幼稚的举动，被迫放弃自己的个性，跻身于乌合之众。他们的自决力、对未来的预测力以及为其准备的能力都逐步地遭到了毁灭。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过程发生的阶段实际上是难以察觉的，但是最

终，随着成人自尊的损害，随着成人参照系的破坏，这种人性消失的过程就会完成。这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教育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所观察到的过程，他在1939年曾被关押在德国的达豪以及布痕瓦尔德两地。①

当囚犯进入这个集中营时，他们就像受到创伤一样失去了自己原有的成人的志趣。这本身对他们的个性就是一种超越生理界限的沉重打击。少数人，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以某种方式悄悄干干自己过去曾感兴趣的事。但是，就是干这个也是很困难的；甚至谈论这些广博一些的成人兴趣，或者在追求这些兴趣中显示一些主动性都会引起其他犯人的敌意。新来的犯人竭力想保持自己原有的兴趣，而“老犯人们似乎主要是在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在里面尽可能地活得好一些。”

对老犯人来说，集中营的世界就是唯一的现实。②他们退化了，只是像孩子一样专注于食物、生理排泄以及原始肉体需要的满足。他们没有自己的隐私，没有来自外界的刺激。然而，最重要的是，他们被迫成天工作，这种工作使他们极度疲倦，不仅是因为体力上的劳损，而且是由于单调乏味，没完没了；这种工作不需要集中精力，不存在深入认识这种工作的希望，有时干起来毫无感觉，只是由于别人的需要或机器的运转。这种工作并没有包容犯人们的个性；它不允许真正的首创精神和自我表露，甚至也没有真正的时间界限。

囚犯们越是放弃自己成人的个性，就越对失去自己的性

① 参见贝特尔海姆《明达的心——混乱年代的人身自由》，伊利诺斯，格伦科，1960年版。——原注

② 参见前引书第162—169页。——原注

能力感到恐惧，对最原始的动物需求就越发专心致志。起初放弃了自己的个性，在隐姓埋名的囚犯中失去自己，这给他们带来了惬意感——感到“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在这种环境中，真正的友谊并没有发展起来。①甚至连谈话，这种囚犯们最喜欢的消遣方式，并使囚禁生活得以忍受下去的方式也很快就失去了任何真正的意义。②于是，疯狂与愤怒在他们身上不断积聚。但是成千上万人的这种疯狂和愤怒，其程度完全能够推倒倒刺铁丝网，击落党卫队手中的枪，却转而对准了自己，对准比自己还要虚弱的其他囚犯。继而他们感到的是自己更加虚弱无力，看到的是党卫队和铁丝网比以前更加坚不可摧。

最后，据说不是党卫队而是犯人们自己成了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因为他们难于正视自己所处的真实环境——因为，他们对自己面对的现实不敢承认，最后使自己去“适应”集中营的环境，好像这才是唯一的现实——他们被自己心灵的监狱囚禁了。党卫军的枪并不能使所有的犯人就范，犯人们不过是被巧妙地摆布，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困境；他们把集中营当作全部世界，使自己对过去的广阔天地、对现状的责任以及对将来的可能都视而不见，由此，自己囚禁了自己。幸存的人，没有死的也没有被灭绝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多少保持了主要的成人价值和志趣，这些曾经是他们个性中的精华。

所有这些似乎与美国郊区家庭主妇的舒适生活风马牛不

① 参见前引书，第231页。——原注

② 参见前引书，第233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粗及。但是，她所居住的房子实际上是不是一所惬意的集中营呢？在生活中体现出女性奥秘的妇女不就是在家中狭窄的墙院之内使自己陷入了困境吗？她们学会了去“适应”自己的生物作用。她们已经变得依赖他人、消极顺从、天真幼稚，她们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成人参照系，而生活在只求衣食住行的较低的人类水准上。她们所做的工作并不需要成人的能力，这种工作没完没了，单调乏味，劳而无功。当然，并没有人准备把美国妇女集体灭绝掉，但是，她们正遭受到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慢性死亡。正如集中营中的有的囚犯一样，也有一些美国妇女，她们抵抗着那种死亡，设法保持自我意识，不失掉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用自己的能力去达到富有创造力的目的。她们拒绝使自己去“适应”那种环境，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她们是有勇气、有才智的妇女。

常说教育对美国妇女“适应”家庭主妇的状况已经起到了抑制作用，然而这不过是过时的废话。如果说教育有助于人类的发展，凝聚着人类心智在过去所发现和创造的精华，赋予人类去创造自己未来的能力，——如果说教育已经使越来越多的美国妇女感到，作为家庭主妇是陷入了困境，是无益的，是不明智的话，那么，一种显而易见的征兆就肯定会被看到：妇女已经从家庭主妇的羁绊中解脱出来。

任何时候，采取去适应一种本身有害的参照系的方式来保持人的个性是不可能的。对一个人来说，要维持这样一种“内部”分化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表面上要适应一种现实，而与此同时却竭力在内心保持那种已遭到否定的生活理想。美国妇女已经步入其中的，或者据说是已进入其中的惬意的集中营，就是这样一种现实，一种参照系，它否定了妇

女成熟的人性。一个妇女用适应它的方式，阻止了自己的才智而变得幼雅可笑；避开了自己的个性而在俯首贴耳的人群中变成了一个默默无言的生物机器人。她变得越来越没有人性。她成了外界压力的牺牲品，她自己也把丈夫和孩子作为捕获、宣泄的对象。她适应这种状况的时间越久，她就越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地存在。她在衣食住行中寻求着自己的保障，她把自己对失去人的本能的恐惧隐藏在检验自己性能力的行为之中。她在大量的梦幻之中，在丈夫和孩子身上过着精神寄托式的生活。她不愿提起外部世界；她日益确信，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或这个世界。但是，无论她多么频频地告诫自己，个人意愿的放弃对自己的孩子和丈夫来说是一种必要的牺牲，依然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于是，她本应在社会中发挥的进取能量就变成了一种可怕的愤怒，但她又不敢把这种愤怒对准丈夫，而是耻辱地将其转向自己的孩子，到了最后，她就把愤怒对准了自己，直到她觉得自己已经不复存在为止。只是，犹如在纳粹集中营里一样，在这个使人惬意的集中营中，妇女身上有某种非常有力的东西阻止了自己的死亡。

贝特尔海姆描写了在纳粹集中营的一次难忘的经历。他讲到一群赤身裸体的犯人——已经不是人，而只是驯服的机器人——排着队走进死刑毒气室。党卫队军官得知女犯人中有一名舞蹈家，就叫她为自己跳舞。于是她就跳了起来。当她接近他的时候，突然抓过他的枪把他打倒在地。她当即就被枪打死。但是贝特尔海姆受到了震动，他不禁问道：

不管她跳舞的背景是多么怪诞离奇，跳舞不正是使

她再一次有可能成为一个人吗？舞蹈，是她作为个人被挑选出来进行的，被要求以自己曾经选为职业的方式来进行的。她不再是一个囚犯的号数，一个无名无姓、没有人性的囚犯，而是像从前一样，一个舞蹈家。尽管她的人性时时都受到改变的压力，她还是像以前的自我那样做出了反应，决心以自己的力量毁灭敌人，即使她会在这一过程中死去。

尽管那些默默走向自己的坟墓，与死人没有差别的人何止千千万万，但仅此一例就表明，一旦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决策，希望与整体分道扬镳，保持自己的个性，那么，原来的个性就能立即恢复，原有的破坏力就会失去作用。动用失去的自由权力（这甚至是连集中营都难以剥夺的）去决定一个人应如何考虑和摸索自己生存的环境，那个舞蹈家据此就摆脱了自己真正的监狱。之所以她能做到这一步是因为她甘愿冒着自己生命的风险去再次获得人身自由。①

郊区的住房并不是德国纳粹集中营，美国家庭主妇也没有走向死刑毒气室，然而她们深深地陷在困境之中。要脱离这一困境，她们必须像那个舞蹈家那样，最终运用自己的人生自由权力来重新获得自我意识。她们必须拒绝过那种默默无闻，难以名状的，没有人性以及受人摆布的生活，必须重新根据自己所选择的目的走自己的生活道路。她们必须重新开始生活。

① 前引书，第265页。 ——原注

失去的自我

人类行为科学家对基本的人类发展需求以及人类自身存在的尽力发展的意愿，越来越感兴趣。思想家们在许多领域——从柏格森到库尔特·戈德斯坦、海因斯·哈特曼、奥尔波特、罗杰斯、荣格、艾德勒、兰克、霍妮、安杰尔、弗罗姆、梅、马斯洛到贝特尔海姆、里斯曼、蒂利希，以及存在主义者——全部认为，人类有机体的内部存在着某种主动发展的趋向，这种趋向从内部促使其发展，直至本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这种“权力意志”，“自我表现”，“自我支配”或“个性自由”，犹如它的别的名称

一样，并没有普通意义上的那种进取或竞争力的含义；它是作为一个人以自己的权力对自己的存在和潜力的个人肯定；它是"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勇气。"此外，他们中有许多思想家对心理健康的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正常状态和变态的概念。正常状态被认为是"我们所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其前提是只有当这个人使自己得到充实和满足、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目的时，他才是愉快的，自我认可的，健康的和坦然的。

这种新的心理学思维寻求的是说明什么东西使人成其为人，从那种破坏人满足自己意愿的能力方面来确定精神神经病。在这种思维中，有意义的时间概念是将来。对一个人来说，仅仅被他人所爱、所接受，并且"适应"自己的文化环境是不够的。他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存在，对生活以及对将来承担自己的责任；不满足自己的全部意愿就会失去自己的存在。

长期以来，精神病医生都是采取使患者适应某种文化环境的方式来竭力"治疗"他们的内心冲突。但是根据新的心理学思想家的观点，那种并不允许实现自己全部意愿的文化适应方式，根本不是良方。

> 于是，患者不经过任何冲突就接受了一个有限的世界，因为现在，他的世界与那种文化环境是一致的。既然焦虑只是随着自由而产生的，那么，这个患者就会自然而然地摆脱自己的焦虑：他从自己的病痛中得到了解脱，因为他放弃了引起自己焦虑的可能性……这样就肯定存在着一个问题：这种以放弃自己的方式从冲突中

得到的解脱，这种不会在个人或群体中导致沉沦的绝望，导致以后将爆发为自我毁灭的愤慨的解脱究竟能持续多久？因为历史已经反复宣称，人类需要自由的意愿迟早都会爆发出来。①

这些思想家或许还不知道，他们是多么精确地描述了这种已经加害于美国家庭主妇的适应方式。我认为，他们所描述的那种在男人身上难以察觉的自我毁灭，在女人身上也具有同样的破坏力。这些女人强迫自己去适应女性奥秘的需求；她们期望过精神寄托式的生活，通过丈夫和孩子达到自己的生活目的；她们只是想能受到别人爱护、保护、被别人所接受，从来不对社会以及将来承担自己的责任，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人类潜力。那些已经适应了的，或心安理得的主妇们则生活在小家庭的狭窄天地里，没有内心冲突或焦虑，她们已经失去了自己，而其他的，那些受到折磨，遭到挫折的人，还有一线希望。因为这种无名的难题，这种使今天如此众多的美国妇女深受其害的难题，正是由于去适应了一种形象而引起的，这种形象并不允许她们达到自己所能够达到的生活目标。它是妇女们日益增长的绝望的根源，她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存在，尽管她们这样做也许会逃避那种总是随着人身自由而产生的孤立和恐惧感。

焦虑总是在某种显露的潜力或可能性面对个人时，即有可能使自己的存在得到充实时产生出来；然而这种

① 罗洛·梅著，"存在性心理疗法的贡献"，载《存在，精神病学及心理学的新尺度》，第87页。——原注

可能性包含着对目前有保障的生活的破坏力，因而这种生活总是对这种新的潜力予以否认。①

这种新观点不仅仅是存在主义者的一家之言。它不会把一个人由于拒不接受存在于自身的智力与精神上的可能性而产生的罪过感分析得“面目全非”。并不是所有的人类罪过感都是无稽之谈 —— 谋杀罪就不会被分析得面目全非，自杀也不会。正如有人谈到一个人时说，“这个病人是有罪的，因为他封锁了自己主要的潜力。”②

不能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全部可能性这个现象，还没有被作为妇女的一种病态来进行研究。因为在美国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这被认为是正常的女性适应现象。但是，人们可以把神经病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真知灼见运用到成千上万的适应了家庭主妇角色的妇女中，因为这些专家研究过大脑被打掉一部分的男性患者以及精神分裂病患者，这些人由于其它的原因，已经丧失了与真实世界联系的能力。我们可以看出，这类病人现在失去了人类所独具的标志：超越现在并依照可能行事的能力，以及对将来进行规划的神秘能力。③

十分清楚，这种独特的人类能力，即超越现在，面对未来，有目的地生活的能力——不是靠世界的怜悯来生活，而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个建设者，一个设计者来生活——正是动物与人类行为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是人类与机器的区别。库尔特·戈德斯坦博士在他对脑损伤的士兵的研究中发

① 前引书，第52页。——原注
② 前引书，第53页。——原注
③ 参见前引书，第59页及其诸后页。——原注

现，这些士兵所失去的正好是抽象的人类思维能力——依据"可能"进行思考，有办法从具体细节的混乱中理出头绪，根据某一目的采取行动。这些人被束缚在自己身处的现时环境中；他们的时空感完全没有了；他们已失去了人的自由。

大致相同的日常生活使一个抑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世界日益萎缩。对他来说，"每一天都是一个孤立的岛屿，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当这类病人产生一种令人恐怖的幻觉，认为他的死已经临头，那是"他自己错误地看待未来的结果，而不是其起因。"

> 没有立足于现实，面向未来，跨越平淡乏味、大致相同的日常生活的行为或愿望。结果，每一天都保持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独立性；难以进入任何一种生活是连续感受之中，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重新开始，就像流水光阴这个灰色海洋中的一个孤岛……似乎已没有向前发展的愿望；每一天都是同样的讲说，同样的抱怨，令人烦恼地千篇一律，直到这个人感到生活已失去了所有必要的连续感……他的注意力难以持久，他似乎没有能力超越那些最平常的问题。①

许多心理学家在最近的实验中揭示，绵羊能够把过去和将来联系在当前的情形中，其能力能短暂地持续约15分钟，狗的这种能力能持续半个钟头，而人类能够把过去几千年以前的事作为当前个人行动的指南，并且能在想象中为自己步

① 明克威斯克著，"精神分裂抑郁病例的发现，"载《存在：精神病学及心理学的新尺度》，第132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入未来作出规划，人类的这种能力不仅能持续半个钟头，而且能持续几个星期乃至几年。这种“超越目前时间界限”，反应及再反应，以及看到自己在过去和未来范围内的经验的能力，是人类存在的独有特性。①大脑受到损伤的士兵由此注定会进入永恒的“日复一日”的非人地狱之中。

这些家庭主妇们对那种无名的难题的缠扰充满了恐惧，她们就是这种同样的死气沉沉的“日复一日”的牺牲品。正如一个家庭主妇告诉我的那样，“我能对付真正的难题，但是就是这种没完没了的厌烦日子使我感到绝望。”遵照女性奥秘法则生活的家庭主妇没有面对未来的个人生活目的。然而没有这种能够唤起她们全部能力的生活目的，她们便难以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没有这种目的，她们就会失去自己是谁的感觉，因为正是这一目的才赋予人类模式以生活的意义。②

美国家庭主妇的大脑并没有被打掉，她们也不是有临床意义的精神分裂患者。但是，如果这种新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如果最基本的人类动力不是为了生物需求的欢快或满足的推动力，而是为了发展并实现自己全部潜力的需求的话，那么，她们舒适的、空虚的、毫无目的可言的日常生活就确实是导致那种难以名状的恐惧的原因。她们以女性为理由，从可以赋予她们以个人的生活目的、自我感的选择面前退缩了。正如存在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人类生活的价值从来就不会从天而降。“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失去自己的存在，

① 莫勒著，“论综合学习中时间作为决定性因素”，载《学习理论与个性动力》，纽约1950年版。——原注

② 参见明克威斯克著，前引书，第133—138页。——原注

而一棵树或一个石头就不能办到。”①

无庸置疑，妇女拥有全部的人类潜力一说与早期心理学理论家所唯一肯定的妇女的性潜力相比，具有同样的真实性，如果阻止她们实现自己真正的的本能需求，她们就会呈现起病态。不仅性欲需求等受到压抑会产生这种情况，而且个人能力难以施展也终究会导致精神神经病。她的焦虑和苦闷能够通过治疗得到缓解，或通过药物得到镇定，或者埋头于繁忙的工作以得到暂时的逃避。然而她的忧虑、她的绝望仍然是一种不祥之兆，说明她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岌岌可危了，即使她已经根据女性奥秘的法则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满足也无济于事。

直到最近我们才逐步接受这一事实，即人类本身（因而也在女性身上）存在一种进化阶段或层次需求，其范围包括从通常称为本能需求（因为这与动物需求属同一含义），到后阶段出现在人类发展中的需求。后阶段出现的这种需求，这种对于知识，对于实现自我，使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需求，从人的意义上来讲，与动物对于食物、性、生存的需求一样，同是出于本能。这种后阶段需求清晰的显露似乎要以前一阶段生理需求的满足为基础。一个饿得奄奄一息的人除了食物不会对其它任何东西感兴趣。这时，对无助于满足饥饿的能力就会暂时不搭理，“但是当有大量的食物，人的肚子被适时填饱的时候，人的愿望又会怎么样呢？此时其它的（更高层次的）需求就会即刻出现，而且这些需求取代了生理上的饥饿，控制了整个有机体。”②

① 罗洛·梅著，《存在性心理疗法的贡献》，第31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② 马斯洛著，《动力与个性》，第83页。——原注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逐步发展的需求层次会离依赖物质环境的生理水平越来越远，朝着相对独立于这种环境的水平发展，越来越具有自主的性质。但是，一个人可以被固定在一种较低的需求层次上；较高层次的需求可能被搅乱或引导到老路上去，并有可能永远不会显露出来。最终会很容易就导致人类向最高级水平的发展受阻——被较低需求，如食欲或性欲等剥夺而受阻；也由于所有的存在都被引导到这些较低的需求上，从而拒不承认有较高需求而受阻。

在我们的文化中，妇女的发展已经被阻止在生理的水平上，在很多情况下，对她们来说，除了爱和性满足的需求之外，没有任何高层次的需求。甚至连自尊、自重以及受到他人尊重的需求——“对于力量，取得成就，对于胜任，精通和竞争，对于面对这个世界的自信，对于自立和自由的愿望”——妇女的这种需求还没有被清醒地认识到。但是可以肯定，自我尊重的需求受到了阻止在男人身上会产生一种自卑感、虚弱感以及无能为力感，在妇女身上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妇女的自重就像男人的一样，只能基于真正的能力、竞争力和成就之上；只能是他人对自己理所应当的尊重，而不是虚假的奉承。不管如何美化“职业：家庭主妇”，只要这种职业不要求，或不允许妇女实现自己的抱负，那它就谈不上有什么自我尊重，更不用说为充分施展自己才能的较高水平铺平道路。

我们正经历着这样一个时期，大量高层次的人类需求被降为或被视为是从性需求中而产生的象征。许多深邃的思想家现在极其严肃地对这类“降低高层次需求的解释”提出了质疑。虽然，每一种性的象征意义以及情感变态都能被怀此

宗旨，探究莎士比亚、达·芬奇、林肯、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或托尔斯泰一类人物的作品和早期生活的那些人所发现，然而这种"降低高层次需求"并不能对他们作品永恒的原因作出解释，也不能对他们所独具的创见，而不是遭受着类似变态折磨的人的创见作出解释。但是这种性的象征意义比性本身作为一种象征更容易见到。如果一个妇女对于个性、自尊，对于取得成就的需求，以及最后对于自己独具的个性表现的需求在我们的文化中得不到自己或别人的认可，那么，她就只有在唯一对她敞开的渠道中去寻求个性和自尊——性满足、男素的权利和地位以及物质占有。并且，这种追求的锁链就此拴住了她，把她阻止在较低层次的生活水平上，使她无法达到自己高层次的人类需求。

当然，对于这些高层次人类需求，病理学或动力学目前所知甚微——想要了解和理解的愿望，对知识、真理、以及智慧的探索，想要解决宇宙奥秘的欲望等——因为这些在传统上使用药品治疗疾病的诊所里是无关紧要的。与传统的精神神经病的病状比较起来，诸如弗洛伊德所观察到的那种性欲受到抑制所引起的症状，这类心理病理学是无关紧要的，轻微的，极易被忽视——或被视为正常现象。

但是，只要不在诊所或实验室里，人，即使面临最危险的境地，也总是追求知识和真理，这是一个已被历史所证实的事实。而且，最近对心理健康的人所做的研究已经表明，这种对于知识和真理的追求，这种对重大问题的关注，正是确定人类是否健康的特性之一。作为完善的人所应有的东西在有些人身上就缺乏，这些人从不委身于一种思想，从不对未知的世界大胆进行探求，从不努力进行男女有潜力进行的

创造活动。正如A·H·马斯洛所指出的那样：

> 能力喧嚷着要求启用，而只有很好地发挥这些能力的作用才能制止这种喧嚷。这就是说，能力也是需求。使用我们的能力不仅令人愉快，而且也是一种必要。未得到使用的能力或器官会变成一种病根，或萎缩下去，由此使人萎缩不振。①

但是美国的妇女并没有受到鼓励，或被期望去运用自己所有的才能。由于是女性的缘故，她们所得到的鼓励只是去逃避人的发展。

> 发展不仅使人有所收获，使人愉快，而且含着许多内在的痛苦，而且这种痛苦总会产生。每向前迈出一步都是陌生的一步，而且会想到可能的危险性。它也时常意味着放弃自己所熟悉的　幸福的、令人满意的境地。它时常意味着一种分离、一种脱离，伴随着必然的留恋、孤独和感伤。它也时常意味着放弃一种更为单纯、轻松顺心的生活，而去面对更为紧迫、更为困难的生活。向前发展是不计较这些得失的，因此在个人身上，需要的是勇气和力量，从外界则需得到保障、许可和鼓励，对孩子尤其应当这样。②

① 马斯洛著，"整体动力心理学的一些基本命题"（一篇未发表的论文，布兰德斯大学）。——原注

② 同前注。——原注

假如外界环境并不赞成那种勇气和力量——有时实际上是对其加以禁止，对于女孩子就根本不鼓励这种发展，假如是这样，会有什么结果呢？假如人的发展被认为是与女性水火不相容，是对一个女人的完善，对女人的性欲的对抗，那么，会有什么结果呢？女性奥秘在“成为一个女人”与甘冒人的发展的痛苦的风险这两者之间暗含着一种选择。成千上万的妇女，被她们的外界环境、生活圈子降为生物性生存的妇女，在她们惬意的集中营中被哄骗而产生了虚假的安全感的妇女，已经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这种选择所具有的讽刺意味是：女性奥秘所坚持的，引以为炫耀的“女性完善”不过是作一名妻子和母亲。然而成千上万的郊区家庭主妇并没有发展那种可以炫耀的东西，这不是偶然的。简单的事实似乎是，妇女在被允许以及得到鼓励来作为一个人去发展自己的全部力量之前，是不会体验到性别完善和人类爱恋的最高感受的。因为，根据新的心理学理论家的观点，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非但不会阻止最大的性别完善，相反，还会对性别完善有促进作用。并且还有一种超越理论的因素使人相信，这不仅对男人来说是如此，对女人来说，亦是如此。

30年代后期，马斯洛教授开始研究性行为与他所称为的妇女“优势情感”或“自我尊重”，或“自我水平”之间的关系——他研究了130名妇女，她们都是受了大学教育或有相同智力水平，20至28岁之间的年青妇女，她们大多数是已婚妇女，其背景是城市清教中产阶级。①他发现，其结果与

① 马斯洛著，“优势、个性及社会行为”，载《社会心理学期刊》1939年第10卷，第3—39页，“妇女的优势情感与性行为，”载《社会心理学期刊》1942年第16卷，第259—294页。——原注

人们从精神分析理论和传统女性形象中可能预料的相反——这个女人越是“突出”，她的性快感就越大——她在心理上“接受”的能力就越大，她使自己自由地爱恋，享有快感的能力就越大。并不是这些表现“突出”的妇女就“更有性欲”，而重要的是，她们本人更加完善，自我表现得更加自由——这就似乎与爱恋的更大自由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妇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女性”，但是她们比受到同样研究的传统妇女享受性满足的程度高得多。

我从未在通俗心理学著作对于女性或妇女性行为展开的讨论中看到这种研究的含意。当时这个研究或许并没有引起注意，甚至连理论家们也没有把它视为非同一般的专题研究。但是这一研究结果对今天依据女性奥秘旨意而生活的美国妇女来说，是颇有启发的。请记住，这一研究是在30年代后期进行的，是在女性奥秘成气候之前就进行了的。对于这些强悍的，精力充沛的，受过教育的妇女来说，很明显，在她们成为自己与爱的动力之间并不存在对抗。下面看看马斯洛教授如何把这些妇女与她们更加“女性化”的姐妹们加以对比的——从她们本人以及从她们性行为方面来加以对比：

高层次优势情感包括较强的的自信、自足、对自我含高度评价、良好的普通能力感或优越感，这种情感没有那种畏缩、羞怯忸怩或窘迫的成分。而低层次优势情感则缺乏自信，自足和自尊；存在着既笼统又具体的普遍的自卑、畏缩、羞怯、恐惧、谨慎感，……一个认为本人完全缺乏自己有可能称为“普遍自信”的人，就会把她自己描述成在其它方面自信的人：在自己的家里煮饭、

缝纫或作母亲，……然而这种人几乎总是对自己具体的能力和天资过分低估；而高层次优势情感的人则通常准确、实际地对自己的能力做出评估。①

这些高层次优势型妇女并不是传统意识上的“女性”.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她们感到可以自由地进行选择，而不受传统意识的束缚，部分是因为她们作为个人来说比大多数妇女都要坚强一些。

这些妇女宁愿“像一个人，而不愿像一个女人”那样受到对待。她们宁可自食其力，也不依赖别人，她们普遍不喜欢迁就退让，这种迁就意味着自己是自卑的，虚弱的，或者不能照顾自己，需要特殊的关照。这不是说她们不能按照传统的标准做人。当其确有必要或出于某种理由希望如此的时候，她们也会按照传统的标准来行事，不过，她们不会对一般的常规小题大做。有句常说的名言“我能够同他人一样漂亮、温柔、对男人百依百顺、但舌头是长在我自己嘴里的。”……传统标准本身通常对这些妇女不起任何作用。只有当她们自己赞成这些标准，能够看见并对这些标准本身的目的感到满意的时候，才有可能服从它。……她们性格坚强，有生活目的，并且确实遵照一定的标准在生活，但是这些标准是自发的，个人得出的。……

而低层次优势性妇女就显然不同。她们……一般不

① 马斯洛著，“优势，个性及社会行为”，前引杂志，第8—11页。——原注

敢打破常规，即使当她们（极少有这种情况）不赞成这些标准规范时也不敢。……她们家的道德伦理标准，一般说来，完全是传统的。就是说，她们是根据自己的父母、老师或自己的宗教信仰的教诲来做人。对权威的意见，她们通常不能公开地提出质疑，她们更易于接受生活、宗教、经济、教育以及政治每一个方面的现状。

马斯洛教授发现，一个妇女身上的优势情感越高，自我力量越大，她的自私心就越少，而且她对其他人以及外界的问题就考虑得越多。另一方面，更带有传统女性特点的低层次优势妇女的主要注意力都是围绕她们自己以及自己的自卑感，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一个高层次优势型妇女更像一个高层次优势型男人，而不像低层次优势型妇女。因而，马斯洛教授建议，或许把高层次优势型男人和女人都描述为“有男子气的”，或把“男子气”和“女性”术语都抛在一边，因为他们是如此地“令人困惑不解”。

这些高层次优势型妇女总的来说在鉴别力、看法、偏爱、能力、哲学以及精神境界几个方面都与男人，而不是与女人，更加类似，……在我们的文化中被认为是“男子气”的许多素质都在她们身上得到高度反映，例如：领导才能、坚强的性格、很强的社会意向、不屑于琐事的缠绕，没有恐惧感、畏缩感等等。她们大抵不愿意做一名家庭妇女或厨师就算了结，而是希望将婚姻和

① 前引杂志，第13页其后诸页。——原注

事业结合起来。……她们的工资兴许还没有女管家的高，但她们感到其它的工作要比缝纫、做饭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更为重要。①

最重要的是“高层次优势型妇女在心理上更加自由——更加自主。而低层次优势性妇女在自我方面则受到了束缚，受到了习俗的牵制。她越是自我轻视，自我猜疑，她就越容易感到别人的观点比她自己的更为正确，她就越希望自己像其他的人。通常这类妇女“尊敬，羡慕别人”的程度远远大于自尊的程度，她们先是对“权威无比崇敬，”对他人顶礼膜拜和竭力仿效，完全“自愿地附属他人”，对他人处处尊重，尔后就会走向“仇视、愤懑、妒忌、猜疑以及不信任。”

有些场合，高层次优势型妇女不受拘束地表示愤慨，而低层次优势型妇女则“在必要的时候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把自己所想到的讲出来，把自己的愤怒显露出来。”因而，她们那种“女性”的沉静不过是“畏缩，自卑和一种总的感觉，即自己所说的任何事都可能是愚蠢、乏味的，都可能留下笑柄的伴随物。”这样的女人“除了在她的幻觉之中以外，绝不想成为出面人物，因为她害怕出众，害怕承担责任，并且总觉得自己是无能的。”

马斯洛教授在自我力量和性行为之间，在成为自我的自由与“顺从”的自由之间，再一次发现了一种显而易见的联系。他发现，那些“胆小、羞怯、淑静、整洁、得体、沉静、内向、谦让、更女性化、更传统”的妇女更难领略到高层次

① 前引杂志，第180页。——原注

优势性，自尊的妇女所自由享有的性满足。

> 几乎所提到的每一次性冲动或性欲都可能在这些妇女身上自由自在地显露出来，没有受到压抑。……一般说来，这种性行为的发生不会使人感到担惊受怕，它不是作为一种正经的仪式来进行的，它与其它所有的行为有本质的差异，它是作为一种欢乐、一种嬉戏、一种高度欢快的动物行为来进行的。①

此外，马斯洛还发现，优势情感高于平均水平的妇女即便是在梦境和幻觉之中，也领悟到了性欲的畅快，而那些低层次优势型妇女连有性欲的梦幻也总是“充满浪漫色彩的或者是担惊受怕的，不正常的，象征性的，隐匿的。”

当女性奥秘的制订者把个人在社会上对成就和行为的消极与放弃确定为女性性完善的代价时，他们是否是忽略了这些强悍的、领略到性快感的妇女呢？或许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们在创立消极女性形象时，并没有在他们的诊所里看到这类妇女。或许马斯洛在他研究的事例所发现的这种自我力量在妇女身上是一种新的现象。

女性奥秘在这之后的时代，甚至还阻碍了行为科学家探究妇女中性与自我的关系。但是，暂且不论妇女问题，最近几年中，行为科学家们对把人性的形象置于研究病态或发育不全的人（诊所里的病人）的基础上已深感不安。在这种情况下，马斯洛教授后来开始研究人，死的和活着的人，研究

① 马斯洛著，《妇女自尊情感与性行为》，第288页。——原注

那些没有精神神经病、精神错乱或心理变态特征的人，研究那些，在他看来，有明确迹象的人，他们要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或“充分实现自己的抱负”，即马斯洛确定为“天资、能力、潜力的充分使用和利用。这种人似乎正在使自己得到充实，正在竭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他们是发展了的或正在发展成为自己所能达到的人。”①

有许多情况从这一研究中涌现出来，这些情况都直接与今天的美国妇女问题有关系。一方面，马斯洛教授在他研究的知名人士中，只发现了两名妇女充分发挥了自己潜在的能力：罗斯福夫人与简·亚当斯②。（男人包括林肯、杰斐逊、爱因斯坦、弗洛伊德、G·W·卡弗德布斯、施威策、克莱斯勒、歌德、索罗、威廉·詹姆斯、斯宾诺莎、惠特曼、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贝多芬③），另一方面，除了知名人士和历史人物以外，马氏还就近研究了一些符合他标准的不知名的人物——都是50和60多岁的人。另外，他还筛选了3000名大学生，但是他从中只发现了20多个似乎是朝着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方向发展的人；妇女人数在这里同样是寥寥无几。事实上，他的研究结果意味着，在我们的社会中，妇女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或者说要完全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潜力，几乎是不可能的。

①马斯洛著，《动力与个性》，第200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②简·亚当斯（1860—1935），美国社会改良家及和平主义者。1931年与N·W·巴特勒共获诺贝尔和平奖。——译注

③以上人物依次为：美国第16任总统；美国第3任总统；美国物理学家；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美国农业化学家和实验家；美国劳工组织者；德国神学家、哲学家；奥地利小提琴家；德国作家；美国作家；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实用主义创始人；荷兰哲学家；美国诗人；美国第32任总统；德国大作曲家。——译注

马斯洛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发现，那些要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人们无一例外地都有一种社会责任感，一种生活的使命感，这使他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广阔的人类世界之中，生活在一种超越利己主义及日常琐事缠绕的参照系之中。

> 这些人向来都有某种生活的使命，某种需要履行的任务，某种超越他们本人、需要大量精力的问题——总的来说，这些任务都不是属于个人的，或者说是没有私心的，它主要与整个人类的完善有关，或与整个民族有关。……他们大都关心着基本的争端与永恒的问题。他们习惯于生活在最广阔的参照系之中。……他们在生活理想的结构中工作，这种理想的价值是广阔的，而不是渺小的，是全方位的，而不是狭隘的，是从一个世纪来加以考虑，而不是从一时出发。……①

不仅如此，马斯洛教授还发现，那些尽力发挥自己才能的人是生活在一个广阔的世界里，因而乐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从不对此感到泄气，而这种事情对另一些人来说，就可能成为一种难以忍受的烦恼，因为他们本人就是自己唯一的世界。这些尽力发挥自己才能的人“……拥有一种奇特的能力来一再欣赏基本的生活用品，对其充满了新鲜、质朴和敬畏感，充满了愉快与好奇，甚至到了入迷的地步，尽管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种感受显得十分陈腐。”②

① 前引书，第211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② 前引书，第214页。——原注

他还报道了，“在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人身上可以发现性欢快以最热切，最令人消魂的完美方式出现，这一印象非常强烈。”这好像是个人的能力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施展开拓了一条新的性兴奋的通道。然而性，或甚至是爱，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动力。

> 在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人们身上，高潮快感比一般人显得更为重要而同时又显得不那么重要。它常常是一种深切的，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感受，而这些人对于没有性行为的生活也更容易忍受。……高层次需求的爱使得低层次需求以及她们的失意和满足显得不那么重要，那么主要，使其更容易被抛在一边。但是，当她们得到满足时，也会更加心醉神迷。……食物就受到青睐，但相对来说，它在整个生活的安排中同时又被认为是不重要的。……性能得到整个心身的享受，其程度远远越出一般人的水平，甚至在性并没有在整个人生观中起到中心作用的时候也是如此。它应当受到享受，理所当然地被享受，它是可以指靠的，就像水和食物一样有着最基本的重要性，而且能够像这些东西一样得到同样程度的享受，但是，应当理所当然地得到满足。①

对于这些人来说，性快感并非一种“不可思议的感受”。它也可能是轻松愉快的，会带来“乐趣、欢乐、兴奋、安宁、轻松，……它具有快活，诙谐，嬉戏的特性——并不是

① 前引书，第242页及其诸后页。——原注

一种力图达到的东西，而主要是一种享受和乐趣。”马斯洛还发现，在那些尽力实现自己抱负的人们身上，爱恋与性满足的性质随着关系的时间的增加而得到改善，这与传统的观点和晦涩的性理论大有出入。(“从这些人身上已得出一个非常一般的结论，性较之以前已有所改善，而且像是一直在改善。”)因为，随着年月的流逝，这种人由于变得越来越像他自己，对自己越来越真实，他好像也与他人有了更深切，更深沉的关系，也能与人更加融合，产生出更大的爱，更完美地与之一致，对自我的界限更能超越，而与此同时又不放弃自己的个性。

> 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杰出的爱恋能力的融合，而与此同时既对他人也对自己极其敬重——在整个最热切最兴奋的情爱之中，这些人仍保持了她们自己，也完全保持了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根据自己的标准生活着，即使相互心醉神迷的时候也是如此。①

在我们的社会中，爱的定义通常为一种完全的自我消失和个体的丧失——是“合二为一”，是对个性的放弃而不是对之加强，至少这一定义对妇女来说是如此。但是在充分发展自己能力的人们身上，马斯洛发现，个性在他们的爱恋之中反而得到了加强。“一方面自我大体上消失了，但在另一方面，自我还像以往一样保持着独立性和坚强性。超越自我个性与磨炼、加强这种个性的两种倾向，必然会以和谐而非对

①前引书，第257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抗的方式被世人所见。”

在充分发展自己能力的人们的爱恋中，马氏还发现了一种倾向，即具有越来彻底的自发性，不再洁身自好，而且益亲昵坦诚，更富于自我表现。这些人感到保持自我，心情自然，是完全可能的；他们能够在心理上（以及在体质上）裸露自己，而且仍然感到自己被他人所爱，所需要，感到安然；他们能够把自己的缺点、弱点、体质上和心理上的短处随意袒露出来。他们并不总是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把自己的缺点、短处、衰愁隐藏起来；他们并不需要频繁地对他们之间的关系“下功夫”；他们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神秘和魔力，那么多的缄然隐情和隐私。这些人在性别之间似乎不存在敌意。事实上，马氏发现这些人“并没有在两性角色和人格之间划分什么真正的差异。”

> 那就是说，她们并不认为女性就是被动的，而男性就是主动的，不管是在性行为，爱情或其它任何方面都不是这样。这些人都对她们的男人气质感觉良好，因而对于采纳某些异性作用的文化观并不介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在爱恋方面既可主动也可被动，这在性行为和爱抚当中最清楚不过了。亲吻和被亲吻，在性交中位于上或下，采取主动，保持沉静以及接受爱抚，挑逗和被挑逗——这一切在两性中都已发现。①

因此，在传统的，甚至世故的观点看来，男性和女性的

① 前引书，第245页。——原注

爱恋，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似乎处在相反的两个极端，而在尽力发展自己能力的人们身上，“对立的双方合二为一，个体变得既主动又被动，既利己又利他，既有男性气魂又有女性气质，既自私又谦让。”

对于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人们来说，爱的定义与传统的定义在另一方面也有所不同，它不是由于需求而产生的，不是补充自我的空虚，而是一种更纯洁的“赠”爱，一种“自发的倾慕”。①

这种无私的倾慕与爱恋过去常被认为是一种超乎常人的能力，而不是一种自然的人类能力。但是，如同马斯洛所说，“当人处于最佳精神状态，得到了充分发展的时候，就会显示出许多特性，这些特性是人们在早些时期认为超自然的天赋能力才具有的。”

在“充分发展”这个词组中存在着解开那种奥妙的无名问题的线索。在性快感之中的超越自我犹如在创造性的感受中一样，只能被那些保持了自我的男女所完全获得，被那些认识到了他或她自身个性的人所获得。理论家们懂得，这对于男性来说确实如此，尽管他们从未透过其中的内涵为妇女考虑过。郊区的医生们、妇科大夫、产科医生、儿童保健门诊医师、儿科专家、婚姻顾问以及牧师，所有那些处理过妇女问题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并没有为其安上一个名称，甚至也没有把它作为一种现象公之于世。他们所观察到的情况进一步证实，对于妇女，如同对于男人一样，自我完善——自主、本人才能的充分发挥、自立、保持个性、充分实现自己的

②前引书，第745页。——原注

抱负——与性需求同等重要，当其受到阻碍时，后果同样不堪设想。在这种意义上，妇女性的问题是她作为一个人来发展、满足自己潜力的基本需求受到抑制的副产品，这种潜力正是鼓吹女性完善之奥秘的人所视而不见的。

当妇女否定了自己的性的活力时，她的智力并没有完全得到发展，精神分析家长期以来对此已有所觉察。那么，反过来，当这个妇女必须否定自己的智力，否定自己最高的人类潜力时，她的性活力能否充分地得到发展呢？成篇累牍的文章、书籍批评美国妇女阉割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控制了她们的孩子，对物质太贪婪，性冷淡或不像女人……，所有这些批评都可能简单地遮掩了这个潜在的事实：妇女和男人一样，不可能单靠性的活力生活；她为证实自己，为个人自由的奋斗——那种“基于为积极参加创造性工作的人类需求的个人创造倾向”——是与她的性满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是作为自己成熟的一个条件。根据女性奥秘的形象，为了达到单靠性的活力生活下去，她最终只有“阉割”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因为他们从未能够让她填补自我的空虚以得到满足并且她只有把自己难言的失望，自我否定的情绪以及不满传给自己的女儿。

马斯洛教授告诉我，他认为，如果一个人能通过其他人来发展自己——就是说，如果这个妇女能通过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认识到自己的潜在能力的话，那么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是今天的美国妇女唯一可行的方式。但他又说，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否可能。

新一代研究自我的男性理论家们，通常都回避了妇女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问题。这是由于他们本人就被女性的奥秘

搞得昏头昏脑，所以他们以为肯定有某种奇特的男女“差异”，这种差异允许一个妇女通过在精神上依赖丈夫和孩子来发现充分发挥主人才能的途径，而男人们则必须依靠自己来发展。甚至最有成就的心理学理论家至今都难于看到：妇女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作为一个人的发展需求与男人的比较起来并没有什么差异。大多数关于妇女以及女性奥秘的传统理论都是依据这种“差异”。然而，对这一“差异”实际上的依据则来自于这一事实，即对于妇女来说，真正地充分发挥主人才能的可能性过去不曾存在。

许多心理学家，其中包括弗洛伊德，都犯了这样的错误，他们的假定是从观察那些没有受到教育以及没有享有在社会中充分发挥自己作用的自由的妇女中得出的，因此他们认为妇女的根本特性就是消极被动、因袭古板、依赖他人、畏缩、幼稚——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以自己的文化和特定的时期作为人性的形象依据，从而也犯了假定的错误，照他看来，就因为一个人是奴隶，那么这就是此人的根本特性，因而“最好是让他当奴隶。”

虽然教育、自由、为伟大的人类尚待开发的领域尽力的权力——所有这些男人已经从中认识到了自己的道路——都对妇女敞开了，只有那种祀奉于女性完善的奥秘所投下的昔日的阴影却在使妇女难以找到自己的道路。女性奥秘许诺的女性满足是通过对自我的抛弃来实现的。大量的统计材料却证实，美国妇女在社会中证实自己的通道敞开之后，妇女性满足的能力有了真正的、引人注目的提高，从而达到情欲高潮。在女权运动者赢得妇女“解放”到女性奥秘在性问题上逆历史而动的这些年月里，美国妇女领略了数十年的性快

感。并且最重要的是，那些充分领略这一快感的妇女，是那些在通往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人，是那些受到教育去积极加入到家庭之外的世界之中的人。

这种根据是在两项著名研究中发现的，这些研究结果很少像我这样引证。第一项为金西的调查报告，这一报告是在走访5940名妇女的基础上写成的，这些妇女在20世纪不同的年代中成长起来，其间妇女解放赢得了胜利，而女性奥秘的时代还没到来。即使根据金西的性满足衡量标准，即用“高潮”来衡量（对此，许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都提出了非难，批评这种狭隘的、机械的、对生理需求过份强调以及无视基本的心理差异的衡量标准。），他的研究也表明了性满足的增长在这几十年中确实引人注目。这种增长始于1900年至1909年出生的一代人中，她们走向成熟并成家立业是在20年代——女权运动的时代。这个时代赢得了选举权，极度重视妇女权力、自主、职业和男女平等，其中也包括性满足的权力。妻子们达到高潮快感的增长与性冷淡妇女的减少持续到这以后的每一代人身上，直到全面调查的最年轻的一代人身上，这些人是在40年代结的婚。①

“解放”得最彻底的妇女，受过大学以上的职业教育的妇女比其他的妇女更有可能尽情地领略性欢快，领略充分的性交高潮，这与女性奥秘所言恰好相反。根据金西调查的人物谈话，妇女受到的教育越多，就越有可能经常地享受性快感，并且性冷淡的出现也就越少。与那些只有小学或中学程度的人比较起来，那些完成了大学学业的妇女，还有那些受

① 参见金西等著，《女性的性行为》，第356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到大学教育以上并受到高级职业训练的妇女所领略的极大的性快感在婚后第1年就显示出来，并持续到婚后第5年，第10年，第15个年头。虽然金西在10名妇女中只发现了1名从未体验到性快感，但他所走访的大多数妇女并没有完全体验过，并没有一直或差不多一直都能体验到——只有那些受到大学以上教育的妇女是例外。金西所调查的人还表明，那些在20岁以前就结了婚的妇女最难体验到性快感，在婚床或外遇之中也很少能感受到，尽管她们比那些上完大学或研究院的妇女开始性生活的时间要早五六年。

虽然全面的调查数据表明，这些年来“与只受到小学和中学教育的女性比较，受到更好教育的妇女在婚后性生活中实际上更频繁地获得了高潮快感，她们中获得这种感受的比例明显要高一些，”可是，有增无减的性感享受在妇女生活中，就大部分妇女而言，并不意味着它的影响程度增加了。总的来说，有一种不易察觉的，朝相反方面发展的倾向，并且私通的增长在受过专业训练的妇女中也不那么明显。①

或许，某些所谓想象中的“非女性”力量或受到专业训练的妇女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使她们在婚后的生活中能比其他妇女享受到更大的性快感——以高潮快感来衡量的话——因而也更少去寻求外遇以获得这种感受。或者，她们可能更没有必要在性生活中去寻求地位、成就或自我。金西的研究结果所表明的妇女性满足与充分发挥自己才能之间的关系，已被事实所加强。这种事实是，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

---

① 前引书 第355页，——原注

的那样，金西的调查抽样对象是那些从事专门职业的妇女、高等学府的毕业生以及有着非一般高层次“优势”情感或自我力量的妇女超典型。这一抽样没有充分代表“典型的”，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丈夫、家庭和孩子的美国家庭主妇；没有充分代表很少受到教育的妇女；由于是采取自愿，因而这一抽样也没有充分代表消极、顺从、因袭旧习、古板的妇女，这些人都是马斯洛所发现的那种难以享受性快感的女性。①对于金西在妇女解放运动之后的几十年中所发现的性满足的增长与性冷淡的下降这一些状况，“一般的”美国家庭主妇可能并没有少数通过受教育和参加专业工作所直接体验到解放的妇女所感到的那么深切。不过，性冷淡的下降在大约6000名妇女的大抽样中，即使还没有充分的代表性，也足够引人注目，就连批评金西的人们也觉得这是有意义的。

妇女性满足是伴随着妇女越来越能平等地享受到权力，受到教育，参加工作以及对美国社会作出决定而增长的，这不是偶然的。与此暗合的美国男性的性解放——从性交中揭去了蔑视、堕落的面纱——无疑与美国男性对女性新的态度不无关系。他们看到了，美国妇女同他们自己一样是一个人，并不只是一种性对象。显然，妇女顺着这个方向发展得越远，性就越是成为一种人类的交往，而不是对男人的一种肮脏的把戏，妇女也就越能热爱男性，对他们的性欲就不是怀着一种消极的厌恶去顺从。事实上，如果妇女没有解放，没有获

① 参见兰迪斯著，“金西所研究的妇女”，辛普森著，“关于妇女的胡言”及马斯洛与萨科达著，“金西调查中由自愿者引起的谬误”，载《美国社会的性行为》。——原注

得人类的平等性，女性奥秘本身——即使它承认妇女在性行为中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同意妇女主动地欣然从事对男性的欢娱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假定——是不会奏效的。正如早期的女权运动者所预言的那样，妇女的权力对于男人和女人两者来说，确实促进了更大的性满足。

其它的研究也表明了，教育和自立提高了美国妇女与男性享有性关系的能力，并因此更加证实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所拥有的性本质。金西之前与之后相类似的研究报告还揭示了受到大学教育的妇女的离婚率比平均离婚率低得多。更具体地说，欧内斯特·W·伯吉斯[①]与伦纳德·S·科特雷尔所进行的有分量的、著名的社会学研究表明，随着妇女就业预修的增加，她们婚姻幸福的机会也增加了——教师、专职护士、女医生以及女律师的婚姻方面的不幸较之其他任何妇女层都要少。这些妇女比那些有技能的办公室职员更能享受婚姻的幸福，而这些职员反过来又比那些婚前未工作的，或在职业上没有进取心的，或干着不顺自己心愿的工作的，或她们工作的训练及经历只是家庭式的或非技术的妇女来说，在婚姻上又要美满一些。事实上，妇女在结婚期间的收入越高，她们的婚姻就可能越美满。正如社会学家所说：

> 很明显，就妻子而论，她们在商业社会中取得成功的标志是以月收入来衡量的，这也是取得婚姻成功的标志，当然，这一特点大概是由于收入间接地衡量了受教育

① E·W·伯吉斯（1886—1966）美国社会学家。他对家庭性质问题的研究使他对婚姻稳定情况进行调查，并对婚姻的成败进行预报。其重要著作《社会学导论》（与人合作）指示了社会学的新方向，已成为经典著作。——译注

程度，因为教育培训的总量影响着收入。①

526对夫妇中，在女方是那些工作了7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大学学业或职业培训，而且是22岁以后结婚的10%的人"较不适应"婚姻；而受到大学以上教育的已婚妇女中，"较不适应"婚姻的人还不到5%。下表说明了已婚妇女婚姻状况与受教育程度的关系：

不同教育水平的婚姻适应人数比率（%）

已婚妇女	婚姻适应情况			
受教育水平	很不适应	较不适应	适应	完全适应
研究生	0.0	4.6	38.7	56.5
大学	9.2	18.9	22.9	48.9
中学	14.4	16.3	32.2	37.1
小学	33.3	25.9	25.9	14.8

人们或许从这种依据中已经预测到，那些受到女性奥秘的鼓励在20岁以前就结了婚，放弃高等教育，放弃工作，放弃自立以及为了女人的特性而放弃与男子平等权力的妇女，要获得美满婚姻，或获得性满足甚至快感高潮的机会，相对来说要少得多。而且事实上，金西对最年轻的一批已婚妇女——即在1920年至1929年间出生的这一代人。她们在40年代正赶上女性奥秘的风头，当时人们已开始返回家中——的研究已

① 伯吉斯与小科特雷尔，《婚姻潜在的成功或失败》，纽约1939年版，第217页。——原注

经表明，婚后第5年，自2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以来，一直是显而易见的婚后性生活日臻完美的倾向就开始急剧逆转。

> 妇女在婚后第5年一直或几乎一直能在性生活中享受高潮快感的百分比，已从1900年以前出生的那一代的37%上升到这以后20年中出生的那一代的42%。而金西所研究的最年轻的这一批人婚后第5年是40年代后期，她们享受性快感的比例甚至比1900年以前出生的妇女还要少（只有36%）。①

一项新的金西式的调查研究会不会发现，那些属于女性奥秘的产物的年青妻子较之她们更解放，更独立、受到更多教育、结婚时更成熟的前辈，享受到的性满足会更少呢？金西所调查的妇女尽管大部分都确实结了婚但只有14%是20岁结的婚；勉强过半数（53%）的妇女在25岁结的婚。这种情况与60年代的美国相比已有极大的差异，60年代中50%的妇女在10多岁就结婚了。

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海伦·多伊奇比起弗洛伊德有过之而无不及；她断定女性是受虐狂性被动人格，告诫妇女“外向型活动”和“男性特征”的理智有可能妨碍充分的女性快感。最近，她又认为对于妇女来说大概“高潮快感”也许强调得过了头，从而在一次精神分析会议上掀起了轩然大波。60年代，她突然对妇女必须享有，或能够享有一种真正的快感感到了怀疑，或许，所能期望的只是一种“渗出”性的满足。终

---

① 金西等著，《女性的性行为》，第403页。——原注

于，她有了一些纯粹是精神病的女患者，她们似乎享有快感；但是她现在所看到的大部分妇女似乎根本没有快感可言。

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此说来，妇女就不能体验到高潮快感了吗？或许在过于强调性满足的这一期间，是不是发生了某种阻碍妇女体验快感的情况？专家们对此意见不一。可是在其它，不牵涉妇女的场合下，精神分析学家们报道说，那些“心理上感到空虚”的消极的人们——那些没能“发展成完全的自我”，“对自我个性意识甚微”的人们——因为恐于自己的不存在而难以接受性快感的体验。① 被弗洛伊德式的“女人特性”的普及者们鼓吹到一种心疲力竭的性追求之中的许多妇女，实际上放弃了一切去追求美妙幻想中的性快感。至少也可以这样说，她们把自己相当的情感精力和需求都引向了性行为。正像有人谈到美国的一位大美人一样，她的形象在广告、电视、电影中频频出现，以至于你看到其人真面目时，就会大失所望。人们甚至还未探究到阴暗的无意识深处就大概会假定：对于美好的快感是要求得太多了，这不仅是为了满足过分渲染的要求，而且是为了使其与性中的强者、薪水上涨、露天夜晚的赏心悦目、提升到高级编辑或副教授具有同等的意义，更不必提这种基本的“个人体验”、个体意识了。② 正如一位心理治疗学家所报道的：

如此众多的妇女今天未能获得性感高潮的主要原因

① 凯密著，“快感中的肉体自我”，载《心理学分析季刊》，1952年第16卷，第153—166页。——原注

② 库比著，“金西报告的精神病学含意，”载《美国社会中的性行为》，第270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之一，就是她们过于奢求它的缘故，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假如她们未能达到意味深长的纵欲高度，她们就会深感羞愧不安以至于会悲剧性地损害自己的欲望。这就是说，这些妇女不去明确地集中对付手边的难题，而要转移到其它的问题上，即，“哦，我真是个白痴，真没用，连没有一点儿困难的满足都没有能耐得到。”今天的妇女在性生活中时常困扰于自己应当**如何**而不是应当做些**什么**的概念之中，这真是太不幸了。

假如性本身，犹如一位精神分析家所说的那样，正开始在美国出现一种“消沉”的特性的话，那或许是因为太多的美国人——尤其是妇女性寻求者们——把她们所有难以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需求都投入到了性的寻求之中。很简单，美国妇女正在遭受着一种没有自我的严重的性病。没有人曾经告诫过她们：性从来不能代替人本身；性本身也不能为妇女提供证实自我的东西，这对于男性是同样的；对于在性当中寻求自我的妇女来说，可能就根本没有性满足可言。

一个人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从而证实自己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哲学家、社会及心理学思想家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其理由是很充分的。其它时代的思想家曾经提出，人的定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根据他所做的工作来确定的。为了要吃，要过日子，要应付自己环境的生理需要，一个人所必须做的工作，支配着他的自我。在这种意义下，当工作被视为只是一种生存的方式时，人的自我就被生态学所支配了。

然而在今天，人的自我的问题已经改变了。因为确定一

个人在社会上的位置以及对自己的意识的工作也改变了这个人的世界。工作，以及知识的扩展已经削弱了人对于环境的依赖；他的生命现象与自己必须为了生物生存而做的工作，再也不足以确定他的自我，这一点在我们自己业已丰盛的社会中是最明显不过的；人们不再为了吃而整天工作。他们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来选择自己将要做的工作；除了必须实际用于维持生活的时间外，他们还有了前所未有的空暇可以自由支配。于是，人们突然间意识到了今天自我危机的意义——对于妇女，以及日益针对男性的意义。人们看到了工作的意义——它不仅是作为一种生物生存的手段，而且是自我赋予的方式和自我超越的方式，是人类自我和人类发展的创造。

因为“充分发挥本人的才能”，或者“自我实现”，或者“证实自我”并不是从镜子中对自己的形象出神地注视就可以得来的。那些最充分实现了自我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在某种能被人类心灵所认可的意义上，即使难以清晰地确定这种意义也无妨，在从事大于他们本身的人类目的的活动时就是这样做的。不同素养的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来描述这种产生自我意识的神秘过程。宗教神秘主义者、哲学家、马克思、弗洛伊德——都对其采用了不同的名称：人失掉自己，才能发现自己；人是根据他与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的；自我、自身，是从理解与掌握现实中——通过工作和热爱发展起来的。

最近几年中被埃里克·埃里克森① 和其他的人在美国男

① 埃里克森（1902—），生于德国的精神分析学家，1933年移居美国，他有关社会心理学、个体同一性，以及心理学与历史、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的著作，影响心理社会问题的专业性探讨，引起世人广泛注意。——译注

性中注意到的自我危机，似乎是因为缺乏那种召唤起自己创造力的工作、事业或目的才发生的，而且要发现它们才能得到治愈。①一些人从来就没有发现它们，因为它们不是来自忙碌的工作或用打卡钟在报到卡片上记录出勤钟点。它们并不能从仅仅为了维持生活，按照程序工作，作为组织机构中驯服的成员去谋求一个保险的位置中产生出来。里斯曼等人关于人在领取薪水支票的工作中再也发现不了个性的论点就认为，证实人的自我个性是来自他自己创造性的工作，这种工作对于人类社会有所贡献：自我意识变得清醒，变得真实，并通过推进人类社会的工作得到发展。

工作，这种经济学家的陈年旧货，已经成为心理学的新领域。精神病医生长期以来对精神病院的患者采用“职业疗法”；他们最近发现这种疗法具有真正的心理学价值，它肯定不仅仅是一种“疗法”，而且还是真正的工作，在社会上起到一种真正目的作用的工作，于是，现在就可以把工作视为是解决那种无名的问题的钥匙。美国妇女的自我危机，是一个世纪以前开始的，原因正是：一方面，这个世界举足轻重的工作越来越多，需用人类能力的工作越来越多的，而且通过这些工作她们能够找到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方式，另一方面这些工作却从她们身边悄然离去了。

直到上个世纪，甚至持续到上个世纪，我们都需要强壮，能干的妇女来开拓我们新的土地；她们与丈夫一道，管理农场、庄园以及西部居住和耕种的土地。这些妇女是受到

---

② 埃里克森著，《幼年与社会》，第239—283页，第367—380页；参见弗罗姆《逃避自由》和《为己之人》；里斯曼《孤独的人群》。——原注

社会尊重的成员，是自我尊重的成员，她们的开拓目的是以家园为中心。力量与自立、责任与自信、自我约束与充满勇气、自由与平等、这一切对于所有的第一代的男人和妇女来说，都是美国式的性格的一部分。乘三等舱来自爱尔兰、意大利、俄国和波兰的妇女们与她们的丈夫一道在那些残酷压榨工人的工厂里、洗衣店里卖命干活，学习新的语言，省吃俭用送给自己的儿女上大学。在美国的妇女从不像她们在欧洲那样“女子气”十足，或受人藐视。美国妇女老早以前在欧洲旅游者的眼中，就比他们自己在法国、德国或英国的妻子要强一些，似乎不那么消极顺从，幼稚可笑，女子气十足。由于历史的偶然性，美国的妇女更长久地分享到了社会的工作，同男人一起发展。小学及中学教育对男孩和女孩一视同仁是通常的规定；而且在西部，妇女参与开拓工作的时间最久，甚至大学从一开始就实行男女同校教育。

在东部及中西部城市中的中产阶级家庭里不再需要，不再使用妇女们先驱们的开拓热情、力量和能力时，美国妇女的自我危机才开始发生，那时，开拓、创业已经完成，男人们开始在家庭以外的工业和职业之中创立新的社会。但是这些妇女先驱的女儿们对自由和工作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以悠然自得，消极顺从的女性为满足。①

奥利夫·施赖纳夫人②这位南非妇女而不是美国人在本世纪初就警告说，妇女在社会领域中的作用，其质量与数量的衰退速度与文明向前发展的进程同样快；假如妇女不赢回

① 参见弗米尔代与克莱因著，《妇女的两种作用》。——原注

② 奥利夫·施赖纳（1855—1920），南非女作家，才华出众。她的《妇女和劳动》（1911年）一书，被誉为妇女运动的《圣经》。——原注

自己充分享受人尊重和值得称道的工作的权力，妇女的心灵和肌肉就会在一种寄生的状态中衰弱下去；她的后代，不管是男是女，都会逐渐地虚弱下去，文明本身也会堕落。①

女权运动的参加者清楚地看到：受到教育和参与社会更高层次工作的权力是妇女最大的需求。她们为此斗争并为妇女赢得了新的、全部的人类自我的权力。然而，她们的女儿或孙女中有几个想把自己所受到的教育以及自己的能力用于更大一些的创造性目的，用于在社会中负有责任的工作呢，她们中有多少人受到了欺骗，或自己欺骗了自己，去墨守在难以维持的、幼稚的“职业：家庭主妇”式的女性之中？

她们的错误选择绝不是轻描淡写的小事。我们现在知道，妇女同男人一样，存在着同样大小的潜在能力。妇女，还有男人，都只能在施展了自己全部能力的工作中才可能寻到自我，一个妇女是不可能通过其他的人——她的丈夫和孩子——来找到自我的。她也不可能在乏味的家务琐事之中找到它。犹如每一时期的思想家们所说的那样，只有当一个人独自正视自己能够失去生命的事实，他才能真正地意识到自己，并开始认真对待自己的存在。有的时候，这种意识仅仅在死亡临头时才显露出来。有的时候，这种意识来自对死的一种更难以捉摸的承受：在消极顺从中，在毫无意义的琐碎杂务中自我的死亡。女性奥秘给妇女所规定的正是这种活生生的死亡。而面对这种缓慢的自我死亡，美国妇女必须着手认真对待自己的生活。

---

① 参见迪茨恩著，“美国的婚姻，道德与性行为”，载《思潮史》，纽约1953年版，第277页，——原注

“我们采用多种标准来衡量我们自己”，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这样说道，“我们的力量和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财富乃至我们的好运，都在温暖着我们的心田，使我们感到自己与生活的和谐。然而，比所有这一切都更加深沉，并且，没有这一切本身就已足够的东西，乃是我们所能施展的尽力而为的意识。”①

如果妇女们最终不把自己身上存在的所有力量都施展出来，使之达到力所能及的目标，她们就会失去自己的人性。今天的一名妇女要是没有目标，没有目的，没有抱负来使自己的生活朝未来发展，使她能延续并超越自己的身体所能满足的生物功能的短促的几十年，那么，她就是在进行一种自杀。因为生育年龄之后的半个世纪的未来生活，是一个美国妇女所不可否认的事实。她也不可否认，这个世界其实正从她的家门口匆匆而过，而她自己只是作为一名家庭主妇，坐在那里张望着。假如她在那个世界上没有自己的位置，那么，她所感到的恐惧就确实是真切的。

妇女奥秘成功地把成千上万的美国妇女活生生地埋葬了。这些妇女难以从她们惬意的集中营中脱身出来，除非她们自己最终拿出一种力量——一种超越生物的力量，超越家庭狭窄的围墙的力量，有助于向未来发展的力量。只有对未来担负起这种个人的责任，美国妇女才有可能冲破家庭主妇的陷阱，并且真正地找到作为妻子和母亲所应有的满足——作为独立的人来实现自己独特的希望。

① 詹姆斯著，《心理学》，纽约，1892年版，第458页。——原注

女性的新生

“说得倒容易”，陷入家庭主妇困境中的妇女说道，“我一个人在家里，孩子们哭的哭，闹的闹，洗的东西要拣要晾，又没有老母亲照看婴儿，我能做什么呢？”在精神上依赖他人，通过他人达到自己的生活目的当然比完全依靠自己要容易一些。如果你以前从未正视过，指引和规划自己的生活自由，那么它是会使人望而却步的。当一个妇女最终意识到，对于“我是谁”的问题，除了她自己能够回答以外，并没有其它的解答途径时，那它是令人生畏的。或许，她多年来求诊于精神分析大夫，力求“使自

己适应女性角色”，让自己得到“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满足。”然而，她内心的呼声仍然会说：“这不对。”即使是最好的精神分析大夫也只能鼓励她去倾听她自己的声音。当社会对妇女极少过问时，每一个妇女都只有去听自己的声音，以便在这个变迁的世界中找到自己。她必须从自己的需求和能力出发，为自己规划出一个新的生活的蓝图，把爱情、孩子和家庭这些以往限定女性的因素与面向未来，目标远大的工作协调起来。

正视这一问题并不等于解决这一问题。但是，一旦妇女正视了它，一旦她问自己，“我要做什么呢？”，那么，她们就会像今天没有从专家们那里得到帮助，只好自行其事的美国妇女一样，开始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一旦她看穿了女性奥秘的虚幻，即一旦她认识到，不管是她丈夫，还是她孩子，不管是家里的物品、性生活，还是像所有的其他妇女那样生存，这些都不能赋予她一种自我，那么，她就会经常找到这种答案，而且比自己原先所预料的要容易得多。

在郊区和城镇与我交谈过的许多妇女中，一些人刚刚在正视这一问题，另一些人正在设法解决它，对这些人来说，这一问题已不成其为问题了。4月间一个宁静的下午，孩子都上学了，一位妇女告诉我：

> 我过去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用车把他们推来推去，为他们操心，教这教那。后来突然就有了这种可怕的空虚感。我担任的义务工作——童子军，家长教师联谊会，妇女选举权协会的工作突然间都好像不值得一干了。我从小就想当演员，我后来想当也当不成了，

已经太迟了。我整天呆在家里，把那些好多年都没打扫的东西收拾干净。在很多时间里，我除了独自流泪什么也没干。我丈夫和我谈论过这种美国妇女问题，一个女人如何为了孩子而放弃事业，然后就会达到某种阶段，这时你已经难以实现自己的夙愿了。我认识几个妇女，我真羡慕她们，她们都有一定的专长，并且一直在从事能够发挥这种专长的工作。我要成为演员的梦想是不实在的——我并没有为之努力。我当时非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孩子们身上不可吗？我把自己整个的一生都掩埋在别人的生活之中，但从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现在，我觉得就是再要个孩子也不能填补这种空虚。你不能走回头路了，你必须往前走。肯定有我自己能走的一种真正的道路。

这个妇女刚刚在着手寻找她自身的价值，而另一名妇女则已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能够对之进行回顾，并且能清楚地看到其症结之所在。她的家装饰华丽、随意，但她已不再是一个专门的“家庭主妇”了。她作为职业画家而领取报酬。她告诉我说，当自己不再与女性的传统形象保持一致时，她终于开始领略到作为女人的愉快。她说：

我原先尽力保持着自己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美丽形象。我的孩子都是用自然分娩法生，用自己的奶水喂大的。可是有一次，在一个聚会上，一个年龄稍大一些的妇女气得让我发狂。当时，我说生儿育女是一生中最重要的，是动物起码的事，她说：“你是想比动物生得更多吗？”

人们确实想得到更多的东西，只不过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罢了。于是你就会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搞家务。就像为你的小女儿们烫烫裙子觉得不够劲一样，所以你就喜欢有皱褶的，需要多烫一下的裙子，并且烤自己的面包，拒绝买洗碟机。你以为如果自己能从中感到一种极大的需要，那就会使人心满意足，但其实不然。

我差点儿就有了外遇。过去我常对丈夫感到不满。要是他不帮我干家务，我就没好气。我坚持要他做菜，擦地板，什么都干。我们并不吵嘴，但有时在半夜，你是骗不了自己的。

我似乎很难控制自己想从生活中索取更多东西的感觉。因此我就去找了一位精神病大夫，他老是想让我高高兴兴地做一名女人，但这毫无用处。于是，我就去找了另一位大夫，他好像要让我去发现自己，并要我忘记那个美丽的女性形象。我意识到我是存心跟自己，跟我丈夫过不去，因为我早就离开了学校。

我常把孩子们放在车上，毫无目的地驱车出去，因为我难以忍受一人呆在家里的滋味。我一直想做点儿什么，但又不敢试一下。一天在乡间的小道上，我看见一位画家在画画，这时我忍不住问道，“你教不教？”

我整天都得看家管孩子，晚上吃完饭，我就画画。后来我就把要用来生另一个孩子（五个孩子是美丽形象的一部分）的寝室作为自己的画室。我记得有一天晚上，自己画了又画，突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我也画完了。我瞧着这张画，就好像是发现了我自己。

我想不出自己以前在生活中想干什么，在竭力符合

一个旧式妇女前辈的某种形象时想干什么。我用不着采取自己缝制自己衣服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女人，而我是我自己，我买衣服穿，我喜欢这些衣服。我不再是一个没有耐心的，慈爱的，完美的母亲了。我不再每天把孩子的衣服从头换到脚，不再烫有皱褶的衣裙了。但是自己好像有更多的时间来享有孩子的天伦乐趣。现在，我不再花大量时间干家务了，但是这些家务在丈夫回来之前就干完了。我们买了洗碟机。

洗碗涮碟的时间越长，你干其它事的时间就越少。把同样的事干了又干不是创造性的劳动。一个女人对摆脱这种重复乏味的工作没什么好内疚的。洗碗，擦地板，这没什么价值。的确良，洗碟机，随洗随干——这就很不错。这是物质生活应当采取的方向。这是我们的时间，我们在世唯一的时间。我们不能老是把它扔在一边。我的时间就是我所得到的一切，而时间就是我所要利用的。

现在，我不需要对自己的婚姻小题大作，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不知怎么搞的，一旦我开始有了自我的意识，我就开始意识到了我丈夫。以前，好像他是我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我想，这是因为我不再为使自己成为女人而努力，我才开始领略到作为一个女人的快慰。

还有另一些妇女在那里举棋不定，他们虽然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但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郊区基金筹措委员会的主席说：

我很羡慕琼，她呆在家里干着自己想干的事。我有两个月都没打开画架了。我老是陷在一些自己一点儿也不喜欢的活动中，与这里的人们打交道就得这么做。但是这并不能使我感到自在，没有像我画画时的那种感觉。城里的一位艺术家告诉我说，“你应当更加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你能够成为一名艺术家，一个家庭妇女，一位母亲，三者兼顾。”我想，唯一阻止了我的就是那倒霉的工作。

俄亥俄州一个年青的妇女告诉我：

我最近才感到这一需要。原先我觉得只要有间大点儿的房子，生个孩子，或搬到和睦善邻的街区去就行了。我狂热地周旋于各种交际娱乐之中，但那好像是生活的中止。

我丈夫认为，做一个好母亲是迄今最重要的工作。我认为这比一种工作更为重要。但我并不认为大部分妇女都只是做一个母亲就够了。我喜欢自己的孩子，但我不愿意把时间都花在他们身上。我并不是他们的同龄人。我可以让家务劳动占去更多的时间，但是，地板总不需要一周用吸尘器打扫两次以上，我母亲每天都扫了地板。

我一直想拉小提琴。我上大学时，正经学音乐的姑娘都很了不起。突然间，我自己身上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说，现在是时候了，你不会再有机会了。这真叫人难堪，40岁才开始练琴。练琴实在是不好受，肩膀又酸又

痛，但这使我产生了一种比自己更加开阔的感觉。宇宙万物霎时变得真切实在，你自己成为其中的一个部分。这时你就感到似乎自己确实存在着。

对我来说，为任何妇女提供解决这一难题的简单可行的答案，都是相当不明智的。在今天的美国是没有简单的答案的，这困难异常，令人痛苦，或许对每一个妇女来说，都得花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找到自己的答案。首先，她必须对家庭主妇这一形象直截了当地予以“否认”。当然这并不是说，她必须与丈夫离婚，抛弃孩子，离家而去。她用不着在婚姻和事业中做出抉择；那一度是女性奥秘所设置的错误选择。事实上，把婚姻与母爱，甚至把这种曾经称之为“事业”的终生目的结合起来，并不像女性奥秘所暗示的那么艰难。这只是需要制定一个新的生活计划——从一个妇女的整个一生出发来做出安排。

这一计划的第一步就是正确地看待家务劳动——不应当视其为一种事业，而是必须高效率地，尽快完成的事。一旦一个妇女不再为做饭、打扫卫生、清洗、熨衣、“以及更多的事”而忙碌，她就可以说，“不，我不想要圆角炉子，我不要四种不同的肥皂。”她就可以对那些妇女刊物及电视中众多的幻影说一声“不”，对那些企图掌握她生活的深奥的研究者和市场操纵者们道声“不”。这时，她就可以使用吸尘器、洗碟机以及所有自动化用具，甚至用配制好的土豆泥，以此来达到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节约可以采取更富于创造性方式使用的时间。

第二步，或许这一步对于以性别为指导方向的教育的产

物是最为困难的，就是要看到婚姻的真实面目，把女性奥秘为其蒙上的一层过于美化的面纱揭去。许多与我交谈过的妇女，当她们把婚姻和母爱视为自己一生最后的愿望而得到满足时，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对丈夫不满，跟孩子过不去。可是，当她们开始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各种能力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时，她们不仅谈到了自己身上的一种新的“活力”或“充实感”，而且，尽管很难对其下定义，有一种与她们以前对孩子和丈夫全然不同的感觉。许多人对这个妇女的话都有同感：

有趣的是，由于我为自己留下了天地，我对孩子也更加喜爱了。以前每当我把自己都投到孩子们身上的时候，就好像我总是要从他们身上找出什么来。我不能够像现在这样爱他们，他们以前好像是落日，与我无干，是单独存在的。以前，我感到被他们拴住了手脚，心里总想摆脱。或许一个女人只有真正地自立，才能真正地与孩子们相处。

新英格兰一位律师的妻子告诉我：

原先我想自己是万事了结了。孩提时期过去了，结了婚，有了孩子，婚姻也美满。但不知什么缘故，我感到苦闷，因为我觉得这已经到了终点。我常常用一个星期安放、装饰家里的摆设，星期天又得给另一件东西着色上漆。我的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我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真是太多了，其实孩子们并不需要大人的过分陪

伴。一个成年女性，整天和孩子泡在一起，把自己分解成三头六臂，让时间过得充实，想方设法烧出没人需要的菜，要是家里人不吃，又气得不得了，这实际上是你已经丧失了成年人的常理，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全部理性。

现在我在学习历史，一年修一门课程。这确实起了作用，我两年半连一个晚上都没缺过。我不久就要教课了。我喜欢成为贤妻良母，但现在我知道，婚姻既然成了你生活的终结，既然你没有其它的生活使命，所以婚姻就会使人痛苦不堪，就会变成俗不可耐的东西。谁说女人就只能高高兴兴，娱乐消遣？你需要工作，并不是非要谋个什么职业不可。可是你得正经干个什么，而且要干到底，这样才能感到实在。

一天一小时，一个周末，甚至一个星期得以从母亲的职责中脱身出来，都不是那种无名难题的答案。儿童一家庭专家或伤透脑筋的医生对家庭主妇的厌倦感或陷入困境的感觉所建议的良方，那种所谓“母亲短时空暇，”① 自然而然地认为，妇女“只是一个家庭主妇”，现在是，以后也将永远是一个母亲。一个被工作充分占有的人才能够享有“空暇”，然而与我谈过话的母亲们从未在“一小时的空暇”中发现任何神奇的慰藉；事实上，她们常常用一丁点儿借口，或是内疚或是厌倦，就放弃了。一个在社会中没有自己目的的妇

① 参见“母亲的选择：经理还是烈士”，以及“为了母亲的时间”，载《纽约时报杂志》，1962年1月14日及1962年3月18日。——原注

女，一个由于无所事事，难以真正证实自己，难以使自己想到未来的妇女，必然会在眼前的生活中继续感到绝望，不管她有多少"空暇"也无济于事。即使今天一位非常年青的妇女也必须首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打发时间的母亲；她必须从自己的能力和对社会的责任出发来制定生活的计划，只有这样，她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职责才能与之结为一体。

我走访过一位妇女，她多年来在郊区"只是一个家庭主妇"，而现在是一位心理健康教育家，她总结道："对过去的生活不够充实的感觉，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当时没有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就组织家庭是不够的。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魔鬼，你是很难再把它召回到瓶子里去的。对自己理智的心灵，你是难以否认的，你需要的是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她从花园里的树丛望过去，看着冷清、空荡的郊区街道，说道：

> 假如你敲开这些人家的大门，你能发现有几个妇女在发挥着自己的能力？你会发现她们在喝酒，和其他妇女坐着闲聊，或看着孩子们玩，因为她们难以忍受孤独。或者她们在看电视或在读书。社会还没有把妇女卷入其中，除了让她们生孩子，还没有采用她们的技能和能量。在过去的15年中，我觉得妇女正在逃避她们自己。年青妇女们强咽下这种女性本分的苦果是因为她们觉得，如果回家寻找自己的满足，要容易得多。然而这并非易事。一个妇女要在某个方面与自己达成协议的话，她就得发现自己要作为一个人那样而存在才行。

对妇女，犹如对男人一样，要发现自己，要了解自己也是一个人的唯一方式，就是从事自己富有创造性的工作。但是一门职业，任何职业都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事实上，它有可能是陷阱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些不去寻找与自己实际能力相一致的职业妇女，不让自己去发展需要正规教育和培训的终身志趣和目标的妇女，那些在20岁或40岁只是为了“弥补呆在家中的不足”而找个工作，或只是为了消磨多余的时间的妇女，几乎和那些陷入家庭主妇困境中的妇女没有区别，正慢慢地走向茫然的未来。

如果一种职业是帮助妇女脱离陷阱的方式，那它必须是妇女能够把它作为自己生活计划中的一个部分而认真从事的职业，必须是她能够从中发展成为社会的一个部分的职业。郊区社会，尤其是那些社会，文化、教育、政治以及娱乐类型还没有稳固形成的新社区，为那些精明强干，富有才气的妇女提供了无数的良机。但是这类工作没有必要成为一种“职业”。在韦斯特切斯特，在长岛，在费城的郊区，妇女们开办了心理健康诊疗所、艺术中心、儿童夏令营。在大小城镇，从新英格兰直到加利福尼亚，妇女们掀起了政治和教育的新运动。即使这种工作不曾被视为是“职业”或“事业”，但是它对各社区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以至于专业人员现在做这种工作都是有报酬的。

在一些郊区和乡镇，可供非专业人员干的，需要才能的工作已所剩无几，只有极个别的领导职务，而大多数当今的妇女担任这类职务则显得缺乏独自处理问题的能力，缺乏力量以及自信心。如果一个社区受教育的妇女比例很高，那么，可供分配的工作就会不够。结果，从最纯粹的帕金斯法则

的意义上来讲，社区工作常常扩展成一种自助性质的社会福利空架子，或官样杂务，做做样子罢了，而且，最终这种工作的真正目的还是让妇女们保持忙碌而已。这种繁忙、无价值的工作是不能使成熟的妇女满意的，也不能帮助不成熟的妇女成长起来。这并不是说，做一个看管幼年童子军的妇女，为家长教师联谊会服务，或组织自带饭菜晚餐会是没有用的工作；对有才能的妇女来说，仅仅做这种工作是不够的。

我所走访的一个妇女曾使自己卷进了无休止的社区活动之中，尽管这些事使人忙碌并值得一做，但并没有为她自己的未来指出方向，也没有真正地利用她特殊的才能。因此，她的才能好像确实凋萎了；她日益严重地遭受那无名的难题的折磨，这种状况直到她朝着自己真正的事业迈出了第一步才告结束。今天，她已经是一个"顶呱呱的教师"，一个安祥的妻子和母亲了。

起初，我参加了医院筹款委员会，它是为诊所服务的职员义务委员会，我还是一个儿童校外旅行考察队的监护人。同时，我还学习一周30美元的钢琴课程，还得付临时照看孩子的保姆的工钱，这样我才能自得其乐。我为我们创办的图书馆实行杜威十进分类法①，兼做看管幼年童子军的工作，为家长教师联谊会服务更是习以为常。所有这些仅仅是为了充实我生活的活动的费用都是在我丈夫收入中开销的，这些活动花钱不少，但还是难以使我的生活充实起来。我变了，变得脾气古怪、喜

① 杜威(1851—1931)，美国图书馆专家，发明图书十进分类法。——译注

怒无常。我经常无缘无故地大哭起来。我甚至静不下心来看完一本侦探小说。

尽管我忙得不可开交，从早跑到晚，但从来都没有获得真正的心满意足的感觉。你把孩子拉扯大，那当然，但这又如何证实你自己的生活呢？你必须有一个根本的生活目的，有一个使你继续向前的长远目标。社区活动是短期的；搞完一个活动又得接着搞另一项。在社区工作中，人们都叫你不要打搅有孩子的年青母亲。这是那些孩子都已长大的中年妇女干的工作。其实那些被孩子捆住了手脚的人才需要干这种工作。如果没有被孩子拴住，就不要干这种工作——你需要的是真正的工作。

由于女性奥秘的作用（或许是由于当人们没有性别上的优势或托辞而卷入实际竞争时所产生的人类对失败的自然恐惧的缘故），对于一个要脱离困境的妇女来说，从业余跨入专业的这一飞跃是最为困难的。但是，即使一个妇女不是为了糊口而工作，她都只能在对社会有价值的工作中找到自我，① 即通常在那些我们的社会赋予报酬的工作中发现自我。当然，获取报酬是比获得奖励要胜过一筹，报酬意味着一定的责任。由于惧怕这种责任，许多能干的，受过教育的郊区家庭主妇今天却无所事事，使本来可以从事的作家或演员工作都付之东流，不是在“自我充实”的业余爱好中涉猎一下艺术或音乐，就是申请干一些诸如接待员，女店员一类大大低于她们能力的工作。这些也是逃避发展的方式。

① 参见埃里克森：《幼年与社会》，第208页。——原注

美国妇女对义务工作日益增长的厌倦感以及她们对领取报酬工作的偏向，不管这种工作的层次有多么低都是无所谓，都是因为这一事实造成的：专业人员占据了社会工作中需要才干才能干好的大部分位置。可是，妇女们自己却不去成为行家，在过去的20年中一直不愿意委身于工作，对有报酬还是无报酬的工作，对需要创造性、领导才能及担负责任的工作都不愿意干。这一情况是出于女性的奥秘所造成的，年青的家庭妇女中那种不负责任，没有事业心的态度，在韦斯特切斯特县最近进行的调查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① 在一个高收入的郊区，年龄在25至35岁之间，丈夫年收入在25 000美元以上的家庭妇女中，有50%以上的人希望工作；其中13%希望立即工作，其余的希望在5年至15年之内工作。在这些计划去工作的妇女中，3/4的人感到准备不足。(所有这些妇女都受过某种程度的大学教育，但只有一人获得毕业文凭，1/3的人在20多岁或20岁之前结的婚)。这些妇女并不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而希望参加工作，而是做出调查研究的人类学家称为“经济上有所获的心理需求”驱使她们要求工作。很明显，那种义务工作是不会满足这种需要的；尽管其中有62%的妇女都在从事义务工作，但是，这种工作具有“临时，短暂的性质”，尽管她们都想参加工作并感到准备不充分，但是在45%学习各类课程的妇女中，极少有人想取得学位。她们工作计划中的幻想成分已被“不幸的，有规律的开张和倒闭的小本经营”所证实。当一个女校友协会在郊区

① 斯科菲尔德著，“郊区妇女的某些变化作用：一项社会人类学研究”，载《纽约科学院学报》第22卷，1960年4月。——原注

发起了两轮专题讨论会，讨论有关“中年妇女如何重返工作岗位”时，有25名妇女参加。会议第一项是要求每一个妇女在第二次会议交上一份个人简历。这一简历需要填写人动动脑筋，就像一位研究人员所说，它具有“开诚布公的目的”。但仅有一名妇女认真写了自己的简历。

另一郊区有一个指导中心，该中心在心理健康运动的早期曾为本地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提供了发挥才智的用武之地。她们当然不是为人治病，而是在早期管理这个中心并且领导家长教育讨论小组。由于那种“家庭生活教育”已经专业化，这一中心的管理以及讨论组现在均由专业人员负责，而且经常从城市里请来这一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人员来负责。在指导中心工作中“发现了自我”的妇女只有极少数继续深入到这一新的专业中去，并得到她们自己的硕士和博士文凭。当继续深入下去将意味着与家庭主妇的角色相去甚远，并且还将一本正经地投身于这一专业的时候，大部分妇女都退缩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允许一个能干的妇女去充分施展她的能力，在包含她婚姻和母爱的生活安排中，能够在社会中证实自己的工作，正是女性奥秘所禁忌的那种对艺术或科学，对政治或专业的献身。这种献身并不局限在某个具体的职业或地点之中，它允许年年变动，在一个地区干专职的，有报酬的工作，在另一个地方干兼职的工作。在妊娠期间或开始做母亲，难以从事专职工作时，就在正经的义务工作中锻炼这种专业技能或学习一段时间。它是一种延绵的涓涓细流，其生命力在于在这一领域中，在全国范围内所开展的工作、学习和联系。

我发现，那些曾经从事了这种长期的献身工作并使之富有活力的妇女，就没有遭受到那种无名难题的困扰。她们也没有生活在家庭主妇的偶象之中。然而音乐、艺术或政治对那些没有或不能认真信守自己的献身义务的妇女来说，并没有使她们的问题迎刃而解。乍看起来，“艺术”似乎是妇女理想的答案。艺术活动到底是在家里得到练习和实践的。它们并不含有那种使人感到敬畏的专业特性，并且很适合女性，似乎为个人的发展以及自我的证实提供了无尽的天地，同时还不必在社会上为了报酬与人竞争。但我已经注意到，当妇女们从事绘画，制作陶瓷工艺品的认真程度不足以成为行家的时候，即她们从事的这种艺术难以得到报酬，不能传授别人，并且得不到其他行家的认可时，那么，她们迟早都会中止这种业余爱好；星期日的绘画，心灰意懒地制作的陶瓷工艺品，当其对他人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时，是不会带来她们所需要的自我意识的。这些业余的艺术工作者或浅薄的艺术涉猎者的作品，要是其他任何人都不愿购买、倾听、观赏、或阅读的话，就不会使她们得以在社会上取得一席之地，或真正的自我证实。而对那些为成为行家已经花费了心血，获得了有关知识以及专门技能的人来说，其作品则是预约的。

当然，认真献身于专业会有许多实际问题。可是这些问题只不过是看起来难以逾越罢了，这是由于一个妇女仍然沉溺于女性奥秘的人为的困境与内疚之中，尽管她没有完全陷入其中，——或者说，她想得到“更多”的愿望只是一种空想，她并不愿意为之花上起码的功夫。妇女们反复对我说，她们关键的一步只是先去女校友职业介绍所走一走，或索取教师证书申请表，或与城里以前的职业门路联系一下。女性奥

秘究竟能够抛出多少障碍和理由来阻止一个女人出去联系或填写申请，这倒是极有趣的。

我认识的一个郊区家庭主妇曾经当过女新闻记者，但是她相信自己再也不会得到那种工作了；她离开得太久了。当然，她是确实离不开孩子的（当时她孩子白天都要上学）。出乎意料的是，当她终于决定干点儿什么时，她只进了两趟城就找到了一个极好的工作，而且还是老行道。另一个妇女，一个精神病学社会福利工作者，她说自己不能干那种有条不紊的机关工作，而只能干没有时间限制的，想休息就休息一下的义务工作，因为她不能依靠一个女清洁工来干家务。实际上，假如她雇一个女清洁工（她周围许多邻居没什么理由却一直都是那样）的话，那么，她就只有一心一意地干工作，干那种对她的能力来说是极大考验的工作。很明显，她不敢承受这种考验。

今天相当一部分郊区的家庭妇女都不再参加或放弃了社会义务活动、艺术活动或职业。当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是要更加认真地尽到自己的责任时，她们都从这一点上退避开去。家长教师联谊会的领导不去竞选管理地方公立学校的教育委员会，妇女选举权协会的领导人害怕卷入自己政党的中心。"妇女不能充当制定政策的角色，"她说，"我才不去干那种费神的工作呢。"对于她来说，要在党内排除偏见，对付男人的竞争，赢得一个制定政策的角色当然会花更多的精力。

一些妇女参加了工作，但不制定出新的生活计划。我走访了两位能力很强的妇女，她们两人都对家庭妇女式的生活厌倦了，两人都在同一个研究所里得到了工作。她们喜爱这

种日益受到鞭策的工作，并且很快就被提升了。但在她们30多岁的时候，也就是当了10年家庭主妇之后，她们所挣的收入却很少。第一个妇女显然认识到了这种适合自己的工作的前景，所以她把所有的工资都花在一周来三天的女清洁工身上。而第二个妇女觉得只有“补贴家里的费用”，自己的工作才能得到证实。因而她决不花钱请人打扫房间，也从不考虑要求丈夫和孩子帮忙干家务，也从不为了节省时间而打电话订购食品杂货，把要洗的，要熨的东西送出去。一年之后，她完全累垮了，辞去了工作。而第一个妇女由于对家庭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和牺牲，在38岁的今天，已经在所里担任了主要的职务，并且还为家里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其数额大大超出了她付给请人定时来家帮忙干家务的费用。而第二个妇女“休整”了两周之后，又开始受到以前那种绝望情绪的折磨。但是她已经确信，自己必须找到能在家里干的工作，以此来少“欺骗”一些自己的丈夫和孩子。

在家里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幸福主妇的形象——画画，雕刻，写作——是女性奥秘半真半假的幻想之一。男人和女中能干这种工作的大有人在，但是，当男人在家里干的时候，他妻子就会把孩子都带开，不许影响他，不然就给孩子点厉害瞧。而女人要是在家里干就不容易了，假如她想认真干一番，就必须另外找个地方，要不就得甘冒风险：在极不耐烦地要求清静之时成为对孩子残忍的母亲。又干工作又当妈妈，她的注意力是分散的，难以专心致志。而一种正经的八小时工作制则将专业工作和家务劳动截然分开；这种工作没有那么多的约束，并通常不会使人感到孤单。妇女若想让自己的事业适应家庭主妇生活的客观限制，就会失去自己在专

业领域里所分享到的激励感和新的友情。

一个女人必须对女性的奥秘断然予以“否决”，以保持任何专业职责所需要的纪律和力量。因为那种奥秘完全不是什么理性的思维产物。在“家庭主妇职业”中，许多人都有，或认为自己有一种既得利益。且不管妇女刊物、社会学家、教育学和精神分析学家要花多长时间来纠正使女性奥秘永存的谬误，一个妇女必须现在就着手对付它们，她必须在丈夫、朋友、邻居、或许在自己的教师、神父、老师、或孩子幼儿园的老师，指导诊所里善意的社会福利工作者，或在自己天真的孩子的诉说所形成的偏见，误解的忧虑以及毫无必要的困境中，去对付那些谬误。不过要坚持下去，不管其动力来自何方，坚持下去就会见到成效。

甚至对正统宗教的传统抵制今天也被精神疗法的控制手法所掩盖了。有着东正教或犹太教背景的妇女很难冲破家庭主妇的偶象；它祀奉在宗教的法规之中，祭祀在她们自己及丈夫从孩提时代就铭记在心的假想之中，铭刻在自己信奉的宗教对婚姻及母亲的职责所限定的那些僵死的定义之中。僵死的教义可以轻而易举就用女性奥秘的心理信条装饰起来，这一点可以从纽约大主教管区家庭生活局的“已婚夫妇讨论建议纲要”中看到。经一个“仲裁牧师”详述后，三四对已婚夫妇合成一组的调查对象，被指导着问及：“一个参加工作的妻子对其丈夫的权威是否能形成一种挑战？”

多数参加调查的夫妇相信，妻子工作并没有什么奇怪，或有什么不好……不要与之对抗。要暗示，而不要独断专横……各组参加调查的夫妇会指出，乐于从事八

小时工作制职业的新娘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她说不定会微妙地伤害她丈夫作为家庭支柱的职业意识。充满竞争的商业世界会反复给参加工作的新娘灌输种种观点和习惯，这些观点和习惯有可能使她很难适应她丈夫的管束。……

2.一天工作完毕，她会在丈夫面前显露出一种身心交瘁的疲怠感，而这时正是她丈夫盼望得到妻子快活的激励以及春意激情的时候。……

3.对于一些新娘来说，作为女实业家并兼任家庭主妇的双倍紧张或许就是导致不孕的几种因素之一。

我走访的一个天主教妇女就从妇女选举权协会中退出了，除了她与神父以及她丈夫之间的种种不愉快之外，学校心理学者声称，她女儿在学校的麻烦是由于她的政治活动引起的。她告诉我："对一个天主教妇女来说，要解脱出来更加困难，我已经退下来了。如果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话，这对大家都更有好处。"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饶有兴趣地偷听了半小时的政治大政方针的交谈，很明显，有关内容并不是妇女协会的，而是地方民主党的。这位"隐退下来"的政治家又回到厨房去完成晚饭的准备工作。她承认自己现在在家里偷着进行政治活动，"就像个酒鬼或吸毒者，但我似乎就是不能放弃它。"

另一个有着犹太教传统的妇女，在成为一个大夫的妻子之后就放弃了自己的医生职业，而去全心尽意地哺养四个孩子。当她最小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之后，她开始复习功课，准备重新参加医学考试，可她丈夫对此并不十分高兴。

一个克制的、沉静的女人在停止了15年专业活动之后，居然能全力以赴，而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取得了开业执照。她不无歉然地告诉我说："你怎么也没办法中断这种兴趣，我试过，可就是不行。"她还承认，当有夜诊时，自己悄悄地溜出去，就像和与情人赴约一样感到罪过。

即使对一个不那么信奉正宗传统的妇女，女性奥秘所采用的最有力的武器还是这一论点：妇女在外边工作就会置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而不顾。如果她孩子病了或她丈夫遇到了什么麻烦，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女性的奥秘，社会上不怀好意的言语，甚至这个女人自己的内心都会谴责她"抛弃"了家庭主妇的责任。也就是这个时候，许多妇女对她们本人以及对社会的责任都在半路夭折了，或者必须绕上很大的弯子。

另一位妇女告诉我，她已经放弃了电视台的工作，"只当一个家庭主妇"，因为她丈夫突然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所遇到的麻烦都是由于她没能"起到一个女性的作用"而引起的，怪她一直在竭力与他"竞争"，想"成为一家主之"。她跟今天大多数妇女一样，在这种指责面前显得脆弱无力——一个精神病专家称作"职业妇女内疚综合症"的那种症状。所以，她开始把原先全力投入工作的精力转而投入到管理家庭之中——并转而投入到啰啰嗦嗦地谈论丈夫职业的兴趣之中。

然而她在郊区的业余时间里作为业余的非营利剧团的导演轻而易举就在当地红极一时。这一成功，外加她对丈夫的职业常有微词对她丈夫的自尊是很大的伤害，长期使她丈夫和孩子不满，其程度远比她原先在家庭之外的世界中与其它

专业人员在工作中客观竞争时要深得多。一天，她正在指导剧团排练时，她儿子被汽车撞了，她把这一事件归咎于自己，于是这一次下决心放弃剧团工作，发誓赌咒“只做一个家庭主妇”。

她几乎立刻就遭受到那种无名难题的严重折磨，她的消沉和依赖性使她丈夫的生活如同在地狱一般。她求助于精神分析大夫，她的大夫不是采取正统精神分析大夫所惯用的漫谈鼓励方式，而几乎是命令她返回工作。她开始写一本题材严肃的小说，终于下定决心以自己曾经规避了的，即使是有了工作也规避了的那种献身感来写作。在她专心从事写作时，她不再为丈夫的职业分心了，而且不知不觉中，每当儿子不在身边时，她也不再臆想又有什么不测之事会发生。尽管她已难再走老路，但有时仍然会怀疑，自己是否已把婚姻置于砧板之上了。

与女性奥秘论所宣扬的不同，她的丈夫或是对她具有感染力的献身范例做出反应，或是对她停止歇斯底里的依赖所形成的喘息机会做出反应，或者，出于他自己自立的原因，在自己的工作中全力以赴以取得与那本小说相等的成就。当然还是有问题，但这些问题不是原来的老问题了；当他们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他们夫妇之间的关系不知何故又重新发展起来了。

但是，每一种发展都伴随着风险。我在走访中遇到一个妇女，她丈夫在她出去工作不久就与她离了婚。她们的婚姻简直糟透了。她从自己的工作中所取得的自我意识可能使她更不愿意接受这种难以维持的婚姻，或许它促成了她们的离婚；然而这种意识也使她更有能力生存下去。

不过在其他的例子中，妇女们告诉我说，当她们最终下定决心出去工作时，男人们的强烈反对也就消失了。她们是不是夸大了丈夫们的反对以逃避自身的抉择呢？我走访了属于同样情况的丈夫们。他们有时惊奇地发现，在妻子的世界中，他们不再是唯一的太阳和月亮，这真是“如释重负”；妻子们对他们的唠叨少了，过分的要求也少了，他们不再对妻子的不满感到内疚。正如一个男人所说：“自从玛格丽特出去工作以来，不仅经济包袱变轻了，说实话，真松了一口气，而且整个生活的担子都好像轻多了。”

可是，有好些丈夫的抵触情绪很不容易消除。他们难以忍受自己的妻子“否定”女性的奥秘，这样的丈夫常常陷入自己天真的幻想之中，好像有一个一直在身边的母亲，或竭力通过孩子来再现这种幻想。一个妇女要对这样一个丈夫讲清楚这点是很困难的：她不是他的母亲，并且如果让孩子自由一些，孩子还会好一些。或许，假如她对自己更加真实并拒绝把他的幻想付诸于行动，他就会突然醒悟过来，再重新审视她。于是，他或许会再寻找另一个母亲。

一个妇女在脱离家庭主妇的困境时所要遭遇的另一类风险，就是其他家庭主妇的敌意。正如在自己的工作中逃避自身发展的男人憎恨他妻子的发展一样，在精神上依赖丈夫和孩子的妇女也同样憎恨那些走自己的生活道路的妇女。在晚餐会上，幼儿园的活动中，家长教师联谊会的招待会上，一个不仅仅是家庭主妇的女人会从她郊区四邻的口里听到不少刺耳的言语。她已不再有时间在早餐桌上没完没了的咖啡中听那些毫无根据的流言；她再也不能与其他妻子们一起分享“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那种悠然自得的幻想；她那种存在

的方式使得这条船为之震动。而且，她能预料到，自己的家、自己的丈夫和自己的孩子，都会被别人用一种特别好奇的，哪怕对“问题”的最细微的迹象也不放过的方式来细细审视。然而这种敌意有时掩盖了一种潜在的妒忌。最为人们所恨的“幸福主妇”或许就是第一个就自己准备去干的新工作征求邻居意见的人。

对于要参加工作，继续往前走的妇女来说，总有一种改变自己生活的惘然若失的感觉伴随着她；老朋友、热悉的、有保障的常规惯例失去了，而新的东西还未明朗。一个女人要对女性的奥秘予以“肯定”，而不冒继续往前走所引起的痛苦风险，这确实要容易得多。如果她要摆脱家庭主妇的困境，那么，要做出努力的意愿，要“有所作为”，就跟能力本身同样必要。“有所作为”就跟“事业”一样，已经被女性奥秘论贬成了极肮脏的字眼。波利·韦弗，这位《小姐》杂志“大学与事业”栏的编辑曾于1956年就“抱负”和“竞争”为题调查了400名妇女，① 她们中大部分人对有所作为的抱负心怀有“内疚情感”。用韦弗小姐的话来说，她们竭力“发扬优良的品德，而不让其像吃吃喝喝一样显得俗气、自私。我们很惊奇……这么多的女人从早忙到晚，诸如为工作，跑社区或教堂一类的，但就是不为自己着想，哪怕从中只得到五分镍币的好处也不要。她们不想要钱、社会地位、权势、影响、得到他人的承认……这些女人是在愚弄自己吗？”

---

① 韦弗著，“有所作为有何过错？”载《小姐》杂志，1956年9月刊。——原注

女性的奥秘要让妇女们自己放弃有所作为的雄心。婚姻和做母亲就是生活的终点；那以后，妇女们只应该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心怀奢望。许多确实“愚弄了自己”的妇女都促使丈夫和孩子去实现自己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在接受《小姐》杂志调查的妇女当中，也有许多有着明显抱负心的妇女，她们好像并不觉得烦恼。

> 这些有抱负心的妇女，回答了我们的询问。她们对失去往日亲密的朋友、家庭野餐，以及阅读无人谈及的书籍的时间，并不感到有什么遗憾。她们说，自己得到的比失去的多，她们谈到了新的朋友、自己进入的广阔天地，以及和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一起工作所获得的奕发向上的感受——像高压锅的蒸汽直往上冲一样，那种可以尽力工作的最大的满足感。事实上，一些愉快的，有抱负心的妇女也使她们周围的人感到愉快——丈夫、孩子和同事……一个有相当抱负心的妇女，要是把自己全部的声誉都放在她丈夫的成功上，她也不会感到愉快……对这些主动的，有抱负心的妇女来说，有所作为的雄心是连接她生命从始到终的命脉，它把她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使她可以想到自己的生命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而不是一些七零八落的拼凑……

我走访的这些妇女，她们遭受过那种无名难题的折磨，然后努力解决那种难题以实现自己长期埋藏在心底或后来涌现出来的雄心。她们尽力工作，拥有一种成就感，她们就像在生活的迷宫中找回了自己失去的那一部分东西一样。她们

挣的钱常常使全家的生活宽裕了一些，但是，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自认为这就是她们去工作的唯一理由，或是她们从中得到的主要收获。完全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不再是一个孤岛，而是大陆本土的一部分"——这种感觉已经恢复了。她们知道，这种感觉不是单单从工作中恢复的，而是从整个生活：婚姻、家庭、孩子、工作，与社区的变化、发展的联系中恢复过来的。她们又一次成了人，而不"只是家庭主妇"。这些妇女是有运气的。有些妇女拥有那种抱负或许是由于逆境的驱使：孩提时期遭到的遗弃、丑小鸭式的少年生活遭遇、婚姻的不幸、离异或孀居的苦闷。正是这种对女性奥秘的嘲弄和控拆使得这些不幸的女人，这些丑小鸭们常常被迫去发现自己，而那些使自己顺应女性偶象的少女们却成为合适的"幸福"主妇，并且从来不清楚自己是何人。但是，要是说这种"不幸"对一个少女来说是一件好事的话，就会不得要领；这种不幸不应当是一个女人为证实自己所应该付出的代价，不幸本身也不是问题的关键。女性的奥秘抑制了漂亮的和丑陋的少女去发现自己的天赋——她们或许能写出像伊迪丝·西特韦尔①那样的诗歌，抑制了或许能像鲁思·本尼迪克特②在人类学领域中有所作为的那些幸福的和不幸的主妇们，抑制了她们使她们甚至难以发现自己的天地。于是，迷宫的最后一块构件一下就到了位，生活的迷宫形成了。

---

① 西特韦尔(1887—1964)，英国女诗人，其诗以优美的音韵和华丽的想象著称，被认为是英国最有才华的女诗人之一。作品有《寒冷之歌》等——译注

② 本尼迪克特（1887—1948)美国女人类学家，参见第269页。——译注

有一件东西，要是没有它，即便是最不幸的妇女也极难找到摆脱困境的道路。不管孩提时代的经历如何，不管婚姻的运气如何，有一件东西在这一时代有试图顺应家庭主妇偶象的妇女中都会产生出不幸。有一件在我所遇到的、最终找到自己道路的妇女都分享过的东西。

摆脱这一困境的关键当然就是教育。女性的奥秘使得高层次教育对于妇女来说，似乎是不可信，无必要，甚至是危险的。然而我认为教育，唯有教育，才挽救了，并且能继续挽救美国妇女，使她们从女性奥秘的极大危险中脱身出来。

1957年，我被要求填写一份女校友调查表，这些女校友都是从史密斯女子学院毕业15年之后的大学同学，我抓住了这一机会,心想这下可以反驳那种日益增强的信念:教育促使了妇女“男性化”,阻碍了她们达到性满足,并引起了毫无必要的纠葛和不幸。我发现这些评论家只对了一半；教育确实是危险的，使人受到牵制——但只有当妇女们不去运用自己所受的教育时才是如此。

1957年在200名接受调查的妇女当中，有89％是家庭主妇。她们经历了教育在家庭主妇身上可能招致的一切不幸。但是当她们在回答了这些问题——“作为一个女人尽力发挥你的作用时，你觉得有哪些困难？……哪些是你今天生活中最使你满意的，哪些是最使你失望的？……你是如何改变你自身的？……你对年龄增大有何感想？……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是希望什么？……”——之后，人们发现，作为女人，她们的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由于教育引起的。一般说来，她们只对一件事感到遗憾：她们没有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教育，没有打算把所受到的教育认真地加以运用。

在已婚的97%的妇女中（通常是大学毕业后三年结婚的），只有3%的人离了婚；在婚后曾对其他男人感兴趣的20%的妇女中，绝大部分“什么也没干”。作为母亲，86%的妇女都打算生孩子，对怀孕感到高兴；70%的妇女自己喂奶，从第一个月哺育到第九个月。她们比自己的母亲生的孩子多（平均为2.94），但只有10%的人感到当妈妈是“牺牲”。虽然98%的人都说，性只是自己生活中“许多因素中的一种”，但是她们既不觉得性生活已经完结，也不是作为一个女人刚开始领略到性满足。约有85%的人说，性生活已“逐年和谐”，但她们也感到性生活“比起过去，已不那么重要了。”她们与丈夫“就像能与另一个人尽力分享那样”去分享着生活，但是有75%的妇女毫不隐讳地承认，她们是不能全部分享的。

讲到自己操持家务这一主要职业时，其中大部分妇女（60%）不能坦诚地讲出，自己就是觉得这是“心满意足”的职业。她们平均一天只花四小时干家务，而且她们对此并不“满意”。在她们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时，她们所受的教育也许确实使她们感到不顺心。在女性奥秘时代之前受到教育的妇女之中，许多人都在那种主妇的角色中有过与显露的个性突然脱节的经验。但是，这些妇女中的大多数人仍然在郊区家庭主妇的模式中发展着——这兴许是由于自发性、目的感以及她们的教育所赋予她们的那种为广阔的生活理想所献身的精神在起作用。

约有79%的妇女，就绝大部分而言，已经在社区自然范围内找到了某种方式去追求教育所赋予她们的生活目标。她

们虽然遭到老海伦·霍克逊[1]的丑化，但是她们承担的社区职责通常是一种成熟的行为，一种受到使用并使之再生出自我力量的献身。对这些妇女来说，社会活动几乎总带有革新和个性的特征，而不带有顺从、追逐地位或逃避的特征。她们在郊区没有幼儿园的地方建立起合作幼儿园；在学校里开办了少年小卖部和图书馆，过去约翰尼[2]在这些学校里不读书，因为很简单，这些学校过去根本就没有好书。她们改革了教育，使新的教学项目最终成为全部课程的一个部分。有一个妇女个人为一次有名的公民投票得到13000个签名出了大力，以使学校制度更具有政治影响力。有一个作公开演讲，主张在南方各校中废除种族隔离。有一个妇女让白人儿童上北方一所事实上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有一个妇女通过西部的一个州议会促使政府为心理健康诊所拨款。有一个妇女在婚后逗留过三个城市为学龄儿童创办博物馆艺术活动。其他的妇女还开办或领导了郊区合唱团、市民剧团、外交政策研究小组等。30%的妇女积极参加从委员会到州议院的地方政党活动。90%以上的妇女在调查中说她们每天通读报纸，并且定期参加选举。很明显，她们从来不看白天的电视节目，好像从来不玩牌或看妇女杂志。她们在一年中所阅读的15到300本书中，有一半不是畅销书。

大多数这类妇女在面临40岁时，都能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头发正在花白，“皮肤看上去已失去了光泽，显得衰老”，

---

① 霍克逊(1893—1949)，美国漫画家，他从1925年起，共为《纽约人》杂志画了1700多张漫画，作品多是讽刺美国主妇或俱乐部女会员。——译注

② 美国典型姓氏，这里指普通学生。——译注

但是，她们对失去的青春并不感到十分遗憾，而且说，“我对自我实现，内心的宁静感以及力量的意识越来越强。”“我已经变得更像我真正的本人了。”

“你在孩子长大成人之后将如何安排你的生活？”她们在调查中被这样问道。其中大多数人（60%）都有具体的工作或学习计划。她们计划最后完成自己的学业，因为当时在大学里还没有事业心而现在有了。少数试图只是像一个家庭主妇那样去生活的妇女简直到了“苦难的深渊”，“幻灭和绝望的边缘”。有些妇女急切地承认，“管管家，养四个孩子，这并没有真正地用上我所受到的教育或自己似乎有过的那种能力。要是能把做母亲和干事业结合起来就好了。”最痛苦不堪的是这些人，她们说，“我从来就没发现自己是哪一种人。我试图在社会生活中发现自己，结果荒废了大学学业。现在我要是能深入到某个方面，享有自己的创造性地生活就好了。”但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是哪一种人，要做些什么；并且有80%的人对没有认真地计划在专业工作中运用自己所学知识这一点感到遗憾。当她们的孩子稍稍长大一些，要她们被动地了解，甚至于主动地参加到社会活动中去都不能再使她们满足了。许多妇女都计划去当教师；幸好对她们来说，亟需教师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回到生活的主流中去的绝好机会。其他一些人期望能深入学习数年之后，能胜任自己所选择的专业工作。

在全国的妇女中都有与这200名史密斯女子学院的毕业生相类似的女人，即那些有才能的，为摆脱家庭主妇困境正在奋斗的妇女，或那些由于自己所受到的教育从未陷入这种困境的妇女。但是这些1942年的毕业生已经是属于女性奥秘时

代以前的最后一批受到教育的美国妇女了。

另一项于1962年，即在霍利奥克山学院125周年纪念期间，对近万名该院毕业生中进行的调查中，人们看到了女性奥秘在过去20年中受到教育的妇女身上所起到的影响。霍利奥克山学院的女校友显示了类似的现象：极高的结婚率，和极低的离婚率（总共2％）。但是在1942年以前，大部分妇女是25岁或更大一些才结的婚；而1942年之后，结婚年龄急剧下降，有四个或更多孩子的比率直线上升。1942年以前，毕业生中有2／3或更多的人都继续深入学习；这一比例已经不断下降了。与1937年的40％的人获得高学位相比，近期毕业的班级中极少有人获得艺术、科学、法律、医学、教育学科的高学位。急剧下降的数目似乎是与国内或国际义务的发展正好相反，加入地方政治俱乐部的人数到1952年的毕业年级已降到12％。从1942年起，极少毕业生在从事专业工作。霍利奥克山学院一半的女校友都曾经工作过，但后来都不干了，其原因主要是她们选择了“家庭主妇这一角色。”有些人已重新工作，一是因为此举增加收入，二是因为她们喜欢去工作。从1942年开始的年级中（其中大部分女校友现在都是家庭主妇），近一半人都打算回去工作。

从1942年起，献身于家庭之外的范围日益狭窄是女性奥秘影响了受过教育的妇女的一个明显迹象。看到这种绝望的空虚，看到这许多年青的妇女的“困境”感，她们在女性奥秘的笼罩下受到教育而成为“家庭主妇”，我意识到了我的同学们经历所包含的意义。由于她们受过教育，她们中许多人就能够把自己重要的事业与婚姻，家庭结合起来。她们能够参加到需要才智和责任心的社区活动中去，并继续走

下去，经过几年的准备，深入到专职的社会工作或教学工作中去。她们能够得到代课教师或兼职社会福利工作这些职业，用所得报酬来付为取得合格证书去学习有关课程的费用。她们常常达到了这一步：自己已不再想回到大学毕业后曾经干过的专业中去了，她们甚至能以教育所赋予她们的那种自发性而进入新的领域。

然而今天的年青妇女们如何呢？她们从未尝过高层次的教育，她们退学去结婚，或在教室里虚度光阴等待“理想中的男子”。她们40岁又将如何呢？每一个郊区和城镇的家庭妇女今天都在追求更多的教育，好像一门课程，任何课程都能够赋予她们正在探求的自我意识。但是她们所学习的课程，为她们提供的课程，却极少被她们在社会上派上什么用场。比一个妇女在18岁时以性幻觉方式逃避的教育更甚的是，她在40岁所能得到的教育已被女性的奥秘所渗入，所污染，因而大大减色了。

对于那些有关高尔夫球、桥牌、地毯编织、精美食品烹调、缝纫等的课程，我想这些呆在家庭主妇陷阱中的妇女是会把它们派上用场的。而成人教育中心通常提供的那些所谓的知识型课程：艺术鉴赏、制陶工艺、短篇小说写作、法语口语、名著阅读、太空时代天文学，只是作为“自我充实”而已。学习研究、下苦功夫、甚至家庭作业都意味着要长期尽力，因而都不是主妇们所期望的。

实际上，许多学习这些课程的妇女非常需要正规的教育；但是如果她们从未尝试过这类教育，她们就不知道该如何下手，甚至也不会懂得，如此众多的成人教育课程都是因为她们没有认真对待才显得使她们为难。一门特别为“家庭主

妇”设计的课程，其本身甚至对“自我充实”都是必要的，有实际意义的，但仅凭课程名称就会被人讨厌。这是确实无疑的，甚至在那些在授课方面享有着最高水平的机构中也是如学。最近，拉德克利夫学院宣布成立了一个“行政官员夫人学会”（大概根据“科学家夫人学会”或“艺术家夫人学会”或“大学教授夫人学会”而来的）。年龄在35岁或40岁，孩子也都上学的行政官员的妻子或科学家的夫人要想靠学习以便用更具体的，代理性的方式去分享她丈夫的世界从而取得她所需要的新的自我，是很难的。学习丈夫的专业知识于事无补，她所需要的是训练她得到她自己的创造性的工作。

在我走访的妇女中，我发现只有当教育是新的生活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且要使其在社会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业余或专职的都行），教育才是解决那种无名难题的钥匙。她们只有在正规的学院或大学才能找到这种教育。且不论女性奥秘在少女和她们的教育工作者身上所酿成的如意想法是什么，一个妇女在18岁或21岁逃避了的教育，要在有了丈夫，有了三四个孩子和一个家庭，自己的岁数也已经31、38或41岁的时候再获得，其难度是无法逾越的。她在学院或大学里要正视女性奥秘所造成的种种偏见。不管她脱离学术试验场的时间有多么短暂，她为了得到再次承认，必须一再显示自己学习目的的认真。她必须与自己以及像她一样的妇女在这一时代过份生育出来的成群的孩子们竞争。对一个成年妇女来说，要坐下来学完为青少年设置的课程，再像青少年那样被对待，不得不证实自己应当像一个青少年那样被正式接受，要做到这些是极不容易的。一个女人不得不发挥出自己的独创性，忍受种种挫折，去找到一种适合自己需要的教

育，并且还要使这种教育适合自己作为贤妻良母的职责。

我走访过一个妇女，她从未上过大学，在得到精神治疗之后，她决定在附近的一所大学学习，一年学两门课程，碰巧这所大学开办了夜大学。起初，她对所学的课程感到茫然。但两年以后，她决定主修历史，并准备到中学去任教。在学习中即使她常常对缓慢的进度和附加作业感到极不耐烦，但她的成绩始终很优秀。至少，带着一定的目的去学习强过她从前在儿童游乐场看侦探小说或杂志时的感觉。最主要的是，这正引导着她朝面对未来的实际走去。但是，以一年学习两门课程的速度来计算（当时费用是420美元，一周两个晚上），她要花10年时间才能得到文学士学位。第二年钱不够用了，她只能学习一门课程。她不能申请学生贷款，除非她在全日制学院学习，而要读全日制也只能等她最小的孩子进了一年级才行。她不顾这一切，这就样坚持了四年，其间她注意到了班上越来越多的其他的家庭主妇或是由于钱或是由于“整个过程拖得太长”的原因退出了学习。

后来，在她最小的孩子进入一年级时，她就在一所正规大学里成了一名全日制的学生，而在那里，进度甚至更慢，因为学生“更不正经学习”。她一想到要得到文学硕士学位还要好多年的时间就无法忍受（她需要这一学位在这个州教中学历史课程），因而她转向选修教育。要是她现在还没有一个去运用所学知识的明确计划，一种需要所学知识的计划，那么她当时就肯定不会继续这种既花钱又费时的学习了。由于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她可以得到一笔政府贷款来付全日制的部分学费（现在已超过一年1000美元）。再过两年，她就可以完成学业了。

就是面临如此巨大的障碍，越来越多的妇女，尽管她们实际上在社会上孤立无援，从教育工作者本人身上所得到的鼓励也是过时、有限的，也都回到学校去获取自己所需要的教育。她们的决心显示出了妇女身上被低估的人类力量以及她们亟待使用这种力量的迫切性。女性奥秘时代几乎过去2)年了，然而只有那些最坚强的妇女才能依靠自己继续向前。这并不是每一个妇女的个人问题，女性奥秘的内涵是全国范围内都必须正视的。

那种无名的难题实际上就是禁止美国妇女去充分发展她们的人类能力的事实。这一难题在我国体质和心理健康方面造成的危害比其它任何目前所知的疾病要严重得多。考虑一下妇女们在20至40岁期间的“角色危机”中所产生的情感崩溃发生率有多么高；想一想她们40岁至60岁期间众多的酗酒及自杀现象；想一想家庭主妇们对医生时间的占用；考虑一下美国青少年中那种令人吃惊的消极顺从吧。如果我们继续培育出成千上万的年青母亲，她们不去发展自己，不去继续学习，她们缺乏个性，没有一种较强的人类价值感去传给她们的下一代，那么，很简单，我们就是在灭绝我们的种族，就是在大规模地埋葬美国妇女，最终随着她们儿女们人性的消失而结束这一切。

这些问题是不能用药物来解决的，甚至也难以用精神疗法来解决。我们需要对女性的文化形象加以果断的改造，使其允许妇女不必与女性的完善分庭抗礼而成长起来，拥有个性，达到完整的自我。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必须广泛地、尽可能地做出努力，牧师、杂志编辑、市场操纵者、指导顾问都应做出努力，制止早婚趋势，打消少女们滋长的“只想做一

名家庭主妇"的念头，坚持要父母亲和教育工作者像给男孩子灌输让他们去发现自己的生活目标那样，从孩提时代起以同样的注意力坚持女孩子去发展自己的潜力，以这样的方式来制止上述现象。

当然，对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要对女性奥秘予以"否决"并不比一个青年女子或妇女容易，甚至是最高明的教育家，尽管他极其关注要自己去度过余生的主妇们近乎绝望的需求，他也不能立即阻止这种早婚的潮流。他们显得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已经被盛行的精神分析的预言所威摄住了，而且一想到会由此干涉一个女性的完善，就会万分内疚。由那些预言者们（有时候这类预言者就出自大学校园内）所提出的基本论点是：既然对一个妇女来说，通向自我的主要道路是结婚和做母亲，那么，在她履行妻子或母亲的义务时或许会引起矛盾的受教育的兴致或事业心，就应当推迟到哺养孩子的年月过去之后再说。一位精神病学顾问大夫在1962年就曾对耶鲁大学提出过类似的告诫，耶鲁大学当时一直在考虑容许妇女作为肄业生享受与男生同样的正规教育。

> 许多青年妇女，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似乎没有能力应付今后长期的智力兴趣，不要到她们经过自己作为女人而健康发展的更为基本的阶段之后才有能力应付今后长期的智力兴趣。……一个母亲在培养孩子、安排家庭生活方面要干好的话，就要靠女人的才智、情感和理性以及她所有的能力。她得到的训练越好，她就会得到更好的机会把这一工作干好，只要情感的路障不会拦住她的去路，就是说，只要她已经为成年女性的发展打下了

> 一个很好的基础，只要她在受高一级教育期间不屈服于有损于那种发展的压力。……急于实现自己充满矛盾的目标，强调男人世界中的一门职业或专业应当是安排她自己生活首先要考虑的，这就会相当不利地影响她本人充分的发展……在她祖母一辈人赢得的所有社会自由权利中，她首先赞成这一自由权利：那就是做一个健康的，心满意足的妇女。她希望没有内疚，没有矛盾……这意味着，在婚姻生活结构中，参加工作常常是可能的，然而却不能搞“事业”……①

这一事实依然存在：就像浪费东西一样荒废了自己的大学岁月，在自己早期工作的岁月中虚度光阴直到找到一个男人的姑娘，是在拿证实自我的可能性，性完善的希望和确定无疑的母亲义务赌博。鼓励一个妇女把自己远大的志趣推迟到孩子都长大成人以后的教育家实际上是根本不让她达到目标。对一个把自己已经完全确定为妻子和母亲达10年，15年或20年的妇女，要在35岁，40岁或50岁才去发现自己新的自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坦率地说，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是那些能够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早期教育，盼望并实际干了一番工作的人，是那些使婚姻和母爱拥有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那些不知为什么希望在以后才获得这些的人。最近，对一个东部郊区和城镇中50名女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她们最大的孩子都已离开了家），那些在工作中，在社区活动中或在艺术

① 罗斯托著，“两个世界的生活方式”，载《耶鲁评论》1962年第3期。——原注

中有所追求的的妇女早在大学期间就获得了这些兴趣，极少有例外。缺乏这些兴趣的妇女现在也不去争取；她们在自己“空荡荡的窝里”昏昏欲睡，盼望的只是一死了事。

每一所女子大学，每一所综合大学、初级大学、社区学院的教育工作者必须设法让妇女对观念领域，对社会极其重要的工作有一种终身的使命感（如果事业这一字眼太脏，含有过多的独身含义的话，不妨将其称为“生活计划”、“职业”，“生活目的”）。这些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求女孩子和男孩一样，认真深入某个领域，把它作为生活追求的目标。这并不意味对热衷了“入门”职业课程的妇女取消人文学科教育。人文学科教育，正如最好的大学和学院都要开设这种课程一样，不仅使人有头脑，而且使人产生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类价值感。但是，文科教育应当得到安排以付诸于实际的运用，而不应当仅仅把它作为业余嗜好，或者被动地加以欣赏。正如哈佛，耶鲁，哥伦比亚或芝加哥大学的男生要从文科必修课程一直学到建筑、医学、法律、自然科学一样，少女们也应当受到激励，为少女们继续向前，作出生活的安排。事实已经表明，拥有这种使命感的少女就不会那么急于加入早婚的行列，不那么急于找一个男人，对自己的性行为也更加负责。① 她们中的多数人当然都结婚，但是，她们的婚姻是在更成熟的基础之上的。因而她们的婚姻就不是一种逃避，而是一种两人共同担负的责任，这种责任成为她们对自己以及对社会负责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如果教育少女们担

---

① 柔福德著，“大学时期的个性发展”，载《社会问题期刊》1956年，第12卷，第4期，第36页。——原注

负起这样的责任，那么，性的问题以及她们何时结婚的问题就会失去其绝对的重要性。妇女们没有自我个性是事实，正是这一事实才使得性、爱情、婚姻以及孩子好像是她们生活中唯一的，根本的现实。

在隐匿着强大威慑力的女性奥秘面前，教育工作者必须认识到，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的措施，是难以激励青年妇女去认真对待自己的教育的。迄今极少数公开尝试过的人正在认真处理这一问题。玛丽·邦廷在拉德克利夫新开设的独立学习学院就很好，它很适合那些已经知道该做什么，追求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或已经积极学习人文学科，或仅仅从母爱中回到生活的主流时需要得到暂时休整的妇女。更重要的是，校园里这些妇女，即这些有孩子和丈夫的妇女，这些依然深深地扎在自己工作中的妇女的出现，毫无疑问，将有助于消除职业妇女的独身形象，并将激励一些拉德克利夫学院学生气十足的二年级学生，使她们从"难以预料的倾向"中顿悟过来，那种倾向就是允许她们接触国内最高水平的教育精华，但只在今后的婚姻和母亲的职责中才去使用。这就是玛丽·邦廷心中所想到的。这类学习机构可以在其它地方开设，甚至可以采取更简单的方式来进行。

希望鼓励妇女认真对待教育，并且根据妇女的能力雇佣他们能发现的所有那些以心灵的生活把婚姻和母爱结合在一起的妇女——即使这意味着对怀孕的迁就或打破有关雇佣副教授的妻子的陈旧规章也无妨，只要这些妻子有着自己受人尊重的硕士或博士学位，每一所这样的大学或学院都不会吃亏。至于未婚的女学者，再也不能像对待麻疯病人那样来对待她们了。简单的事实是，她们是认真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存

在的，她们已经发挥了自己的人类潜在能力。她们或许会受到妒忌，而实际上是经常受到其他女人的妒忌，这些女人自己生活在丰盛的家庭聚会的偶象之中，然而却已经丧失了她们自己。女人，与男人一样，只有扎根于人类的工作之中，才能扎根于生活。

最重要的是，教育工作者本人应当去“否决”女性的奥秘，并且正视这一事实，即教育妇女唯一的要点就是教育她们竭力发挥自己的能力。妇女们并不需要学习“婚姻与家庭”的课程去嫁人理家；她们并不需要学习家庭管理课程去操持家务。然而她们需要学习科学以便在科学中有所发现；需要学习过去的思想以便萌发新的思想；需要学习社会以便在社会中开拓。教育工作者也必须中止“仅此一次”的折衷方案。那种分层的“教育”，“性”，“婚姻”，“母亲的职责”，“最后1/3生活年月的兴趣”，那种相互脱离的层次是不能解决“角色危机”的。必须教育妇女取得一种新的整体角色。越是鼓励她们为新的生活做出安排——使自己严肃认真地把对社会的终身责任与婚姻和母亲的责任合为一体——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时所遇到的冲突以及多余的挫折就会越少，而且，她们的女儿们也越不会由于缺乏妇女自我的完整形象而做出错误的选择。

我可以从调查女大学生蜂拥早婚的现象中看到这一点。十分明显，少数并不急于“找一个男人”，而且委身于自己长远志趣的少女并不担心自己因此会失去“女人的特性”，她们几乎全都有母亲或其他的个人偶象，委身于某种真正的人生目的（“我母亲正好是个教师”。“我最好的朋友的母亲是个医生，她好像总是很忙，但很愉快”。）。

教育本身可以促进新的形象的形成，可以使少女们产生出要创造她们自己形象的活力，只要教育对“妇女角色”的陈旧形象不再和稀泥，不再采取权宜之计，就会立即起到这种作用。教育，对于妇女如同对于男人一样，它是，而且必须是人类进化的摇篮。如果今天美国妇女在寻求新的自我时能最终从主妇的陷阱之中脱离出来，其原因就是因为如此众多的妇女已经体验到了高层次教育——尽管没有完成学业，没有认真对待，但这种教育仍然足以迫使她们继续向前。

因为这最后的，最重要的战斗能够在妇女自身的心灵和精神中来进行，所以许多美国的青年妇女甚至没有个人偶象，所受的教育也只是与一般人的一样，却获得了一种人类希望的意识，这种意识很强，足以使她们超越那种昔日的女性形象，超越那种旨在异性的爱之中寻求保障的行为，并找到一种新的自我。一个刚开始做实习医生的斯沃斯莫尔学院的毕业生告诉我，由于她起初觉得自己在大学越来越“独立”，因此对约会和结婚感到很烦脑，很想“占有一个男生。”“我就设法迫使自己更具女性的气质。后来我对自己的所做所为开始有了兴趣，并且不再烦恼了。”她说。

这好像是你有了某种转变。你开始感到自己做事情的能力。就像一个幼儿蹒跚学步一样，你的心灵开始扩展。你发现了自己的天地。这实在是太好了。喜欢干这种工作，觉得确实存在着什么的感觉，而且你们可以信赖这种情感。要说不愉快，这也合算。人们说，一个男人只有受到磨炼才能成长起来，或许，这种事也会落到女人身上。你开始对成为你自己不再担惊受怕了。

现在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对那些受到女性奥秘诱骗的妇女进行再教育。我走访过的许多感到当主妇是“上当受骗”的妇女，在过去的几年中已经开始从这一陷阱中走了出来。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妇女又重新陷了进去，因为她们没有及时地发现自己想做些什么，或是因为她们难以找到进行的方式。几乎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现存的教育机构都会花太多的时间，花费太多的资金。极少的家庭妇女能够参加全日制的学习。即使大学允许她们按业余时间体制学习（就这样许多人都不行），也没有几个家庭妇女能在这种10年或更长的正规大学教育的缓慢节奏中坚持下来。有一些学院现在愿意对家庭妇女进院学习冒冒风险，但如果受到大学束缚的产物蜂拥而至，这些学院还那么情愿吗？在萨拉·劳伦斯和明尼苏达大学开办的试行教学就开始显示出了这一倾向，但它们还没有承受时间和财力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对许多妇女来说是难以克服的。

现在需要的是对那些妇女实行一项全国性的教育计划，与士兵福利法案[①]相类似的计划，以适应那些非常愿意继续受教育或重新开始受教育，并且愿意在职业中去切实发挥这种教育的妇女的需要。这项教育计划应当为能够胜任的妇女提供学费，外加助学金以支付其它开销，如书、旅费等，甚至如果需要的话，支付一些家务费用。这一计划会比士兵福利法案的开销少得多。这一计划将允许母亲们在不能参加正规学习的年月里利用业余时间使用现行的教育设施进行自

---

① 士兵福利法案，美国国会1944年制定，其目的在于协助第二次大战期间退役的士兵接受教育或职业训练以及购买房屋等。——译注

学，并且在家进行课外自修项目或科研。妇女教育的整个观念都应当重新加以考虑，让其满足于四年制大学教育到生活计划的需要，使一个妇女在这类教育中不与她的婚姻，丈夫和孩子发生冲突从而能够继续自己的教育。

那些经过第二次大战的士兵在战争中成熟起来，他们需要受到教育，以此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由于无心浪费时间，他们渴求受教育的行为使他们的老师，甚至他们自己都感到吃惊。在家庭主妇禁锢时期成熟起来的妇女，也能够指望她们自己表现出类似的行为。她们对教育的渴求以及这个国家在所有职业中对妇女才智储备的渴求均表明了这些应急措施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那些没上大学或过早退学的妇女，那些对以前的天地不再感兴趣或那些从未认真对待过受教育的妇女，我要建议她们首先要对人文学科进行强化地、密集性地重新攻读——不是像新生和二年级学生通常对学科进行摘略和选择式地概览，而是像贝尔电话公司或福特基金会为青年董事们试办的教育试验那样强化学习，因为这些年青董事原先与驯服职员没什么两样，以致于在身居高位时根本没有所需要的首创精神和开阔的视野。对于妇女则可以采取一种全国性的集训来进行，依据成人继续教育运动的原则来进行，这可以先让主妇们参加六周夏季强化集训这样一种智力上的“震动疗法”，以此让她们回到思想的主流中去。可以给妇女们一些补贴，这样她们就能离开家，上一所能住校的、夏季得以空闲不作其它用途的大学，或者她可以去都市中心，以同样强化的体制在夏季一周五天连学六至八周的时间，同时该中心设立儿童白昼夏令营以方便孩子。

也许这一教育震动疗法能够使精明强干的妇女清醒，激励她们为进一步的专业训练去完成四年大学课程。这一大学课程可以在四年或少于四年的时间内完成，妇女们不参加全日制的课堂学习，而是采取将夏季集训与可以在冬季在家里进行的指定阅读、答卷以及课外自修项目结合起来的方式来完成。大范围的电视课程或地方社区大学和学院开设的课程可以与年中或每月的面授结合起来。这些课程的学习可以采取学分制，学员也可以获得通常的学位。一些“相应”的制度要制定出来，对那些学习平平，不适应需要的妇女不予承认，而对于真正严肃认真地去努力的妇女才予以承认，即使她们的学业是继续的，分别在几个地方，并且是违反传统大学标准的方式来完成的都可以。

好些大学无意识地在业余学习或为毕业安排的功课中设置障碍，阻止了家庭妇女们继续学习。或许这些大学是被妇女们不认真学习的态度激怒了。可是业余学习大学课程，完成毕业或未毕业的课程，那种适合一项认真的生活计划的课程，是唯一能防止家庭主妇不认真学习的教育方式，是一个与丈夫、孩子在一起的妇女能够得到的或继续得到的受教育的唯一方式。从大学的观点来看，这也是最切实际的安排。大学的设施由于人数压力已经超负荷运转，因而大学和妇女双方都会从不需要正规课堂教学的学习安排中得到好处。明尼苏达大学根据正规大学设施制定出非常出色的妇女继续教育计划①，这是极有意义的。但这种计划对必须从头开始以

---

① 森德斯著，“明尼苏达妇女继续教育计划”，载《教育档案》，美国教育委员会编，1961年10月，第10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找到自己出路的妇女来说，并没有什么帮助。不过，一旦妇女开始实施自己的生活计划时，任何学院的设施都可以用来填补这一差距。

大学和学院也需要一个新生的计划——成为学生一生的学府，指导她们，负责记录她们的学业成绩，密切注意她们高级阶段的学习或补修学科，不管这些课程是在哪里学的都无妨。要是一个妇女能指望她的大学继续给她以教育和指导，而不是指望筹款茶会，不是指望每逢6月5日举行的伤感聚会，那么她会从女校友那里得到多大的鼓舞和经济支持啊！巴纳德学院的女校友们，只要她们获得批准，就可以，而且确实可以随时返校免费上课。所有的学院都可以操办暑期集训，这样在妇女们初做母亲的时期就可以让女校友们跟上专业发展的步伐。这些学院可以接受兼职学员，为不能定期上课的家庭妇女提供函授课程。这些学院可以为妇女在阅读课程，答卷或论文以及课外自修项目或科研方面提出建议。学院也可以制定出一种制度，女校友们可以根据这一制度在各自的社区完成教育、心理健康、社会学、政治科学等方面的自修项目，这些项目可以同样纳入学分以取得学位。不是让妇女志愿者们积下几个小钱，而是让她们进行受到指导的专业见习并积累能够得到认可的学分，其目的不是为了支付见习医生的费用。同样，当一个妇女在好几所不同的学院学习了课程（或许这是由于她丈夫干涉的缘故），并且她已经从机关、医院，图书馆或实验室中获得了社区学分，她的大学母校，或由几所大学开办的某种全国性的中心就可以对她进行口试，综合性测试和特定的考试，然后根据考试授予学位。“继续教育”的思想对于男人已在许多领域中成为

了现实。为什么不可以对妇女也这样呢？对妇女来说，这种教育不是为了事业而不要母爱，不是出于做母亲之前暂时工作的需要，不是让她们“当好贤妻良母”，而是一种把她们视为社会正式成员而要对其加以使用的教育。

“但是有多少美国妇女真正想在一生中多干点儿什么呢？”玩世不恭的人会问。新泽西州的家庭妇女要求参加一项数学强化轮训的人数多得令人难以置信，这项轮训是为原来上过大学，愿意成为数学教师的妇女提供的。1962年1月，《纽约时报》一条简明新闻宣称萨拉·劳伦斯学院的哈丝特·劳申布什已得到许可，帮助成年妇女在业余时间（与做母亲协调起来）完成学业或获得文凭。对此做出的反应简直使小小的萨拉·劳伦斯学院的电话交换台难以承受。24小时之内，劳申布什夫人就接了100个电话。接线员说，“就像电影院举行夜间观众抽奖一样，好像她们必须马上来，不然就会错过这个机会似的。”劳申布什夫人会见了那些申请参加学习的妇女后，她跟明尼苏达大学的弗吉尼亚·森德斯一样，对妇女需要受教育的现实简直确信无疑。这些妇女并不是“神经过敏，要抛弃”丈夫和孩子，她们并不需要心理治疗，而是确实需要更多的教育——这种需要已经刻不容缓了——而且，她们需要以一种不抛弃丈夫和家庭的方式来受到这种教育。

美国妇女为达到认真的目的要获取的教育和再教育，不是由一二所有远见的学院就能完成的，它必须在更大规模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那些重弹女性奥秘的陈词滥调的人，即便是为了权宜之计或打圆场，也难说是符合这一目的。有一种说法，就像一些主要的妇女教育家今天所说的那样，说妇

女当然要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知识，但是，她们不能在那些会与男人竞争的职业中运用，绝不能有这种事。这种说法是错误的①当妇女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教育和自己的能力，并把它们付诸于实际运用时，她们势必要与男人竞争。对一个妇女来说，像男人那样在社会参加客观的竞争，这比她在家里与丈夫争夺家庭支配权利，与四邻竞争那种本不存在的地位，并因此窒息自己毫无竞争可言的儿子相比要好得多。看一下最近有关美国最新职业疗法的新闻吧，这些职业疗法都适应了受到抑制的妇女参加竞争的需要：

这是达拉斯市②平时很典型的一天。爸爸在工作。婴儿在睡早觉。在隔壁房间里哥哥（3岁）在骑着新摇马，布西（5岁）在看电视动画片。妈妈呢？妈妈只有几步远，弯腰站在53道上的罚球线上，臂部朝左扭动着，浅蓝色的大理石球打进一、三柱之间的凹穴处，妈妈在玩地滚球。不管是在达拉斯、克利夫兰③，还是在阿尔伯克基或斯波坎，精力充沛的主妇们丢掉了抹灰布、吸尘器，把孩子拉到新的球场空地，那里有设备齐全的托儿所，里面全日制的保育员随时准备照看孩子。

阿尔伯克基的德龙地滚球俱乐部经理说："一个女

---

① 邦廷著，"拉德克利夫学院的自修培训"，前引书，第19页及其后诸页。——原注

② 美国得克萨斯州北部城市，为州里第二大城市（仅次于休斯敦）。——译注

③ 克里夫兰，美国俄亥俄州最大城市。
阿尔伯克基，美国新墨西哥州最大城市。
斯波坎，美国华盛顿州东部城市。——译注

人结婚以后，她能到哪里去竞争呢？她需要跟男人同样的竞争，……这肯定比回家做饭烧菜强！①

地滚球场和超级市场有代管孩子的机构，而学校、大学、科学实验室和政府办公处则没有这样的机构，留意到这一点或许能使人觉得有道理。要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美国妇女不在某种有实际意义的追求中发挥她的能量和能力（这种追求有必要称为竞争，因为我们的社会每一种正经的追求中都存在着竞争），她就会在神经病的状态中，在徒劳之中，或在有害的“爱恋”之中，一点儿一点儿地把这种能量和能力消耗殆尽，这并非是耸人听闻。

对于那种认为美国妇女已经万事大吉，妇女的权利已经赢得了看法，我们现在不能再虚情假义地敷衍了。当少女们跨入了新的领域或回到她们原来的专业时，那种让她们不要声张，以免男人们会注意到她们在这个专业中的作法，真是荒谬之极。几乎在所有的专业领域、行业、艺术及科学领域中，妇女们仍被视为二等公民。告诉那些准备在社会中工作的少女们要预料到这种微妙的、令人不快的歧视——告诉她们不要悄然从事，不要以为这种歧视会自行消失，而应当与之做坚决的斗争，告诉她们这些确实会对她们大有好处。一个少女不应当以自己的性别而期望得到特别的优惠，但是，她也不应当去“顺应”那些歧视和偏见。

因此，她必须学会去竞争，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是作为一个人那样去竞争。社会本身要等到大量的妇女从生活的边

①《时代周刊》1961年11月。——原注

缘进入到生活的主流之后才会为她们的新蓝图作出安排。但是每一个设法在法律学校或医药学校坚持下来的姑娘，每一个完成了硕士或博士课程并继续运用所学知识的姑娘，都会使其他的人继续往前走。每一个与现存障碍做斗争以取得被女性奥秘掩盖的完全平等的妇女，都会使下一个妇女更容易地取得这种平等。在埃莉诺·罗斯福[1]的领导下的总统妇女地位委员会的存在本身，就创造了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下，歧视妇女的现象不仅有可能从妇女所得报酬，而且也可以根据她们机遇中的微妙障碍来加以识别，并有可能对其采取行动。即使是在政治生活中，妇女也必须是作为公民而不是"家庭主妇"来作出自己的贡献。当妇女们在"妇女为了和平罢工"的旗帜下抗议核试验时，或许这是进入正确方向的一步。但是为什么那个领导这场运动的专业插图家说，她"只是一个家庭妇女"，为什么她的追随者坚持说，一旦停止核试验，她们就会和孩子们愉快地呆在家里？即使在大政党核心集团的城市中心，妇女也能——而且正在开始——改变那些暗中不成文的规定，即让她们做政治的家务（打杂），而让男人们去决策。

当足够的妇女制定了适合自己能力的生活计划，并且为妇女的产假甚至休假专职管理托儿所而疾呼，并为一些规章制度的必要改进而呼吁时，她们就不会像牺牲自己的婚姻和母爱那样再对自己参与正当的竞争和有所贡献的权利做出牺牲了。老是要把那种毫无必要的选择讲清楚是错误的；这种

---

①埃·罗斯福（1884—1962）富·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当时世界上最受人敬佩的妇女之一。——译注。

选择使妇女无意识地抵制为事业献身或拒不履行母亲的责任，这种选择抑制了对必要的社会变迁的认可。妇女是可以做到两全其美的。一个妇女受到了她性别的阻碍，而她也以某种方式阻碍了社会，这种方式或是盲目地模仿男人在专业中进展的模式，或是拒不与男人竞争。但是她只要有安排自己新的生活的愿望，她就可以履行自己对专业和政治的使命，并且也能以同样的认真态度尽到自己对婚姻和母爱的责任。

不顾女性奥秘的可怕警告而做到这一步的妇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实现了“突变”，树立了一种美国妇女能够成为的形象。当她们没有或不能够为了生活而整天工作时，她们就会把业余时间花在真正使她们感兴趣的工作上。因为时间是绝对重要的，因此她们常常跳过那些费时无功的家务琐事和毫无价值的繁琐工作。

不管她们清不清楚，她们已经在遵循着一种生活的安排。她们在做实习医生之前或之后，在交友期间就有了孩子。如果在孩子早期哺养那几年她们不能完全脱身的话，就放弃职业找一个兼职的工作，这种工作的报酬或许不那么可观，但可以使她们在工作中继续得到发展。教师们改革了家长教师联谊会并取而代之；医生们在离家近的地方看门诊或从事研究；编辑和作家们开始做自由编辑和作家。即使她们挣的钱不是为了开销食品杂费和家务花费（往往是），但她们也都实实在在地证实了自己做贡献的能力。她们并不认为自己“有幸”成为家庭主妇；她们在社会上竞争。她们懂得，婚姻和母爱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然而却不是生活的全部。

这些"突变"的妇女们体验到了，并超越了这种"生活角色调节中的文化间断"、"角色危机"以及自我危机。她们当然有难题——棘手的难题：要隐瞒怀孕，找保姆和女管家，当丈夫调离时不得不放弃自己满意的工作。她们还要去忍受其他妇女对自己的那么多的敌意——许多妇女还得去忍受她们丈夫们那种频频的怨气，并且，由于女性奥秘的作用，许多妇女感到内疚，忍受着毫无必要的精神上的痛苦。当社会不对妇女的新计划有所期望时，妇女们要追求它就曾经、而且仍要拿出非凡的意志力。但是，她们与陷入陷阱中的家庭主妇不同，那些家庭主妇的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成为痼疾，而她们则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又继续向前了。她们抵制了众多的规劝和操纵，坚持自己的生活准则，使之与理想相一致，这一过程往往是痛苦的。她们并没有退避到利己主义之中，而是去迎接真实世界的挑战。现在她们已十分清楚自己是谁了。

她们或许并没有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她们正在做每一个男人和女人现在所必须做的事以跟上历史疾驰的步伐，并且在我们的群体社会中去发现或保持各自的自我。男女中存在的自我危机不能由一代人为另一代人所解决；在我们急剧变化的社会中，人们肯定会持续地正视这种危机，也只能在一生的再次正视中来解决它。一种生活的安排必须易于变化，因为新的可能性在社会中以及本人身上都在发展着。美国今天没有一个开始寻求自我的妇女能够确信自己会走向何方。今天，没有一个妇女不经过斗争、冲突，不经过自己的果敢就开始寻求自我。然而我所遇到的妇女，那些正沿着那条未知的道路向前的妇女并不对自己所遭受的痛苦，付出的努力

和担当的风险感到有什么遗憾。

就妇女争取解放的长期斗争来看，最近美国的性反叛或许是最后一次危机，一种幼体破壳而出进入成熟期之前的奇特的间隙——一种无数妇女把自己暂时搁置起来并停止发展的延缓。人们说，科学有一天将能采取冰冻人类身体的方式使其具有更长的生命力。美国妇女近来已经比男人活得更久——像活着的死人一样安度自己的余生。当妇女们挑起了更多的与世抗争的重担而不是自己成为包袱的时候，兴许男人们在美国会生活得久一些。我认为，她们荒废的精力会继续加害于她们的丈夫、孩子以及她们本人，直到这种精力消耗在她们自己与世抗争之中才会完结。然而当妇女们像男人一样摆脱了生物生存而意识到她们的人类自我的时候，这剩下的后半生或许会成为她们生活中得到最大满足的年代。

于是，出现在家庭主妇形象上的裂纹将得到愈合，她们的女儿们也不会在21岁或41岁的时候去正视那种面临抉择的问题。当少女们的母亲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种实现使少女们确信自己想作女人的时候，她们就不会“强迫自己”具有女性的气质，她们可以竭力发展，直到她们自己的成就告诉她们自己是谁为止。她们将不再凭着少年或男人的好感才能感到自己的活力。当妇女们不再需要通过丈夫和孩子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目标时，男人们就不会对女人的爱恋和力量感到恐惧，他们也不需要其他人的虚弱来证实自己的男人气概。他们最终能看到人们相互的本来面目。这或许是人类进化的下一个阶段。

当妇女们最终自由地成为她们自身的时候，有谁知道她们能成为什么呢？当妇女们不摒弃爱情就能培养自己的才智

时，有谁知道她们这种才智将奉献出什么来呢？当男人和女人不仅分享孩子、家庭和花园，不仅分享他们生物作用的满足，而且分享工作的责任和热情，这种工作将创造人类未来以及他们是谁这种完美的人类认知时，有谁会了解这种爱的希望呢？妇女们的自我探寻已经开始了。女性奥秘的喧嚣再也不能淹没这种驱使妇女们日趋完美的内心呼唤的时代，已经指日可待了。